



廣場活碑

一個香港女記者眼中的六四血光

蔡淑芳

文化糧食 閱讀快感

四筆象 038

廣場 活碑

一個香港女記者眼中的六四血光

作者 | 蔡淑芳

電郵 | sfchoi8964@gmail.com

編輯 | 陳國權

美編 | 小魚

出版者 | 四筆象出版社

地址 | 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電話 | 27805625

印刷 | 新雅印務公司

總經銷 | 田園書屋

地址 |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56號2樓

ISBN | 978-962-7420-64-4

出版日期 | 2009年6月4日 初版

定價 | \$ 64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 錄

題字 司徒華

獻辭 游順釗 風雨之夜 6

序 蘇曉康 她從來沒有撤離廣場 8

史 明 「六四」記憶的意義 10

自序 我的失魂落魄與劫後餘生 12

廣場實錄

緣起 18

4·26 – 4·30 學潮印象 19

5·1 – 5·12 遊行現場 44

5·13 – 5·19 絕食請願 72

5·20 – 6·4 戒嚴令下 98

劫後記憶

5·20 兵臨城下 142

5·21 疲勞轟炸 155

5·22 堅持留守 165

5·23 風起雲湧 174

6·2-3 解放軍進城 182

6·4 廣場死寂 184

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大事紀要 204



人物專訪

前言	212
周勇軍 「犯錯是因為不想同學過激造成流血」	214
王丹 「擔憂學生內部失控會導致運動的發展偏離軌道」	216
吾爾開希 「擔心後半輩子是被人主宰和安排」	219
馬少方 「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呼喚民族醒覺」	223
趙少若 「學生運動是在承擔中為未來書寫歷史」	224
馬少方 再訪談學運組織及決議過程	226
蘇曉康 「學生被一步步迫向對抗」	236

餘生心緒

北京發生了甚麼事？ 給香港中學生的演講稿	260
國殤日感懷	266
逝去的並沒有白白犧牲 一年後重訪北京見聞	270
一位記者的剖白	273
去年的北京，今日의香港 「六四」一周年悼文	275
甚麼時候能好好的睡一會	278
民運採訪經驗談	282
黃泉路上獨來獨往	285

廿年痕傷

廿載的心靈傷痛 為甚麼我對「六四」靜默	292
睹物思人：天安門兄弟	295
附 天安門兄弟 詞/張健	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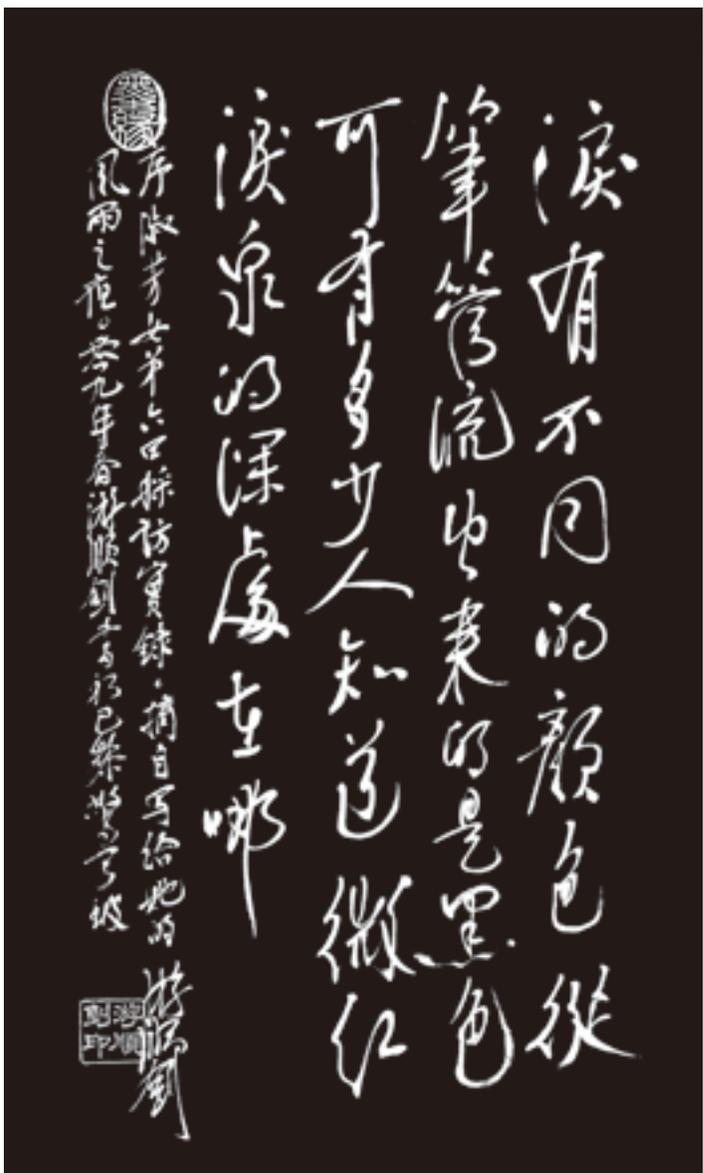
六四底層

六四底層列傳 黃河清編錄 蔡淑芳整理	302
六四軍人列傳 黃河清編錄	371

附錄

馬少方 從見證到抗議 記與淑芳的重逢並向香港記者朋友致敬	386
孩子，希望	400
紀念「六四」二十周年 我們呼籲	404
鳴謝	408
跋 微紅淚泉	410





獻辭

風雨之夜

你該慶幸活著回來，
可有人奇怪你還常流著淚！
不是早有詩人說過
是因愛這土地愛得太深沉？

每到廿年前那凌晨時刻，
你總禁不住淚流滿臉。
心態異常吧！他們可知道，
你的淚從哪兒流出來？

淚有不同的顏色，
從筆管流出來的是黑色。
可有多少人知道，
微紅淚泉的深處在哪？

這也難怪有人不理解，
當代的醫術可曾
給你提供過透視，
掃描你心靈的痕傷？

淑芳賢女弟一九八九年赴京採訪。在那驚心動魄的風雨之夜，心靈受了重創，二十年後仍難以開解，足見人禍之遺患，較之天災為甚。現淑芳當年的採訪實錄行將發表，謹題幾句暗含慰勉的話作為獻辭。

游順劍 二零零九年春書於巴黎·驚弓坡



蘇曉康 序

她從來沒有撤離廣場

二十世紀的歷史，比先前的時代更需要目擊和見證，因為太血腥。

我們被籠罩其下的這個時代，有一個血腥的起點，發生在眾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快要被塗抹、消音得乾乾淨淨了，於是它更是需要目擊者站出來向後人後世提供見證。這種使命，是將我們所有人都要肩擔的劇痛和責任，卸落、強加在罕見的承擔者身上，而使他們忍受劫後餘生。

然而，這也是一種資格，只有稀少的人，有幸具備這種資格。二十年前在紀念碑底下的那個悲壯夜晚，纖瘦的蔡淑芳，溶化在茫茫靜坐者的淚光和歌聲裏，一夜之間死而復生，成了另一個人。她跟廣場上的學生們一道，靠電筒光寫下自己的遺言：「也許我也要寫遺書吧！在這樣的一個夜裏，我從個人掙扎到國家興亡的潮流中淹沒自己，我相信我這樣做是對的。」由此，她獲得了這種資格。

「凌晨一時，在廣場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方向發射，信號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閃光，散落……廣場上歌聲悲壯動人……信號彈發放詭異彩光，製造恐怖的戰場氣氛。」蔡淑芳就是這樣，被定格在一幅她自己親手書寫的史詩裏。

她在槍聲流彈中奔突、跌倒。她在流血如注的槍傷者前面驚呆。她目睹了清晨四點的「熄燈」，「整個廣場漆黑一片」。她在紀念碑的東北面，曾經面對一個持槍的士兵朝她走過來。五點三十分，她在撤離人群中，回頭看了天安門最後一眼。許多人死在天安門廣場，卻也有人永遠活在那裏。

「六四」一百天後我逃出中國，卻在香港遇到逃不出中國的以淚洗面的蔡淑芳。她茫然若失在四點鐘的廣場上，以後便一次次地驚叫、哭醒在香港的深夜裏。我們流亡者「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她卻失去了自己往昔的一切：美好與天倫之樂。她囚禁自己，不比獄中的「六四囚犯」有更多自由。她化為每年「六四」維園燭海裏的一點燭淚。她陪整個民族受難。

她不是軟弱。她只有恐懼，恐懼廣場上的血白流了，恐懼坦克碾壓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遺忘，等於再一次槍殺她！她也是一個「天安門母親」，煎熬歲月二十年，她那被謀殺的孩子，就是中國人的記憶。她的敵人是遺忘。

中共綁架中國，精英整體投降，西方輸誠利益。香港女子蔡淑芳的努力，或許只是杯水車薪。但「六四」把她淬礪成一個「革命者」——她已經忘我，她不再是一個私人的蔡淑芳。俗話說，時間改變一切；不屈不撓地跟歲月搏鬥，乃是她的回應。

她把自己變成了一座「六四」的活碑。

蘇曉康，1949年生於浙江杭州，北京廣播學院講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報告文學作家，是電視政論片《河殤》的總撰稿人，「六四」後遭內部通緝，被迫流亡法國、美國，為普林斯頓大學訪問學者。曾任民主中國陣線理事、《民主中國》雜誌社社長、「中國學社」執行主席。現居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



史明 序

「六四」記憶的意義

我不怕聽你訴苦。我想在歐洲，很多人只知道「六四」這個概念，並不清楚這場悲劇對全人類四分之一的巨大人群意味著什麼。因此，僅僅為了讓這些在溫飽和諧中「嬌生慣養」的人們對現代中國的悲劇有所瞭解，把你的所見所聞告訴他們，也非常值得。

人的記憶永遠都不可靠，這沒有辦法。但史書就很可靠嗎？所謂科學調查就很可靠嗎？既然人可以為環境所左右，為什麼歷史學家或者別的什麼科學家就可以例外？我們記者不能傲慢到聲稱我們的回憶絕對真實；但我們也絕對不可妄自菲薄到了僅只承認所謂「科學」，所謂「學者」的分析才可靠。這個世界中為權力和金錢所傾倒的，有多少科學家和學者呢？

回憶「六四」除作為史實的重大意義之外，在我看來也有另外一層現代中國任何其他歷史實踐不能比較的意義：你知道北京向來都是中國政治的「聖城」。天子腳下，就算殺人，也要推到城外菜市口，在城外集市上梟首示眾；遍翻中國皇朝史書，唯一在皇家內城折磨殺人的，就是明朝的廷杖；其他朝代對於孟子所云「君子遠庖廚」都有幾乎相同的解釋：天子和他的精英不屑和不能見到血淋淋。共產黨進北京城也未曾例外，按照這個黨的話說，北京是和平解放。日本人進北京城的

時候，除在郊外的蘆溝橋打了一仗之外，也沒有放槍。近代可以視為例外的，僅只段祺瑞政府曾開槍殺人，死傷遠不及一九八九年。結果段祺瑞立即下臺以謝天下。即便毛澤東治下的文革中國，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也只動用了工人民兵，動用了鐵棍和壘球棒。可以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國統治者打破了自己給自己留下的唯一聖城的最後禁忌：那就是哪裏都可以大開殺戒，唯獨北京不行。

以你的史筆記錄這一事件的細節，回顧當時人們的心態，難道不可以幫助我們反省這樣一個人類學問題：為什麼在改革開放的中國，這個國家行之有效了數千年的政治禁忌，可以打破？而打破之後的二十年，據許多中國人和據說特別熱愛中國的歐洲人、美國人、日本人，說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人民生活最好的二十年呢？難道現代的意義，也存在於徹底打破即便是據稱非常不人道的封建時期，也顛撲不破的神聖禁忌之中嗎？歐洲歷史有德國法西斯以對猶太人大屠殺打破如是禁忌的先例；中國現代化史上，「六四」難道是這樣打破禁忌的又一先例嗎？

我的這些想法未必妥當。但我們是記者，我們的任務永遠不是回答問題，而是提出問題，提出真正的問題。一生為記者，倘或可以提出一個屬於全人類的真正問題，實在足以告慰了。你說是嗎？

二零零九年一月六日

史明，1957年生於北京，畢業後曾在國際廣播電臺德語組工作，後轉職為中國技術進口總公司專案經理，1987年被派到德國科隆任公司代表，1991年以後，一直在德國作自由記者，從事廣播電視與平面媒體的亞洲報導工作。



自序

我的失魂落魄與劫後餘生

我的失魂落魄得從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在廣場上寫遺書說起。

也許我也要寫遺書吧！

在這樣的一個夜裏，我從個人掙扎到成為國家興亡的潮流中淹沒自己，我相信我這樣做是對的。

事實上，周圍都有傷亡了，難道我們坐在天安門廣場中的人能躲閃嗎？

這國家是沒救的了，這次流血事件叫人們一定要醒過來，徹底地把這政權栽下來。

這個沒救的國家，不能讓他這樣下去的。

我沒甚麼希望，我只想假如我有機會在這情況下死去，我覺得是很光榮的，因為苟且的生，何如壯烈的死？

黑夜，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國際歌聲中，我知道這夜將是最悲慟蒼涼的，誰會想到這不可思議的事情會發生？

我沒哭，也不怕，我知道這是光榮的，這是不能逃避的。

生死存亡又有何足懼？

槍聲嘩嘩，不絕於耳。沒有人知道為何會有如此的暴力，但既然暴力發生了，誰能抗暴而不受傷，又誰能不勇敢地向前進，向前衝？

我不知道死亡是甚麼滋味，但我知道要生就必須生存得有意義。

現在，我不想回到過去的，庸庸的生活中去，我在這裏經歷了一場革命的洗禮，我已獲得新生了，因此，我再也不用怕死，而且也想迎接死。

請原諒我對未來的恐懼和沒有信心，這是因為一切都叫人不能夠清醒和好好工作的。

死，又豈不是一次最好的完結嗎？

中國一定要有希望，中國一定要富強起來，中國人要勇敢地站起來，我們再不是奴隸，也不是卑屈者，我們不能苟且貪生，我們不能庸奴般生活，我們要醒覺過來去建造新中國。

把這場血化為新中國希望之源。

戰鬥開始了，死亡和新生也開始了。

我希望我在選擇生死的同時，是能夠認真地明白我的一切。

這是一場歷史的悲劇，請原諒我這種冒險。

1989-6-4 4:22am 寫於天安門廣場上

失魂落魄，劫後餘生，死去活來。這是我廿載回眸的心路歷程。《廣場活碑——一個香港女記者眼中的六四血光》，是我最後瞥見的光印記憶，是永久殘留視網膜上真實的血斑痕傷。

沒想到這光的印記投射在活碑上終於能夠面世。我以為那只是個人的傷痛，未完的心願；是埋沒在歷史長河的一滴血，也是隱藏在心靈深處的一滴淚。直到無數活碑逐一現身，我才發現廣場是公眾的，是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魂靈匯聚起來散射榮光和閃耀燭淚的偌大場所。

早在一年前，我已經開始為「六四」二十周年的紀念，放



下自己的工作。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早上，我用一個黑色的殘舊行李大箱，滿載「八九六四」的沉重包袱，托朋友幫我運送到支聯會，以便影印資料、掃描相片，彙編文物，為籌備今年二十周年紀念活動之用。

我打算全身投入，計劃參與「我要回家運動」的採訪工作，籌備六四舞台劇，協助《人民不會忘記》的再版，建立網上紀念館等等。結果，我只是聯署《零八憲章》，完成了簡單的爭取釋放昂山素姬的一天「自我囚禁」活動，密集發出民運訊息的廣傳電郵群組，為《紀念「六四」二十周年：我們呼籲》徵簽，最後把我的心事放進個人博客：<http://sfchoi.wordpress.com>，和貼在「一個香港記者的八九·六四」網誌：<http://sfchoi8964.wordpress.com>。

我最大遺憾是失去了最珍貴的文物，包括：寫滿北京學生簽名的T恤、「六四」廣場現場的錄音帶、濺有幾滴血的白布口罩、完成了一半的「八九」學運回憶手稿，還有一些當年留下來的雜誌。對一九八九年六月的記憶非常模糊，只定格在六月四日，沒法再倒回前幾天，我身不由己的迷離境界。依稀記得，我沒法返回天安門廣場守夜，於六月二日凌晨，城內已發現大批軍隊入城，只見在北京飯店附近神色慌張的娃娃兵，比圍堵他們的群眾更加恐懼。深夜三時，我陪朱耀明牧師到訪北京大學，介紹他認識北高聯的王有才，將香港基督徒專程帶來的部份捐款交給他們延續運動。

六月三日凌晨，風聲鶴唳，軍隊已經進城，並有零星衝突。我獨個兒在北京街頭拖著疲憊不堪的軀體，像孤魂野鬼到處遊蕩，危城戒嚴下充滿鬼魅肅殺的氣氛，我感到暈眩昏厥，步履不穩，難辨方位，沒有力氣走進天安門廣場，只好停在北京的大街路旁陰森恐怖的暗處靜坐佇候，那時候隱約覺知我應該是迷了路，魂魄靈體受到驚嚇，一股不祥之兆籠罩下的沉重

和窒息感，至今仍如影隨形的附身，揮之不去。

六月四日凌晨，我無論如何都不敢再走進槍聲四起，大開殺戒的北京街巷，堅持留守在燈火通明的，受到保護的天安門廣場，我並不勇敢，而是恐懼，沒有準備慷慨就義作出犧牲。我在廣場燈滅的時刻，追隨那漆黑暗夜襲來的死神陰影，才匆忙寫下遺書，因為大軍衝鋒殺入廣場，已經沒有退路，唯有立誓與廣場共存亡，若苟活性命才站出來做歷史見證。

我無法面對黑暗和失去希望的那個時刻，請原諒我，因為家人在六月三日晚上打來多個長途電話，要我留在北京飯店，不可冒險。對不起，我沒能做到，愛上了廣場的自由氣息，不去不行。

我開始明白自己沒哭和不怕的這個時刻，請原諒我，因為我必須冒險親歷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的實地採訪，冷靜報導真相。對不起，我沒有死去，戀上了廣場的青春熱血，不離不棄。

劫後回來，憂鬱恐懼，畏光怕人，圈套在廣場大牢的禁絕枷鎖，圍繞在紀念碑上的沉重腳鍊，我成為受驚幽閉的精神囚徒，沒能現身見證這道歷史傷口的血痕。

為了對得住自己的良心，對得住人民書寫的歷史，對得住「六四」底層仍然受苦受難的人質和囚徒，我能做該做的就是拿當年採訪時所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公諸於世，把血光映照出來點點滴滴的血與淚，附帶着個人軟弱無力的夢囁呻吟，結集成活下來作見證的碑文。

但願蘇曉康給我創造的「活碑」，能承載這一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對抗遺忘。今天，我歸來，呼喚魂靈，為了還這個願，揭露真相，拒絕暴力。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

廣場實錄

1989.4.26 - 6.4

4.26-4.30

學潮印象





緣起

1989

按：這份手稿是我到北京採訪的四十日報導實錄，四月份的材料大約是在八九年七、八月期間整理，夾雜一些印象和記憶。五月份的材料是照錄採訪日記原文，二零零九年初整理。

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的逝世把壓抑了的學運再度掀動起來，年輕的大學生熱血沸騰，在悼念胡耀邦的時候把壓在心底裏的抑鬱都發洩了出來，他們很單純地要求中共接受他們的誠意，可是中共卻瞧不起年輕人簡樸的請求，這腐敗的政權早就暴露了它醜惡的一面。

那時候，我還沒有到北京，我在香港電視新聞看到三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面，請求李鵬出來接他們的請願信。李鵬沒有出來，學生下跪了，其他同學都哭了，叫他們不要跪。

這種下跪，在封建皇朝中，是老百姓跪請聖上的表現，根本就打動本來已不把人民放在眼裏的在上位者的心，更何況他們已想當然地要踐踏人民，要人民永不超生地活在底層。你下跪，他們不會感動，但卻明顯地反映了人們未能衝破封建思想的樊籬，上尊下卑的不民主、不平等，正好就在下跪時，把奴性充分地顯露出來了。

中國人甚麼時候才能站起來呢？中國人怎麼樣才能鼓起勇氣去挑起歷史重擔，解下封建的枷鎖呢？

我們期盼著中國人站起來的日子，我們也相信中國人終於會站起來，而我亦想親眼看到學生喚醒群眾去對抗橫蠻無理、暴虐無道的虛偽政府。這失信於民、造謠生事、製造動亂的荒唐政權，終有一日會被平民百姓推倒垮台。我們等候著這歷史時刻的到來。

我在悼胡之後才到北京，那時候正是四二七大遊行的日子，

在飛機上我知道肯定會錯過這歷史時刻。後來學生告訴我，他們如何悲壯地走上街頭，臨行時留下遺書。老師哭著要同學不要上街，可是大家都抱著準備流血的心情，雖然知道這政府一定會鎮壓，而且也聽到早已調派重兵入京候命的消息，但學生給四二六社論激怒了，誓死也要上街遊行，抗議政府污蔑他們單純的學生運動。

我當時遺憾錯過了這個震動人心的遊行場面。沒想到後來赴京採訪四十天，每日每夜我目睹了一場又一場更加感動和震撼人心的場面。只可惜，最後人民要付出血的代價。我真正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在中國最需要記者見證歷史時刻，在六四之後最應該繼續揭露真相的時候，我失魂落魄撤離天安門廣場，倉皇受驚告別首都北京。

後來，我們聽見有人毀屍滅跡，有人偽造歷史，有人掩飾事實真相。他們為所欲為，還指責我們造謠，但我們卻無法即時反駁。在軍隊坦克暴力鎮壓的威嚇下，我們可愛的民族精英犧牲的犧牲、被捕的被捕、流亡的流亡。到底怎樣才能夠保護及保存國家寶貴的人才呢？四十年來，他們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被摧殘了，不能再把我們剩餘下來的少許希望都一舉趕盡殺絕，救救我們祖國的孩子，救救我們祖國的精英，保存我們祖國的希望，讓我們合力建造美好的新中國。

出發赴京前的準備

一九八九年四月，首次赴京採訪，一切都不熟悉。赴京前找過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我說：想採訪五四運動。當時還沒發生悼胡事件，他便已經對我說：「沒甚麼好採訪吧！兩地制度不同，互不理解，最好還是不要去。」

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大陸實行社會主義，新任中共黨總書記江澤民在八九年七月十一日說：「井水不犯河水。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不會在港澳台搞社會主義，你也不要吧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內地來。」



這講法，張浚生在那時候就提醒過我，說我們香港記者的採訪，往往會用香港的一套來看大陸，這不行的。

悼胡事件發生後，我結識一位在香港大學作交流生的北京大學校友，作個中間人好方便我到北京後找同學做訪問。在傾談中，他說基於北大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民主自由等開放思想較有傳統，校長丁石孫在這方面也沒太大的壓制，所以幾次學潮都是由北大帶頭。他又說，八六學潮之後，學生普遍有一種情緒的壓抑，其實搞運動的氣氛早已是蠢蠢欲動的，所以政府亦已嚴陣以待，「四五」當天發動不夠，「五四」會是時機，但期間要堅持則很困難，剛巧胡耀邦逝世，馬上成為很好良機，令學生不滿的情緒得以宣泄。

另外，我又剛好透過浸會大學的講師，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香港做研究的清華校友，他分析，如果沒有悼胡事件，令學生借機而起，中國也會有經濟改革的危機出現，而且學生也實在不會忍受太長的沉寂，即使沒有悼胡，學生也好有可能會在七、八月展開一場學運。

總的來說，自年初方勵之上書鄧小平，希望正值八九年是中共建國四十周年，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及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呼籲特赦及釋放魏京生等民運份子開始，到知識份子聯名請願，陳軍被逐等等事件相繼發生，民主運動的醒覺意識已被觸動，結果把八九民運藉悼胡事件，演進為北京學運，再擴大至全民參與，推向一個又一個的高峯。

4·27

訪京的第一印象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踏上飛機之前，聽著收音機廣播北京學生被《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激發上街遊行的經過。已經上京的報館同事警告說，這次不是鬧著玩的，周圍都有不安全和被監視的感覺，赴京採訪絕不輕鬆，是會有危險的。

我對北京很陌生，在七、八年前還唸大學的時候，才第一次旅遊到北京逗留過五天，對北京的一切一切，都不熟悉。至於中國新聞、政治、經濟、歷史等等，我連基本常識也沒有，所以這次前往北京採訪，是毫無把握的。

我原先是希望做一期專題，探討五四運動，後來變成特派記者，在北京跟進悼胡後的學潮發展和亞銀會議，然後才可以構思專題內容。正因此，在亞銀會議後，大多數香港記者都離開北京，我還繼續留在北京做專題報導，沒有間斷地全程體驗了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發展經過。

登上飛機的時候，心想，在傍晚抵達北京，或許仍能適逢其會的，遊行隊伍不會那麼快便散去吧！到北京國際機場，才不到五時，可以趕得及的。不過上出租車時，司機便已經說：「去北京飯店？路堵得很厲害，我試試看吧！」然後，他問：「你知道學生在遊行嗎？他們的隊伍很大，交通都給堵塞了！」我回說知道學生在遊行，反問他會否不喜歡學生鬧事，弄到交通大亂？他說：「學生鬧事是沒錯的，他們也是為了大家好嘛！」

我不了解北京情況，所以會很小心的，沒向司機透露身份，也沒借題發揮的繼續發問。在未進市中心時，交通尚好，我欣賞沿途風景，城郊樹木蔥綠，人們自在悠閒，學生示威遊行沒有影響郊區的安靜祥和。

抵達市區後，司機說：「你瞧，堵住了！」然後他表示要繞路，又行了一段路，經過北京站，再一段路，他說：「看！路口有學生的旗幟。」繞了一圈，「糟了！又沒路行。」經過人民大會



堂，很多軍車泊在路旁，還有很多公安坐在地上休息。天安門附近的一帶，路都堵塞住了，司機不耐煩，一見塞車，就繞一大段路，再看有沒有辦法。如是者，五時許離開機場，兜兜轉轉的走了很多路，七時許才繞過中山公園，在北京飯店對開的一條橫街停車，司機說：「小姐，真對不起了，公安不許轉入飯店，我只能在這裏停，你步行少許路吧！」

然後，他開價二百元，我沒有人民幣，他幫我折算，要收我三百八十元港幣，我說：「那麼貴？」他答：「路程遠嘛！」又說：「你來公幹的吧，可以開數，要收據嗎？」當然要啦！他給我一張沒有寫價錢的收據，說：「你自己填吧！」他的語氣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受惠吧！我想，開天殺價和「報大數」是兩地貿易往還的特色嗎？心照不宣？算啦！反正講價也無謂，司機本來說好可以幫我拿行李到北京飯店的。我付錢後，他說不放心隨便把車停泊在路口，我只好「死死氣」自己提行李，狼狽的走過馬路到北京飯店找同事。

進北京飯店，問服務台的時候，因為我記錯房間，所以電話接不通。服務員問：「你是找誰呀！」我吞吞吐吐，不好說，因為普通話不靈光，人生路不熟，摸不清他的用意，只告訴他房號。他說：「沒這房間，你是不是記者？這裏有房間住了記者的。」

我吃驚他竟然這麼神通廣大，知道我的身份還能點出我想找的房間，便對他說是的，我的同事姓甚麼。他便對我說：「我早知你找錯房號的了！」然後指示我如何去登記入住的房間。我不知道，我們在北京飯店工作是否應該隱瞞身份，因為，很多人告訴我，北京飯店的房間和電話都安裝了偷聽器，到底這是否多疑呢？但畢竟太難說了，這國家一直是沒有個人私隱和自由的。

踏進房間，同事很累，因為一整天跟著學生遊行，場面壯觀。她對我說：「你錯過了歷史盛況，他們的隊伍已過，政府答應對話，他們便解散了！」我問她：「服務台知道你們的身份，沒事

嗎？」她說：「我們的行動，很難不給人知的。」

來京初期，我們非常小心謹慎，談一些採訪計劃都是壓低聲音，怕有人竊聽，打電話出外時，不談內容，只說，出來見面後談談吧！有時候，我也感到不舒服，既要保護被訪者，又要保護自己，做事總是吞吞吐吐，很不暢快的。這夜，我甚麼事也沒幹。第二天也不知道可以做甚麼，想：打些電話碰運氣吧！

4·28

誤打誤撞進入北京大學採訪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首天工作是盡快認識這次學生運動的背景。

激情過後，我才到京，總感到氣氛怪怪，很不是味道。同事各有各忙，她們熟路、線多，我卻還未上手，派不上用場，不知從何做起。

早上打電話找北京大學副校長羅豪才，問他對北大学生和北京學潮有何反應，能否安排一個訪問？他的回覆是：學潮期間在外開會，不知內情，但他不贊成學生上街、遊行，因為還有很多渠道讓政府和學生有所溝通的。至於接受訪問，他則表示，沒甚麼好說，也不太方便，因此婉拒了。

第一個電話就碰灰，很掃興！再接再厲，終於找到一個北大的研究生樂於跟我見面，還說三角地的大字報可能很快會給撕毀，叫我早點來了解情況。於是跟他約好在北大校園見面。當時，我對北京懷有一種恐懼，總覺得人人都不可靠，去甚麼地方都可能跟蹤



和遇到危險。我外出之後，誰也不知道會有甚麼遭遇，會擔心隨時人間蒸發，於是留了字條給同事，說明自己的去處，有事的話可以追查一下。

我不能不說，早期在北京的日子，我是非常小心的，隨後經過學運日夜的風雨洗禮，我對北京反而再沒有恐懼，對北京市民再沒有懷疑，這個城市的平和親切感，是我最初幾天在北京時，還不能感受到的。

第一天給出租車司機開天殺價，車費實在太貴，心裏說笨，於是問清楚同事，大概費用多少，如何安排交通？同事說，北京的出租車一般不會在街道上接客，因此外出的話，一定要包車，費用一般都要百六至二百元一整天，且要講價。到飯店門口找車，向司機說要包半天，去兩個地點。他說要一百二十元，我說：「太貴了，八十元吧！」他竟說：「行！」我奇怪，以為要討價還價的，怎麼會還一口價這樣兒戲？難道我這個價錢仍然是很笨？

算了吧！反正這價錢比昨天低。

先叫司機去北京大學，在門口等那同學出來接我。北大校友先跟我說過，那道門比較容易進入校園，又表示，悼胡事件後，有朋友告訴他，校門守衛嚴格了很多，他教我，如果要說找誰，就表示找留學生，亂作一個名字可以啦！因為無論我怎麼裝扮，在服飾及口音方面都跟本地人不同，說找留學生就完全沒問題了。

在北大南門等了一會兒，那素未謀面的被訪者便出來找我。其實他是一位北大講師，他來接電話，我便以為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後來談到最後，他給我留下聯絡方法時，我才知道他的真姓名，跟我想找的人不一樣。第一個被訪者原來是張老師，他早就有說名道姓的自我介紹，不過，我的普通話真的不好，聽講都是「半桶水」，腦子裝載不了太多陌生又新鮮的事物，尤其北京腔調和一些當地的政治專有名詞，即使他們講了幾遍，還是搔破頭皮不知所

指，最後要人家給我在筆記本上寫出來，才恍然大悟。

我跟張老師在校園內邊談邊走，他很坦誠，盡量給我幫忙，對於我的發問也大方地回答。我問：會否有人監視，對他不利用？他說，校園氣氛還好，沒甚麼，政府還沒採取任何行動，而且他也不算是積極參與者。

他給我介紹了校園的心臟地帶，亦即貼滿了大字報的三角地。他說，校方大概會在明天就撕掉所有大字報，相信政府會對北京各所高校採取一致措施，令學潮趨於平靜。他又約略跟我講述了學潮的背景，及發展到現階段的情況。他說：有五十一所北京高校組成了一個臨時的學生聯合自治籌備委員會，該會現時的工作是為對話作準備，因為在情緒上還未平伏，學生希望透過對話能反映意見。他承認學生之間未有統一的行動，有少許磨擦或意見不合，但是絕大部份同學都是支持這個臨時聯合自治會，因此，他認為，學生與政府展開對話的先決條件是要政府公開承認學生臨時聯合自治會的合法性。

悼胡事件中，學生跪請李鵬接請願信後，因為得不到答覆，同學憤而宣佈發起罷課抗議。張說，此事後，校方很無奈的想動員學生復課，到《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同學最想抗辯的是：「我們沒有違憲。」同學的一切行動都是法律賦予的權利。

他續說，因為這社論，把同學迫上街了，由於事前知道會有鎮壓，而事實上亦真的有大批軍人武警在京城戒備，在主要街道口設防線，所以同學在早上上街之前，老師們都勸同學不要上街遊行送死，有女老師哭著喚同學回來，不要踏出校門。他表示，這次遊行非常成功，因為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維持秩序，避免造成交通混亂，又注意提防有官方的人或群眾喊不好的口號，所以統一喊一些支持共產黨的口號，引述鄧小平文選的語錄等，都是共產黨可以接受的。由於組織良好，令混水摸魚的人不能得逞，而且學生亦深明支持共產黨是不得已的，因為短期內學生是不可能得到民主的，而



現實情況是中共政府不得民心、官僚腐敗，學生反對這些就很容易得到農民和市民的同情和了解。

他說，學生在悼胡時期提出了七點要求，對於官員而言，這些要求看似簡單，實在不好處理。例如公布官方的財產，就算說了出來也很難核實，要核實就得全盤托出，這就難辦了！此外，要求新聞自由，這是共產黨最怕的。張又認為，鄧小平在四二五的講話，比為胡耀邦所寫的悼詞還要退步，其實鄧小平的時代應該過去的了，現在的學潮令他大受刺激，而學生愈搞運動，他就愈固執。他老了，再難要求他在深化改革方面找出路，但是他卻要干預民主進程，令人們不敢說話。

最可悲的是，去年物價改革掀起通脹、搶購和提款風暴，政府硬闖物價關時，根本沒作科學化調查。在如此的經濟改革進程下，導致銀根緊縮，加上貪污腐化和官商倒賣日益猖獗，人民百姓怨聲載道，社會根本承受不了，如果還不實行政治改革，推動民主進程，只會導致這國家更加混亂。對於這場運動，他說，要視乎對話的結果。假如不順利的話，政府極有可能會抓捕一些積極搞組織的籌委會學生。不過，據估計，目前官方還未敢對付學生，因為怕將事情擴大。他說，發起這次學運的同學，大多數是八八年的本科生，他們最早出來搞遊行，比較單純和幼稚；而很多年紀較大的學生，因為忙於寫論文，找工作單位及計劃出國，從個人前途考慮，不少高年級同學都放棄搞學運。另外，年紀較大的學生都覺得這樣下去是不會達到目的，所以沒出來參與。

專訪李進進

—— 北大是學潮的搖籃及發源地

我到北大想找的人其實是李進進，他是法律博士生。我問張老

師是否認識他，他說，知道他是誰，還表示可以帶我去見他。張對我說，李進進在悼胡事件中最早站出來，他的家人知道他搞學運之後，馬上叫他哥哥趕來北京勸他停手，怕他惹禍上身，所以現在李進進沒有搞下去了。

來到李進進的宿舍，拍門找他時，第一次見我這位不速之客時，他竟然說，我們見過面了。但我沒有印象，所以隨便說，香港來京的記者很多，可能你認錯了。

這開場白令雙方都有點尷尬，所以氣氛很不自然。我跟他說，是香港的一位北大校友介紹我來找他的。談了幾句，他說要換個地方到隔壁房間傾談，而鄰房的博士生跟他很熟絡。訪問時，張老師跟鄰房朋友都一起聽我們的交談。

訪問完後，張老師陪我離開，帶我到校園三角地附近聽了一會兒廣播。臨別時他說，李進進曾到過香港搜集資料，為他的博士論文做研究準備，他剛才說跟你見過面，可能是指在香港見過面吧！

我想了想，便慢慢記起，我是在香港大學認識北大校友的時候，大家曾經匆匆點點頭打招呼，很偶然的一次因緣際會，沒想到北京會再見面，我善忘，令大家都感到很冒昧。後來，我在北大再遇到李進進，便不忘跟他道歉，而通常我在北大看完大字報後，都一定會去宿舍找他，找不到人就找他的鄰房，我們經常互通消息，熟絡了很多。

之後，我還找他談工人自治聯合會及工運的發展可能性。他當時又重新投入運動，擔任工自聯的法律顧問。六月三日，即屠城前一日，我又去找他，談到香港的捐款不應該單是照顧學生，因為這場運動工人付出了很多，而他們的犧牲亦是最多，更加迫切需要經濟方面的支援。

本來，我還以為在工運方面，日後我或許可以穿針引線。誰知六月四日屠城之後，一切都是我不想結束的情況下，學運、工運、



民運都被徹底瓦解，消滅於萌芽狀態。返港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在港的北大校友來電向我告別，因為他申請到去美國留學，簽證方面獲得通融，毋須返回內地申請。他對我說，收到太太的信，得知李進進已遭公安抓去了。聽到這消息，我很心痛，雖然經過通緝大搜捕之後，知道很多學生、工人、知識分子沒法逃，都凶多吉少了。但是，當你得知這些相熟又很敬佩的人被抓，他們的命運跟這場運動的結局一樣悲哀和慘絕人寰的時候，那種傷痛是錐心刺骨的。

總結至四二七的學運發展

跟李進進第一次傾談時，他顯得比較小心謹慎，不過他看問題很成熟和非常深入，是專門研究憲法的。訪問的中途，不時會有人敲門，大家都顯得很緊張，我總是很擔心自己會給他們帶來麻煩，因為不知道秘密警察和幹部學生到底有多少潛伏在校園。來北京採訪，才學曉了一個名詞，叫「秋後算賬」，想起文革時期，互相告密、批鬥、揭發和打報告的事情，令我非常不安，他們會因為和記者見面而捲入某些莫須有的罪名中嗎？誰知道將來在甚麼時候會來清算他們？

鄰房應門，都是他們相熟的朋友，招呼進來之後，有些閒聊幾句便走，有些則再約時間，他們其實也並非害怕甚麼，只是因為我算是外人，而且還未熟絡，不好解釋。再者，李進進那時有流露隱退之意，我覺得，他原先是不想接受訪問的，但礙於人情，所以他才會對我這個對學運一無所知，從來沒有這種政治鬥爭和整肅清算等體驗的人，闡述了事件的來龍去脈、發展經過及內在意義。

他說，在四月十五日下午，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在新聞中播出，北京大學的同學馬上有反應，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幾分鐘內便有人張貼出來，學生的情緒慢慢在醞釀過程中，開始有批評某些領導人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大字報出現。

四月十六日，政法大學首先上街遊行和發表演說，活動有幾千人參加，很有秩序和組織，而當晚便開始了靜坐。他說，這次政法大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對北大亦有相當大的影響。

四月十七日，北大自發地組織了遊行，持著「中國魂」的牌匾旗號，約四時抵達天安門後把旗號掛上。當天參加遊行的學生提出了七點要求，包括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否定「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要求新聞自由；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公布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和財產；如實報導此次悼胡事件。

他說，學生希望將這七點要求，以請願信的形式交人大常委會，但沒人接見他們。到四月十八日早上，中央仍持不理睬的態度，亦不接待學生。他表示，學生希望見人民代表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但學生卻從來不獲任何人民代表接見過，直到晚上七時，人大常委會信訪局才派人出來接收請願信。

他認為，這次悼胡事件中，學生遊行靜坐對以後的運動將會起先導的作用，因為汲取了八六年學潮的教訓，不再是鬧哄哄的，而是要用合法、民主及和平的手段，爭取及達到民主的目標。他更形容這次運動充份體現了學生的團結精神和成熟力量。他又強調，今次運動是使用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不要求政府立刻回答學生的問題及要求，因為程序上不民主，則誰也不能回答，而且亦不能要求一、兩位領導人來解答，問題是要民主地解決的，所以在這一點是開了先鋒作用。雖說，現在收了請願信的代表是信訪局，也只是答應傳達學生訴求，他相信這七點具體要求是不可能有的。

到此為止，他估計往後的學生行動可能會有三個可能性：一是走到最前面，要求更多；其次是出現割裂，這是以前都有的教訓；其三是慢慢來，因為走到現在已是很大進步，應該告一段落，而且政治及經濟等問題，單靠學運是不能為現時政治局面帶來高壓的。



回想起來，我覺得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可是當學運如火如荼的發展到不可收拾的時候，他在五月十七日組織了北大博士班上街遊行聲援絕食學生，後來還加入工人運動，為工自聯擔任義務法律顧問，為工人團結組織的合法地位傷透腦筋。

他繼續談到學運的發展，提到四月十九日發生的衝擊新華門事件、四月二十日在新華門前靜坐、四月二十一日天安門廣場戒嚴，至晚上八時有十萬學生遊行到廣場靜坐，一直留到天亮，希望能參加四月二十二日的悼胡儀式。他說，整個學生悼胡活動的過程，只有《北京青年報》和《農民日報》有較為客觀的報導。

四月二十二日，學生在原來的七點要求之上，提出了修訂的七點請願要求，並且在人民大會堂門前跪下來，求見李鵬。當時很多同學都哭了，精神上受不了，感情上亦受到傷害。其實同學對領導人還存有希望，雖然有喊過較為強硬的口號，但是亦希望政府能聽取同學的意見，就像小孩子對父母提出要求般，後來才知道民主是不能乞求的，所以才決定罷課，並且開始有組織地商議行動，成立自己的學生組織。這個負責領導工作的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臨時籌備會，只是初步展開工作，慢慢汲取經驗的學生組織。但是到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措詞嚴厲激烈的社論，把這場運動定性為動亂和反黨時，馬上激發起學生的不滿和憤怒。

他說，當天政府在電視重申北京市遊行十條的規定，抨擊學生搞非法組織，又不容許學生在街頭公開演講及募捐。四月二十七日，學生很理智地進行遊行抗議活動，校方因為有壓力，在學校官方廣播中，勸同學不要出去遊行，還把校園大門關上。很多同學都擔心會出事，但是亦有不怕事的堅決站出來。學生出發遊行時，真是帶著非常沉重的心情步出校園的。

這次遊行有幾十萬人參加，很多群眾圍觀及表示支持，同學在設計口號和標語時，都經過精心選擇，例如維護共產黨和引述鄧小平講話等，沿途亦衝破了多個防線，包括中關村路口、友誼賓館、

白石橋、三里溝、復興門、六部口、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

他說，四二七的這次遊行，可以說是四十年來第一次有組織的對抗政府的行為，因為以前遇到高壓就會馬上停頓下來的。在學生遊行期間，收音機廣播了國務院的發言，表示可以對話，並提出要澄清三個謠言：關於四二零新華門慘案、四二二學生跪請上書，及北師大女學生被車撞死等，都是不符合事實的謠傳，但對此，學生仍然是相當不服氣的。

遊行過後，學生還是決定返回校園，由早上八時出發，到晚上十一時，遊行隊伍才抵達校園。這次是高壓之下，學生無視政府壓力，強行上街參加大遊行，而政府越加壓制，學生情緒就越高漲；衝破軍警防線後，同學越來越有信心，而且亦爭取了團結的力量。

北大同學跑完一天之後，住在近南門的青年教師宿舍掛上了「生生不息」及「後生教先生，先生趕後生」的對聯，並跑出來歡迎參加遊行的學生隊伍回來。

分析學運的進展，李進說，現在還不知道會往哪兒走，主要還得視乎當局怎樣處理及態度如何，也就是要看對話成功與否。他說，現由全國學聯組織學生代表來對話，但到底學生代表如何選出則還未談到。他又表示，有些學校可能會在對話後準備復課，而且會解散各校自發組織的學生自治會。其實，學生原先決定罷課的主要原因是新聞作不真實的報導，以及政府的不理睬。因此，他認為今次學運的特點是，將矛頭指向只有一家之言的新聞界。事實上，新聞界就此事的報導亦是有破綻的，例如官方的報導，沒有記者的署名，像是要表示不願作失實的報導，而且有幾份報紙，如《科技日報》、《農民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工人日報》及《北京青年報》，都有很大突破，報導比較真實，而且採用自己記者的報導，不是統一發布政府官方的消息。

他又總結這次運動本身是屬於有組織地領導運動，跟以前運動



也有一點重大的突破，就是依憲法賦予的權利展開合法的活動。同時，在歷史意義上來看，是爭取民主、自由，反對獨裁、專制的人民抗爭口號延續，學生在這方面廣發傳單及展開宣傳，所以政府才會採取高壓態度，先發制人。他認為，在一黨專政下要求民主，只能夠是歷史性的、階段性的提出訴求，亦即是說不能超越歷史演進的各個階段性，不可能一下子達到先進階段，實行多黨制或推翻共產黨。目前，只能在維護共產黨的原則下，由提出民主發展到逐步完善民主的政治制度。

他估計，如果政府態度和緩下來，學運就會轉趨平靜；但是如果政府繼續高壓，則學生在「五一」勞動節，或「五四」紀念日時，就肯定會發起新一輪運動；又如果政府現在就抓人，則會爆發更大型的示威活動；再如果這回一旦給政府鎮壓下去，估計學生仍會等待時機爆發另一次運動！

跟他們道別，出租車在外面等我。夜晚的北京被一種神秘感籠罩，我帶著混沌模糊的印象，對陌生的環境產生恐懼，看不清眼前物事。但是，單就這第一天所見所聞，已覺得新相識的他們毫不防範的，親切熱情地給予我幫忙和指點，一開始就自然而然地坦誠訪談和交換意見，我疑惑冰冷的心充滿溫暖和感激。

吾爾開希在酒店舉行記者會

回到飯店，整理了一篇稿。突然收到消息說吾爾開希召開記者會，於是馬上趕去採訪。中外記者雲集，主要還是香港記者較多，都擠進一間房間內，吾爾開希坐在沙發上，是焦點人物。他年少氣盛，意氣風發，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這孩子的笑容有不可一世的輕佻自大。

吾爾開希自我介紹，說自己是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系一年級學生，二十一歲，父親是知識分子，維吾爾族人。

他強調，今次是以個人身份開記者會，向記者表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的臨時主席周勇軍，因為在四二七遊行前傳達錯誤消息及決定，已經引咎辭職。現北高聯由他當主席，選舉過程無可奉告，而主席職位七天一任，定期重新選舉主席代表。

他表示，北高聯由四十多所院校組成，北京有七十多所院校，有些院校提出加入申請，但因為未有成立自己院校的學生自治會，所以他們的資格仍在爭論中。目前的工作，他說要努力爭取自治會的合法地位，相信程序上，樂觀估計要三天時間。他認為高自聯是根據憲法成立，籌組工作已經展開，但是合法化仍未解決，如果當局不承認他們的自治組織，可以理解為政府違憲的。

對於政府已答應對話，吾爾開希說，明日會向全國學聯提交對話要求，由學聯傳達到中央。他們希望對話的代表能夠雙方都認可的，學生方面要有北高聯的代表，如果政府答應要求，作出正式對話的安排，學生是可以考慮先復課後對話。

他認為，對話代表應該跟全國學聯平等、並存的。對話時，主要會重提七點要求和對話條件，必須保護學生領袖，而且談判要公開，亦即記者可以參加，電視直播等，希望談好條件後才正式對話。又表示，四二七遊行可被視為學生啟蒙運動的開始，而且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不過這只是形式上的勝利，因為面前還有失敗的危機，例如政府會把北高聯視為非法組織進行非法集會，又或者對個別學生進行報復，阻嚇學生領導民主運動。

他透露自己和王丹二人已被政府點名。王丹被指為「陰謀顛覆政府」，吾爾開希則被指為「反革命煽動」，而他個人已作好流血準備，在四二七遊行前寫過一封遺書，並在出發前發表過悲壯的演講，感動了很多同學。他又說，很高興這次運動得到人民的支持，在遊行時，他個人很激動，步行了十五小時，不斷喊口號。在遊行的最後五小時，他是微笑著回校園，人民也對著他們喊：「人民萬歲！」、「人民感謝你們！」，期間又送麵包、送水和捐錢。



他說，以前還擔心人民素質不好，可能動不起來，但四二七上街有百萬市民圍觀、支持，這是七十年來最大型的運動，相信只有文革才能相比，但這次卻是真正的文化革命，而且沒有動亂。

4.29

政府與學生的對話變成官方座談會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政府以很高的效率，由全國學聯組織學生代表，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即展開對話。

香港傳媒不相信這是對話，因為對話條件還未談妥，但是亦有部份傳媒知道，這次政府與學生的會面是正式的對話，因此紛紛致電記協及學聯，欲了解詳情及申請進入採訪場地，但始終不得要領。

結果，北京學生要求的對話，變成全國學聯組織的高校學生與中共國務院官員的對談會。在召開會議之前，香港記者繼續向學聯爭取進入會場，到正式開會時，國內的新聞媒介，包括《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新華社》、《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等記者，均獲准進場採訪，香港及台灣的記者則被拒諸門外，香港兩份親中報紙的記者亦不例外。

記者在學聯大樓門前進行交涉，負責人只解釋因為事前沒有報名的不能進內，而且會場內已擠滿人，不能安排港、台記者進去，於是記者抗議不公平對待時，該負責人承認，但始終沒給予機會進入採訪。事實上，部份香港記者曾聯絡中共全國記協，但獲得答覆是需要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介紹信」才可採訪。

香港記者曾再致電全國學聯及前往全國記協尋求協助，但再次被拒，記協方面還聲稱是全國學聯不願接受訪問。對於是次被拒諸門外，港台記者均大感不滿，雖然當晚，中央電視台廣播對談過程。

我們趕赴對話會場即全國學聯，大批海外新聞傳媒跟門外守衛理論。守門人說，沒有事先申請一律不能採訪，現在補辦申請也不行。在門外守候片刻，見吾爾開希最早走出來，他說：要以離場來表示抗議，原因是全國學聯不容許他在這場合發表聲明，所以他拒絕學聯的邀請，退出會場。他補充，這次不是對話，只能說是座談，同學是今天上午才接到通知，毫無準備，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其他同學或自己的院校。

他強調，對話的實質意義應該是國務院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而北京高校學生是一個整體，而並非部份學生，所以不能稱為對話。會議進行了約四個小時後結束，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教委會副主任何東昌離開時，沒有告訴在外面久候的記者會議有甚麼結果，只是說還有其他形式的對話座談。

政法大學的一位學生代表項小吉表示，這次會議由北京市學聯組織，到會發言的同學只是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北京市廣大學生意見，所以只屬於一個小型的座談會。席間，政府認為學生的愛國熱情可以理解，與會同學代表則有秩序地輪流發言，問到是否肯定這次學運時，未獲明確回應，政府有要求同學復課，但由於與會同學不代表整個學運，所以亦未給予答覆。

前北高聯主席，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會後也被記者追問會議情況。他說，同學在裏面發言機會很少，只是聽他們的對答，形式上存在一種非本質的，未能解決的現存問題。最後輪到他發言提到北高聯組織的問題，被何東昌等人打斷，認為這是非法組織而結束會議。他希望政府能夠與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但相信此要求要一定時間後才能實現。



他又說，與會同學以個人身份參加，開始時以為是進行初步的磋商及接觸，商談對話內容、途徑、方式、時間、地點等，希望能安排得妥當一點，但是現在願望落空了。

最初同學在發言時提到，對話應該在法律程序下進行，但袁木的答話則表示，對話可多種多樣，也可以多次對話，中國有十億人，每個人都很忙，不需要官方與學生對話來耽誤中央領導人的時間。

此外，參加這次會議的學生代表都是由全國學聯及北京市學聯召集，同學們根本不承認此官方的學生組織，而出席是次會議的大部份成員都是各校原來學生會及其他幹部，政府不承認院校學生自發組成的自治會及北京高校的自治聯合會，反映政府根本不願意與學生真正對話。

吾爾開希及王丹澄清謠傳

學運領袖吾爾開希及王丹晚上對北京市中外百多名記者澄清一些謠言，為他們個人闢謠，及對全國學聯組織的對話反映意見，他們認為對話會應該要有能夠代表學生利益的人前往出席，而一直組織學運及新組成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是可以作為代表的，政府現在的安排不符合這個基本要求，可知當局毫無誠意。

吾爾開希是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的新任主席，王丹是常委之一，他們希望對話能在正當途徑，傳達給中間人或是直接傳到中央去。到底中間人是誰？他們不願透露。

對於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電視廣播上的講話，吾氏個人認為這些講話缺乏邏輯性，而且迴避問題。

另外，王丹為他自己個人在四個方面闢謠，他表示：

（一）他與方勵之夫婦的關係屬私人關係，但有人造謠說方氏兩人是背後操縱及煽動這次學潮。他否認方老師是借助他的力量在

北大煽風點火，因為學潮是在四二零開始發展到現在，他跟方氏兩人未有任何接觸。

（二）有人造謠說他用募捐來的錢拿去大吃大喝，更買煙給別人抽。他說組織募捐，但錢不會經他手。至於募捐款項的來龍去脈，已公開數目並在北大張貼出來。關於這點，吾氏亦補充募捐款額是由學校自治會秘書長組織，有五位同學負責管理，有關捐款的財務報告，日後可以公開。

（三）有人散播謠言說王丹是北大的壞學生，留班生和科科不及格。他解釋自己八七年在北大唸政治系，八八年後覺得學習這些理論很遠離中國現實，反而與歷史分不開，所以轉系唸歷史，並自願重新唸一年級課程。他否認科科不及格，學業成績單是可以到系務室查看的。

（四）北大有大字報說王丹在四一九衝擊新華門時，當警察來時，他第一個逃跑。他說，當晚八時發生衝突事件，他十二時才到，衝擊時根本不在現場。至於造謠貼大字報的人是誰？他說不會是北大學生，懷疑內裏有陰謀。

他們兩人舉行的記者會，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舉行，港記前往召開記者會地點時，曾發生不愉快事件。事緣記者會在一間國際電視通訊（CBS）的駐京辦事處內舉行，該機構不知道吾、王二人已通傳各留京中外記者，當大伙一窩蜂趕往酒店房間時，機構負責人以人擠為由，不許香港記者進入採訪，一度鬧得極不愉快。

後來，記者會移師酒店外停車場一處空地舉行，百多名中外記者很合作地擺好攝影位置及圍坐在地上，等候吾、王二人在記者群中舉行是次記者會。在吾、王的記者會上，他倆都自我保護。離開時，吾登上出租車，對尾隨的記者舉起勝利的手勢，好像要暗示他們將不知去向，隨時有被抓的可能。他們的人身安全真的全無保障嗎？政府會在甚麼時候動手？

政府做了一場與學生對話的好戲，這場戲裝飾性地安排加插幾



個持異見的學生分子在內，但又限制學生代表的發言，使他們甚麼也做不到。

晚上，很多北京市民都收聽、收看了現場對話的轉播，當然是有刪剪的，但時間也長達三個多小時。出租車司機也收聽廣播，頗為氣憤的表示：「這是騙人的，學生別這麼快便相信了！」但對話確然是展開了，學生還能鬧些甚麼？他們還想繼續鬧事嗎？

4·30

學生提出的對話協談草案

一九八九年四月三十日

頭幾天，我完全摸不透學運的動向。亞銀會議快要開鑼，記者要分頭做這方面的新聞。紀念「五四」七十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也紛紛舉行了，很多中、港、台知識分子雲集北京。四月三十日早上，買不到報紙來看，人們對這次對話座談會抱有極大興趣。

在北京飯店門外，找了一部出租車，講好價錢，只租半日，去海淀區各高校逛逛。

車行到一半路程，跟司機談起學生運動。我說要去看看北京大學高校學生的反應。他說，剛剛經過北海公園，看到有一批學生在舉行集會，很多人圍觀。我好奇想去看看，叫他掉頭繞路。果然有幾十位同學在做宣傳，他們都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周圍有百多群眾圍觀，談論對四二九對話的看法。

同學們發表了協談草案，掛在樹旁，供市民參考，草案內容如下：

具體時間、地點請擬定出來，必須有實況轉播。

代表：我方為臨時學聯代表，他方為國務院委托全權代表，不一定為總理。

一．我方條件：

- 1、就四二零問題：
 - i. 向受傷同學及市民致歉；
 - ii. 就新華社不真實報導澄清真相。
- 2、如實評價本次運動：
 - i. 承認學生自始至終擁護黨和政府；
 - ii. 承認此次運動是學生自發的民主思想、人權思想啟蒙問題；
 - iii. 以上擬同書由新聞界公開發表。
- 3、對本次運動中，新聞界的弊端：
 - i. 點名批判不真實報導的報紙、電台；
 - ii. 就社論的出入向學生做出道歉。
- 4、對此次運動後：
 - i. 不追究此次捲入運動的學生、老師責任；
 - ii. 現時臨時學聯組織合法化與學生會並存，或聯合組織為起監察作用的自治會，承認其法人地位。

二．接受我方意見，將採取合作態度：

- 1、通過國際、國內新聞媒介申明熱烈擁護黨和政府的態度，申明學生運動是針對學生的少許差錯，而採取的是和平請願方式。
- 2、儘量保證不在正常時期發起類似大規模的運動。
- 3、限制運動在縱橫面上推廣、擴大，盡早復課，恢復校內正常秩序。
- 4、公開就衝擊新華門事件道歉，對學運中傷及軍警情感及肉體的行為道歉，就此次學運的社會治安、交通、經濟造成的某種影響道歉。



三．停止臨時時期大規模宣傳活動

四．公開捐款用處，並將餘款移交，成立民主基金委員會

五．政府應採取以下建議：

- 1、將官員財產公開，製議案提交常委會
- 2、新聞如實報導，允許私人辦報，新聞對政府全面監察作用，列入新聞法草案，設立學生接待處，請學生代表提意見。
- 3、設立人大常委學生處，請學生代表對立法機關或行政、執法機關監察。
- 4、教育經費儘快增加，一年內達世界平均國民產值比百分之四點五。

拾遺：

- 一．就四二二政府對十餘萬學生及數十萬群眾態度作出解釋。
- 二．對四二七軍警清場，傷及十餘觀眾做出解釋。

來到公園做宣傳的同學表示，這協議草案是根據北高聯開會後下達的訊息整理出來的。他們都是聽從北高聯的指示，說同學們可以繼續進行活動，所以早上便出來作宣傳及募捐。





廣場實錄

1989.4.26 - 6.4

5·1-5·12

遊行現場



5·1

吾爾開希的遺書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早上去香山臥佛寺飯店，那裏有金觀濤等舉辦的五四研討會，無數中港台學者雲集，交流學術心得，延續五四精神。

中午離開，到北京師範大學想找吾爾開希。由於五一勞動節放假兩天，各院校學生都外出遊玩，校園氣氛顯得冷清。聽說吾爾開希要躲起來，並寫了遺書給他母親。據北師大同學表示，現時情況非常微妙，吾氏處境十分危險，隨時有可能被公安抓捕，為安全計，同學已把他藏匿起來，不讓人發現他的行蹤。

到北師大找不到吾爾開希，便跟其他同學聊起來。他們把宿舍房間變成工作總部，還設有廣播台。同學說廣播台可以找到吾的遺書，因為昨晚宣讀過，同學深受感動。宿舍的廣播台設備簡陋，只有擴音機和喇叭，兩個文件夾寫着已播、未播的，同學給我找出吾爾開希的遺書來讓我抄錄。

為了母親的微笑 ——《吾爾開希遺書》

親愛的母親：

兒向母親遙遙謝罪，我知道你有心臟病，在家中你最疼愛兒，可是兒卻在這裏傷着你的心，兒不孝。

媽媽，也許你將失去你的兒子，你的兒子已準備好，為了一個你在夢中曾憧憬的、滿布鮮花的美麗世界，獻出自己的自由與生命。

媽媽，兒不敢忘記你的諄諄教誨，為人要正且直，不要貪生怕死，要敢於犧牲，要勇於捍衛自己認定的真理，而不要跟在別人後面，點頭搗蒜，兒時不敢忘。

幾十年來，人民為了人的尊嚴，為了他們應該有卻沒有的自由，為了互相都如兄弟姐妹般的情感伸出乞討的手和磨破膝蓋，沒有人把這世界已缺乏的美麗的東西發給人們，人民流過淚，流過汗，也流過血，甚至獻出了生命，可是我們奪得到手的太少，太少了。但人民已經明白，乞求是不會有民主和自由、人權和法制的，只有正面慘淡的人生，用自己滾燙熱的鮮血才能澆灌出這世界上最美麗的花朵。

兒不孝，不敢忘記媽的教誨，兒已準備好自己的鮮血給媽媽染紅一片鮮花，讓媽媽和更多媽媽們看到這世界美麗的希望所在。

媽媽，兒不忘媽媽對兒所寄重托，可惜兒年方二十一，未能盡全侍母左右之事，就有可能讓母親淚盈雙眼。

媽媽不要為兒悲傷，而為了更多的母親，因他們兒子的幸福微笑，兒先走了，想母親之為人必有痛兒之哭，想亦得為其他母親的幸福而產生欣慰，此即兒所孝母親之最了，不孝兒再三饒謝已罪，媽媽為了更多的母親和兒子，請你再為兒唱一遍童年天天聽得的催眠曲，微笑地送兒一程吧！

不孝兒，吾爾開希
「五四」運動七十年紀念日前

5·3

袁木指方勵之是幕後黑手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



五月三日早上，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在全國記協召開中外記者會，對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日前要求以該會為代表展開對話，表示絕不同意。他堅持各院校的學生會及研究生會才具有合法地位，並認為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是非法組織。對於學生可能五月四日發動遊行示威，他說，會採取以前採取過的正確措施，又指出學生背後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想挑起動亂。

袁木說，中共政府是歡迎對話的，而且樂意與不同意見的學生展開不同層次的對話。他認為，對話是有助溝通思想、增進理解及促進問題的解決，但不等同於政府與學生對立及談判，同時對話亦應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

由於學生提出請願及對話的先決條件，是要排除合法的北京市學聯及全國學聯，並要求以非法的臨時高校自治聯合會來組織對話，他認為這是不合理的。他不屑地表示，學生要求與政府平起平坐，甚至高於政府，這也是學生幼稚衝動的表現，若連參加對話的官員也必須獲得學生同意，便更加不合情理了。

此外，學生的請願信中採取了最後通牒的方式，要求政府在五月二日中午答覆，否則便進行遊行示威，袁木認為這是苛刻的條件，帶有威脅性。同時，他又認為有少數人在學生背後出主意，挑起動亂。他又強調青年學生要求民主、自由及反貪污等，都是合情合理，與政府意見相一致的。

袁木申明，政府是真心真意愛護全國學生的，所以希望學生能與挑起動亂的人分開，並呼籲同學馬上停止罷課、示威和遊行，不要被背後製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利用，捲入這場政治鬥爭中。

至於幕後「黑手」是誰？他說，主要人物並非學生，但不排除有學生參與，如果學生不侵犯刑律，對其過激言論和行動，政府已宣布是可以一筆勾銷的。他又指出被中共視為反動組織，基地在美

國的中國民聯，亦扮演着幕後策劃的角色。

他承認少數人便能挑起動亂，確是因為大陸存在着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複雜原因。目前中共正進行改革開放，堅持現代化進程，其中也有缺點與失誤，故引起群眾不滿。但是現時有少數人利用這種對政府的不滿，挑動和否定黨領導和社會主義，他覺得這些人唯恐天下不亂，別有用心，想千方百計破壞國家的安定團結。

他又說，已確實知道幾年來，有些人向高校學生中灌輸錯誤思想和提出錯誤政治綱領，並進行非法組織串連活動，他有所指地說：「希望這些人不要天真地以為中共不知道情況。」

對搞事的人，他說，在西安和長沙已逮捕了一些暴民，而那些沒有露面，在背後作惡毒主意的人，目前政府暫不會採取拘捕行動，因為動亂時期採取拘捕行動是愚蠢的，而且政府採取此克制做法的根本原因是愛護青年同學，但也希望學生特別小心龍蛇混雜的人。

他希望學生不要在「五四」發生大規模示威遊行，亦衷心希望即使遊行也不要對「亞銀會議」及官方紀念「五四」的活動大會造成搗亂不安。

問及政府會否採取暴力鎮壓時，他只是表示中共將會採取一貫的態度，而中國公民雖有遊行示威的權利，但人民也必須遵守人大設定的十條遊行規定，重申假如真的遊行示威，政府將會採取以前曾採取過的正確的做法。

方勵之表示民運不是一、兩人可以煽動起來

在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召開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當時對有關方勵之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的看法時，袁木說，對方氏的全部言行，他不準備發表評論，但方氏在動亂時提出的一些主



張，是否跟他一直主張開放改革有矛盾，則留待公正言論者、歷史及他自己來判斷了。

他表示，中共堅持改革開放，一切維持不變，而國家亦有能力制止可能有的臨時動亂。他又保證在開放過程中，對外商的投資，是絕對會保護他們的利益。他不希望大陸有任何動亂，亦相信真正關心中國和願意與中共做朋友的人，也不願看到大陸有動亂。因此對方勵之的主張是否一個有愛國心的中國公民應有的態度和立場，則留待方勵之自己及他的言行作答。

記者致電方勵之時，他的太太李淑嫻表示，學生的一切行動，他們不太了解，至於別人怎樣評價他們，就由得他人，而事實上不少海外朋友都認同他們為高尚的知識份子。她說，方勵之到科學院上班，不在家。暫時沒有甚麼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也不怕國家會有任何行動，他們仍可繼續各自的工作。

方勵之回家後，接受電話訪問時表示，當日接受《亞洲華爾街日報》訪問談到外資問題，他只說應考慮人權問題，而非所有投資均有利中國改革，例如與官倒有關的，但他並無說過「不要來中國投資」。

他說，有關方面的警告只會增加其知名度而起不了阻嚇作用，他仍會繼續說話，表達意見，發出聲音。談及今次學潮時，他強調，作為一個知識份子，除對自己的事業外，亦應對一些政策發表議論和看法。又說要求民主改革不獨是他個人提出，而民主運動也不是一、兩個人可以煽動得來的。

北高聯大會議決舉行「為民請命」大遊行

北京市四十七所高校在下午舉行學生自治聯合會代表大會，以大多數票議決聯合舉行「五四為民請命大遊行」，並與外地學生串連行動，其中上海復旦大學、合肥科技大學、天津南開大學、成都

科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都有派學生代表到京聲援。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在會議上宣佈，會在五月四日舉行各種形式的活動，包括和平請願大遊行，而學生將會喊的口號主要是：支持改革，反對倒退，維護憲法、爭取民主、人權、自由及要求政治公開化，繼承五四精神及發表五四宣言。北高聯十多名學生代表中午到國務院辦公室信訪局等候答覆，該會執行主席王丹在與接見他們的官員會面後表示，該官員沒對袁木的講話作再多的解釋，只說政府的答覆就是這樣。學生代表對此表示不滿。

各高校代表及後齊集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大會，決定進一步行動的部署，結果有投票權的四十七名高校代表中，有四十票通過「五四」遊行，二票反對及五票棄權。遊行將於清晨出發，路線待定。

吾爾開希以北師大自治會主席及北高聯常委身份在決定遊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五月四日舉行「為民請命」大遊行，由各高校聯合舉行，作用是紀念「五四」這盛大節日的七十周年，為幾十年中國的民主啟蒙運動賦予新機，至於遊行的目的及總綱領是不會改變的。他說，請願遊行目的很明確，像要求政府誠意地跟北高聯代表對話，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等，他不否認今次行動是與政府不答應對話條件有直接關係。

至於今次遊行人數會否超過上次，他認為會。問及學生與公安會否有衝突，他認為很難回答，但學生是理智的，會盡量避免衝突。對會否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及何時復課，則表示無可奉告。他又說，不希望對亞銀會議開幕造成影響，而有關戒嚴的消息，他亦不大知道，但四二二及四二七均曾有此警告。他說，沒有考慮過有過激行動，也相信政府鎮壓的可能性很低，至於市民會否支持學生，觀察實際遊行場面便知。對方勵之是否「幕後」策劃者，他明確地說：「不是」。而有說中國民聯與北高聯有連繫，他說，這是無中生有的，再者民聯被視為反動組織，北高聯不會與他們聯繫，也沒有收過他們



所發出的支持信

有關袁木答記者問，他說，袁木的談話在邏輯概念上混淆不清，他個人認為袁木和官方代表的一部份人，都是缺乏對話誠意的。最後，問他個人會否擔心被政府抓起來？他說：「甚麼可能性也會發生。」

此外，在新聞發佈會上，北師大的同學均紛紛圍住會場，秩序良好，並對遊行表示支持及不時拍掌叫好。上海在前日已有接近萬人的遊行示威活動；合肥科大學生代表李亞呼籲外地學校的在京學生，早上七時三十分在北師大集合一起遊行；而中大學生代表余晨星亦趕抵北京支持遊行，並將在中大募捐所得的一萬元港幣送交北高聯。

5.4

「五四」大遊行 宣言及花絮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

遊行路線保密 各校學生兵分兩路

北京高校學生藉「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發起請願大遊行，全市五十多間高等院校及各省赴京聲援合共五萬餘學生，早上在各自院校出發，兵分兩路，遊行四十多公里後在天安門廣場匯合及集會，至下午四時許和平散去，返回校園，歷時九個小時的遊行集會，軍警並無施加鎮壓，雙方未釀成嚴重衝突。

學生在五個多小時的大遊行中，沿途只四度被軍警阻攔，與四月二十七日學生環城大遊行時，遭十多次被大量軍警阻路的情況比較，顯示中共對是次遊行的態度較為溫和及克制。不過，今次參加

遊行的人數明顯減少，而且遊行氣氛亦不及上次群情的熱烈。

為避免遭政府沿途阻擋，今次遊行的路線在事前籌備及出發遊行前均保密，只有少數帶頭的學生領袖知道。學生又以化整為零的策略離開校園及分散遊行，主路大軍以北師大、北大、人大及清華大學等，由西路進入長安大街遊行到天安門。其它如中央美術學院、社會科學院等則由東路進入長安街。各路學生約由早上八時分散出發，因此軍警不太能夠攔截，學生遊行隊伍得以順利於下午逐漸齊集起來，會師於天安門廣場進行大型集會。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清華大學等主要院校在清晨起，校方電台便播出勸導學生復課及不要遊行的廣播，但學生主辦的電台則呼籲同學罷課及上街遊行，雖然廣播聲音此起彼伏，交叉混雜，但校園內在早上八時前仍相當寧靜，只有少數學生打球、往飯堂吃早點，及至八時半左右，領導遊行的學生出現才慢慢熱鬧起來。

各校學生出發前氣氛輕鬆，並無誓師及演說，舉起的橫額已無「風蕭蕭兮易水寒」及「不自由毋寧死」等字眼，換來大部份校名、系級等旗幟，遊行時的旗海陣容不如上次壯觀。

北京大學遊行隊伍於上午八時半出發，沿途會合人大、清華、北師大等院校，組成龐大陣容，行到二里溝路及白石橋首度遭到軍警阻路，但學生稍向前擠便衝破封鎖線，順利往前走。遊行隊伍正午匯集在復興門橋上，其時學生人數已達三、四萬，圍觀群眾亦有幾十萬人，部份走在學生隊伍後加入遊行。遊行隊伍延綿數公里，所到之處交通出現混亂，但司機及群眾並無太多怨言，反而興緻勃勃地加入圍觀行列，學生經過時頻有拍掌聲以示支持。

遊行隊伍於下午十二時五十分經過中南海新華門前稍有停留，前排的北師大學生呼喊「反官倒」、「反貪污」及「新聞要講真話」等口號，然後繼續往天安門廣場前行。而後排人大的學生則向新華門前的國旗下唱國歌。遊行過程中，學生並無強調「支持共產



黨領導」的口號。

以北師大為首的遊行主路隊伍於下午一時半，順利與較早前已突圍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西行隊伍會合。中央美術學院，石油大學等院校亦很容易便衝破軍警人牆，順利進入天安門廣場等候集會。學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安放國父紀念像，再新加上一幅寫着「天下為公」的橫額。

遊行到天安門廣場集會的五萬多名學生中，有來自各省高校的學生，其中包括上海復旦大學、煙台大學、中山醫學院、深圳大學、山東大學、華北電力學院、山西財經學院，以及瀋陽、湖北、吉林、南海等地的學生。香港中文大學兩名學生代表亦有參加今次遊行，當港隊進入天安門廣場時，得到在場學生及群眾熱烈的掌聲。

學生在集會中發表了「五四宣言」及宣布復課的消息，之後於四時許各校學生分道返回校園，歷時九小時的「五四請願大遊行」於下午五時結束。

遊行花絮

- * 今次遊行主要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與學潮以來所喊的口號有所不同，其中最突出者有「不能再等一個七十年」，「德先生，你好！」等。
- * 北師大的學生表現比較熱烈，很多學生頭帶紅布條，上書「媽媽，我沒有錯！」一個學生對記者說：「我相信在山西的媽媽會諒解我上街遊行，因為這是我應該做的。」
- * 學生為遊行請願作了一首《請願歌》：「背負着民族的希望，肩負着國家的重任，同學們起來，為了民主，為了科學，為了自由，為了法制，請願！請願！用我們的熱情和智慧，用我們一顆赤誠的心，嶄新的黎明一定會到來。」

- * 今次遊行出現一些有趣的橫額，例如：「博士碩士除了良心一無所有」、「我討厭暴力」、「一小撮等如十一億乘百份之九十九點九」。又有以諷刺袁立本及何東昌等領導人的對聯「這副嘴臉政府何以立本，如此對話國家何時東昌」，及「袁木求愚」等。
- * 官方將塗滿詩句及悼詞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清洗後，今日再度被群眾擠湧圍觀。學生集會後，尚有幾千群眾圍着紀念碑閱讀尚有殘留痕跡的詩句。
- * 今次學潮扮演主要角色的北京師範大學，其遊行隊伍遭到軍警較粗暴對待。北師大約千五名學生於早上九時半出發，離開校園不遠便被六百多名軍警組成的人牆阻擋去路。該校學生自治會主席吾爾開希與軍警談判十分鐘後並無結果，在場的群眾及學生遂向軍警組成的人牆擠去，希望突圍，但遭軍警猛烈對衝，部份在前排的學生被拳打及粗暴推撞，現場引起數度混亂，並有數十群眾被推倒地上，有兩人受傷送院救治。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在混亂中被軍警打了數拳。雙方擠壓時軍警將學生的一面旗幟折斷及向學生擲雜物。

首都新聞界加入遊行隊伍

北京學生運動中對新聞自由的呼聲，獲得首都新聞界的支持。五月四日，北京約四至五百名新聞記者前往北京新華社門前請願，要求與政府對話，就《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撤職，及北京高校學生近個多星期來的活動報導受到限制作出解釋。

北京市新聞記者在請願後，停留在街道旁等候學生遊行隊伍的經過，他們互相呼應及一齊喊出支持爭取新聞自由的口號。

首都新聞界拉起「我們想說真話，別迫我們造謠」的橫額，而學生亦舉起「人民報紙人民養，人民報紙為人民」，「言論自由，聲援導報；新聞自由，解除報禁」，及「向《世經導報》致敬，向欽本立先生致敬」，「新聞要說真話，向敢於說真話的記者致敬」



等示威標語和喊起口號。

此外，中國新聞學院研究生也有八十多名同學參與遊行，經過《解放軍報》報社時，也大喊「新聞自由」，反映學生的心願。

集會後突然宣布復課

北京市高校學生在紀念「五四」的大規模遊行及和平請願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發表「五四宣言」，藉此遊行承先啟後，將五四的民主和科學精神發揚光大。

北京市高校學生聯合會昨宣布結束由四月二十二日至昨日為止的罷課行動，由今日起五十多間高校全部正式復課。學生在紀念五四的大規模遊行及和平請願後，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及聯合發表「五四宣言」。

學生代表在宣布全面復課後，表示各高校臨時自治籌委會，將負責成立各校學生代表團，繼續與政府交涉及要求對話。他們又希望同學支持北高聯及代表團與政府交涉的結果，並籲請同學保持熱情，保留鬥爭的權利，在必要情況下，人人都可以行動起來。

學生以吶喊的方式朗讀「五四宣言」，內容大意：「七十年前中華民族的精英學生曾在天安門前齊集，以發揚民主與科學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是學生愛國民主和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步，亦為中國歷史開展了偉大的新篇章。」

宣言表示：「學生今天雲集在天安門，不單是為了紀念五四，而是要自豪地向全國人民宣稱，他們無愧於七十年前的先驅們。新中國一方面在向現代化邁進，另一方面卻極大地忽視了民主建設，而在強調科學時又不重視科學精神。目前國內民生普遍存在的，如政府機構臃腫、貪污嚴重、知識貶值及通貨膨脹等問題，令現代化進程出現嚴重障礙。在沒有民主和科學精神的社會生活中，大量封建及舊制度殘渣會再度泛起，為了能令現代化實現和發揚五四精

神，加速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保護人權及加強法制，便成為了當務之急。」

因此，宣言呼籲同學們：「總結五四以來歷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經驗教訓，使民主和理性成為一種制度和程序，深化五四所提出的課題及精神，令中華民族崛起的願望能在地球上實現。」

宣言強調：「學生在這次學運中，是因為對民族的前途和命運關注，所以希望政府加快改革步伐，切實保障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允許民間辦報，鏟除官倒及重視教育和知識份子。」

事實上，是次學生運動是繼「五四」以來最大規模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數以萬計的學生走上街頭，沿途群眾呼喊支持，也反映學運發展到現階段，已獲得相當程度的勝利。

不過，宣言中也呼籲同學們：「要達到富國強民及現代化，我們的勝利是極之微弱，當前的任務只能在校園內進行民主改革，鼓勵學生積極參政，堅持要求與政府對話，促進政府民主改革，反貪污腐化及促進新聞立法，而現在我們便正在為此而奮鬥。」

5·5

思考如何深化學生運動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

北京學潮發展到五四大遊行及宣佈復課後，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對復課意見與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不一致，並堅持繼續罷課。不過，清華、政法等大學則正式結束罷課，同學亦收拾好心情上課。



有北大及北師大的學生表示，同學前日遊行了十五小時後才返抵校園，所以累得不去上課了。不過，北大則在校園貼上公告，表示繼續罷課，同學會開會商量下一階段的工作計劃。學生代表王丹表示，北大還未收到北高聯的通告，等獲正式通知後便會通知同學復課，而他們是會服從集體的決定。

北師大自治會秘書長張軍表示，還未具體決定何時復課，有些高校已經復課了，但北師大共有八千名學生才一百多人復課，他們會召開各系大會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肯定會復課，不過需要時間商量。

張軍表示，五四遊行未能達到預期的聲勢浩大和壯烈隆重，本來是想由一個高潮推上另一個高潮，結果有點失誤了。他說，這次運動本來是有明確目的，即繼續抗議政府及宣布新五四的來臨，運動才剛剛開始而並不是結束，現在要推展真正的啟蒙運動。

如何評估往後的工作，他說，才剛起步，要先開展校園的改革，出版刊物，探討治國之策，介紹東歐、蘇聯民主改革的有關情況，分析中國具體國情、文化心態、歷史根源等。此外，打算進行一些中國經濟、人權和現代化的現象調查，邀請青年學者、各方人物與同學探討問題，提高思想意識水平。這次運動還要在意識形態上進行鬥爭，藉以提高民族的素質，是一場漫長的運動。

在北大的三角地，亦有大字報總結今次學潮，表示四二七是學運高潮，五四遊行人數下降反映熱潮不能持久，學生領袖宣布復課，顯示學潮大抵已接近尾聲。該大字報又提到，近十萬學生在四月二十七日以很大的冒險精神，對《人民日報》的恫嚇、高壓進行聲勢浩大的示威，給中央高層領導一次清楚的民意測驗結果。又提到同學決定罷課，將對得起海外的支持、聲援和自己的良心。

至於清華大學的學生，則支持北高聯的決定，全面復課。同時，校內的大字報也冷清零落得多了，對五四遊行及跟進工作沒有新的言論發表。

政法大學的各系會聯合發表了一份公告，表示半個月來，同學視死如歸的中華精神，團結一致的偉大行動，迫使政府作出了初步讓步，而遊行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和影響之深遠，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參加者都為推進民主化進程付出血汗而欣慰，但罷課只是鬥爭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國的民主化不是一蹴而就，須經長期不懈努力方能實現，因此學潮雖已取得初步勝利，但考慮到長遠利益，故決定結束罷課，並強調同學在復課後要繼續以其他方式為推進民主而努力。

5·6

復課之後及學運去向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發表復課聲明，各高校在五月五日起陸續復課，但北京師範大學暫時不復課，至於何時復課，意見仍有分歧；而北京大學則以宿舍為單位舉行投票，結果決定繼續罷課。

北高聯秘書長王志新在記者會上表示，決定復課是考慮到社會各界及政府代表的誠意，同學為正義行動及減少對抗壓力，應以國家大局為重，故倡議復課。

關於仍有兩間院校不願意復課，他說，是因為常委之一周勇軍在五四大安門集會時作出口頭宣布，沒有以書面公告形式通知各院校，同時具體復課日期到底是在五月五日抑或五月八日，當時尚未有最後決定。

但是北高聯表示，五四之後學運仍未結束，同學應對運動進行反思及提高理論水平。對是次學生的自發行動，各學生代表已組



成高校聯絡機構，以後會發展為一個協調機構，了解及綜合各校情況，使能互相配合及呼應，為共同事業而努力。

不過，由於組織發展時間短，嚴密及協調不足，所以北高聯承認曾發生了兩次重大失誤，包括：四二七遊行之前，曾發通告取消遊行，常委應共同承擔錯誤；以及遊行後，政府立刻答應對話，同學未能即時作出反應，錯過機會，令學運走向低潮。

此外，對首都新聞記者，北高聯曾經不客氣地批評，現在發現記者們十分同情學生，五四遊行也站出來，對這正義行為非常欽佩，希望以後能並肩鬥爭。北高聯又呼籲全國大學生，要與打、砸、搶分子分開，大學生應與當地政府合作，協助維持秩序和推動改革，不希望再有西安、長沙等事件發生。最後，高校聯會又公開向國務院發言人袁木道歉，因為同學曾經誤以為袁木提過北高聯是反黨及反社會主義，後證實未有此言，所以願向他道歉。

至於五四之後，學運已取得初步勝利，不過仍會繼續爭取北高聯的合法地位，希望校內組織能有公開的民主選舉程序。就學運的未來去向，北高聯表示會返回校園，例如籌辦自由講壇、搞刊物、報紙、出版學運書冊等，為學運創造氣氛及建立對話制度。

5·7

學生對話代表團的組成

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

新成立的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在五月七日召開第三次會議，並於五月六日向政府提交請願書。對話代表團的成員，到現時為止共有三十一所院校參加，學生代表由普選或推選產生，成員素

質較高，多以博士生及研究生為代表。

對話代表團負責人項小吉表示，對話的原則是瞻前顧後，希望能為今後的民主法制建設提意見；此外又會兼顧上下左右，涉及的問題不局限於學生、教育，而是廣泛地考慮到社會各階層的心願和利益，作一些反映，使當代中國青年能更進一步啟發愛國熱情，提高參政、議政、法治及民主的意識，推動全民族及國家前途的發展。

他透露，對話的內容，從學生一方來考慮，是希望就當前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與政府協商及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

目前學生代表正為對話作準備，至於會否獲得答應，仍有待政府的答覆，他們希望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代表，能盡快就對話的時間、地點及程序等事宜與學生代表進行協商，以利對話的順利進行。又請求政府能根據新聞自由原則，允許新聞界進行採訪，全面、公開及準確地作出報導。

項小吉又表示，代表團主要的工作是對話，其他的活動將不考慮，而且亦不會以作為政府對手的姿態出現。但是以國家公民的身份，對話代表團覺得應有責任對國家發展提意見，及希望取得溝通的渠道。

基本上，對話代表團與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是沒有聯繫的，但總方向是推動民主法制的建設，北高聯是支持的。此外，對話代表團的合法性問題，亦會考慮，希望能在對話會議上詳細談到他們的觀點，亦不排斥其他代表團的組成參與政府對話。

5·8

北京大學的復課條件

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



北京市各校已陸續全面復課，恢復正常的校園學習氣氛。唯北京大學至今仍堅持罷課，願意復課的同學大約只得三成。

北大學生晚上在校園舉行民主論壇，圍觀及參與的同學約有百餘人，之後學生又在校園內遊行，更有部份同學上街，繼續進行不息的學生運動，以示目的未達。在北大校園三角地，仍貼有很多大字報堅持繼續罷課，甚至有說：「堅持十天，會會老戈」。

北大籌委會張貼復課條件的五點聲明，告示內容：（一）要求《人民日報》就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評公開糾正錯誤，對學運重新作公正客觀的評價；（二）要求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三）要求國務院立即公佈調查官倒的統計數字，成立審查官倒小組，着手懲治工作；（四）要求立即給《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復職；（五）要求重新審議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就此五點復課條件，若政府不作答覆，同學將繼續罷課，積極行動。

5·9

北高聯商議下一步行動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召開會議，決定翌日中午十二時正採取騎自行車遊行示威的行動，以表示對政府拖延答覆對話的不滿，及堅持繼續爭取民主，宣示學運還未結束。學生踏自行車遊行示威是由北京大學最先發起，目的是要向人民表示，學生還沒有放棄行動，所要求的尚未實現，因此還要繼續爭取。自行車遊行得到十多

所高校的響應，北高聯晚上開會決定支持。由於北京大學繼續堅持罷課，五月九日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農業大學亦宣布再度加入罷課行列。北大籌委會表示，罷課是一種象徵，表明要求民主的意願還未達到。

北高聯主席吾爾開希對記者透露，除罷課及遊行外，北師大有學生已帶頭建議採取絕食抗議，他不排除五月十五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卓夫訪華時會有所行動，北高聯現在尚未有明確決定，一切還須待政府答覆會否安排對話，及是否令學生滿意。

學生的自行車遊行計劃在中午出發，到政法大學集合，自行車隊以三十人為一組，沿上幾次遊行路線一直往天安門方向前進，最後還會經過《北京日報》及《人民日報》報社，才折返回各高校，全程約需十小時。

此外，北大籌委會宣布，天津各高校約五百名代表將於五月十三日騎自行車到北京聲援學生運動，主要目的是歡迎戈巴卓夫訪華，要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以及敦促政府盡快與同學對話。

新聞界代表請願要求對話

北京市新聞界代表前往全國記協遞交請願信，要求與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及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啟立對話，爭取新聞自由，改善現存新聞體制中的弊端。

新聞界代表，《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主任李大同，獲全國記協書記處楊翊及唐非接待，在遞交請願信的過程中，中外記者均獲准進內採攝。

李大同表示，今次遞交請願信的目的是希望與黨中央官員進行心平氣和的真誠對話，以正當的途徑向政府表達對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整頓總編輯欽本立停職的不滿。學潮期間，新聞報導受到限



制和作出失實報導，就如何真正建立報社總編輯制，推動新聞改革等，新聞界要求通過對話向有關部門交流意見。

他說，簽名支持請願信的單位共三十個，簽名人數共一千多人，現時簽名仍在進行中，簽名者都是代表個人，出於職業道德和良心，希望能解決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

他表示，不會期望對話能帶來直接的結果，但相信會帶來一次好的開端。對話代表由名單中民主推選產生，約由四十人組成。他又認為，對話不代表對抗或辯論，只是希望能充份表達各自的觀點。

他希望通過這次對話，能向公眾完全公布新聞工作者的思考。若對話的請求被接受，雙方最好能有一周時間準備，也希望對話過程能全部公開廣播及報章上作全版報導。負責接待的全國記協書記處書記楊翊表示，會盡力協助及轉達新聞界的要求，待有關當局回覆後將盡快通知各代表安排對話的事宜。

在新聞界遞交請願信期間，多間北京高校包括北大、北師大及北京農業大學等，均有陣容頗大的遊行隊伍在全國記協前靜坐聲援，他們自發支持新聞記者的良心及敢於站出來。學生的遊行隊伍約有千多人，離開記協後，部份學生還繼續遊行到《人民日報》報社，就四二六社論抗議示威。

5·10

自行車隊穿插北京市巷宣傳學運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

三萬多名北京市高校學生以騎自行車的遊行方式，繞過北京市各大街小巷一周，抗議政府拖延對話，敦促政府在即日內要有明確答覆。自行車隊伍在馬路上奔馳，場面壯觀。

中午，北大學生在校園南門齊集，列隊出發前先廣播遊行目的及播放國歌，同學們心情頗為輕鬆。十二時半自行車開始出發，單是北大參與的同學人數已接近三、四千，人群在校園外圍成人牆，讓自行車隊可順利出發，約四十五分鐘後，所有北大自行車隊才全部離開校園。

北大學生以非常標緻的綠色及黃色彩帶，自行寫上北大及自創標語圍在額頭上，又把大旗裝配在自行車，由作家班帶頭，其中著名作家蘇曉康也領在前面。同學們把平等對話，堅持到底，爭取民主、人權、自由等標語、旗號鮮明地掛起，甚至把精警句語及文摘抄在衣服上，以取代部份橫額、旗幟及口號。

其他院校學生的自行車隊，均齊集政法大學連成一大隊，包括有北師大、北農大、北航及清華大學等，都有相當多的學生代表參加，結成大隊後便浩浩蕩蕩駛經復興門橋，到《中央廣播電台》及《新華社》抗議，要求新聞自由。

自行車隊所經之處，交通一度引起混亂，不過車隊過後，很快又回復正常。下午三時左右，自行車隊經過西單駛向天安門，大群圍觀者早就等候自行車隊經過，擁上前表示歡迎及支持學生的行動。本來自行車隊是按原先構想，三十人一隊出發，但結果秩序很難維持，不時有掉隊，分散及其他騎自行車的插隊混進，又經常有堵塞及人車爭路。在寬大的東長安街上，自行車在巴士和汽車之間穿插，學生向巴士上的乘客揮手致意，群眾則喝采支持。

學生對沿途造成交通混亂抱歉，不時向人群及司機大喊：「對不起」，「請讓一讓」。群眾則希望了解學生情況，堵車時便上前跟學生傾談幾句，回說：「不用客氣」，「你們做得對」，雖有造



成不便，但也怨言不多。自行車隊伍中，更有幾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加入，他們希望參與學潮，了解北京學生的情況及學運進展。

是次自行車遊行路程頗長，學生最後抵達《人民日報》報社前抗議，然後再繞路各自回校園。約七時許，車隊還在安定門附近街道，要再多走兩小時左右才能返抵校園。

經過幾次的遊行活動，學生已經不再害怕政府會採取鎮壓行動。此次自行車遊行的創舉，再見不到有軍警設封鎖線的舉動，沿途只有交通警維持秩序及安排車輛早些恢復正常行駛。

由於遊行沒有太大威脅，學生的裝扮也較多花款，很多同學在額前圍上布條、紙條，又拖着長長的布字條，行車時隨風飄揚。又有同學用彩帶包住自己的口，表示無法說真話，希望報禁能夠解除。

堵車時，同學用粉筆在貨車上寫上「新聞自由」的語句，以起廣泛宣傳作用。更有同學別出心裁地把一塊圓木（取袁木諧音）掛在車把上，木頭刻有「鐵咀半仙」字眼，然後用鎚敲打之，以抗議袁木胡說八道，顛倒是非，混淆視聽。

5·11

積極準備對話及醞釀新一輪行動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

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召集人沈彤表示，他們得到國務院辦公室信訪局的通知，學生要求對話的建議已經轉達中央及國務院，領導人仍在研究中，估計在本周內會有明確答覆。

沈彤說，據信訪局的通知，領導人很了解學生焦急的心情，對此他覺得還可以滿意，因為對話是要慎重的，應該還有希望的。

早上九時，對話代表團等候答覆及召開會議，他們仍在積極準備對話。

幾則學生消息的報導

-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同學受到校方的干擾，壓制學生的行動，不少大字報已被撕去。在剩下幾張新貼的大字報中，有學生稱，五月四日當天，校長單獨採取行動抄查學生宿舍，學生對此極表不滿。
- * 據北大《新聞導報》快訊指出，北京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有三位進修生因參加學生愛國民主運動被勒令退學。
- * 在北大三角地的大字報中，有部份研究生建議破釜沈舟採取緊急措施，呼籲同學集體絕食及在戈巴卓夫訪華之日，遊行進駐天安門，作最後拚搏。
- * 天津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會在北大舉行記者會，宣布自治會的成立。

5·12

王丹等人倡議絕食請願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

北京學生決定在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促請政府盡快達成與學生真誠平等的對話，並要求重新評價學生運



動。

這是建國以來北京首次由學生自發進行的絕食活動，主要的倡議同學都是以個人身份參加，其中包括北大的王丹及封從德、北師大的吾爾開希、北京電影學院的馬少方等。自願絕食的同學會在下午一時在北師大集合，然後到天安門廣場作無限期的集體絕食。

學生所喊的口號將會是：「不是動亂，必須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不達目的，誓不復餐」、「我雖愛米飯，但更愛真理」等。由於是自願參加，學生人數暫無法估計。

王丹對記者表示，參與絕食的同學會堅持到底，決不會中途離開，他們會一直等到政府有答覆才肯罷休。至於會否一直拖延到十五日，影響戈巴卓夫訪華的活動，他估計政府肯定要想辦法制止他們的。不過，他以個人身份表示，戈氏訪華時，不應該會有大規模行動，因為同學也不想利用外國力量來向政府施壓。

王丹又表示，他和吾爾開希、馬少方、封從德四人，五月十一日晚草擬好一封致中共中央的請願信，已郵寄出去。請願信的內容主要是向黨及政府表示，學運反映出來的許多問題是很值得他們反思，又表明學生願跟他們相互溝通。

信的內容強調，這次學運的性質是愛國學生民主運動，出發點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加速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步伐。這種政治要求，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並不能令人滿意，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建設上，出現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一系列嚴重挫傷知識份子積極性的錯誤政治運動，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權保障等憲法賦予的權利幾乎毫無進展。

此外，縱觀歷史發展規律和世界形勢，民主政治的發展是大勢所趨，東南亞專制獨裁政權相繼垮台，匈牙利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改革都證明這點。若中共中央一意孤行，逆潮流而行，只顧

慮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拖延民主化，其後果是很值得悲哀的。請願信又指出，民心是執政和政府最應珍視，學運中提出的政治要求獲得了社會各階層人民的擁護，由此亦反映了民心所向和人民群众的意願，因此希望黨和政府順應民意，認真考慮接受學生的政治要求。

學生明確表示，會對黨的正確領導擁護，又認為中華民族已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時刻，選擇順應民意，抑或倒行逆施。學生希望中共政府能作明智的選擇，並建議政府認真考慮他們的三點要求：（一）肯定學運，推翻《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二）盡快與學生代表進行平等真誠的對話，認真考慮學生的政治主張及復課條件等要求；（三）允許學生在校園內實行充分的自治，並使之制度化、合法化。

北京民運消息短訊

- * 北大校園下午舉行民主沙龍，邀請「太平洋論壇」主編包遵信演講。包遵信表示，四二七大遊行是有國際性特殊意義的，因為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他說，這次運動宣布封建專制統治應該結束，亦標誌著民主運動已達到新的水平，其影響將會超過「五四運動」。他又說，要防止秋後算賬，運動就必須繼續鬥爭下去。他希望知識份子別怕，要有責任地承擔這歷史使命。
- * 北京農業大學的大字報，在一夜之間被全部撕掉，北大同學晚上七時三十分組成百多人的自行車隊，前往北農大聲援。
- * 繼天津高校聯合會學生代表訪京後，又有上海高校聯會請願團抵達北京聲援學運。

同學絕食前寫下的遺書

此時，部份學生已發起絕食行動，其中一位絕食同學在起行前便寫下了一張大字報，全文如下：



虛無，彷徨，卑鄙？！

我看不下去，看不下去日趨麻木甚至僵死的面目，看不下去面孔上掛着譏諷和嘲笑，看不下去昏聩無力，朽而不折的專制，我更不忍看見這次民主的鬥爭被輕鬆地定罪或澆滅。我怎能看這些淺薄、醜陋和腐敗呢？

與其平庸、卑劣地苟活，遠不如樂觀地拚搏而死！只願這句話伴隨着我的一點良心，還有我的靈魂去拚命，直到流血！

我曾自視清高，曾得意於命運之神的過份寵愛。現在才清楚我生命的三分之一已經在天真傻笑之中飛逝。我好可憐，我有甚麼引以驕傲的東西？我連一絲的僥倖都不曾有！我與一個赤身的動物無異，我的慾望被潛滅，我的理想被蹂躪，我的意志被強姦，我的毅力被磨耗，我就是我，一個已失卻了人性的人！

我不能再徬徨，我不能再等待！徬徨就是怯懦，等待就是死亡，而且比死亡更痛苦。心早碎了，血早沸了！我何不站出來？！屈從於生活，馴順於現實比閹割了自己更可悲可痛。昂起頭，挺直胸，伸出手，邁出腳腿去爭取民主！這就是我的宣言。

要麼是條蛇，溜溜地爬完此生；要麼是個人，錚錚然挺立！抉擇只有兩種，我自然選擇後者。

自由不死，民主永存！

附：今日絕食，宣誓參加，不達目的，誓死不休。相信還不至於死去，盡管自去冬已有胃病，萬一不幸，父母也不會悲傷，他們唯一的兒子沒有給他們丟臉。

（五月十三日）





廣場實錄

1989·4·26 - 6·4

5·13-5·19

絕食請願



5·13

絕食第一天

千多名北京學生自發參與集體絕食請願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北京高校學生發起絕食抗議行動，接近一千名學生自願參加，同學用白布條圍在頭上，身纏的腰帶和布帶也都寫上感人的字句，他們在天安門廣場將抗爭到底。

首都高校自願絕食的學生表示，採取絕食行動的原因是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抗議拖延對話及把這次運動冠以動亂帽子等一系列歪曲的報導。

學生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對話，並為今次運動正名，給予公正評價，肯定其為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一名絕食同學出發前在北大貼上大字報，表示唯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又有聲援絕食者的大字報表示：「風一程，雨一程，再送壯士到紅城」，表示絕食勇士為今日的維新變法獻身，是想用鮮血和生命來喚醒民眾，刺激麻木的神經，因此絕食是不得已的。他們更建議：「素衣白帶為民主勇士壯行，為腐朽體制送葬！」

北大清晨在校園內連續多次廣播由一位女同學泣誦的「絕食書」，陳情誠懇，悲慟感人。北大作家班豎起「壯士一去盼回還」的橫額，送上一首送行詩誦，學生的心情沉重蒼涼。

約十二時半，北大絕食隊及送行隊在校園南門出發，歷史系送

上「與天地同泣，為勇士壯行」的豪情壯語，更在校門口新貼上一副對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各高校絕食隊伍下午二時左右齊集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操場，同學在寫上「絕食」的白布條頭巾上，再加上自創字句，如：「拚死一搏」，「腐敗的掘墓人」，「因噎廢食」等，圍在額頭上。又有聲援及送行同學給他們掛上腰帶，這些腰帶也寫上很多動人詩句，如：「衣帶漸寬終不悔，為民消得人憔悴」、「學子忍死望民主，何處今宵得自由」、「生也憂憂，死也悠悠」等。

還有些同學穿上白袍，袍上寫着：「七十年了，我們今天絕食是以死抗爭，為後來者不再重演我們的悲劇。」、「不是動亂，必須平反，即使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尊嚴與自立，我們只有一死，抗爭了！」等。聲援的隊伍有北大進修老師、北大作家班、清華二百五十一名博士，和二萬多名自動請纓的同學，他們一直會留在絕食同學身邊，保護他們的安全和保證絕食鬥爭的勝利。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亦發表聲明，對同學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給予充份理解和同情，為保護同學安全，呼籲聲援學生晚上在紀念碑前集合，加強糾察，在絕食同學周圍靜坐，又呼籲政府對絕食同學的要求盡快答覆。

另一方面，北京學生對話代表團亦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的答覆，表示五月十四日可展開對話，但人數不多於二十人，採座談形式，並須於五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前提交學生代表名單，由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出席對話及允許部份報導。對話代表團對此答覆不滿，認為確定名單方式不對，因為對話代表團由二十九所高校組成，至少應有三十五名學生代表，又認為必須允許新聞界，包括電視直播及中外記者採訪，作公開報導。並強調，政府給對話代表團的答覆不會影響自願絕食活動，而北高聯、對話代表團及自願絕食團三個組織是相對獨立，互不影響地進行各自活動，同時又可相互聯繫的。

下午四時許，北京市高校千多名絕食學生已抵達天安門，由



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等人帶頭，走進天安門廣場正中央後，絕食同學紛紛坐下，萬多名聲援的學生則手拉手圍圈保護絕食同學及維持秩序。集會陣型和秩序整頓過後，由王丹發表絕食宣言及帶領同學齊喊口號，北高聯代表亦發表聲明，最後由吾爾開希帶領同學宣誓，誓詞如下：「我宣誓，為了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國家的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的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絕食由五時二十分正式開始，並宣布學生在絕食期間只能喝水，不能抽煙，不可吃其他食物，很多同學對不抽煙很有異議。

下午六時，王丹、馬少方代表絕食同學在革命紀念堂前召開記者會，但是圍觀的群眾比記者還多，很多記者都無法擠進去。王丹表示，同學的絕食並沒有限期，一切都取決於政府的回應。他希望政府人道地看待學生的要求，又表示學生運動屬國內的事情，他們無意向蘇聯招手，或利用戈巴卓夫訪華期間要求國外力量干預中國內政，但絕食團會否留在天安門廣場直到戈氏訪華之日，他則表示主動權在政府。

至於絕食同學具體要求達到甚麼目的？馬少方表示，希望政府能通過新聞機構向學生道歉，平反及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推翻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

在同學絕食期間，另外又有同學發起二十萬人的大聯簽運動，呼籲同學及老師在一封《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上簽名，聯簽仍在各院校進行中。內容大意是，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反對黨內的各種腐敗現象（如官倒、政治上的裙帶關係、政治特權及貪污等），運動依憲法賦予了人民的自由權利，以遊行示威和申請願方式，自始至終保持高度理性和嚴明紀律。抗議《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把運動定性為的動亂，認為這仍是往左的階級鬥爭擴大化觀念的產物，加劇學生與政府隔閡與衝突。又不滿政府就對話一拖再拖，迫使同學們絕食抗議，要求中共中央和政府公正和準確地

重新評價這場學生運動，真誠平等地與學生展開對話，以實際行動糾正自己的錯誤。

另一方面，北京師範大學籌委會昨向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發邀請信，希望戈巴卓夫在訪華期間，能前往北師大與學生一起，就蘇聯改革現狀及民主化進程發表演講。

5·14

絕食第二天

統戰部邀請學生對話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四日

北京市自願絕食的千多名學生，在烈日當空下繼續逗留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第二天絕食。有七名學生代表早上獲統戰部長閻明復邀請談話，但未達成任何結果。下午再有十多名學生代表前往統戰部，繼續傾談展開對話的條件。

另一方面，北京市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在早晨收到中共中央電話通知，對話提前在下午舉行。對話代表團負責人項小吉和沈彤，下午二時前往統戰部商量具體對話條件及情況，四時許其餘二十多名代表亦趕到統戰部，在四時四十五分正式展開對話。

據了解，政府是因為戈巴卓夫明日訪華，為了安撫學生情緒，作出了提前對話的讓步。在學生的對話代表人數方面由原先限定二十人，放寬為三十人，但是電視台直播及容許中外記者訪問的條件，則因技術性的困難，只能作電視台轉播，亦無法安排全體中外記者進內採訪。



雖然絕食團亦有代表前往統戰部，但是留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學生則持觀望態度，他們會在收聽對話廣播後才決定何時結束絕食，並會堅持下去直到同學滿意政府的答覆。他們重申訴求：平反學生運動，不扣動亂帽子，推翻《人民日報》社論。他們說，若對話得不到實質性的答覆，絕不罷休，並且會一直留在天安門廣場上。對政府提前對話是否代表一種讓步，絕食同學表示這只是形式上的讓步，實質性的結果還沒達成。

五月十四日凌晨二時許，李鐵映、陳希同、李錫銘等前往天安門廣場慰問同學，希望他們停止絕食，盡快復課。但政府官員跟學生只談了幾句話，便在噓聲四起下退去。

絕食同學在早上曾就絕食行動決定一些相應措施，例如應否以大局為重，將絕食大本營移師到其他地方，以避免影響戈氏訪華活動？但因為絕食是同學自願參與，各人都有自己的意願，而且同學情緒已無法控制，所以大多數同學仍然堅持不肯離開天安門廣場。

另一方面，各院校不斷派出聲援隊伍前往天安門看顧絕食同學。據說，絕食首晚再有四至五萬學生聲援隊伍進駐天安門。另外，天津高校千多名學生亦已騎自行車趕抵北京聲援。此外，嚴家祺、包遵信、蘇紹智等知識份子亦發起遊行活動，將在翌日下午二時正在復興門出發，到天安門聲援絕食同學。

第一次對話破裂的原因

據學生透露，北京市對話代表團第一次對話破裂的原因是，政府在對話會上安排了一百個席位給學生，但其中只有二十席是對話團成員，八十席是官方選派的學生代表及幹部，在對話時經常提出不在意的問題。中止對話，是由於對話代表團跟政府本來已談妥條件，學生代表只能夠是對話代表團的成員，而且必須作電視現場直播，但結果政府無實踐諾言，學生有被欺騙的感覺，故決定休會。

對話代表團昨日凌晨曾到中南海門前遞交請願信，但由於沒有高級官員肯出來接信，所以苦候了兩個多小時後，失望而回。

5·15

絕食第三天

知識份子到廣場支持 學生稍為轉移場地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

經過連續三日兩夜的寒暑煎熬，北京市千多名高校自願絕食學生仍得不到政府合理的答覆，他們堅持繼續絕食下去，誓不罷休。但截至五月十五日清晨為止，已有三十多名學生不支昏倒，送往醫院救治。

清晨五時許，學生經過徹夜不眠商議行動方向後，終於決定為顧全大局及國家體面，絕食同學從原本霸佔的天安門廣場正中央位置稍作挪移，轉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左側作為絕食靜坐場區，以示對戈巴喬夫的歡迎及愛國心的一種表現。

在通宵集會上，學生得到十二名知識份子的支持，同意所提出的兩點要求：在《光明日報》全文刊登知識份子肯定學運的訪問稿，以及趙紫陽、李鵬應站在學生中間說幾句話。

是夜趙紫陽、李鵬二位領導人沒有在學生中間出現過，政府亦沒有理睬學生的絕食抗爭行動。後來對話代表團來到廣場報告對話破裂及休會的消息，表示李鐵映曾強調學生應照顧國家體面，撤離廣場，騰出天安門廣場作歡迎戈巴喬夫的禮節儀式。



不少學生的即時反應是同意轉移，繼續絕食，以退為進；但有部份同學表示，現時學生組織鬆散，很難作出轉移，而且沒有適合地方；又有學生私下認為：「我們照顧國家的體面，國家有照顧我們嗎？」

學生經過一小時多的商討議論後，大會曾決議暫時原地不動，但最後吾爾開希以個人名義鼓動同學應顧全大局，成全這次愛國運動的含義，先挪一挪，離開天安門正中央位置。語畢，學生糾察隊便開路及收拾地上棉被，讓絕食者動身轉移地點到廣場另一側。轉移行動開始時，多名絕食同學不支倒地，他們帶着飢餓、疲憊不堪的身體，悲壯地聽從大會決定，場面感人。

由於絕食同學進駐天安門廣場已有四十多小時，轉移行動完畢，幾萬名聲援隊伍也作進一步配合。廣場地面堆滿學生殘留下來的破瓶及紙屑，部份同學有怨言。有到場支持的群眾認為學生的轉移不理智，應該佔據廣場堅持到底；但絕大多數同學都同意絕食抗爭的意義，只是迫不得已下騰出廣場中央給政府留點餘地。

北京日夜溫差變化很大，下午酷熱，晚間寒冷。絕食同學身體很難適應，在場照顧同學的醫學院學生表示，他們很容易會中暑、休克和感冒、受寒。他估計，同學的絕食一般只能支持四至五天，下午的情況會更為嚴峻。同時，由於學生大多身體虛弱及營養不良，估計絕食過後還要一段長時間才能恢復體力。

知識份子及工人自發遊行

北京天安門廣場整天都擠滿圍觀人群，連同學生、知識份子及工人遊行隊伍，市內約有為數超過五十萬的群眾上街聲援絕食學生。雖然絕食場區已經轉移到廣場的一側，但天安門廣場始終沒有成為歡迎戈巴卓夫訪華的地點。

同時，駐守天安門附近戒備的武警人數大為減少，很多群眾

及學生自發地圍圈演講，市民及工人更組織請願聲援團繞着天安門巡遊，沿途喊：「進來！」、「中國人，進來！」、「市民，進來！」，以增隊伍聲勢，遊行人數逾千，這是學潮發展至今，首次由市民、工人自發組織起來的遊行隊伍，他們手拉着手，秩序非常良好。此外，各高校聲援的學生亦不曾中斷地在廣場內遊行及發起募捐，群眾反應熱烈，有市民說：「這麼大的場面，政府連一個官員也不敢站出來，太不像話了！」

很多抵達天安門廣場的遊行聲援隊伍，高舉新做的旗幟和橫額，寫上：「我們與你們同在」、「媽媽我不想死」、「哭我祖國」、「為政府傷心」、「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是中國唯一出路」、「老百姓站起來」、「官僚絕情，學生絕食」、「民主運動，從來正確」、「長嘆掩涕教育多艱」等標語。

堅持絕食的同學已有百多人不支倒下，救護車響號不停鳴叫，學生重申要政府答應電視台直播對話，肯定這是愛國民主運動，才肯結束絕食。

另一方面，各高校老師、教授、首都新聞記者、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作家、出版社編輯等知識界，中午在復興門集合，連成一隊長達三公里的遊行隊伍，聲援絕食學生及肯定這是愛國民主運動。據估計，此遊行隊伍人數達十多萬人，每個參與遊行都掛上白腰帶，寫上單位及自己名字，又加上「良心發現」、「新聞自由」等各類字眼，他們沿途唱黃河大合唱，以表示中華民族的力量和氣勢。

教師、記者及知識份子的遊行隊伍舉起很多寫上感人字句的橫額，其中有「北大教師與同學共存亡」、「孩子們，沒錯」、「學生是我們的驕傲」、「蘇有戈氏，中國有誰」等。老師表示，同學絕食辛苦了，但假如不達目的便停止絕食，則一直以來的努力就會白費，他們不希望學運在無結果下告終。此批遊行隊伍在四時左右抵達天安門廣場後，繼續留下來與學生一起靜坐。



雖然學運發展到有工人及知識份子的聲援，但是政府至今仍未有表示任何態度。是日，戈巴卓夫訪華的行程明顯已有更改，歡迎儀式改在機場舉行。下午四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宴會也被迫延遲。至於一般情況下，歡迎國際性人物到訪時，大街上都會掛起彩旗及兩國國旗。現時在天安門廣場對開一帶則未見掛上隆重彩旗，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仍然掛滿各高校的旗號和「絕食」大旗。

激進學生倡議自焚

北京市高校絕食團中有十一位同學竟倡議在天安門廣場上引火自焚，以壯烈的死來刺激政府領導人麻木的心。不過，由於此行動太激進，遭到很多同學勸阻，不許這些同學採取行動。絕食同學整晚繼續堅持留在天安門廣場一側，總共已有數百人支持不住，有一百三十多人在場救護車緊急送院治療，其餘仍能支持下去的同學表示，他們已經沒有餓的感覺，胃有點痛，不過全身都已沒有氣力。其中一位絕食同學表示，目前時勢已到達關鍵時刻，學運的發展已捲入很多其他不可估計的複雜問題。由於知識份子、老師都來慰問同學，工人、市民、群眾都支持和同情他們，往後的發展已不是他們可以控制的了。又說，當初他們還很樂觀地估計，在學生絕食二十小時後，政府應該會有明確答覆，可惜現在已錯失機會，難以預料將會發生甚麼事情。

北京市街道到處人頭湧湧，前往天安門廣場湊熱鬧。入夜前，軍警曾企圖作戒嚴措施堵截人潮流動，但無法成功。晚上九時，十萬多群眾包圍人民大會堂，向裏面出席宴請戈巴卓夫官式會晤的高層領導大喊「李鵬」、「對話」等口號，軍警雖已增援兵力維持附近秩序，加強階梯對開一帶的保安，但是人群仍然輕易霸佔階梯各處位置，軍警根本沒有能力驅趕。據估計，直至晚間仍有百萬群眾毫無目的地前來天安門廣場附近遊蕩，人聲鼎沸，場面頗為混亂，但沒有造成緊張氣氛。

5·16

絕食第四天

北京市內遊行人數不絕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北京市三十四所高校，共三千多名學生，繼續其第四日的絕食行動，數百名學生已相繼昏倒，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響起救護車警鳴聲，緊急載送絕食學生到醫院治療，急救車鳴響的頻率十分驚人。但部份送院學生休養一段時間後，又堅持返回廣場繼續堅持絕食，同時不斷有新加入的同學響應絕食行動。

由於政府繼續不理不睬，有十七名北京師範學院同學在早上十一時起在廣場採絕水行動，打算堅持到死以顯示愛國救民的決心。北京各高校已全面罷課，同學發動聲援隊伍巡迴穿插市內大街小巷，展開募捐工作；又有同學到火車站、機場等地方，宣傳他們這場為正義而戰的學生運動。

教授、老師、記者、知識份子也再次由建國門路，從早上出發到天安門聲援及慰問同學，再從原路折返，老師們說：「學生在絕食，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

遊行到天安門的人群絡繹不絕，北京市民都很關心絕食學生，主動為他們買布條、帆布等擋住烈日陽光，免遭曝曬；到晚間氣溫下降，又有很多好心市民捐贈大衣、棉被，禦寒送暖。北京各間醫院及醫學院亦派出很多年青醫生來廣場看顧同學，提供醫藥治療。絕食同學則以堅貞不屈的決心繼續頑抗及鬥爭下去。



現時，天安門廣場有如傷兵營地，各所院校豎起旗幟緊守自己的臨時據點，穿着白衣的護理人員不斷前來照顧絕食學生，送上吊點滴的鹽水或葡萄糖水，並勸同學可以進食奶類飲品及藥片等。晚間，他們亦會經常巡察和不時喚醒一些暈極而睡着了同學，擔心他們失去知覺，不省人事，有生命危險。絕食同學雖然疲憊無力地躺在地上，但是他們的精神卻喚醒了人民封閉多時的心靈，廣大的群眾都受到極大的感染。連日來，無數學生、群眾都日夜聚集天安門廣場，學生的糾察隊除維持秩序，堵成人牆為救護車開路，及防止群眾亂闖進絕食同學中外；還有負責清掃廣場垃圾，注意公眾衛生；亦有為絕食同學送上面巾水盆，作個人清潔。

天安門廣場外，革命紀念堂之前現已成為救護車的停車區，隨時出動搶救性命危在旦夕的絕食學生。同時，在附近也特別關設了一個範圍很大的臨時廁所，供廣場學生和聲援群眾使用。

知識分子及教師的簽名運動

北京大學教師及教授，分別展開多個簽名運動及倡議書，呼籲全國同胞支援絕食學生，要求政府領導人退休及辭職。

北大教師是日召開教職員全體大會，決定成立北京教師臨時學生後援團，因為按照目前形勢，學生十分需要老師的支援。鑒於中央現仍未對學生有任何公開表態，學生將會繼續絕食下去，因此教師後援團的成立，會盡量通過各種可能渠道，協助反映學生的訴求，希望學運能夠完滿結束，設法解救當前學運危機。

教師後援團發表聲明，強調老師自發成立該組織的原因，是要支援及積極參與這次愛國民主運動。聲明內容主要有八點：（一）立即採取措施，保護學生身體健康及生命安全；（二）支援學生與政府展開對話，提供諮詢顧問，與學生站在一起；（三）監督政府，與學生、各界人士一起向政府提供意見；（四）為老教授提供

交通，好能到天安門慰問學生；（五）與其他高校聯繫，互傳消息；（六）督促政府和黨採取果斷措施，清除腐敗和嚴懲官倒；（七）掃蕩庸人政治，力爭民主政治體制；（八）要求何東昌立即辭職。

此外，北大教師又展開「告全國同胞書」的簽名運動，由張炳九、袁紅冰及朱善利等人發起，呼籲首都知識界及廣大市民舉行遊行，表示聲援，並敦促政府立即與學生進行公開坦誠的對話，向全國各界公開報導對話經過，為學生運動正名。他們又呼籲一切有良心的中國人，立即行動起來，救救學生。由於教師情緒亦頗為激動，反而有一位絕食同學較為理智地表示，希望老師們三思，要考慮到這場運動涉及到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及學運的長遠發展，恐怕發動這次全市人民大遊行，會出現不欲見到的打、砸、搶動亂場面，將對學運發展不利，所以他希望老師們能實質地支援學生。

不過，另外有兩位出席大會的絕食同學，則滿腔憤慨地表示政府對他們的要求無動於衷，若再不加理會，學生就要自焚的了！其中一位絕食學生更大喊：「我們根本沒錯，除了歷史和我們自己外，無人能為我們正名。如果我們叫政府為我們正名，這根本是錯誤的方向。」又說：「鄧小平，你錯了！如果你所代表的是共產黨領導，那麼，共產黨，你也錯了！」

另一方面，由馮友蘭、季羨林、朱德熙等人發起的呼籲書，表示絕食行動令形勢發展十分嚴峻，為免事態惡化，懇請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學運為愛國民主運動，決不以任何形式對學生「秋後算帳」，承認學生自治會為合法組織，及允諾不對學生採取暴力。又希望學生以大局為重，停止絕食，撤離天安門廣場，通過和政府對話來解決問題。

發起北京全市人民大遊行



北京市將發起全市人民大遊行，工人、各階層人士、老師都會加入隊伍當中，以表示全北京人民對政府這種冷漠、無能態度的不滿。遊行人數的多寡及場面如何控制，會否造成打砸搶等動亂，誰也無法保證。

絕食學生代表王丹、楊濤、柴玲及馬少方早上在記者會表示，他們並未決定下一步採取甚麼行動，絕食將會堅持下去，但政府至今仍未有答覆。他們強調，今次的絕食行動是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進行，他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同學倒下為止。他們反對過激的行動，如衝擊人民大會堂及自焚等。又表示，目前學生已面臨最嚴峻的考驗，三百多名學生昏倒，廣場同學的發病率極高，而且除了學生堅持絕食外，也有教師加入絕食的行列。對戈巴卓夫訪華，他們的絕食行動是否影響了行程安排和接待活動？學生代表說，他們無影響戈氏訪華活動，即使有，責任也應由政府來負上。他們又表示，希望蘇聯能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勸告中共領導層給予學生答覆，因為學生都非常欽佩戈氏，認為他是一位政治改革家。

《人民日報》的報導指稱，政府派救護車協助看護學生，學生代表對此加以否認。他們說，救護車是由北京急救中心院長自作主張派來的，其他各醫院也是自願和自發來廣場救助學生，他們的熱心行動，並非來自高層的指派。又表示，會向世界人道組織，及全國同胞發出呼籲，希望能獲得更大的支持。

5·17

絕食第五天

續有全民聲援的大遊行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

北京市高校絕食學生已展開第五天的絕食抗議，對於趙紫陽五月十六日晚間發表的書面講話，絕食同學表示，此番講話並無實質答覆及保證，沒有回應學生的具體要求，所以他們雖然在廣播及報紙中得悉趙紫陽的講話內容，但仍無動於衷，會繼續堅持絕食：「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到夜間為止，已有超過一千名學生要由救護車送院治療。廣場上的絕食同學，有些是新加入，亦有些是留院護理後再返回廣場鬥爭下去的。天安門廣場上，這幾天日日夜夜都擠得人頭湧湧和水洩不通，學生組織的糾察隊很成功地維持良好秩序，給絕食同學發出入證明，以防閒雜人等騷擾他們休息。

目前，仍有不少學生加入絕水抗爭行列，但絕大多數絕食同學都表示，不宜採取過激行動，又強調只要政府肯派代表與對話代表團正式以公開的現場直播展開對話，以及在報紙、電視台等傳媒宣布今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他們願意撤離及停止絕食。

一些絕食同學表示，對現時運動已擴大到社會各階層人士都來聲援，大批群眾自發加入示威抗議的遊行隊伍中，他們感到欣慰，亦很有信心全市人民大遊行絕不會造成動亂，因為民心民意都支持他們和平請願，民眾採取的行動自然亦會十分克制。他們又表示，即使發生動亂，責任亦非學生之錯，應該歸咎於政府一直無誠意解決問題。

百萬全市人民大遊行

北京高校學生自發組織的糾察隊，相當有效地協助維持北京市人民大遊行的秩序，為保衛和鞏固這次偉大的學生運動已取得成果，他們希望遊行隊伍堅守下列通告事項：（一）嚴禁呼喊違反憲法和過激口號；（二）嚴禁一切暴力和非法行為；（三）嚴禁衝擊



一切機關、商店及公共設施；（四）嚴禁進入王府井、西單、前門等繁華商業街道；（五）所有遊行隊伍必須組織糾察隊，各高校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千方百計維持好遊行秩序；（六）各界人士要警惕和嚴防別有用心的人搗亂和破壞；（七）遊行隊伍主要沿二環路行進，附近單位應就近加入。

是次全市人民大遊行中，人數達數百萬人，除學生、老師和新聞記者外，還有人民解放軍後勤總部、中國六個民主黨派總部（民革、民盟、民進、工商聯、台盟、農工黨）、北京市中學生、工人隊伍，包括燕山石油化工廠、起重機廠、鐵路工人、機械工業、電機工業、能源工業、紡織工人、電子工人、核儀器製造工人、羽絨廠工人、傢具廠工人等萬餘人。

此外，中央部級機關亦加入大遊行行列，其中有外交部、鐵道部、航空航天部、建設部、外貿部等。知識界行列如中國文聯、中國作協、首都出版界、中國社會科學院各研究所、《北京日報》、《求是》雜誌、人民出版社及中央電視台等。

同時，各省高等院校、港澳留學生、香港學聯等亦有代表參與遊行，其餘還有百貨商店，各個體商販員工，大學院校職工等亦有聲援隊伍。

遊行隊伍巡經天安門廣場四面的大街，長安街上兩旁都有對流雙向的聲援團，由學生組成的糾察隊在兩旁手拉手維持秩序，又打開一條通路為救護絕食同學的急救車駛過。在新華門前，同學手拉手保護政府機關，呼籲遊行隊伍切勿停留及避免有衝擊舉動。市民、學生、聲援團及群眾十分團結，沿途人群都很有禮貌地讓路，並無發生不愉快事件。

各式各樣的旗幟及標語在廣場四周高舉揚起，工人隊伍的橫額：「工人階級實在壓不住的了」、「工人要說話，政府不能欺壓學生」、「工人是學生堅強後盾」、「學生的心 = 工人的心」等。

民主黨派的遊行隊伍標舉的橫額有：「我們要民主自由，政府不能對學生見死不救」；《求是》雜誌的標語是：「理智 麻木，秩序 禁錮」；中學生隊伍則舉起「對抗學生 - 昏庸，怕見群眾 - 無能」、「中學生，大學生，心心相映」、「哥哥姐姐我來了」的橫額。此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大幅標語，寫上：「黑貓白貓，偷魚吃魚是甚麼貓？」、「中蘇智力競賽：85：58」、「專制體制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關係，只能靠獸性來維持」、「鄧小平要認錯，收回你的四二五講話」、「救學生，除官癌」等。

其餘的遊行大旗所持標語，還有：「自由引導人民前進」、「貪官污吏快下台，政府不要糊塗快表態」、「強烈抗議政府喪失人道主義」、「獨裁者不能坐江山」、「低能治國，國家必亡」、「學生有理，救國無罪」等。還有《人民日報》的遊行隊伍更高舉寫上「不承認四二六社論的話」的橫額，反映群眾與學生都是同一條心，為民主自由改革而表達心願。遊行隊伍到晚上，仍不息地穿梭街道，所經之處都有令交通暫時癱瘓及堵塞。

5·18

絕食第六天

學生體力不支相繼昏倒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

北京市高校絕食學生繼續展開第六天絕食抗議，由於學生已體力過度透支及虛脫，目前已有一批批同學昏倒及趕送醫院治療。昏



倒學生的人次已接近三千，有不少同學被送院後醒來便拒絕接受治療，要求立刻返回廣場絕食團中。

北京市日間陰天有雨，紅十字會準備了數十部巴士讓絕食學生上車避雨。下午三時許下了一場大雨，令在現場的聲援學生及少部份留在廣場上的絕食學生十分狼狽。不過，同學也早作好準備，添購大量透明膠布條、雨具及搭好避雨棚，能暫作臨時擋風避雨的棲身之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等人，在凌晨五時曾到醫院探望絕食中昏倒的部份學生。中午，總理李鵬、教委主任李鐵映及統戰部長閻明復，與絕食同學代表吾爾開希、王丹、程真等在人民大會堂見面。

李鵬表示，他希望所有絕食同學都能入院接受治療，給國家醫護人員盡快搶救性命，保證同學們身體健康。他認為，廣場上的同學應從關心自己出發。雖然中共官員已有初步的表態，但廣場上的同學對這些觸不着實質性問題的慰問仍表不滿，他們所提出的兩點具體要求至今亦未獲明確的答覆。

天安門廣場是日秩序大有改善，同學基本上已能把總部、各校聯絡處、物資供應處、救護中心、廣播台等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不容許群眾自由出入。同時，多天來天安門廣場人來人往，同學席地而坐的臨時棲息地方都滿布垃圾，現時已有人負責把垃圾清掃及運走。另一方面，市民十分支持廣場上絕食的同學和聲援的學生糾察，北京各大小飯店紛紛送上麵包、饅頭、飲品及水果等，充份體現出他們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各類糧食、日用品及藥物都得到充份的補充，所以學生透過廣播台宣佈暫時可以毋須給予這方面的捐贈。

此外，廣播台又宣讀了各界聲援他們的公開信，以及中國農工會盧嘉錫的聲明，還有詩人葉文福退黨的消息等。

目前，絕食學生的生命危在旦夕，有些同學已被送院達五、

六次之多。而人民大會堂北門的北京戲劇學院十多名同學仍繼續絕水行動。另外，新華門前又有另一批由前日開始便採絕水行動的同學，由於他們的位置較為偏離廣場，所得到的看護顯然不足。至於老師加入絕食團方面，昨有十多名政法大學老師已到新華門前與絕水學生一起，參加絕食行動。

風雨中北京各界的環城聲援大遊行

北京市繼續第二天的全市人民大遊行，民心所趨，萬眾一心。在陰霾暴雨的風雲變幻中，工農兵及市民在聲援絕食同學的潮流大趨勢下，將會進一步向政府施壓，爭取更大的民主自由。

遊行隊伍中，不少口號、標語和橫額都採用了更不客氣的措詞，由針對鄧小平等一批老人政治應該辭職和退休，轉為針對整個政府應該撤換及下台，反映人民群眾已對共產黨統治不存任何幻想。

是次遊行隊伍非常盛大，人數超過三百萬人，把街道擠得水洩不通。除了有昨日曾經上街遊行的隊伍外，還開始有各公共事業機構的加入，例如：郵電職工、石油職工、地震局、供電局、公交工人等，還有各大小中型工廠的工人也穿上工作服，一批批地坐貨車趕來聲援。至於官方機構則加進了中央辦公廳、最高人民法院、檢察官、法官、解放軍文職軍人等部份政府部門的職工。不少工廠工人及機構職工因為才剛趕到，所以在載他們來的車上掛起了「我們來晚了！」的標語旗號。

此外，北京各校的中學生及老師的聲援人數亦大有增加，有些年長點的中學生更協助高校大學生維持大街上遊行隊伍的秩序，避免出現混亂。同時，小學生也加進遊行隊伍，唱兒歌時也蠻雄壯的。新加入的遊行隊伍中，還有不少是從外地兼程趕到的外省高校學生，主要是來自天津、武漢等鄰近省份，這批學生只須憑學生證，鐵路局便會免費提供火車票給他們赴京。由於各行各業的員



工，都跑上街遊行及湊熱鬧，王府井街的商店及食肆已全部關門及暫停營業，聲援學生運動。交通方面，北京遠近各處的工廠工人都乘車趕來天安門，所以中心區的交通全面停頓，陸續讓無數聲援車隊緩慢地通行駛過。還有，在遊行隊伍經過的長安街及二環路等一帶的樓宇，都掛上長長的標語布條支持和聲援學生。

預料工人聲援會引發罷工風潮

消息透露，擁有二十二萬工人的首都鋼鐵公司，擬於即日發起全面大罷工，以抗議中共政府遲遲不與學生展開直接對話。首鋼為全國重點企業，該公司工人宣布罷工，預料會引發北京，以致鄰近地區一場罷工風潮。

首都鋼鐵公司工人，是日向政府發出警告，限令政府於下午二時前與學生對話，否則舉行大罷工。中共並未與學生進行真正對話，僅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領導人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部份絕食學生，但是次會面未能得到顯著成果，三千多名高校學生繼續在天安門進行絕食。首鋼為北京最大企業，擁有員工最多。數以百計的首鋼工人早已帶備材料，協助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營紮棚。若首鋼帶頭罷工，其它工廠及企業必爭相倣效，繼學潮後另一場影響性極大的工潮的出現，將無可避免。

另，中華全國總工會昨日捐出十萬元，透過紅十字會援助在天安門廣場救急的經費，支持絕食中的學生。該會發言人表示，自從蘇領袖訪華以來，該會與政府的對話便停止下來，雙方並沒有就學生絕食問題接觸。

知識份子發表五一七宣言

以著名知識份子嚴家祺為首發起的一個要求鄧小平辭職的知識界簽名運動，兩天以來已收集了數以百計高級知識份子的簽名。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為首的一群知識份子，草擬了一份「五一七宣言」，此間廣為流傳，收集知識份子的簽名。宣言矛頭直指中共領導鄧小平。內容說：「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趙紫陽總書記（五月十六日）公開宣布，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

宣言又肯定是次學潮是愛國學生運動，不理會學生絕食行動的政府「是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是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最後呼籲「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發動是次簽名運動的嚴家祺透露，現在已收集了數以百計知識份子的簽名，其中包括著名學者劉再復、于浩成、蘇紹智等。

政協委員發表緊急呼籲聲明

連日來在北京出現的聲援遊行活動、各界的呼籲及發表懇切的公開信等源源不絕。其中政協常委程思遠及賈亦斌亦提出了緊急呼籲，肯定這次學運及平等對話是合理要求，所以呼籲黨和政府應滿足學生爭取此項民主權利的訴求，儘快會見學生代表，避免局勢惡化。又希望黨和政府，能與學生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一起為清除腐敗現象而鬥爭。

此外，四個民主黨派主席，包括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及九三學社亦有致函趙紫陽，建議儘快與學生對話，及勸喻同學愛護身體，停止絕食，返回學校。

新聞界要求解釋請戰真相

北京市新聞單位部份新聞工作者，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因為學潮的激化是由於四月二十四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學潮動態時，要求在第一線反擊，誘



發四二五鄧小平講話及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

因此，部份新聞工作者強烈要求北京市委通過新聞媒介，公布要求中央授權的整個過程，及向各區院局總公司部署反擊的具體步驟。他們又要求公布市委、市政府在學潮中制定及實施不准向學生供水、供食物、募捐、接待、圍觀等措施的全過程。同時，又要求市委、市政府對其在學潮中的錯誤明確表態，儘快與市屬新聞單位代表直接對話，討論真正實現總編輯責任制及新聞管制等迫切問題。

此外，北京市十四家新聞單位數千名新聞工作者亦就學潮問題發表了《致黨委、國務院的公開信》，希望政府以大局為重，順應民心，防止事態擴大惡化。他們懇請趙紫陽、李鵬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答應學生的合理要求，正式宣布這是一次愛國、民主、和平的請願，而不是動亂，並請中央與絕食學生認可的代表作真誠及直播的對話。

5·19

絕食第七天

形勢急轉直下 學生宣布停止絕食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北京市是日仍有遊行活動，不過規模不大，而且亦不及前兩日的氣勢，不少官方或民間機關的職工都沒有上街，只有部份工人、市民上街遊行，明顯地群眾的氣氛及興致已逐漸退減，而學生方面亦因感冒受寒及疲累不堪，無法再舉行大規模遊行。

天安門附近的交通，主要由學生組織的糾察隊來維持秩序，市民都很尊重學生的指揮，避免人擠人及車輛堵塞的問題惡化。

北京市近日出現連續數天的全市人民大遊行以後，正如李鵬所說，北京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中，唯全靠學生努力維持秩序，勸喻市民群眾切勿衝擊政府機關，以免讓政府有把柄表示學生製造混亂破壞，所以大家都緊守崗位，在人民大會堂、新華社等地方，學生糾察隊都手拉手圍守保護，以防別有用心的人，給愛國民主運動留下污點。

北京市學生絕食行動堅持到第七天，到晚間形勢突然急轉直下。七時許，北京市高校自治聯會正式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形式繼續抗議。有消息稱，中共中央官方高層人士已部署好有效壓制的行動，而李鵬將要宣布實施軍管，並已從蘭州、武漢等地調動五師集團軍進駐北京。由於李鵬將會採取鎮壓措施，所以亦顯示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人士，包括王震、薄一波、彭真、李先念、楊尚昆及宋任窮等會繼續得勢。

消息又透露，鄧小平已於五月十七日秘密南下，到湖北避過這一次可能會令他地位不保的風波，留下殘局由趙紫陽收拾。對學生運動帶來的問題，消息稱：鄧小平不願意處理，並表示戈巴卓夫訪華後，他的任務已完，可以離開。

是次北京的學潮雖然得到民眾的支持，並且北京市大遊行時，不少標語、口號的矛頭都是指向鄧小平，想逼他下台，但是集政權於一身的鄧小平，自然能想出不倒的妙計，把黑鑊留給趙紫陽。

因此，消息又指出，趙紫陽將在這場運動後被迫下台，宣布辭職。據觀察所得，趙紫陽在凌晨親自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時候，神情凝重，並表示事態複雜，希望學生體諒，此亦反映他心裏已有難言之隱。

但是，反觀李鵬對學生的講話，則既生硬又盛勢凌人，令絕食



學生感到極為氣憤。然而，他早就部署好下一步行動，即日下令國務院，通告所有國家機關職工一律不准上街遊行，若有違反則會受到紀律處分，因為此令一出，北京市上街遊行隊伍的聲援群眾及政府單位職工都大受影響，不敢有所行動，令參加遊行的人數顯著的下降。

形勢分析

接近官方的知識界著名人士，認為形勢惡化的迹象確已存在，民運前途只有二個：一是政府接受絕食請願學生的要求，和平解決；一是政府採取強硬手段，遏止這一場波及全國的運動。看來形勢發展至此，後一種可能性很大。

此間觀察家已注意到，鄧小平突然離開北京的消息已傳遍北京，而官方迄未否認，並有消息說，鄧小平已有三點指示：一．學生絕食引起全國性的遊行示威，已形成社會動亂，無政府狀態。二．《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沒有錯誤。三．如果學生經勸導後再不撤離天安門廣場，政府就要宣布軍管維護首都安全。

同時，李鵬已於今日簽發一項國務院緊急通告，命令中央各級機關及直屬附屬單位，嚴禁職工上街遊行支援學生，否則以違犯紀律論處。

在此緊張形勢下，知識界著名人士如發起五一六聲明的劉再復，以及發起五一七聲明的嚴家祺等，今日均到天安門廣場與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斡旋，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改為靜坐請願。到今晚九點鐘，學生總指揮部正式宣佈停止絕食。

學生停止絕食的聲明

繼中共中央領導層多次與絕食學生談話及慰問後，北京市高校

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表現得相當疑惑，並對李鵬講話感到氣憤，對趙紫陽的慰問頗有觸動，但由於停止絕食的兩點條件還未達到，所以絕食團、北高聯及對話代表團整日都在商討下一步行動，結果在晚上九時，廣場學生總指揮宣布暫時停止絕食活動。

停止絕食的聲明表示：「絕食鬥爭的停止，是為了保護同學的生命。我們不是退縮，因為各高校學生這次在天安門廣場，會繼續罷課、靜坐鬥爭。感謝各界人民對我們的支持，我們再次呼籲全市人民，要繼續採取理智的、冷靜的、和平的方式，在民主及法治的軌道上，進行鬥爭，以保證愛國民主運動的心願，及保證發展生產和各行各業工作的正常進行。各高校糾察隊不得解散，一起在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繼續罷課靜坐鬥爭，保證廣場正常秩序。同學們，民主道路是艱辛複雜的，但是我們的信仰絕不會放棄，我們的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工人組織發表宣言發動罷工

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向工人發表宣言及聲援學生，並提出總罷工的警告，向政府施壓。工人自治聯合會表示，若政府在二十四小時內不答覆學生的要求，則北京市工人將會立即發動總罷工，並會通知全國工人響應。

不過，北京市總工會亦向工人呼籲，表示趙紫陽及李鵬已看望及與學生代表會面，所以希望學生停止絕食，以免出現令人擔憂的發展，令北京人民的日常生產、生活都受到嚴重影響。總工會又表示，現在又有人散發號召聯合罷工的傳單，甚至造謠說是該會組織的，因此總工會鄭重聲明，呼籲全市職工保持冷靜及不要輕信謠言，要通過正常渠道提出意見和要求，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廣場實錄

1989·4·26 - 6·4

5·20-6·4

戒嚴令下



5·20

戒嚴第一天

大軍兵臨城下 市民紛紛趕往市郊攔截軍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我在深夜外出，觀看北京市面情況及趕到城外現場視察市民堵截軍車，返回酒店後致電報館即時報導北京的消息：

李鵬的講話由凌晨十二時開始，在街頭官方喇叭上重覆地不斷向著天安門廣場播放。李鵬講話之後約數分鐘，有一大批公安武警把天安門的東面包圍住。

一名北京老百姓在十一時半趕到天安門大喊：復興門有武警軍人。復興門的公主墳來了十七輛軍車，每輛約載有三十至四十人，這些軍車全給市民重重的包圍住。

北京學生發了守則，不可採取暴力行為對抗政府，捱打也不可反抗。廣場學生後來決定全部留守在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都會繼續絕食下去，天安門外圍的救護人員、學生糾察和群眾將會繼續保護廣場內的絕食學生。學生們堅持留守廣場，絕不離開，除非出現軍隊強行把他們拉走。

全北京市的人民都已自發出來攔截軍車，他們包圍住軍車並勸說士兵們不要做歷史的罪人。其中有一名中校回說：「我是中國人，不會做對不起人民的事。」不過，由於軍隊對外面事情全不知情，而且由外省調動過來，所以對學生及市民一概不太了解。現場所見，士兵的表情很木訥。若聽命於司令，軍管就難免了。

市民合力包圍軍隊，表示支持學生，一定會堵住城外軍車，不容許

他們駛去天安門廣場把學生清離廣場。北京市民都跑上街頭聲援學生，不少車隊、電單車隊都駛到有軍隊的地方，攔截軍車進城。

大批軍隊已到北京城四面的城郊準備隨時命出發，據知東面的呼家樓、雙井，南面的木樨地，西面的公主墳到五顆松，北面的黃村，共進駐了一百六十輛軍車，每輛載有四十至五十名軍人。

北京市內的交通警察也叫軍隊不要打學生，不要採取鎮壓行動。群眾對軍車入城極為不滿，把其中一部軍車推進胡同去。市民向記者提出要求，呼籲全世界的人聲援這些危在旦夕的學生，救救這些愛國的孩子。

北京首都戒嚴令下的綜合報導

據消息透露，趙紫陽現已遭軟禁。現時軍用直升機剛在天安門附近廣發傳單，叫市民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宣布戒嚴已開始了，記者的採訪及攝影亦遭嚴禁。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表示，為保護、聲援及維護學生利益，北京市有九成工人已經罷工。對於早前北京總工會的呼籲，工自聯表示贊同其出發點是好的，但一旦政府採取鎮壓行動，則全體工人罷工是肯定的。北京學生呼籲人民、同胞、絕食同學、中共黨員及解放軍指戰員：（一）應盡量避免暴力對抗，絕對避免流血；（二）社會各界團結起來，捍衛憲法；（三）解放軍戰士是人民子弟，不能自相殘殺；（四）強烈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五）立即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

有關軍隊入城的動向，在北京東面的軍隊已進駐在雙井、建國路及呼家樓等地方，據說在呼家樓有三百輛坦克車。在雙井，軍車已減少了一半，剩下來的十部軍車，都被學生和人群包圍，學生正努力與士兵建立良好關係，北京人民送麵包給士兵吃，學生協助派發傳單及麵包，解釋形勢並勸士兵多吃。不少士兵都樂意接受學生



的盛情，亦被感動了，與學生握手、交談及道謝。北京市上空經常有軍用直升機飛過。在北京主要街道及通往天安門的道路，有大型巴士及聚眾的人群攔路，其中有一塊寫上「軍民一家」的攔路牌擋住。市民、軍隊及學生都沒有發生衝突，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

由於北京學生摸不清政府下一步將採取何種措施，所以估計晚上會有空投兵鎮壓，及施放催淚彈來驅散學生。因此，廣場上的學生都作好戒備，一方面組織了敢死隊，作首批應戰的勇士，並呼籲同學服從指揮部的命令，有任何危急突發事件時，要靜坐廣場上歡迎解放軍，並齊喊擁護共產黨的口號。

學生預料凌晨十二時會有軍隊出動，晚上已向廣場同學分發口罩，紗布等，教導同學如何預防軍隊施放催淚毒氣，又準備好幾大桶水用來淋熄彈藥火燒。他們又估計有三部載有便衣特務的軍車從香山出發，裝扮成學生模樣混進廣場，隨時會挑起事端來藉口廣場發生動亂，然後讓軍隊立刻候命防暴，再把學生驅散及維持秩序。學生表示擔心這次運動若失敗的話，軍管下的統治會令中國再倒退五十年，所以他們希望能成功，那麼中國便會有新希望和民主了。

晚間，北京市的工人和市民都自發地組織了長長的遊行隊伍，在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人數約有三、四十萬，並陸續有學生聲援團車隊、單車隊及卡車隊加進，他們都是想保護廣場上的學生。北京市四面八方都有軍車駛進駐紮，有些軍車已經後撤了，有些則已成功地被群眾堵截在城郊。

附 一位北京老記者卓然最先報導趙紫陽下台的消息

《趙紫陽下台記》

胡耀邦逝世後，趙紫陽率團訪問北朝鮮，在訪朝期間，四月二十五日，鄧小平就北京學生群眾悼念胡耀邦而舉行的遊行活動，在內部講話中定性為動亂，說是反自由化運動只搞了二十

天，不徹底（指趙紫陽把那次運動阻擋了），又說，反動亂流點血也不怕，外國干涉也不怕。並由胡啟立根據鄧小平旨意寫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在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指令幹部、黨員學習表態。

四月二十九日，趙紫陽訪朝歸來，李鵬到車站迎接，趙首先問李國內的局勢（即指學生為反對四二六社論，要求與中央領導人對話而遊行）怎樣了，李說，學生都要找你的兒子算帳。隨後趙在一次會議中說，我的兒子經商，別的領導人之子女從政，前幾年經商是要冒風險的。現在我要把我的兒子經營的企業財產全部充公，希望中央部長級以上的人都立即把他們子女經商所得的財產都一律充公。當場只有萬里答應照辦。

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趙紫陽多次提出要到廣場去看望學生，李鵬說，你若去就是分裂中央。趙只得到人大會堂樓頂或乘車繞廣場去看學生絕食集會情況。

五月十七日，鄧小平在他的家裏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趙在會上提出六條解決辦法的建議，主張由《人民日報》發一篇社論，說明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要求與學生代表公開對話。會議付諸表決，李鵬與姚依林堅決反對趙的建議，胡啟立與喬石雖同意趙的建議，但要保留發社論否定動亂之說，最後由鄧小平作結論，宣布即日起停止趙紫陽的總書記工作，但暫不對外宣布，以免再產生胡耀邦事件之影響。鄧小平並指定李鵬接替總書記工作，兼掌總理。

事情演變至此，完全說明盛傳已久的保守派倒趙之鬥爭，藉學運被激發之機而升級。以李鵬為首倒趙的一班人，背後的靠山便是陳雲、楊尚昆、王震、李先念、薄一波等元老，老鄧再一次倒向保守派，遂使趙紫陽孤立無援，終於成為胡耀邦第二。

趙紫陽下台後，保守派能否控制局勢，是否會演變成真正的大動亂，使十年改革開放毀於一旦，尚待觀測。



5·21

戒嚴第二天

北京市民學生成功堵截軍車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北京市仍未解除戒嚴令，但是市民及學生繼續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衛天安門靜坐的同學。來自外省的軍隊已進駐在北京的四面八方鎮守，隨時候命出動，但是北京高校學生糾察隊則繼續在城郊走進解放軍的隊伍中展開遊說工作。

記者下午曾走訪位於北京軍事博物館後面隱藏着的解放軍大本營，該處約有二十部軍車，八部炊車（煮飯弄吃的軍車），路口已被兩部被刺破車輪的公共汽車堵住。市民及學生均各自有糾察隊在營內維持秩序，學生亦不時跟燒飯洗菜的解放軍交談。

一位學生糾察隊長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他們在五月十九日晚發現公主墳有軍隊後，便派學生來聲援，途中發現此部隊駐點，便臨時召集了三十名糾察隊來，一直與解放軍關係良好，並沒有與官兵發生任何衝突。不過，據他剛收到未經證實的消息，說有一小撮不法分子製造分裂，他們現正展開調查。至於二十日晚上六里橋的衝突，他說，有一女學生被武警的汽車壓傷了腳，另外武警又用盾牌及警棍毆打了部份學生，但學生完全能做到：「罵不反抗，打不還手」的原則。而受傷人數到底有多少？他表示，總指揮部未能下達消息。

學生糾察隊長說，他們不理會這些解放軍在這裏到底有何任務

及何時採取行動，因為這是高度機密的。但由於北京有四至五十萬學生在廣場上進行請願，糾察隊有責任來這裏了解情況，假如他們要出動開往天安門，糾察隊和市民就會用自己的身軀阻擋住他們。

由於學生堅持採取非暴力的和平請願方式，他表示，學生糾察有責任要保護天安門廣場同學，他們會在解放軍出動時，手拉着手，若解放軍前進，他們會先退三步，若再進，他們也絕不再退的了。現時，學生和解放軍的關係非常好。他說，解放軍對學生亦十分了解，而且有部份官員會利用休息時間到大街看北京市民的呼聲和力量。對於估計晚間會否闖進天安門，他表示，他們何時及採取何種行動，學生完全不知，但一旦他們出動，則市民和學生就會聯手阻擋。這軍團部隊跟其他分散在街頭的部隊有很大不同，營地附有炊車，軍事裝備明顯較為集中，到底這是否總部大本營？他說，據了解，有三名學生糾察隊發現這營有電台通訊設施，能否說屬總部還沒法斷言。他又說，這些來京的士兵已有四個日夜沒閱報紙、看電視及讀新聞，他們只是奉命來此值勤，雖然軍車帶來炊具，不過食品也存留不多，所以學生用向市民募捐得來的錢給士兵買煙和補給食品，在午膳時學生更與士兵一起進餐。

此外，記者走訪了六里橋的軍車隊，那裏的解放軍已兩日兩夜停留路旁等候命令，但政府並沒有給予他們任何援助，他們的吃喝都是靠市民送贈補給，學生也送報紙及傳單給解放軍，勸他們吃市民送來的食品，飲料及冰棒等，彼此之間已完全沒有芥蒂和敵意。

由於北京酷熱，有解放軍中暑不支倒下，市民都極表關心及責備政府不負責任，有一位大孀更哭喊起來，他們勸說現在軍兵們應盡快把病者送院醫治，認為政府不應對解放軍這麼不人道。現時，北京城內駐有軍車的地方，都在路口的前前後後給刺破了車輪而不能行駛的公共汽車，橫放在大街小巷的主要道路上，用來阻擋堵截軍車的去路。市民表示，他們會一直留守在這裏，不容許軍車出動。

又訊：北京市經過第二日的戒嚴，市面只有堅持鬥爭的人民和



學生，不斷在街頭奔波，宣傳及維持交通秩序。由於事態已發展和維持了多天，已開始有混亂情況發生，極有可能令一般老百姓反感和不滿。現時，全市交通完全停頓，一百七十八路公共汽車已經停駛，嚴重影響市民上班及出入；出租車也不能在街頭上行駛；地鐵由於在十九日晚被截斷電源後，一直停駛。市民只能靠自行車、電單車、運貨卡車、麵包車等來往城內各處地方。

在北京市各繁忙街頭，日間都顯得冷冷清清，食肆、商店全部停業，糧食及副食品因運輸不便造成供應緊張。同時，市民因為恐怕晚間會停電，紛紛搶購蠟燭、火柴和食鹽等必需品，反映社會民生受到嚴重影響。政府及學生現時所面對的壓力非常大，估計一到深夜，隨時會有突發及無法估計的事件發生。

此外，北京市人民、學生糾察隊等經過前一晚整夜緊張的戒備後，顯得十分疲憊、無力及困倦，他們的熱情及支援力量都大大減弱下來。據來自天安門廣場的消息，學生表示，李鵬已下令清晨五時一定要把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清場。更說，北京的監獄有足夠地方容納二十二萬人，並表示會派清潔車到天安門清掃垃圾。

5·22

戒嚴第三天

軍隊駐防情況及最新動向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約四十部坦克裝甲部隊昨仍停留在北京市郊區東高地。該部隊已三日三夜停駐該地，跟北京市高校的糾察隊關係非常良好。

記者繼續走訪軍隊進駐的地方，發現東面的雙井及呼家樓的士兵都撤走了，途人表示：軍隊是早上離去的，學生糾察隊也一起走了。不過，市郊東高地卻仍然發現有坦克部隊，記者前往訪尋時，向學生糾察表明身份後獲准採攝，唯部份解放軍則喝令不准，但沒有發生不愉快事件。

學生糾察隊大多坐在坦克車的履帶前，他們採取輪班制，大概可休息六個小時，並死守在這裏，令坦克部隊無法開動。部份學生與解放軍交談甚歡，其中一位解放軍對記者表示，他們不會用槍桿對着學生和人民的。學生也表示，相信解放軍已對他們很了解。

學生又表示，據一些解放軍透露，原來他們很早就接到命令來京城候命，出發日期比李鵬看望及與學生談話的時候還早，表明政府根本沒有誠意與學生和解，並且早已部署好派駐重兵鎮壓。

凌晨三時左右，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代表曾就撤退問題出現意見分歧，後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議決絕不退出廣場，與市民共存亡。對此，站在前線保衛學生的糾察隊表示，市民跟學生一樣，會盡全力阻止坦克部隊出動的，而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是整個學運的命脈，若撤退而不堅持到底，就會令學運徹底失敗，亦辜負了市民和糾察隊在這裏的奮鬥。他強調，坦克車部隊三天來都沒有出發的動靜，由於他們的糧食帶備不足，所以市民、學生都很熱情給他們吃、喝的補給品，雙方已建立非常良好的關係。

據中央電視台晚間新聞報導，二十一日晚有謠傳表示解放軍會進城，因為二十日發出了戒嚴令，恐怕解放軍會採取行動。但一名軍官表示，他們的軍隊一直都沒有進城，因為上級下令他們要在原地待命。又表示，解放軍仍留在城外，不過受到市民的阻攔，他們已將情況向上級反映。他又表示，會與大學生一樣，避免發生衝突，要維持好秩序。不過他又指，群眾對士兵不太了解，常聽到很多挑釁性的說話，但解放軍不會理睬。此外，大學生也做了很多工作，雙方都十分克制，避免衝突。到目前為止，他表示大學生和解



放軍之間並沒有發生任何不愉快事件。

他又說，當初調動解放軍進北京城時，上級的指示是值勤及維護首都治安。他表示，曾到過天安門廣場，那裏人數比較多，一旦出現甚麼情況，他們會非常難辦，而且群眾上街及學生的情緒都很激烈。他強調，上級已向他們清楚說明解放軍的任務是熱愛首都、群眾和學生。但承認，現時他們的吃喝和睡宿都不好，晚上沒有被鋪禦寒，不過士兵會堅持緊守崗位，克服困難。上級開始有給解放軍買麵包、饅頭，暫時情況已有好轉，未有違反紀律的事情發生。

六里橋的軍民衝突

北京市民及學生再熬過了第三晚戒嚴令下的緊急作戰狀態，在全民皆兵的情況下，六里橋附近的大井五里店告急消息傳出後，大批聲援學生立刻坐上卡車，尾隨不少市民騎自行車很快趕到現場。

五里店屬於重要的駐軍地點，該處這兩天本來已停泊了無數軍車，但守衛森嚴而且相當隱蔽，所以學生甚少有機會與解放軍接觸。對於晚間曾發生衝突事件，據目擊者解釋，晚上十一時半，軍隊有十部卡車要開進後勤總部，市民以為軍隊要駛往天安門，所以在攔截過程無可避免地要與軍隊對拚。

在軍隊與市民發生衝突時，因學生曾企圖將市民和軍隊分開，但雙方都無法平伏情緒，軍隊中有些較凶狠的開始拾起石頭磚塊打人，混戰中，傷及學生二十多人；軍隊則報稱有兩人性命危殆，七十八人受傷；市民受傷人數暫無法統計，但為數不算太多。

據目擊者表示，這師軍隊因為糧食不足，士兵脾氣暴躁，加上三日三夜受困，當市民企圖攔阻時便瘋狂地動手打人，有些甚至用皮鞭打群眾。目擊者又表示，這裏經常發生衝突，已經不是首次。不過這趟較為嚴重，市民群眾情緒激動的原因是發現這些軍車準備開動，不管是直駛到天安門，抑或是返回總部匯合其他軍車，市民

都感到不安全，所以拚老命也要跟軍人對打起來。據一位在場的鐵路工人表示，市民情緒激動是可理解的，因為，在軍車駛進總部後，估計大批解放軍將可用地底通道一直前往天安門廣場，還可以到西單接駁一條鐵路軌道通往火車站，所以市民對軍車的動靜非常留意並提高警惕。

又據一位已跟這師軍隊的部份士兵建立良好關係的學生表示，本來下午他們已開始能與解放軍有說有笑，但由於這師部隊屬裝甲兵團，有位頭頭長官表現十分兇惡，跟學生保持距離並採不合作態度，令學生與裏面的解放軍無法繼續溝通和建立良好關係。他又表示，這師部隊聲稱是二十七軍，但他已三次向軍隊核實，得知其實是三十八軍，不過用二十七軍來掩飾他們是精銳部隊，肩負隨時候命的特殊任務。

在衝突發生後，大批聲援學生和防暴武警趕到，事件平息後，武警離開，學生與軍隊司令展開談判，及後為方便雙方獲得共識理解，能互相讓步，故決定先行讓一批聲援學生撤退，隨後圍觀市民分兩批散去，希望作少許讓步後，能令談判順利。

一位糾察隊員表示，這師部隊的參謀長其實已曾與學生表明，不會進入天安門及絕對不會對付學生。所以在場的糾察隊希望，市民能保持冷靜和理智，以免造成混亂，令政府有借口鎮壓，變成幫倒忙。他又希望市民切勿輕信謠言。他說，這師部隊來京城後糧水不足，學生市民都把食物、飲料送給士兵，有同學更因此挨餓，兩天沒吃東西。這些部隊一直被堵住而沒法前進，以致在發生衝突時，有軍人無法控制自己，甚至邊唱歌邊打人，完全失去理性。

廣場學生及各界遊行的情況

下午，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陣營中出現不明來歷的傳單，宣佈停止靜坐請願行動，要求同學撤離廣場，返回學校。後來被留守廣



場的學生通過廣播站否認其事，並一再提醒同學們別受壞分子滲入分化所影響。

據靜坐的學生表示，廣場曾出現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向學生派發一份整齊排版打字印製精美的傳單，簽發者為全體北京市高校同學及廣場絕食靜坐請願同學，傳單內容大致為：「絕食請願行動已取得勝利，同學應顧全大局，穩定社會秩序，返回學校。」取得傳單的同學立刻議論紛紛，要求學生廣播站澄清。廣播站後來發表聲明，從來沒有作出離開廣場的決定，相信此乃壞分子盜用學生名義進行分化的手段。

另訊：軍部直昇機早上並沒有盤旋廣場，只數度在上空投擲傳單，重申戒嚴令限制行動的《告北京市市民書》，部份學生拾起發覺是政府傳單便隨即撕毀，以示抗議。

學生現仍繼續留在廣場，堅持靜坐請願及前來聲援的隊伍已陸續減少，北京時間下午四時為止只剩下十餘萬人。但堅持繼續絕食的少部份學生則認為學運換來政府軍管，是中國民主政治的倒退，而非前進，所以他們堅持繼續絕食。

香港學生赴京留在廣場聲援

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當代中國學會的十餘名代表，下午會合了北京知識界及新聞界二千多名人士組成遊行隊伍，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靜坐請願的學生。香港的代表們走在隊伍的前端舉着「香港一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的橫額，由東長安街轉入天安門廣場時，受到廣場上十多萬學生熱烈歡迎。

遊行行列中最引起注目的是《人民日報》隊伍，當他們進場時引起一陣哄動。另外有工人出版社、新華社等新聞及出版單位加入。走在遊行隊伍前頭的有著名知識份子嚴家祺、蘇紹智、戴晴等，他們高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反對專制」等口

號。隊伍在圍繞天安門廣場遊行一圈後繼續在長安街前進。是次集體遊行是知識界、新聞界等又一次有規模的支持學生聲援行動。

5·23

戒嚴第四天

天安門城樓毛像被潑墨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掛像下午被三名裝扮成學生模樣的，額前圍上紅頭巾的可疑人物，潑上雞蛋液和混合紅黑色的墨汁，該三人及後被體育學院的學生糾察隊長捉住，送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審問。由於毛像遭惡意弄污，官方人員旋即用綠色帆布將毛像掛畫全部覆蓋。

據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透露，其中一名被捕的可疑人物為喻東岳，年齡二、三十歲，報稱為湖南《瀏陽日報》記者，記者證號碼為03808。就現場發現所知，此人與另外二人均曾向毛像潑上雞蛋和紅、黑色的墨水，毛像因此被弄髒，在毛像的左下方，及面額等均有明顯的污跡。此三名蓄意破壞而又別有用心者，當場被糾察隊逮住，帶往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司令台審問，具體動機如何仍在調查中，不過他們所出示的身份證及記者證均真實不虛。

大約在北京時間三時半左右，毛像給官方人員利用雲梯，與登上天安門城樓上面的工作人員，合力用綠色帆布給整幅毛像覆蓋。毛像被弄污後，學生立刻豎上一條橫額寫上：「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據現場觀察，群眾對此破壞行為極為不滿及憤怒，認為這是



有辱國家及黨的象徵的，所以學生及群眾嚴禁在場的人士拍照，其中一名外國人士不理會群眾喝止，站在高處連拍多張，立刻被群眾圍住及企圖毆打，又喝令要拆菲林，後給學生協助調解才把他放走。一名學生對記者表示，無論是人民、群眾和學生都不希望有此等亂事發生，尤其是會製造藉口給政府抓把柄。

正當毛像被弄污及蓋上帆布後，北京天氣由晴轉陰，並忽然間刮起了大風沙，隨即一片萬馬齊瘖的景象便籠罩着整個北京城，然後下着滂沱大雨，人群四散避雨。

穿梭不息的遊行隊伍

北京市在第四天的戒嚴令下，仍有數十萬人上街遊行，遊行隊伍由下午一時半出發，約三時左右在天安門廣場四周列隊遊行。是次遊行隊伍主要有中國直屬機關、外交部、民盟、中國金融界、航天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知識分子、新聞界等，同時又有不少外省學生參加是次遊行。

遊行隊伍的口號及旗幟全部都是針對李鵬的，有大幅橫額寫上：「四海翻騰喚民主，五洲震蕩除李鵬」、「現在到底是誰怕誰？」、「抗議戒嚴，要求民主」、「反對軍管」、「反對暴政」、「李鵬 人民將審判你」、「要求人大罷免李鵬」等。

由於北京時間四時左右，天氣轉變很大，既刮大風又下暴雨，廣場上的靜坐學生和廣場外的遊行隊伍都給風雨橫掃，氣溫急劇驟降，靜坐同學瑟縮顫抖，有些同學冒著雨仍搖旗挑戰狂風暴雨的無情吹打，遊行隊伍則疏落地堅持要完成行程。

廣場上的「學運之聲」播放國際歌，振作同學士氣，唯在此飢寒交迫的侵襲下，廣播呼籲市民給同學食物、衣物和雨具，恐怕晚間同學會受不了這場持久戰，難以熬過艱困的寒夜。

北高聯整頓內部組織

據來自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一名常委透露，北高聯晚上召開會議，決定整頓學生內部組織，將北高聯的組織分成三個部份，分別負責決策，權力及執行，而同學將會繼續留守天安門廣場。又表示，王丹、吾爾開希均已非北高聯代表，他們的一切發言只能代表個人，而非集體。

該常委表示，經整頓後的北高聯由三個部份組成：（一）常委會，屬決策機關，成員來自北大、法大，各有兩名代表；清華、北航、人大、師大、民院各一名代表，另東郊十院校派一名代表列席。（二）全委會，屬最高權力機構，各院校派一名代表為成員。（三）執委會，屬常委會下面的執行機構。

他說，現時北高聯的工作方向主要是：一方面在廣場上確定人數，輪班靜坐，氣氛要嚴肅，但亦可活潑，並且要整頓陣容，將各院校靜坐的人排列成方塊；另一方面，校外繼續派出糾察隊、宣傳隊，把守各主要路口，組成巡查團，巡視各路口及學校情況。

此外，廣場上的車輛將會全部撤走，並會組織敢死宣傳團，負責攔截軍車，維持秩序，盡快恢復市面交通。

按目前的形勢分析，北高聯估計未來行動取決於政府鎮壓與否，他們決定若政府採取鎮壓行動，只要聽到第一聲槍響，便立刻全部撤退，不準備有流血犧牲。若政府不強行軍管鎮壓，則上述部署工作不變，繼續進行抗爭，及要求召開人大會議罷免李鵬。

據該學生常委透露，目前北高聯很擔心李鵬可能用強硬手段暴力鎮壓，但無可否認，最近已有軟化跡象。近日解放軍進駐北京，語氣已改為協助首都維持秩序，無意鎮壓學生。他估計現時碰到的最大難題是，學生體力消耗太大，對政府的了解不足，現時學生在明處唱獨台戲，政府則在暗處按兵不動，因此他們只能希望工人、



群眾能加強組織，聯合一起推動民主運動，才有機會走向勝利。

北高聯由二十三日下午開始，已暫時將廣場指揮權交給絕食團。四十八小時後，北高聯組織內部整頓完善後，同學願意接受領導的話，才會接管廣場。又稱，已分配好各校的管理地帶，任務是疏導交通及在各路口阻截軍車。

此外，他又表示，北高聯本身是無權罷免任何代表，因為各代表由高校選出，所以無權罷免，只能提前通知各校，由該校自行決定。現時，王丹、吾爾開希均非北高聯常委，他們只代表個人。而絕食團方面，據該同學表示，絕食團經常不聽從北高聯的指示，態度囂張；另外對話代表團雖未解散，但已形同虛設，因為他們已不打算跟這個政府對話，學生運動現在只剩下一個目標，就是推翻李鵬。北高聯考慮到同學經過長期鬥爭後，體力消耗厲害，所以希望能輪班靜坐，並在嚴肅之餘，搞一些輕鬆活潑的活動，例如演唱舞會等，讓同學留在廣場堅持下去。

他又透露，其實常委中沒與中央有任何關係，很多消息都只屬猜測，對中央高層內部的政治權力鬥爭亦不甚了解，現時只能要求儘快召開人大會議，但並不可能有實質行動。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解放軍進駐京城的目標並非對付學生，因為二十萬解放軍部隊，兩師精銳部隊裝甲兵團，要想鎮壓學生早就可以成事，但軍隊按兵不動，可能與派系鬥爭有關，背後有各自的政治目的及動機。

學生堅持留守天安門廣場，其實已經意義不大，不過由於群眾的情緒已高漲到轉折點，市民為同學辛苦堵截軍車，若撤退將對不住市民，即使遊行聲援亦不可能製造到夾道歡迎的氣氛，所以作出堅持留在廣場的決定。

外省學生組織自治聯會

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會一名同學代表稱，近日北京的消息完全

受到封鎖，特別是戒嚴令期間，外地完全沒有任何關於北京方面的學運消息。

該同學表示，第三批赴京同學已經陸續到達，昨日有二十所新加入的高校抵京，並加入遊行隊伍中，而第一批赴京同學現已離京，以勝利凱旋的姿態，打算各自回去宣傳北京民運的消息及廣發宣傳單張。有部份外地赴京同學認為，學生運動應由北京向全國方面發展，現時由於消息封鎖，外地學生只知道絕食停止了，又誤會學潮已經結束，所以北京學生應堅持學運精神，奮鬥到底。

他又表示，鐵路局對學生十分優待，出示學生證便可免費登車，又可在餐卡上用膳。他不知道這是鐵路局還是政府提供的優厚待遇，但現時鐵路運輸的安排方面出現逆轉，離京的同學一律可以放人，但赴京的則不准上車，同學只好幾經轉車才能抵京。此外，他又透露，在武漢有使用過催淚彈驅散人群，這是學潮發生後首次有使用催淚彈的記錄。他又表示，外省的鎮壓比北京嚴重。

北京詭譎的政局消息

中共高層連日來召開各式會議，剛剛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此間，北京多位消息人士只透露是由中央召開的會議，沒法確定是那一層級的。有消息稱，在二十二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把這場學生愛國運動定性為「反革命」。至於趙紫陽是否有出席這次會議，也有截然不同的說法。但從北京傳來的內部消息稱，趙紫陽在十九日起請病假三天，故此他沒有出席當天的全國幹部會議。

北京市仍未解除戒嚴令，市面一些公共路段的交通已逐漸恢復正常，交通警察亦開始值勤，指揮交通。北京市十五路段的六十一條公共汽車已恢復行駛，市民亦守秩序地排隊候車。其他交通工具，地下鐵方面已恢復從蘋果園到北京站的一段地車服務，即仍只



能局部行駛，唯其餘各段則在維修中，估計很快可全面通車。

又訊：副食品供應方面的運輸車亦很暢通地運抵北京，現時由於貨源未有截斷，所以沒有發生搶購現象。近日由於解放軍沒有進城，北京市民情緒穩定，商店照常營業，恢復平時情況，與戒嚴令前沒有太大分別。

5·24

戒嚴第五天

北京政變的來龍去脈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軍車後撤和部隊動向

北京市已進入第五天戒嚴，軍隊於日前稍往後撤，據知現時已有部份軍隊撤往位於大井西倉庫軍營，但是另外曾有軍隊停留的地方，如長辛店、杜家坎、蘆溝橋等地的軍車則不知去向。據中央電視台報導，軍隊已撤往安全地帶。在豐台近日經常發生市民和軍隊的衝突，該區的市民表示，戒嚴令後第二天，有兩連軍隊曾往前衝，並踩過學生，但連衝三次，仍不成功，所以撤走了。

至於昨晚的衝突，市民表示，並非有流氓挑起事端，而是因為有防暴武警到來打人。市民又說，武警在幾次衝突中，曾經打過女學生，而且亦有小孩子被打。市民表示，他們是自發地出來堵截軍車，不少老百姓已三日三夜沒有睡過，他們都是為了保護學生，認為政府有錯，所以民心所向，都是普遍支持及贊同學生的。

另外，又有市民表示，昨晚八時趙家店與朱家墳之間的十字路口，有一名北大二年級學生被軍車輾倒，被送往長辛店醫院。記者到醫院查問時，醫院工作人員表示，傷者是一名姓王的農民，並非學生，現已轉送往宣武門醫院。

北京昨日的交通及市面情況均已回復正常，除了部份地方有出現堵車外，基本上全市人民都不感到有戒嚴的威脅。

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仍然留守廣場，何時撤離須視乎事態發展才能決定。前日起，廣場氣氛已轉為輕鬆，再沒有告急的廣播消息，並改為播放輕鬆音樂，緩和幾個晚上緊張作戰的戒備心情。由於天氣轉冷，經呼籲後，市民紛紛送上禦寒衣物。不過昨日廣場上的糧食供應出現緊張，學生要憑學生證領取乾糧。此外，廣場及各路口的糾察隊已加入了不少新血，他們都是剛抵京的外省學生，北京學生因經過一個月的疲累鬥爭，很明顯已倦怠及鬆懈下來。

中央電視台持白色的示威牌遊行

今日雖然是北京市第五天的戒嚴，但是由北京各界人士組成的全市大遊行，在烈日當空下，有接近一百萬人參加遊行隊伍。

是次遊行路線兵分二路，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從建國門出發，所喊的口號多為「打倒李鵬」、「粉碎軍管」、「反對獨裁」、「要求民主、自由」及「天賦人權」等。另一路隊伍則從復興門出發，先有北大黨員、職工到場集合，出發時以北大宣傳隊帶頭，遊行隊伍才陸續跟上，而所喊口號的主題有：「罷免李鵬」、「歡迎萬里」、「召開人大」等。

兩列遊行隊伍抵達天安門後，再與外省高校的學生遊行隊伍匯合，外省院校有南開、天津、南京、復旦、同濟、山東礦業學院等，部份北京高校亦有加入，舉起的橫額有「強烈要求召開人大，罷免李鵬」、「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等。



各遊行隊伍在下午二時出發，三時多抵天安門廣場，匯合起來的陣容令天安門一帶經常都擠滿有五十萬人左右的遊行及支持的群眾。此外，遊行隊伍中還有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及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其中有部份中央電視台的員工持着白色的示威牌，遊行時不喊口號，也不解說為何以此形式抗議，直接反映新聞封鎖下他們現在是空白一片，無話可說。是次遊行完全是各界人士自發，有位參加遊行的教授表示，聞說趙紫陽要下台，所以他要出來遊行表態。

5·25

戒嚴第六天

北高聯秘書長 王志新決定請辭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繼吾爾開希、王丹與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脫離關係後，秘書長王志新亦決定向北高聯請辭。現該會只有王超華是最老資格的常委，其他全部常委都是新進的學運領袖。

已請辭的秘書長王志新在北高聯會議尚未結束前便離場，對我說，他已辭去北高聯秘書長職位，原因是北大代表對他不滿，雖然各院校仍很支持他，但因將來開會經常要到北大，為免尷尬，同時個人不想長期做職業革命家，對政治的興趣亦已大減，所以倒不如退下來。

事實上，北高聯常委是經常有變動的，目前主席位置亦不設

立，但秘書長則屬常設，而且不應該經常更換代表，這樣才能對組織本身有較深的認識，延續各項長期的工作。王志新說，秘書長一職是無表決權的，他本人從四月二十三日開始擔任秘書長，能保留職位至今已算不錯了，但現在組織內部有各種不同意見，北大還是以老大哥身份想控制學運方向，所以他才決定退下來。

王志新是政法大學法律系三年級學生，明年就要畢業了，他在學運中表現得較為理智、冷靜，分析能力頗高。由於學運進入打持久戰而一直沒完沒了，他的身體也衰弱了很多，他因個人健康理由不參加絕食，而事實上亦覺得絕食不能扭轉局勢，他持審慎的態度觀望政局的發展，認為李鵬的勢力仍很大，趙紫陽失勢的端倪早在學潮之前已顯露，像八六年學潮後，胡耀邦倒台一樣，趙紫陽極有可能會在這次學潮中被栽下台的。

現時北高聯開始整頓內部組織，將會加強與外省聲援同學及北京市各界自治會的聯繫工作，以便統一行動方針及宣傳策略。此外，處理財政的工作組亦要加強，有條理的處理開支及收入。同時，又會成立龐大的宣傳部，有系統地由專責小組長駐在有條件的院校內統一宣傳的內容，減少各自為政的混亂現象。

另一方面，北高聯亦得到一份民間報紙的自願協作，成立一個與財政部分開的獨立基金組織，更有條理地將募捐所得的數千萬人民幣好好利用，搞一些具體有意義的事情，例如辦報等，會有計劃地將所籌得的資金投資運用。

至於廣場方面，靜坐學生現仍堅持留守，什麼時候撤退由廣場指揮部自己決定，北高聯不給意見。若撤退後，廣場指揮部便會解散，能幹的同學可加入北高聯繼續工作。當北高聯內部組織整頓好後，還有待解決的是交通及通訊問題。現時北高聯在這方面仍然相當落後，無法好好動員學生，安排交通及有效地、迅速地傳遞訊息。昨天，北高聯才選購了幾部對講機，但通訊範圍亦非常有限。此外，北高聯的辦公地點亦很欠缺，聯繫方面很不方便。



學運發展至今，經過八天絕食後，政府不單不加理睬，還採取極嚴厲的措施下達戒嚴令，使同學又再進入緊張戒備狀態。現時，同學普遍認為能夠喚起全民關注及支持，是這次學運的極大成功。雖然有可見的勝利，但是同學經此一役後，除了大部份都顯得疲憊不堪，精神不振外，絕水同學的生理及性機能受到破壞；而絕食同學則大腦也受損害，記憶力很差，情緒不穩定和容易衝動。據估計，不少院校都有同學在絕食後變得神經質，不能自我控制。

有消息說，學運之後，留美學生聯合會將會在美國發起一個組織，終身照顧這些身體及大腦受到破壞，將來無法畢業及喪失工作能力的同學。由於中共政府不會理會他們，故計劃成立一個組織，考慮給予這些摧殘自己生命以喚醒民眾覺醒的同學一生一世的照顧。

外省學生將陸續撤離廣場

北京天安門廣場仍有數萬名學生繼續靜坐示威，不過這些學生多數都是來自外省，而且亦有一批來自山東的海軍學校學生穿着白色軍服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站崗。

這些外地學生表示，他們計劃兩日後會撤離廣場返回各自省市地區進行學生運動的宣傳，各所院校只留十人左右。外地學生組織的外省高校學生聯合會，會跟北高聯保持聯繫，返回各地後會展開有系統的宣傳，令民主運動能夠繼續向外地發展。不過，雖然廣場上的外省同學將陸續撤走，但是每日仍不斷有來自外省的同學乘火車抵京。

廣場上官方的廣播聲響蓋過學生廣播

天安門廣場近日出現兩個廣場聲音，其一是官方的廣播，不斷重覆播送關於北京市人民政府發言人的呼籲，宣讀解放軍三軍總部

向戒嚴部隊的慰問信，及各省擁護中央及李鵬、楊尚昆的講話，而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則相對地稀疏冷清，儼然有官方「反宣傳之聲」已蓋過了「學運之聲」的氣勢。

北京市人民政府發言人的講話是：支持北京紅十字會的緊急呼籲，勸喻學生離開廣場，並表示保證與學生代表對話的一切渠道暢通。又提醒學生廣場環境污染嚴重，恐怕會有傳染病或瘟疫流行。同時亦強調會維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對學潮期間的一切過激言論可以概不追究。

雖然官方反覆播放這段陳腔濫調的宣傳聲帶，但是學生則對這段不斷重播的官方言論不表興趣，更在學生廣播中強調指揮部從來沒有發出撤離廣場的消息；又有另一段報導表示，種種迹象顯示，在戒嚴令下解放軍隨時有可能強行入城，所以呼籲同學要維持不用暴力來爭取民主，又希望糾察隊繼續設置路阻，堵截軍隊進城，並加強宣傳及遊說工作，盡可能不要與軍隊有直接衝突，而即使軍隊入城，市民和學生亦應繼續舉行遊行以示抗議。

附《全國人民爭取諾貝爾和平獎倡議書》

（錄自天安門廣場流傳的傳單）

全國同胞們：

據悉，由於中國人民在當前的民主愛國運動中，以非暴力的，合法的形式，成功地抵制了李鵬等一小撮反動勢力非法的，暴力的軍事管制，為世界和平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因此，中國人民已得到了1989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在此，我們向全國人民發出倡議，以實際行動去爭得這一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最高榮譽。

全國人民積極行動起來，用非暴力行動和我們的軀體繼續



保衛佔全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

以民主和法制作為手段，堅決抵制軍管，抗議政府對首都人民與廣大軍隊官兵的人格侮辱，強烈要求政府立即撤消戒嚴令，撤離京郊十數萬野戰部隊，盡力使首都成為優美安寧的世界和平城。

聲援世界上所有遭受凌辱和壓迫的人民為爭取自由，平等，和平而進行的正義鬥爭。

和平，是人類存在與發展的首要前提，是當今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流，同胞們，我們要以戰士的抗爭而不是奴隸的馴服去爭得中國的和平，人民堅信自己的力量，和平的鮮花就必將在全球開遍。

和平萬歲！民主萬歲！人民萬歲！

首都人民

1989年5月25日

5·26

戒嚴第七天

列車加班安排外省學生離京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從外省來京聲援北京學運的大學生已陸續返回原地，人數之多今日到達高潮，北京火車站特別安排加班列車，方便他們盡快離京。北京火車站黨委書記白永富表示，單是昨日一天已經有二萬六千多名外省大學生離京返回各自的院校。這些學生因為覺得在北京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到天安門廣場看看，一兩天左右便想回去，

所以他們都擠到火車站等候離京。北京火車站已為大學生安排好每個方向的排隊指示，為保證他們能夠乘坐火車離京，特別作好充份準備，加設四列空車專給外省大學生，按學生需要前往的方向來安排加班列車的路線。

另一方面，國務院前日發出了關於堅決制止各地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京的緊急通知，表示有些同學甚至臥軌攔車，嚴重干擾鐵路運輸的正常進行。所以通知有關方面，要盡快制止這種不正常狀況，維護交通運輸的正常秩序。

又訊：雖然天安門廣場靜坐人數大減，但北京市民在入夜後仍不斷湧上街頭走動。據街上的北京市民表示，在東單附近發現有不少軍人，包括軍官在內，在凌晨時份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樣，混進大街小巷的人群中，目的是進行偵察及個別分批前往前門集合。據記者現場觀察，已有七、八名便衣軍人被群眾包圍及審問，有些供出自己身份是當兵的，被市民趕走，不容許他們往前走。北京市民說，這些便衣軍人很容易辨認，因為他們的髮型都是陸軍裝，年紀輕，是外地來的新兵，跟本地人不同。市民逮住便衣軍人時，通常都不會為難他們，問清身份就放他們走，但不許他們往前門方向去。街上市民心情顯得輕鬆多，但有透露下午楊尚昆曾召開會議，可能深夜鎮壓，他們說現在要先向便衣軍人戒嚴。

5·27

戒嚴第八天

北京學生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北京高校學生計劃明日進行全市大遊行，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以壯學運聲勢。據悉，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希望藉此遊行活動，建議廣場上靜坐的同學撤離廣場，並發起「空校運動」，呼籲同學各自返回家鄉，作為對政府抗議的最後表示。

不過，據了解，廣場總指揮部仍堅持不撤，目前撤離廣場與否的意見仍很分歧，即使撤退，相信也會是在五月三十日發動另一次大遊行才會正式撤離。學生意見的分歧，主要是因為對學運風向有不同理解。據一位學生表示，學運總方向是推動民主改革，不少贊成撤退的同學深明政治局勢，了解中國國情、歷史和中國傳統封建思想，知道現時首要任務是先要打破這些，才能向民主邁出一步。

然而，採取絕食抗議及堅持靜坐不撤的同學，思想已走向偏激，要求徹底打倒李鵬，推翻保守政權，卻不明白目前時機尚未成熟，現階段根本無法達到任何目的，所以該同學認為最好撤離廣場，把同學的精力轉為向民間搞宣傳工作，把民主的希望放在民間播種。

目前不少留在廣場的同學，都是一些滿懷希望來到北京想感染學運精神的外省同學，他們在天安門得不到精神力量的鼓舞，反而強烈感到廣場很混亂，及氣氛不融和，令不少外省同學感到失望。

同時，很多高校同學對廣場總指揮柴玲有微言，認為她的表現相當獨裁和不理智，特別是處於此歷史時刻，同學認為她作出了很多極不負責任的決定。

另一方面，廣場秩序混亂，部份原因是外省同學大多留守廣場，他們素質不及北京高校同學，而且思想及理論水平參差，經常出現失控現象，加上廣場總指揮部已脫離北高聯，於是無論外部和內部的聯繫都極需要尋求改善及整頓。

由於全球華人將於明日上午十時舉行世界各地自發的大遊行，

北高聯亦已向各院校作廣泛宣傳，號召同學參加，並將於各院校出發。同時，北京各界人士亦會發動全市人民大遊行，分別在復興門及建國門出發，令民主運動聲勢自內至外，又由外至內不斷擴展及互相支持呼應。

此外，北高聯又考慮發起「空校運動」，希望能在廣場靜坐同學撤離後實施。現時，北高聯已號召同學各自返回家鄉，以最徹底的罷課形式向政府表示抗議及宣傳學運未死，而且同學離京後可打破新聞封鎖的限制，向各地展開廣泛宣傳。

5·28

北大學生為民主剃光頭抗議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北大十多名同學倡議為民主剃光頭，他們早上以光頭隊在北大校園宣傳，表示昔日反清義士以剪辮子表示追隨革命，推翻帝制的決心。今日他們亦毅然削去滿頭烏髮，顯示追求民主，反對獨裁專制之充份信心，又表示這種剃光頭的特殊方式，是為抗議李鵬等一小撮野心家陽謀家無法無天，愚弄人民，強姦民意等一系列劣行。

剃頭的目的是要表達他們對這個倒行逆施，無視民意的政府的極端憤慨和絕望，以及對前途的深深憂慮。又號召每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熱血男兒拿出勇氣來加入剃頭行列，也希望女同學予以大力支持和理解。

此外，北大昨有大字報倡議學生進行第二次絕食，建議人數不超過五百人，及設後備人員，一人倒下，另一人跟上。又建議保衛



廣場的糾察隊約只須一千人，其他同學應深入民眾作進一步宣傳民主思想的工作。

5·29

北京外商撤離 開始抓捕工人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由北京新聞界、知識界、文化界主編的最新一期《新聞快訊》今日出版，其中刊登了一段報導，表示近日來已有部份駐京外商和外國僑紛紛撤離北京，尤以美國和日本為多。據該報導稱，這些外籍居民倉促撤離的重要原因，是從衛星傳送的海外電視節目中看到北京附近地面的軍隊調動情況，他們感到有不可預見的不安全因素。

另外，又有一段報導稱，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委員沈銀漢、錢玉明、向東平，摩托車隊十一名市民和汽車司機易京瑤等，因參加是次人民愛國民主運動而被公安局逮捕。其中易京瑤一案會由石景山區法院審理，北高聯及首都各界協商聯席會議均予密切關注，並派律師、新聞記者和組織同學前往辯護。又據未經證實消息指，另有數十名各界參與民運活動的人士失蹤，一些已在逃亡中。

《新聞快訊》又刊登了易京瑤姐姐易京寧的來信，就政府對其弟弟的判決表示不滿，解釋在十九日軍隊入城第一天，易京瑤聽到東大橋學生演講指軍隊要鎮壓學生，希望市民支持和攔堵軍車，所以他便憑着一股熱情開車去首鋼，目的是號召首鋼工人團結起來，幫助大學生攔堵軍車。他到首鋼後被門衛阻撓，什麼犯罪事實都沒有造成。

但是關於此事，《北京日報》二十二日刊登消息說：「易京瑤冒充大學生，衝入某工廠散布謠言。此案在進一步審查。」二十三日報導稱：「煽動工人罷工，亂喊口號，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經中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宣布逮捕。現在已提交石景山法院下星期四開庭審理。」

記者到易京瑤姐姐工作的地方了解情況時，易京寧表示，她弟弟是在北京市政司處做司機，他在工作單位的表現一直很好，單位領導亦曾致電慰問，表示會保證他是良好公民，又希望公審時能旁聽。她說，現時已委託政法大學法律系老師鄒明安及洪道德作她弟弟的辯護律師，由律師跟他接觸，而她則一直沒機會探望弟弟。她又說，父母對此事很擔心，易京瑤現年才二十歲，本來今日公審，法院表示可以公開聆訊及家長憑身份證可進場旁聽。不過由於父母不好承擔這次太大刺激，所以她作為大家姐會為弟弟出頭。但昨晚，易京寧收到法庭的最新消息，表示易京瑤一案今日不開庭，日期押後，具體公審要自己到法院門前留意告示。她表示，不明白為甚麼會有這改變，但她希望盡快公審。

組織工會團結工人力量

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的法律顧問李進進表示，該會在合法性問題正進行鬥爭，現時仍有困難，所以只能以半公開、半秘密的形式出現。他說，雖然憲法賦予人民結社自由，但是按國務院的規定，合法結社的鬥爭可能已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政治鬥爭的問題，現時他仍在研究有關這方面的規定，但問題將不容易解決。因為，成立工人自治會主要是組織工人參政及議政，獨立於其他組織及不受工會局限，希望將來可以發展成為波蘭團結工會的形式。

但是，他承認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中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如住、吃、養育孩子等都有賴分配及受到政府的嚴密控制，跟學生的一無所有不同，工人為生計有很多顧慮，未到水深火熱的地步，是很難



組織起來，因此要發展成為一股龐大的力量仍然是相當遙遠的。不過，他有信心現時可先在合法性問題上進行鬥爭，播下種子，對將來的發展還是有利的。他又說，瀋陽重工業區已經組織了工人自治會，天津、上海也有派工人來聲援，不久的將來肯定可以繼續發展出工人的團結力量來。

5·30

天安門廣場豎立民主女神像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

二十九日晚上，北京天安門廣場豎立起一座名為「民主女神」的塑像，該塑像由中央美術學院二十多名塑像系學生日以繼夜地合作創造，共花去三日三夜的時間才完成。

「民主女神」是仿效美國「自由神像」而作的，由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撥款及委托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創制，本來要求跟美國自由神像一模一樣，不過中美院學生認為完全仿製這樣的神像可能會引起誤會，而且他們亦希望創造一件能體現這次運動的塑像，所以經協商後塑造了這座希臘式女神像來。

這座安放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民主女神，將會莊嚴肅穆地站立，高舉合手持著的代表民主光芒的火炬，以堅定及有朝氣的面孔體現年青人的力量。女神像主要用發泡膠材料塑成，外圍用紗布石膏包住，在運抵天安門廣場後會貫注石膏，令神像不怕風吹雨打，仍能穩妥地屹立。

三十日，天安門廣場正中央徹夜裝嵌和安置好「民主女神」

後，隨即舉行揭幕儀式，廣場四周大約有六至七萬群眾圍觀，他們對女神像抱很大的興趣。

「民主女神」高十米，前一晚在中央美術學院完成部件後，深夜運到廣場便引起了北京市民的圍觀熱情，通宵觀看安裝過程，不願散去。中美院先搭起棚架，逐個部件安裝，工程龐大，亦帶有危險性，所以不斷有廣播嚴禁記者拍照，及不許群眾點火抽煙，怕觸及易燃品。

白色的民主女神像在清晨六時安裝妥當，被紅藍兩色大網布條包住頭身，開幕儀式時徐徐拉下來，象徵民主的塑像堅毅地屹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天安門毛像中間，分庭抗禮，成為備受矚目的偉大民間集體創作，充份表現是次爭取愛國民主運動的純潔力量。

又訊：北京電視新聞播出兩段針對民主女神被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強烈不滿，指責此乃未經批准的，又引述一市民的書面意見，及發表天安門管理處的聲明。

該市民為中央某設計院的一名知識份子，他對市政府提供書面意見，表示天安門乃新中國的象徵，只有英雄前輩的紀念碑才能體現為自由民主奮鬥的意志。那些口口聲聲要求民主、自由的人，未徵求過全國及全部人民的同意，便把自己意志強加於別人。並指出這是中國而非美國，即使在美國也不容許在國會大廈前隨意塑造神像，故促請市政府採取強烈措施，制止這種無法無天及強加民意的做法。他又認為這屬於非法建造，恐怕對於想到天安門瞻望英雄紀念碑的人來說，會有不健康影響，所以強烈要求市政府盡快解決。

至於天安門管理處的聲明則表示，天安門廣場是國家進行政治性集會及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是非常莊嚴肅穆的地方，因此堅決反對一些人把女神像放在廣場上。聲明認為這是對國家尊嚴及民主形象的污辱及踐踏。



附 北京大學三角地大字報兩則

四十年了，究竟誰制造動亂？

北大三角地近日又陸續張貼了不少關於政治局勢分析的大字報，其中一篇為「四十年了，究竟誰製造動亂？」，從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五八年的五年大躍進，六六年起的十年文革，八三年的冤假錯案，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八八年的闖物價關，都可以證明種種的動亂都並非學生、百姓造成，而是極少數極少數造成的。該大字報稱：

中央政治局裏的壞人，有長鬍子的，有不長鬍子的；有禿頭的，有留長髮的；有耍流氓的，有倒買倒賣的；有智能低下，胡說八道，有道貌岸然，口是心非的。實踐證明，動亂之源是中央政治局內的「一小撮」竊取了黨政權力的人。

另外又有一篇題為「保守勢力以哪些人為代表」的短文，表示保守勢力主要人物是李鵬、楊尚昆、陳雲、彭真、王震、李先念、薄一波、喬石、姚依林等人，但這些人卻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文章指出，保守派人士反對否定四二六社論，反對趙紫陽在「五四」青年節，在亞銀及關於學運的講話，終於趙被迫辭職。

老人政治與極權主義的政治雙簧

另有一篇名為「評「老人政治」與「極權主義」的政治雙簧」，鞭撻中共政治現狀的醜態，原文抄錄如下：

在當代中國，老人政治和極權主義兩具政治殭屍聯袂而行，滑滑稽稽地上演了一幕幕的政治鬧劇。

極權主義把政治上平庸無能的李鵬之流推上政治舞台，通過形形色色的裙帶，密密麻麻地織成一張自中央到地方的權力網，把共和國的政治集中於一小撮不思進取，權欲膨脹的極權之手，這個極權集團又擁老人以令「諸侯」，把黨政軍的最後決策權拱手交給一位「總設計師」，總設計師喜怒無常，於是共和國的政治風雲，全然繫在一位「旗手」的喜怒哀樂之上。

反過來，老人政治對極權主義亦有「投桃報李」之舉，以老人政治慣有的愚頑和粗暴，對於自由自尊的腦袋左一個「一小撮製造動亂」，右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集團」，咆哮如雷，令人重溫起七六年毛澤東一句「反擊右傾翻案風」，即可扭轉乾坤的迷夢，聰明的老人，同時又以老人政治慣有的「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之古訓，重溫起一手「槍打出頭鳥」，一手撫摸愚弄群眾的歷史舊夢。最大的失誤是在思想教育說穿了是「愚民」做得不夠，愚民+高壓+鐵桿極權集團，何愁不安定團結。

當今之世，民主風潮席捲全球，倒行逆施必將為歷史之輪輾壘粉。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5·31

官方新聞透露政府開始抓捕工人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北京市經過十一天在戒嚴令下並無太大威脅的氣氛中，從電視新聞報導提及抓捕工人的消息、特別聲明、各項廣播等種種迹象顯



示，北京市政府將有可能採取進一步行動，以強硬態度對付工人、市民、學生及記者。

凌晨有三名工人被抓，引起學生及工人不滿。在公安局門前，天安門廣場上設有官方的廣播，勸喻學生冷靜。市民，特別是黨員已遭黨的紀律處分及整肅；工人，進入工廠上班後大門立刻關上，不許工人外出等。

在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中，發佈一段新華社的報導，表示據記者從外交部獲悉，外交部新聞司向各國新聞機構駐華記者發出通知，內容如下：「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發布第二號及三號的戒嚴令，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期間，外國人應注意的事項，及就記者採訪的問題作出規定，請遵照執行。在此期間，記者在北京市進行採訪活動等有關事宜，請與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聯繫。」此項特別播出的聲明重申，記者在北京採訪活動已遭到政府再三警告。事實上，已有外國記者被公安警告，美國電視台採訪隊在公安局附近進行採訪時，曾被邀請進內，半小時後才出來，但這批記者拒絕向香港記者透露內進公安局後的遭遇，並拉隊立刻離開現場。

在中外記者雲集及下榻的北京飯店，在大廈前已掛上四幅紅布條，其中兩條寫上「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儼然將批鬥的矛頭再次撥向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狀中，也給人一種北京飯店已被軍管的感覺。

還有香港《文匯報》及《澳門日報》已被點名，四名人大常委聲明會追究責任，表示在簽名呼籲人大常委召開緊急會議的名單中，他們的名字被盜用。由於北京氣氛仍見緊張，這種對新聞報導上的失實指責，與前段時間的流言、謠言及傳言滿天飛的新聞消息，若被嚴正執行責任追究的話，在北京進行新聞採訪工作可就麻煩了！

學生化妝遊行及空校運動

北京市近日陸續有工農上街支持黨中央及反對動亂的合法遊行隊伍。今日，不少單位、機構員工接到上級命令，要上街遊行支持李鵬，獎金十至二十元不等，或可獲假期，若不奉命遊行，則會被視為曠工。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及農業大學等多所院校學生，索性跟政府「對着幹」，發起另一種化妝及奉命遊行方式，喊出一些諷刺口號，給李鵬幫點忙。北大在三角地張貼大字報，揭露李鵬用每人十元去買七十萬工人擁護他的遊行。其實工人老人極想在遊行時倒戈，所以建議同學幫忙。因此北大籌委會建議同學每人準備十元鈔票一張在遊行時揮舞，又希望同學帶上鬼臉等道具，令遊行更熱鬧趣怪。

北大籌委會決議的行動計劃，包括組織自行車隊，前往《北京日報》報社門口焚報，及針對政府以金錢和高壓組織的遊行，同學應組織自己的反遊行。北大籌委會的通告又表示，在化妝、奉命的反遊行隊伍中，考慮到北京市各領導機關動員工人上街遊行過於困難，及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建議由學生代工人進行化妝遊行，同學自備面具，遊行時不亂呼口號，一定要與中央的政治立場保持一致，喊出與政府相近的口號，例如：「擁護李楊講話，擁護共產黨領導」、「懲治官倒，剷除腐敗，制止軍事動亂」、「還我廣場，還我天安門」。

此外，還有可供參考的口號：「擁護獨裁，要求專制」、「大戒嚴帶來大安全，大遊行帶來大戒嚴」、「戒嚴期間，奉命遊行，每人兩張，擁護李鵬」、「幹部幹部，幹掉民主」、「無賴精神，永垂不朽，流氓手段，萬古長青」、「大逮捕，大欺騙，大恐嚇，大流氓」。通告又呼籲同學們，不要敵視工人同胞，因為廣大工人也是在政治和經濟的高壓下被迫上街遊行，所以要向工人及市民宣



傳，爭取鬥爭的主動權。學生上街進行反遊行的人數無法統計，但零星地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有百多人參與，引起途人圍觀及會心微笑，很多市民都表示：「學生真棒！」

發起空校運動

北京學生運動呈膠着狀態，有不少高校學生對政局的不明朗感到徬徨及無所適從，有些同學則認為局勢表面平靜，但實質是一個新高潮的醞釀階段。由於現時北京未有可預見的最新情勢，很多同學都決定返鄉進行民間宣傳工作，把北京學運的訊息帶回家鄉，希望全國民眾能與學生思想保持一致。

據估計，北京大學已有三分之一的同學離校，各自返回家鄉或到其他省份串連和宣傳。而清華大學留校的同學只得三分之一，回鄉同學獲贈臥舖火車票的津貼。此外，農大更呼籲學生騎自行車，組織數千人的隊伍南下宣傳。

6·1

柴玲被同學綁架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

天安門廣場總指揮封從德及其愛人柴玲，凌晨四時被三名學生及一名不知身份的工人綁架。據封、柴二人表示，事發期間，一位外高聯常委連盛德，另兩名同學，分別為王文、陳偉及一名工人，突然闖進他倆的帳篷內，用毛巾捂住封從德的口，柴玲掙脫後走出營外大聲喊叫，獲其他同學救援，把他們嚇走，所以綁架不遂。現

時，外高聯已宣布罷免連盛德。

北高聯財政部交代財政狀況

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財政部承認在五月二十九日前，他們在處理財務方面相當混亂，不過他們會成立財務監察小組，就絕食運動後的所有財務工作進行清理，將收支定期公開，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會向海內外同胞交代。

北高聯財政部負責人陸明霞表示，財務部小組在五月二十九日成立，共有十五位來自各院校具專業才能的同學組成，分成會計處、出納處、募捐處及辦公室。同時，又會成立獨立於財政部以外的監察小組，監督捐款及財務等一切工作。對北高聯財政部曾出現混亂，他解釋原因是絕食行動後的一切發生得很突然，同學們沒想到海內外的支持會這麼熱烈，因此也沒有作好接受大筆捐款的準備。此外，由於絕食期間，廣場情況特殊，人員流動快，再加上接受捐款的渠道很多，除北高聯外，各院校、絕食團、紅十字會等都有接受捐款，難免出現帳目交收未能對口和驗數等混亂情況。

他又說，在戒嚴令剛發出期間，由於形勢緊張，對募捐回來的款項無法即時清點，又怕經費給搜去及搶走，於是一袋袋不知數額的捐款都分散給同學保管，這裏可能有些捐款對不上了，亦難保證所有管錢的都沒有貪污，但也只能憑大家的良心，希望海內外各界人士諒解當時的混亂情況。他表示，現時財政部整頓後，基本上已可以慢慢控制財務及捐款管理的情況，他們有決心把財政工作搞好，將來會採取公開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審查他們的財政情況，亦肯定會定期公開收支的報告。

對財務問題的混亂，他深表歉意，因此他們會努力將財政部的組織健全化及系統化。不過，他亦擔心，由於北高聯在合法程序方面仍未獲官方承認，因此募捐得來的款額沒法在銀行開設帳號，亦



沒有政府批准在法律上具效力及承認的圖章，恐怕入數會有麻煩及人們沒信心交來捐款。同時，他表示已作最壞打算，相信政府會逐步整肅工人、各界人士及北高聯，財政部將首當其衝，被視為非法銀行收納捐款或者在經費方面先加以控制，隨時可以指控檢舉和取締北高聯後被迫解散了他說，財政部現時全部收入約有一百萬元人民幣，其中只剩下三十多萬元可以使用。他相信這筆款項可以維持幾天的開支，將來應該會收到更多捐款。他希望現時各院校的捐款最好能夠由北高聯負責作為統一的組織機構，然後海外亦設立各自的統一機構，方便消息的聯繫及捐款的轉移。如果北高聯的組織完善化後，便將會在良好的基礎下成立全國高校自治聯合會，統一處理民主基金的帳目，以便為民運的持久戰做好準備。

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繼正式將「民主女神」塑像樹立在天安門正中央後，宣布下一步行動將會建議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掛上三幅大布條，中間寫上「民主、自由」，兩旁分別掛「全民追求民主」及「不自由、毋寧死」。北高聯計劃在近一、兩日內就掛上布條，以表示不撤離天安門廣場的決心及堅定的立場。現時，北高聯正進行廣場整頓工作，及勸喻外省同學離開，改善廣場衛生情況。

現階段，北高聯會在天安門廣場開始將各地赴京同學的外高聯自治會統合組織起來，然後會成立全國高聯。不過，由於外地高聯表現頗不成熟，所以北京各高校將會派同學到外省協助他們把組織搞好。

學生運動的進展已踏入準備作長期抗戰的奮鬥，因為運動本身將會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和世界和平，所以北高聯希望世界各地發動輿論，對付李鵬政府。此外，有迹象顯示，曾積極為保護學生而走上街頭的北京市民已開始有內部整肅的問題出現，據悉從上級下達的黑名單中，總共已有五百人榜上有名。北高聯表示，學生和市民會堅決地站在同一戰線上，當市民有難，學生肯定會保護及聲援市民。據知，昨凌晨時分有三名工人被公安抓去，所以北高聯立即派

請願隊及敢死隊前往聲援。

另一方面，北高聯又呼籲海外捐款請盡量以提供實際物資為主，同時在天安門廣場上已成立海外資源聯誼會，負責接待海外赴京人士及處理帶來物資的管理。由於來自香港及台灣的捐款頗多，他們呼籲香港及台灣最好能各自成立分會，有專人負責統一捐款，與海外資源聯誼會保持消息方面的聯繫。他們又表示，捐款切不可通過紅十字會轉交，最好能以物資轉運來京，現時北高聯最欠缺的物資主要是：無線電話機、對講機、傳真機、影印機、油印機、文具用品、綜合維他命丸和雞精等補品、即食麵、罐頭食品、音響器材、喇叭、汽車及摩托車等，希望海外捐款能以購買此等物資，轉運到北京給他們實質的幫忙。

6·2

北高聯接收香港捐款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

來自香港的四名基督教教會代表，昨已把部份捐款交付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財務部接收，款項為四萬七千二百四十元，兌換為外匯券折算為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元，作為提供給北高聯的一般經費，希望能幫助該組織作宣傳、印刷等內部開支費用。

現時，北高聯的財政狀況還可應付，財務部負責人陸明霞表示，在宣傳方面支出最大，每日開支約一萬元，分配各院校印發傳單，製作橫額等。他又表示，北高聯的宣傳部現在可以說是一無所有，最急需的影印機、打印機也欠缺。由於經費不足，供宣傳部的日常費用只能批一千多元。



事實上，各院校都有不少撥款申請，唯經費有限不能全部滿足。同時，各院校都有學生往外地作宣傳，他們的開支很大，但財務部只能給同學一百五十元的旅費津貼，銀根非常緊張，所以同學只能靠沿途募捐來展開工作。

6·4

六四清場後在北京的最後一篇報導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按：有關六月二日四名知識分子的絕食及六月三日軍隊入城的風聲鶴唳的幾篇採訪報導稿件已經散佚。原因是六月四日凌晨，不少記者返回北京飯店時遭到軍警搜身毆打和充公菲林，同事擔心軍管後巡房抄查，連累北京支持民運的人士，故匆匆在酒店廁所內將採訪稿等資料和學生傳單等重要文件全部燒燬。這是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清場後，傳真回報館的最後一篇北京採訪報導

北京「六四」大屠殺，一夜的瘋狂殺戮後，早上仍不斷有亂槍掃射，市面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工作在五時半左右完成，靜坐學生在有序撤離過程中，戒嚴部隊沒有放過任何驅趕學生的機會，見人就用木棍揮打。學生被迫撤退到天安門廣場的南面出口，學生本來想繼續遊行，但戒嚴部隊不斷湧進，令學生完全沒有退路，不少同學還在這個時候被打死。

從昨晚起，北京市四周都有發生過軍民衝突，晚上十時軍事博物館有軍隊用衝鋒槍射殺學生和市民。凌晨一時許，西單有衝突和死傷；二時，公安局也有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與市民對峙；二時許，坦克車從西邊駛往長安街，裝甲車則從東邊駛往天安門。

記者在天安門廣場上了解實況，在一時許天安門南面不斷有訊號彈發放；接近二時，四周槍聲不絕；二時許，戒嚴部隊出動，向廣場邁去，不斷有開槍事件，亂槍掃射後有人倒下受傷死亡。

三時十五分，知識界四人絕食代表發出緊急呼籲，叫解放軍放下武器，不能繼續屠殺人民，又表示願與軍隊指揮談判，勸服學生有秩序地撤離廣場。他們表示現在不能再流血了。

四時正，天安門廣場全部街燈被截斷電源，廣播台希望學生冷靜，堅守廣場，原地靜坐，隨後播放國際歌。

四時二十五分，群眾聲援隊進入廣場，齊喊「中國人站起來」。

四時二十七分，侯德健代表絕食團懇請學生不要留在廣場，他表示這場運動已取得大勝利，他相信廣場上的所有人都是民族精英，亦不怕死。但他希望大家死也要死得有價值，所以他們跟解放軍談判了，希望不再有流血，同意全場學生、市民都撤離，因為戒嚴部隊一定要在清晨必須清理廣場。

他勸喻同學和市民往南面撤退，又表示，他們會等到廣場上的人都撤走後，才最後離開。其他三位絕食者劉曉波、高新和周舵都表示同意這決定。

四時三十分，天安門的街燈全都重亮了。工人自治會一位常委也在廣播上發言，表示同學、市民傷亡無數，軍隊毫無人性的，不能再存幻想及作無謂犧牲，希望同學保留革命力量，撤離廣場。

四時四十五分，一批戒嚴部隊進入廣場中央，折斷學生旗幟



及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軍隊不斷有開槍，同學齊喊：「不可還手」。市民群眾則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軍隊佔領紀念碑後，不斷槍擊廣播台的喇叭，子彈射中紀念碑發出火花，市民喊：「不可打紀念碑」。

四時五十分，學生開始自紀念碑撤退，一批批很有秩序地離開。戒嚴部隊肆意地破壞紀念碑前的帳篷和布條橫額，而且不斷還有開槍。

五時，坦克車從外圍往裏面駛進，輾毀廣場上的所有帳幕，也不理會帳幕內是否有人。坦克車後面，再有一大批戒嚴部隊向前衝，學生已開始不斷後退。

五時十分，來不及趕快撤走的同學被擠，秩序混亂，有學生被推倒，接近戒嚴部隊的同學全部遭殃，部份軍隊在地上拾起搭帳篷的木棍向同學揮打，毫不留情，很多同學被打流血跌倒。

五時二十分，大多數廣場學生都已撤到歷史博物館的左側，一直向南面走，有女同學瘋狂地喊叫，受不了這恐怖的悲劇場面；有同學不願離去，寧願死守。

五時二十五分，撤走的同學手持旗幟，打算向南遊行。

五時三十三分，有另一批戒嚴部隊從南面前門口一帶湧出來，向天安門方向跑去，市民很憤怒地向軍隊擲石塊。

五時五十分，前門東大街尾的地鐵站，再有不少部隊湧上來執行戒嚴任務。

至八時為止，往南撤的同學無路可跑，四周都有軍隊堵住，有同學被槍傷及死亡。



北京 西長安街 人民大會堂側 2009年6月3日傍晚

劫後記憶

5·20 絕食請願

5·21 疲勞轟炸

5·22 堅持留守

5·23 風起雲湧

6·2-6·3 解放軍進城

6·4 廣場死寂





散佚的手稿

按：在北京採訪期間，最緊張的日子就是戒嚴令下四出訪尋軍車和坦克，真正體會到人民的力量，北京市民的愛國熱情、堅持和平非暴力，發揮超乎尋常的道德勇氣。可惜這段剎那光輝瞬間消逝，雖說人民不會忘記，但是中國的歷史依然留白了這一頁，未被好好記載。廿年來，我是有份刻意隱藏和埋沒所見所聞，未敢遺忘，不想回憶，因為我擔心一旦曝光之後，善良的北京市民和學生會繼續受到迫害和拘捕禁錮。在國家殺人機器瘋狂肆虐嚴厲監控，社會新聞嚴密封鎖的扼殺壓制之下，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抵擋坦克是英雄還是暴徒？揭露真相是義行還是幫兇？我們懷著無止盡的悲哀傷痛，真的不曉得怎樣解構這黑幕下的人類暴行。劫後殘留記憶寫下這幾篇斷章，草於八九年七月期間，原稿已散佚，黑暗絕處永留空白，光明在望填補遺缺。

北京首都戒嚴令下三天的見聞

5·20

兵臨城下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接到同學來電報訊，說北京城郊有大軍迫近，市民紛紛出來堵軍車，廣場暫無威脅。絕食同學已經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我即時決定要出外了解軍車入城情況，此刻，電視台剛播出了李鵬在黨政軍大會上發表的講話。

我沒來得及細聽講話內容，馬上跑出北京飯店，急速步行到天安門廣場，見廣場東北面路口有公安包圍，學生手拉手保衛廣場。我問學生糾察隊員這批公安有否採取行動，學生回說他們剛駐守這兒沒多久便被包圍，沒發生衝突。

這時長安街上有一個傻漢坐在地上，拿出幾本書來，對我說他自己是一個瘋子，他所唸的這些書是沒有人懂的。我想，他並不瘋癲，但我沒時間跟他聊，繼續上路。找到一輛三輪車，我對車伕說，想去城郊看軍車。據學生提供的消息，最早發現軍車的地方是公主墳。車伕答應載我前去，沿途掛在長安街上的喇叭，正在播放李鵬的講話，有伴隨鼓掌聲時，市民群眾都報以噓聲回應。

北京的夜晚特別冷，我前天着涼了，咳得很厲害，入夜在馬路迎着風前行，我更感寒意，不住打顫。很多市民騎著自行車也趕去看軍車，有靠近來到我坐的三輪車旁跟我交談，問我是否相信李鵬的講話，我回說：我是支持學生的，學生沒有搞動亂，但李鵬這番講話將會製造動亂。那市民說：聽到廣播之後，知道事情發展不妙，會去堵截軍車，保護學生。車伕送我到公主墳後，極力保護我，載我到處拍照。這處共停泊了十多二十部軍車，由於相機自動閃燈，馬上引起群眾注意，他們要求我公開身份，我坦白說自己是記者，他們馬上圍攏過來，向我報告情況，說：軍車晚上已駛到，停在路口一直沒行動，有一位老人馬上跑去廣場通風報信，現在市民自發出來設置路障，圍堵軍車，跟士兵說話，解釋北京情況。

街上群情洶湧的市民們對我保證，他們會徹夜不眠地守在這裏，不許軍隊有任何行動，又希望我馬上趕回去把消息向外發佈，要為他們向全世界呼籲，以人道主義來聲援學生，因為現中共政府



才是一小撮，但絕食同學生命危在旦夕，極需要國際社會給予救助。北京市民非常齊心，而且很善良，我深深見識到這股強大的人民力量在極短時間內自動凝聚起來。很多老伯伯、老婆婆聲淚俱下向年青的解放軍苦苦規勸。包圍軍車和聚攏著士兵的老百姓對我說，這些都是二十七軍從外面調來的，城郊外圍還有許多軍隊準備入城，人數起碼過萬。他們又說，三十八軍因為明白和了解北京情況，早已被撤走了。這些從外面調派過來的二十七軍，對北京情況毫不了解，而且中央封鎖消息，向軍人洗腦，因此老百姓要向他們解釋，不要被政府愚弄。群眾成功堵截軍車，被困在車上的士兵毫無動靜，也不準備執行任務，於是圍觀的市民親切地對士兵說：「你們不要對付學生，不要成為歷史罪人。」他們一邊勸說，一邊唱國際歌，又大喊「反對軍管」的口號。

我在熱心的群眾中間左穿右插到處觀察，更攀高正面對著軍車上的士兵，近距離拍了幾張照片，他們有點不悅，亦對市民絮絮不休的勸說訓話似不耐煩，幸好對我給他們拍照沒有抗議禁阻。市民說：他們有軍令，是不能隨便與市民說話的。我本想直接訪問這些士兵，也不太不好意思，只向一位樣貌較為良善可親的士兵說，請你回答我問題，點頭示意即可，他沒反應。我鼓起勇氣再問：「你們是不是停在這裏，今天晚上不會採取任何行動，對嗎？」他竟然向我點頭，我不敢為難他，很滿意地下來走開了。

車伕到處找我，但我也發現他很投入地周圍查問情況，後來載我離開時，經過一部軍車，他停下來大聲向解放軍說：「四十年前，你們入京城，我們歡迎你們；但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不歡迎你們入京城，要把你們趕走！」

聽說城外還有很多軍車，車伕想再送我去更遠的地方，但愈遠就愈靜，而且也愈來愈寒冷，沿途遇不上市民問路，走到好一段距離，才碰到一名騎自行車的人，問有否見到軍車，他說沒有，我覺得很凍，受不了，叫車伕調頭回去。

走了差不多個多小時，回程經過天安門廣場，圍坐在廣場最外圍的學生說，同學們對李鵬講話極表不滿，因為這番講話連續播出了多遍，現在同學決定繼續絕食，而且是全體留守在廣場上的二十二萬同學都集體絕食，同學們不可以，也不能在這時候撤離廣場，必須繼續堅持下去。他們又對我說，剛才有廣播宣佈，說北大的共產黨員和教職工共二十人，現在到台上參加絕食抗議。這夜，全城民眾驚醒過來，很多車隊滿載學生前來聲援，又有摩托車隊及自行車隊前來，聲勢浩大的跑到街頭保衛廣場學生。

返抵飯店，還來得及在截稿前發消息，在門前還碰到看熱鬧的服務員，他收集了所有路過市民的消息，把北京四面軍車圍城的地點，寫在我的筆記簿上：東面的城樓和雙井，南面的木樨地，西面的公主墳到五棵松，北面的黃村都有發現軍車。他說，市民情緒非常高漲，不過亦有軍人對市民說：「我是中國人，不會做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我只是來執行任務。」

發稿後，我又趕去廣場看望同學，他們絕食七天了，政府還派軍隊來對付他們，我們很擔心，恐怕這政府會卑鄙到在學生最軟弱無力的時候，進行殘暴的驅趕行動。

來到廣場外圍，聲援的同學和市民都提高警覺，李鵬政府擺出最拙劣的姿態來威嚇學生，但學生最大的抗議行動也只不過是以絕食自殘方式向政府施壓。有必要派出軍隊入城鎮壓嗎？同學說，絕食同學已經將絕食車的車胎放氣，提防政府強行把他們載走。還有學生表示，北京的西山發電廠被切斷電源，地鐵全面停駛，令軍隊無法通過地鐵渠道入城。

我與北京資深老記者卓然同行。我第一次獨自外出視察軍車去向時，他已叮囑我千萬要小心。這回我們一起走到廣場同學的中間，有一名中年人對我們報消息，表示趙紫陽現時地位不保，他是趙的近身助理，擔任翻譯工作，他把五月四日至今，趙紫陽失勢的經過告訴我們，叫我們趕快回去報導。據他透露，趙現時處境十分



危險。

我和卓然這幾天通宵工作，奔波勞頓，大家都非常疲累了。我建議分頭行事，著他先回飯店寫稿，向報館發報消息，然後休息。而我還想繼續留在廣場，與絕食同學一起，了解他們的感受。

廣場學生嚴陣以待，心灰意冷了，看清楚這個政府的真面目，還能有何所求呢？同學在廣場的「學運之聲」廣播中表示，絕食是不值得的，叫同學們應該停止絕食，不應再為如此腐敗的政府領導層，繼續殘害自己。廣場又強調動亂非人民、學生造成的，而是政府這一小撮人的腐化所導致。同學們又號召全市總罷工。

絕食已經進入第八天了，他們承認不能再這樣下去，要堅持爭取鬥爭的最後勝利。市民自動組織起來堵截軍車，人民力量多麼崇高偉大，經歷了一夜苦鬥，天色漸白，「學運之聲」播放了《快樂頌》，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樂中最後合唱的樂章，頌讚普世實現大同理想。我記得吾爾開希說他崇拜貝多芬，最喜歡這段合唱，此刻我在現場，浸染這種歡樂、激情、希望和勝利的氛圍中，深信人民的力量最終會爭取到應享的權利，不容無理侵犯、剝奪、欺凌和打壓。學生並非孤軍作戰，他們得到全民支持，力量不斷壯大。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已推向時代的浪尖起伏澎湃、讓置身其中的市民群眾心神盪漾。看來李鵬講話起不了恐嚇作用，反而激起千萬民心，哪怕這糊塗蟲張牙舞爪，都不及人民力量的壯觀偉大？

回飯店稍作休息，幾小時後馬上出動再到城外視察軍隊去向。跟同事各自分頭走不同方向，我去雙井一帶採訪。飯店外面沒有出租車，只見很多車伕拉着三輪車，一名年青車伕問我想去哪兒？我說，要去看軍車，他很樂意並熱心想載我去。在危難當前的北京城，人民所關心的不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國家大事，所以街頭上每一個人都很好奇地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即將會發生什麼事？他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長安街上，有軍用直昇機在空中飛過，朝天安門廣場那兒去，

車伕遞了一張學生派發的傳單給我。他說：「這等事，還出動軍隊、軍用直昇機，在北京城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到達雙井，有一排排的軍車，都給人群圍住，學生們坐在軍車前面，當我舉起相機拍照時，有同學上前制止我，我跟他們理論，說：「你們不是要記者把真相向全世界發佈的嗎？」一位女同學溫和地向我解釋：「我們第一時間趕到這兒來，才剛剛與軍隊建立關係，正在努力勸服軍兵不要鎮壓學生，請你跟我們合作，不要給他們拍照，因為軍兵要服從上級命令的，假如軍部司令從照片中發現有解放軍兵們跟學生建立良好關係，會對被拍攝下來個別的士兵十分不利的。」

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要保護士兵。在軍隊還未出手之前，學生已處處為他們着想。我合作地收起相機，跟着學生和群眾在一排排軍車之間了解情況。那場面實在感人至極，北京學生和群眾都捧來很多食物，包點、饅頭、汽水、冰棒等等，勸守在軍車上面的士兵吃。

領頭軍車上的士兵都接過了，他們敢吃人民送過來的食物，於是學生不斷勸其他士兵，說：「前面的軍人已經吃了，你們都吃吧！」軍車上的士兵盛情難卻，都肯接過食物，還對學生說：「謝謝你們！」

軍民關係像魚水情般，我看見有內地記者拿起照相機拍照沒人前來阻止，我便同樣拿出相機來，不計較角度，但求能保留和拍下這段動人光景的美好影像。此情此景，有不少同學甚至已經爬進軍車內，與士兵們一起讀新聞報導，又有同學拿着幾張報紙和傳單前來派發，給士兵朗讀廣場學生印發的傳單內容，解說這場學生運動到底所為何事。

學生說：這些士兵在偏遠的地區調派來京，只許讀四二六社論，不許讀報紙或聽電台廣播，對北京發生什麼事一無所知，當一



些士兵略知少許真相後都感動起來。由於軍民能如此融洽相處，加深了我的印象，滿有信心以為政府的鎮壓只是擺姿勢而已！

車伕和我四處問路，看看哪兒還有軍車，市民對我說，在呼家樓有三百輛坦克車。但是我們去到呼家樓沒有發現什麼，只看到有群眾圍觀，他們說，軍車在上午十時已經撤走了，他們又說發現有「罐車」，是屬於二十七軍的。（按：後來我回港跟記者朋友提起，才知道這些所謂「罐車」，其實是配備有地對空飛彈的先進裝甲軍用專車。）

回程路上，看見學生一批批坐著卡車，聽到號召前來協助維持北京市面的社會秩序，他們群起組織宣傳隊、糾察隊、敢死隊，趕到城郊有軍車的地方遊說士兵，他們還沿途大喊：「李鵬下台」的口號。這場面振奮人心，北京各個主要街道的路口，都有大型巴士橫放阻路，其中有一路口還放着「軍民一家」的攔路牌。

我叫車伕帶我去一家飯店打長途電話回港報料，替我接通長途電話的女服務員，關切地想了解外面情況，她告訴我，聽到消息在勁松這地方也有軍車進駐。於是，車伕很費力踏三輪車把我送到勁松一帶，卻沒什麼發現，然後再問路過市民，哪兒有坦克？有人說是在東高地。車伕說，那地方很遠路的，要花很長時間，我也不勉強要他載我去，決定返回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

戒嚴令下的北京城，變得蕭條、淒涼、冷清，店舖都關上門，馬路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各式交通工具，只見稀疏零落的有人踏着自行車來往，如果沒有三輪車的話，我們就只得躲在飯店裏，沒法外出採訪。

想找地方吃午飯，但餐館都關門了。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仍有許多聲援的群眾，到處人山人海。有一個學生拿着一塊寫上「廣場缺水」的字牌，聲嘶力竭的喊：「請市民送水，請市民送水。」沒多久，真的看見有市民用木板車送一桶桶水到天安門廣場去。

頒布戒嚴令的消息，我在早上出發前略有所聞，但未經證實。後來找餐館時，在街上聽到廣播，分別有國務院及北京市政府發出的三道戒嚴令通知，由即日十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施，以維持首都秩序正常，而第三號的戒嚴令，則明文規定及限制記者在首都實施戒嚴的地區內進行採訪活動。

在戒嚴令下，我發現這奇怪的現象，北京市民竟然完全沒把軍管當作一回事，仍然熙來攘往地湧到廣場聲援學生，更全民皆兵親自走去城郊攔堵軍車，不讓解放軍進城。

車伕送我去雙井尋找軍車時，沿途看到一位老婆婆給自行車撞倒，很多人都會上前扶她，抱起她到路旁守護，發揮守望相助精神，市民心中雖對城內不安定的政局抱怨，但是矛頭清清楚楚一律指向李鵬政府。

在大街馬路的天橋底下，很多傳單張貼在牆上，引來途人圍觀，其中一張標語說要打持久戰，叫大家好好準備應戰。忽然，有騎自行車的市民相撞，並且爭吵起來，路過的途人見狀馬上勸說：「現在國難當頭，你們還吵什麼？要罵就罵李鵬好啦，咱們北京人別傷和氣吧！」他們果真不好意思互相對罵了！

車伕對我說，北京人很暴躁的，要是平日，他們肯定會大罵一場，甚至動粗而大打出手的，現在非常自制，都覺得沒有什麼好吵了，無謂自己人製造事端惹出亂事！

北京首次頒下戒嚴令，我們不知道究竟將會亂成怎麼個樣子，但是市內連日來的百萬人大遊行，秩序井然，我對北京人很有信心，他們不會亂，而且很明白政府就是想要抓他們的亂子，有了把柄才好對付，所以全民克制，寧願忍，哪怕是受委屈了，哪怕是不想見到的意外發生了，都心平氣和地盡力協調化解，以免出現小小的亂子後，被加以擴大至政府有機可乘，製造一發不可收拾的暴動。

抵達天安門廣場，絕食車還在，同學們都說停止了絕食，要好



好跟這個政府鬥，身體不能在這時候垮下來的。是的，他們早就應該轉變鬥爭的方向，為這個政府死是不值得的，更何況現政權採取軍事武力要把學生推向死地呢！

人民蔑視這個無能的政府，絕食同學也對這個橫蠻政府徹底失望。堂堂一個國家，無視人民發揮高尚的愛國情操，不理學生感動人心的絕食死諫，莫名其妙採取戒嚴措施恐嚇自己國民，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走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第三層，港澳在京留學生正發表聲明，支持及聲援北京大學生。一個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工人代表向我透露，工自聯才正式成立，他們已號召到二千五百名工人罷工，他們來廣場是要保護學生，聲援學生和維護學生利益。他又說，今天上班的工人不多，應該有九成工人罷工了。

他表示，不承認全國總工會，雖然總工會有二十二萬工人，而工自聯只得一千五百人，且大多數是個體戶、投資戶和各行各業的人，談不上發動罷工的問題，但他相信全體罷工是會發生，特別是如果政府採取鎮壓，則全體工人總罷工則必然發生，他深信現在醒覺過來的人愈來愈多了。又說，政府隨時會鎮壓，南苑機場附近來了四十部坦克，都被群眾堵住了。他說，看到軍車上面運載有催淚瓦斯，估計政府會動用來鎮壓人民，這是建國四十年以來首次的。

離開天安門廣場，看到長安街上有告急標語，說晚間政府會派空援兵到廣場驅散學生，所以呼籲北京市民出來保衛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的學生。

深沉的夜裏，氣氛愈見緊張，從飯店走去廣場，市面寂靜淒冷，令人寒慄，感到鎮壓即將會到來。我沒有跟同事洗偉強道別，但他已托人送我一張紙條，寫上：「萬事小心，若軍隊出現，要快步離開人群，我們要見證，而不是犧牲。想念你。 - 洗」

其實，我沒有思考過在戒嚴令下繼續採訪，到底應該如何抉擇

做見證或者犧牲；我沒有強烈的使命感，只是想到廣場找相熟的同學見面，希望跟他們一起，不想離開，我要和他們一起親身經歷這歷史性的關鍵時刻。

大約八時許吧！我到廣場的絕食車上想找馬少方，找不到。遇上電影學院的一位女同學，她曾說過要給我寫一篇關於對學運看法的文章，她覺得這樣鬧下去不好。雖然她有參加絕食，但認為學生的表現不對。

事情一夜之間出現很大的變化。在絕食車上，她說，李鵬作了這番講話後，形勢完全不同了，她的看法也要改變，她想不出到底學生應該採取什麼策略，局面既已發展到頒布戒嚴令和出動軍隊，實在很難說不堅持下去的了。

她絕食了很多天，下午恢復進食流質的食物。她說，同學們的體力可慢慢恢復過來。我實在很累，聲音沙啞了，不住的咳嗽，便留在絕食車上休息，小睡一會。不知道這夜將會怎樣，同學都說，軍隊肯定今晚八點要開進來的，他們都準備好在廣場靜坐，即使軍隊要來，也會「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九時許，沒法好好地睡，稍稍休息過後，應該可以捱過這夜吧！這時在絕食團廣播車上傳來消息，說軍隊會用催淚瓦斯來鎮壓學生，又說凌晨零時軍隊就會動手。這種充滿緊張作戰氣氛的廣播，令我膽顫心驚，不寒而慄，對天安門廣場生起了恐懼畏怯。同學在廣場上派口罩，又儲備了水桶等用來撲熄催淚瓦斯，有一個好心的同學送我一個口罩，好幾個夜裏，我都掛住這個白布口罩，這是當時我們用來防範催淚瓦斯鎮壓的唯一備戰物品。

北京市民很支持學生，他們日以繼夜的到天安門廣場保護學生，不斷有遊行隊伍到來，民眾的聲援令我深刻感受到，這股強大的人民力量定可抵擋軍隊進城，人民會勝利的，學生受到保護，我是不應該害怕的。



離開絕食車之後，看到一隊工人聲援隊伍經過，他們喊口號，拉橫額。其中一位工人被我截停下來，我問他來到這兒將會做甚麼？他說有成千上萬的工人、市民在外面包圍廣場，他們整夜都不會離開，又表示政府已經慘無人道了。工人無法忍受，若學生捱不住，就要前來保護學生，他說：「咱們工人有力量。」他們一眾工人遊行時高喊的口號，都是「打倒李鵬」、「李鵬下台」之類。

工人遊行隊伍過後，又見學生敢死隊出動了，他們匆匆忙忙的吃過麵包，隨即拿着「敢死隊」的旗號，出發去有軍隊的地方，充當前線準備對陣。我問一個學生：「你們敢死隊不怕死嗎？」那學生說：「我不怕死，我們是要到軍隊前面，首先解決問題的第一批人。」他們大無畏的精神，令我疑幻疑真，他們是鬧着玩的嗎？這裏真的變成戰場一樣，要聽從總指揮的命令，雖然廣場上有好幾個指揮部，又有各自的廣播，但是他們好像各有所屬和任務，即時就組織了一批敢死隊出來迎戰對敵。廣場由絕食開始，慢慢從傷員的兵營變成戰場的大後方，亦是敵人進犯入侵的主要陣地，他們緊守崗位，保衛廣場成為大家的共同目標，這得來不易的戰略據點是敵人最想奪回的，所以沒有人願意放棄及撤退。

絕食團的廣播車又傳來消息，說有便衣人物混進學生當中，這些便衣人物從香山出發，打着民族學院的旗幟，打算混進學生當中搗亂，令人以為學生意見分歧，一旦廣場出現學生間自亂陣腳的局面以後，空戰隊就有理由出動，來這裏平暴和維持秩序。

我終於在學生靜坐的隊伍中找到馬少方，他說自己的身體狀況還好，曾經累倒過，但比起吾爾開希，他的健康就好多了。他表示，吾爾開希有心肌炎，病倒了很遍；而王丹則最強，一次也沒有累倒過。

他又對我說，已經停止絕食了，他有很多話想說，想召開一次個人記者會，交代絕食始末。他認為有很多問題要澄清，例如絕食期間，沒有一個同學死，只有兩人比較危險，但沒有生命危險，不

能胡亂傳出去說有同學死，這不對的呀！

我跟他一起坐在靜坐的隊伍中，廣場內草木皆兵，絕食團的廣播車不斷發放很多外面傳來的消息，要大家作好準備。什麼時候，軍隊動手了，就要去迎戰；又呼籲同學警覺突如其來的局勢轉變。

馬少方說，他已經給點名了，但覺得這個晚上，可能不會有事發生。我也想問，捱過今天以後，明天會怎樣？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李鵬是不是傻瓜，他會不會發動鎮壓？這是關乎成敗之仗，一場艱辛的角力，也是一場沒完沒了的戰事，學生已經沒有退路了，學生只是抱有歷史的使命感，選擇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這樣做已經給政府留有餘地的了。

他對我說：「勝利是屬於人民的，是屬於爭取民主的人。」但現在，大家都充滿恐懼、焦慮，不知道政府會怎樣處理學生。每個院校同學們都有自己靜坐集合的地方，他們留守在自己的院校的旗幟下互相照應。有一位比較成熟的學生領袖走過來對馬少方說：「你是比較危險的，肯定會被抓去，待會兒有什麼事情發生，軍隊一旦進來，你得馬上走進絕食車裏面，我們會安排把你送走。」

馬少方說：「我不走，我要一直坐在這裏。」那同學說：「你要聽我的，你要先走，不能留。」然後他望一望，看見我手上拿著錄音機，說：「你是記者嗎？你也要跟他一起走，這裏沒你的事幹，不能留。」

可我不覺得有什麼危險，尤其是我知道外圍有三十多萬市民、工人十分齊心的攔路和堵截軍車，誓死保護廣場學生，我感到留守在天安門廣場反而是最安全的。所以，我當時的反應是，沒必要這麼緊張，好像打仗的，犯不著捕風捉影，像驚弓之鳥呢？

沒多久，程真來跟馬少方商量事宜，說好什麼時候若離開廣場，便到什麼地點再會合。程真是真性情的人，長得很漂亮，她是吾爾開希的秘書，我一直以為她是開希的女朋友。程真對馬少方



說：「開希進了醫院很多次，好像又跑回來，在廣場的救傷站養傷。」於是程真、馬少方準備去看開希，問我去不去，我馬上跟著去。

走過簡陋的帳篷，經過睡在地上的學生，小心翼翼的怕踏到他們。廣場到處都是垃圾，還有破瓶留在地上，是挺不好走的路，抵達救傷站，找不到開希，醫生也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我們只好走回去，程回自己北師大的同學堆裏，我還是跟着馬少方坐到電影學院的同學堆中，很疲累，抱膝小休了一會兒。馬少方躺在地上，說：「要狠狠的睡一下了！」廣場上度過這麼多個日日夜夜，他真的很久沒好好睡了。

在電影學院的同學堆中，遇見陳寶珣，原來他每晚都在廣場睡，他很自在的蓋好棉被席地而睡，他表示自己是作為不介入的學生身份參與學運，而我則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麼身份？我多想自己不是作為一名香港記者來到這兒參與學運，因為有了這個身份，我便要自覺地刻意要與學生保持距離，雖然非常關心和支持他們，但是我始終不能成為學運成員的一分子。儘管我選擇跟着他們，日夜守候在廣場，等待着即將會發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和他們一樣那麼勇敢，也不清楚怎樣才叫做作見證或者犧牲！

他們都睡着了以後，我便走開了，我又去看長安街上的人群，去感受人民的力量，想感染人民身上流露出來的大無畏勇氣，以壯大自己的膽量，天不怕，地不怕，他們敢出來，我就不用懼怕了。

無數的人都以不眠的夜來對抗可能發生的鎮壓，有很多聲援隊伍，有摩托車隊，有自行車隊。摩托車隊風馳電掣的威震四方，自行車隊很齊心的勇往直前，熱血民眾，大喊口號：「北京市民，聯合起來，保衛學生，義不容辭。」

這是一個壯烈的革命時代，這麼多的人群，這麼大的場面，全都是自發的，誰也不能說誰主導或佔領這個革命聖地。每一個跑到

北京來朝聖的外省學生，每一個不眠不休來保衛廣場的首都工人，每一個誓死來堵截軍車的廣大民眾，每一個勇敢站在最前線的聲援同學，每一個留守在天安門廣場抗爭了七天的絕食同學，還有每一個曾經到來聲援、遊行和維持首都秩序的各式人等，都是中華民族最光輝、最偉大和最典型的公民代表。我不能不說，我受到這股人民力量和為正義而戰的精神感染以後，無可選擇地想永遠跟着他們一塊兒，哪怕是要犧牲也是絕對值得的。

5·21

疲勞轟炸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緊張完一晚了，清晨時分一到，大家都舒了一口氣。沒事了，不來鎮壓了，大伙兒又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去。從天安門廣場回北京飯店大約十分鐘的步行路程，這段日子來回走路多了，腳痛生水泡。我忘記什麼時候開始，很依賴北京人，隨手截停自行車，對好心的北京市民或學生說：「我累極了，可否給我坐車尾，就在北京飯店停便可以了。」他們毫不猶疑的載我去，很感激他們；當他們知道我是記者，也很感激我，說：「謝謝你，要為我們好好報導。」

這就像他們托我予重任般，我跟他們已連成一起，我不僅僅是為了要好好報導北京新聞，我全然投入當中，除了要站穩記者的崗位外，也責無旁貸地要把所見所聞的真實情況記錄下來，為了未來。

睡到上午十點，又趕去天安門，已有好多個夜晚是這麼奔波勞



頓的。北京飯店的服務員見我咳得那麼厲害，聲啞的說不出話來，總關切的說：「別太辛苦了！要好好休息。」我說：「不行的，學生比我還辛苦得多呢！」

踏出北京飯店，看到大白天街上的人，還是朝天安門方向走，市民的負擔也挺重啊！日間上街的市民人數比晚間少，他們有些上班去，有些要休息去，晚間一定會再來廣場看看。有幾部軍用直昇機在天安門及北京市上空來回盤旋，圍繞天安門巡幾圈後便離開。聽到消息，有三列火車滿載軍人抵達北京站，其中一列火車上的軍人給說服，原車軍人全撤走了。

廣場上有三個廣播台及指揮部。絕食車附近有一部廣播車，是絕食團指揮部的，車外掛上幾個大喇叭，作宣傳行動及發號命令用。另外，聲援在廣場外圍升旗禮的旗桿附近設有廣播站，應該是臨時搭起一個帳篷作為總指揮部營地。至於天安門廣場的總指揮部，則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東南角，發佈最多消息，而且是整個廣場的中心點，掌握學運發展的命脈。

我出示記者證可以很輕易通過同學手拉手圍住的不同關卡，一直往紀念碑第三層，聽「學運之聲」廣播，同學們好像已經爭取到初步的勝利，最緊張的時刻都捱過了，這時候體現到人民萬歲、民主萬歲的精神。廣場也常傳來一些報捷的消息。說北京城的群眾已成功攔住官兵了，現在那裏有軍隊，群眾就往那裏跑，軍隊根本沒法前進，都給老百姓勸走了。

另外，告急的消息同樣頻傳，說復興橋、六里橋形勢危急，要動員更多同學援救；又有消息說，軍隊已各自分散為小分隊，打算鑽進胡同裏面埋伏。

很多香港記者一早就守候在紀念碑第三層，收聽學生廣播的最新消息。有電視台記者聽說，中央電視台給軍管了，召開過全體黨員大會之後，全體職工都要執行中央命令，人造衛星傳送新聞的途

徑已被截斷。香港兩家電視台的新聞片只能靠飛機航運，要第一時間趕到機場委托出境的香港旅客把錄影帶送返香港，有些旅客擔心過關有問題，但絕大多數旅客都願意幫忙。我們報館記者，也經常委托他們運送菲林回港的。

記者行家說，同學們在廣場中散佈很多未能證實的消息，不知可靠程度有多大，其中一則說：「戒嚴令頒布了二十四小時之後，還沒有真正實施戒嚴，這個國家是不獲承認的。」還有消息說：「北京市對外交通已被全部切斷，學生沒法跟偏遠郊區堵截軍車的同學聯繫，建議考慮利用信鴿傳遞消息。」又有一段消息說：「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的部份黨員軍人，發了一封致全體解放軍書，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議，罷免李鵬和鄧小平，理由是反對李鵬下令實施軍事鎮壓，而且李鵬的專制獨裁不能代表軍隊，罷免李鵬之後可以由趙紫陽擔任總理職位。」

更爆炸性的消息是：「萬里返京，提前召開人大會議，又稱萬里表態認為下達戒嚴令是違憲的，徐向前將軍亦反對政府戒嚴，表示如果誰下令鎮壓，他就要將那人抓去打靶。現在連鄧穎超也表態，說如果政府鎮壓學生，她就會退黨。」

關於高層官員的表態和動向，同學之間都趕忙謄抄、打字、油印出來，所以在廣場都會有機會接到他們的一些聲明傳單，政治鬥爭的形勢分析和內部討論文件。

學生重申這是和平請願，堅持抗爭到底。日間，廣場少了市民前來聲援，同學說，各部門機關要求工人如常上班返工，不過交通工具嚴重不足，所以市內秩序混亂。但是這種混亂並不等如動亂，學生即使筋疲力盡，也要確保北京市面盡快回復正常運作，這裏絕對不能出現動亂。

現在，廣場上少了很多學生糾察隊，他們都趕去城外各處堵截軍車；絕食期間守在生命線上保護同學的醫護人員也輕鬆了；很



多聲援的同學、市民紛紛走上街頭合力維持首都秩序，他們聲嘶力竭、疲憊不堪。

有一則告急的消息從廣播中傳來，說六里橋有軍警乘機煽動，造成衝突傷及學生，據說有四十五名學生受傷了。坐在旁邊的一名學生很激動的說：「要以暴易暴了，希望市民能繼續支持學生。」沒多久，又傳來廣播消息說，解放軍會派代表來與學生商量，了解市面和廣場情況，軍隊有可能會撤退。

之後，氣氛又緊張過來，說前門有軍隊從地鐵衝出來；接著又通報復興門告急；還有軍隊從北京火車站進城，不過有二千多名解放軍兵自行撤退了。

學生罵這是流氓政府，說這偽政府製造動亂。聽到這番議論時，我頗覺痛快。然後又聽到廣播，嚴斥這偽政權，說：「根據憲法，李鵬無權頒佈戒嚴令，這是違憲的行為。」

那時，我問一位唸法律系的同學，他不是那麼激進，頭腦比較清醒，他不贊成絕食，但通宵留守廣場靜坐，聲援同學。他經常提供很多參考消息給我，都是比較確實和可靠的。他對我說，很認真翻閱中共憲法第八十六條，總理無權頒佈全國性的戒嚴，但是若在危急情況下，他有權在省、市局部地區實施戒嚴，所以並不違憲。

有聲援隊伍來到廣場，他們說：「有良心的公民都應該說話了。」有消息傳來：「民族飯店的一名廚師，已去參加工人敢死隊。」同學說，早前發現有武警二師的人成功混進學生群中，北高聯已經偵查到，但尚未採取行動，只嚴陣以待。另有消息說，民族學院有四十名聯絡員離開廣場，超過二十四小時後還未回來，不知發生什麼事。

此外，海淀區的學生糾察隊已經在各個出口把守，恐怕政府派兵來軍管學校。同時，為防軍隊到來抄家搜集證據，有同學已經返回學校，將這段日子印發的宣傳單張海報等一律燒毀掉。他們的政

治觸覺特別敏感，懂得及時燒毀檔案文件以免日後成為罪證。

午飯後，我決定去六里橋視察軍車動靜，也想證實一下是否真的發生了軍民與學生的衝突事件。沒刻意找出租車，由於市面交通癱瘓，三輪車成為唯一最易找，亦是最能到處穿插，不怕攔擋軍車路阻的便捷交通工具。

找到一位中年車伕，沿著長安街朝西去六里橋，途中沒看見交通警察，自行車、汽車及行人都聽從學生糾察在街道上的指揮，維持良好秩序，民心所向，學生運動拓大為民主運動。

在新華門前，曾有絕水同學及政法大學老師聲援團在這地留守，現在掛上了新的橫額，包括有：「政府已自絕於人民，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鬥爭到底。」、「召開人大，罷免李鵬，昏庸無能，流氓無賴。」、「中國危急，全國人民，行動起來。」等標語。

抵達六里橋時，見有兩部公共汽車被橫堵在大街路口，有大批群眾圍住軍車，在橋底的牆上有標語：「子弟兵要覺醒」、「這不是動亂」。

軍隊來去的路給堵住了，軍民之間並沒有發生衝突。相反，群眾和學生都走進斗篷軍車內，或者到司機位旁邊跟軍兵交談、繼續遊說。他們給水、給吃的，暑熱天氣，同學還給軍兵送上冰棒，然後親切有禮的對解放軍解釋學生處境危險，以及政府措施無理。

市民努力幫腔遊說軍兵，喊的口號是：「人民軍隊，熱愛人民」，又規勸說：「你們不能來對付學生的，老百姓全都支持學生的。」

我問市民有沒有發生過衝突及軍隊打人事件？市民說，軍隊沒有打人，應該是防暴警察打人吧！聽說有二至三百名武警見人就打，但這些軍隊兩日兩夜呆在這裏，政府沒給糧食補給，也沒有照應他們，都是人民給他們吃喝的，所以他們開始理解學生，只是軍



人始終要服從命令，不過據估計軍隊也不想用槍來對付老百姓的。

我問市民，估計今晚軍隊會否出動？市民說：「誰也說不定軍隊何時出動，但無論如何，這種膠著狀態會僵持下去的。假如軍隊真的出動，我們會躺在地上，不給軍車駛走。」

圍觀的市民還扶我站在欄杆上拍攝軍車，在一部小包車上，軍人吃罐頭糧食，突然間有軍官緊張地把一名暈倒了的士兵扶上車，他中暑了。市民說：「應該送他去醫院，哎！辛苦了。」另一市民又說：「他們受不了北京市日間炎熱，夜間寒冷的天氣變化，守在這裏兩日兩夜，沒有棉被和糧食補給，身體不弄壞才怪呢！」

一名老婦見軍人暈倒昏迷，怪可憐、狼狽的，還見其他軍官急救時的神情，挺焦急、忙亂的，她竟哭喊起來，說：「快送院救治，好慘啊！當官的為何不好好照顧當兵的？當兵的挺苦啊！」

軍民魚水情的場面，都不陌生，大家互相體諒，沒有衝突，怎會用槍來對付人民？人民子弟兵能幹得出來嗎？我無法想像，只覺士兵們沒有惡形惡相、喊打喊殺的，要怪就怪這政府為何調派重兵到北京城來，據說起碼有二十萬大軍殺到，而來到城外就給人民重重圍困，可是政府卻沒有為軍人的基本食宿作好周詳的安排和考慮。到底赴京有何任務呢？連士兵、軍官也說不出來，道理何在？

離開六里橋之後，向路過的學生打聽是否在哪個地方發現軍車去向？同學透露，在木樨地的軍事博物館後面。車伕送我到路口，有兩部被戳破車胎的公共汽車堵住主要路口，我自己走進內巷找，發現有大約四十部軍車集中一起，還有八部糧車，有炊具可弄餐的，極有可能是一團解放軍部隊的大本營。

我大概是黃昏時分到達，解放軍正忙於準備晚飯，幾個人一起，有洗菜的、有揉麵團的，學生伴隨著解放軍一起有說有笑的煮飯燒菜，我偷偷拍了些照片，覺得這地方環境比其他幾個地方優越，至低限度這些軍兵有自己做的熱糧吃的。

老實說，戒嚴令下有不許記者採訪的規定，但我毫不戒懼，沒理會有關禁令了。走進軍隊布防重地，好像是總部，而不是遊兵散將的軍營，我不敢放肆，偷偷拍照，不給解放軍看到。但我大膽走進去，跨過圍欄時，又無人來阻止，直到我拍了好幾張照片後，才有學生走上前問我到底是誰，有市民提醒他須要提防，也得小心保護像我這等外來的陌生人。

我對那學生坦白說自己是香港記者，他大方地說自己是學生糾察隊隊長，問我想知道什麼？我說，想採訪及了解一下解放軍和學生之間的關係如何，有沒有衝突？他說：「好！我可以告訴你。」

然後他們覺得停在軍隊駐紮的營地內傾談不太好，便帶我走到圍欄外面，但邊走邊拿著手提式小喇叭召喚周圍的同學和市民們齊集起來，說：「有一位香港記者前來採訪，現在我們就要告訴她，請大家都一起來聽。」

於是，一大堆人群圍攏過來，我真沒料想到會是這麼大的陣容，好像這不是做一般採訪，而是要作出重要的宣佈。圍住我和隊長前面的人群非常合作地，前排自動自覺的坐下，後排較遠的站著，紛紛湧過來聽取報告和接受我的採訪。

那學生隊長叫我先介紹自己，把喇叭提到我嘴邊，我心驚膽怯地面對著群眾，受不了自己竟然一下子要由記者身份變成被訪者，並在眾目睽睽之下成為備受矚目的焦點人物？！

學生問我採訪內容和想知道些什麼？我們就這樣拿著喇叭對著人群展開這次訪問，我硬著頭皮即時發問，非常尷尬。我發現面前的群眾，似乎有內地記者混進來，還不斷給我拍照，但願這人不是便衣公安或者特工間諜。我心裏發毛的暗想，這趟糟透極了，已經違反戒嚴令了，竟膽敢公然在群眾面前採訪，更給照相，行動曝光了，怎麼辦呢？不過，現下採訪的現場又真的完全沒有危險，群眾熱情地歡迎我到來採訪報導，不時鼓掌如雷，又留心細聽。我多想



這所謂的戒嚴令是無效的，假如軍民能同心合力對付這無能的、不負責任的政府，該多好啊！

我信心十足，勇氣可嘉的進行這次公開的採訪，接受訪問的學生糾察隊隊長解釋說：五月十九日晚，他們發現公主墳有軍隊後便派學生前來聲援，途中發現這個地方有另一支軍隊設營，於是臨時召集三十名糾察隊到來，一直留守此地，由於沒能跟廣場總部溝通聯繫，所以沒派增援的糾察隊來調班。

他說，已與解放軍之間逐漸取得信任，雙方關係良好，沒有發生衝突。不過，他剛收到未經證實的消息，說有一小撮不法份子搞分裂，他們會展開調查，了解事實。

至於有否發生過軍民衝突事件，他說，六里橋有一名女學生被武警所駕的汽車輾傷腳，公安又用盾牌和警棍毆打了部分學生，但學生完全能做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原則，到底受傷人數有多少？他說，尚未收到總指揮部傳來消息。我問他是否知道這些解放軍駐紮這兒的任務是什麼？他說，學生糾察和市民百姓跟解放軍交談時，曾問過他們，他們回答說是調派來此值勤的。

他說，學生糾察和市民群眾們不會查探解放軍將會執行什麼任務，也不會知道何時採取行動的，因為這是軍事上高度機密的情報。但是，由於天安門廣場還有四至五十萬學生靜坐請願，糾察隊有責任來此了解情況，假如軍隊真的出動駛往天安門，學生和市民就會用自己的身軀阻擋軍車。

這糾察隊長鬥志昂揚的，很懂得鼓動群眾情緒，一問一答的時候，他會將喇叭遞向群眾，反問他們：「假如軍隊出動，我們會怎樣？」市民齊聲回答說：「我們絕不會讓軍車駛走，會躺在地上抵擋！」

糾察隊長補充說：「我們是堅持採取和平非暴力的請願，我們在這裏有責任保護天安門廣場上的同學，我們會手拉手阻止解放軍

前進，絕不會後退的。」

不擔心解放軍會強行粗暴對待學生嗎？

他說：「現在學生與解放軍的關係非常好，中午還一起燒菜煮飯，同桌共膳。這裏的解放軍糧食算是補給充足，市民、學生把募捐所得的錢，買些香煙及日用品等補充物資轉送給解放軍。其實，這裏的解放軍十分了解學生的，部分軍人在利用休息時間走到城內大街上觀察，體認市民的呼聲及人民的力量呢。」

他說無法估計解放軍晚間會否接到命令出動，但市民和學生會竭盡所能合力聯手攔阻。在木樨地這隊解放軍，跟分散在街頭給堵在路旁的部隊最大分別，是軍部卡車有連同炊具的糧車，營地自成一角，雖守衛並不森嚴，但也絕非一般部隊，所以我問糾察隊長這兒是不是解放軍總指揮或大本營？他說，這個他並不清楚，但是據三名學生糾察隊員在附近偵察發現，這個營地有電台通訊設備，不過沒法斷言是否就是總部。

他又說，這些士兵被調派來京前，嚴禁閱報、看電視及讀新聞的，對北京學運全不知情，奉命調派來值勤，連將會有何任務也不知道。同學很努力向他們講述學生請願經過，希望他們不會被政府一面倒的蒙騙。

戒嚴令下完成這類採訪，覺得很刺激，一方面無懼禁止記者採訪的明文規定，另一方面是可以自由採訪而毫無威脅。北京始終是首都，人民質素很高，是全國及全世界的焦點，不會動亂，也應該不會像西藏那樣遭到血腥鎮壓吧！

我帶著樂觀亢奮的心情四處犯禁，實地採訪，無視所謂的戒嚴令。三輪車伏樂意載我到處找軍車時，他會保護著我的。在愛國的大前提下，北京所見的人都一條心，不欺騙、不奸狡，也不猜疑，保家衛土，盡力而為。

回程途中，見飛虎隊奔馳，市民鼓掌歡迎，再見直昇機在上空



飛過，市民慨嘆：「又來了，整天轉來轉去，幹嘛？」我深受北京人激昂意志和民心熱血所薰陶感染，強烈地感覺到這真是一場偉大的革命現場，公民與學生發揮了人性光輝的一面，我對時局莫名其妙的恐懼感一下子消失了！

回到飯店，氣氛反而緊張起來，我很開心告訴阿洗在外面採訪的遭遇，他說：「小心呀！不要去得太盡。」我沒理會他的勸告，可能他知道我已經太投入了。

晚上，港澳台的新聞媒體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如何進行採訪，要確保在京記者的安全。我中途退席，很疲累，喝了咳藥水，藥力發作，周身酸痛乏力，昏昏欲睡。我回房間休息，對自己說，深夜一定要外出，要保留力氣支撐下去。

這是狼來了的第二夜，收到廣場傳來消息，說形勢嚴峻，中央領導已作出三點決定：（一）最遲在凌晨五時開始對學生鎮壓；（二）北京監獄已被騰空，有足夠的囚室關禁二十萬學生；（三）清潔工人清晨前必須把天安門廣場打掃乾淨。

這兩晚，鎮壓消息頻傳，真折磨人。好像如臨大敵，勢將流血，香港記者決定聯群出動，不搶獨家消息，要彼此照應。如果我想一個人自己去廣場的話，是會給責備的。

香港記者將分三批行事，設立臨時資料中心通傳和收集來自北京各界的消息，然後統一新聞資訊再向各自報館發佈。基本原則是記者人身安全第一，必須發揮群體合作精神。

為了解最新消息，電視機一直開著，中央聯播新聞公開闢謠，指有些人在天安門廣場、各所高校及大街小巷散播謠言，目的是製造動亂，希望市民提高警惕，認清挑起動亂者的陰險。

中央電視台更引述徐向前的一段講話，表示軍隊絕非針對學生而來，亦不願發生流血事件。澄清解放軍部隊只是執行戒嚴任務，為了恢復首都正常秩序，呼籲市民別輕信謠言，又希望同學盡快復

課，理智地協助政府遏止事態惡化。

基於此項有關鎮壓行動的謠言，科技大學七名學生去信向聶榮臻要求接見及澄清，中央電視台引述了聶的講話，表示關於李鵬總理作出的決定，指學生在搞叛亂，要鎮壓二十萬學生，並騰空各大監獄，以及清潔工人必須凌晨五時清掃廣場的消息都是謠傳。

5·22

堅持留守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體力過度透支，這陣子我無懼軍管鎮壓，卻擔心自己體弱昏倒。連續幾個日夜的緊張焦慮，我精神暈倦，呆滯恍惚，身心疲勞，痠痛無力，感覺身不由己，沉重迷茫，惶惑暈眩，別真的病倒啊！

實在沒法安靜休息，惦念著廣場，決定再去通宵守夜。香港記者大夥兒出發，都從大門出飯店的，我習慣在西門爬過欄杆跳出去，想避過一些監視跟蹤的耳目。在長安街找自行車，一青年肯停車載我，交談過後才知道他並非學生，而是內地記者。

到廣場，我們出示證件之後，經過幾重糾察關卡，到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廣場總指揮部，聽取透過喇叭發出的緊急呼籲：「若學生市民與解放軍對峙，必須堅持和平非暴力，不還手、不反抗。我們並非一小撮，正義在人民的一邊，北京沒有發生動亂。同學們，切勿喊出過激口號，軍兵不明真相，應避免發生誤會。」

這時，「學運之聲」的喇叭在嘈雜的背景聲發出一段沙啞的宣



布撤退的廣播，吾爾開希代表北高聯發言，建議廣場學生撤退，因為形勢嚴峻，戒嚴部隊即將會到廣場鎮壓，學運失敗之後，學生領袖將會被捕，所以他希望同學們一起撤去使館區靜坐，保存實力。

撤退的消息十分震撼，廣場同學鼓噪起來，議論紛紛。紀念碑東側其他院校的廣播台即時否定這項建議，高喊：「絕不撤退，絕不投降。」發言的同學說：「一定要堅持下去，有四百萬的市民支持，絕不能撤。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休，假如我們撤到使館區，只會給政府找到借口。」

有一位曾絕食七天的女學生說：「我剛才返回廣場時，看到很多市民都起來行動，群眾在街頭演講，北京老百姓會保護我們的。為了人民，為了國家，絕不能撤。假如我們撤到使館區，就只能保護廣場上靜坐的人，但外面很多攔截軍車的學生和市民可怎樣？我們絕不能撤。」

廣場一片混亂，吾爾開希個人倉卒的決定，渙散了全體留在廣場上的同學的士氣和鬥志，北高聯的代表立即透過「學運之聲」的廣播，聲明有關撤或留問題尚未討論，請各院校委派代表到紀念碑進行民主表決。後來，廣播強調目前形勢並不危急，請大家保持安定，不要爭論。

北高聯的常委王超華以堅定的聲音發表講話，平伏廣場同學的情緒，她說北高聯並沒有作出撤退的決定，請大家保持安靜和鎮定。表決進行時，廣播不斷向在場同學解釋，沒有作過撤退的決定，剛才關於撤退的發言只是個人意見，不代表北高聯，請保持安定。

聽說，吾爾開希因過度激動，給抬走了。我對吾爾開希再度表現盲目的個人英雄主義感到非常失望。我直覺認為撤退是卑劣的行為，而且去使館區靜坐是極不理智的。軍隊未到，廣場學生已匆忙撤退，勢必出現更難掌握的混亂場面，說不定軍隊正好借機到來鎮

壓，更何況使館區比廣場更加敏感，是受國際法保護的外交重點地方。捨廣場公共空間而闖入外國使節禁區，是罪加一等的嚴重搗亂行為。更何況，成千上萬的學生和市民已經守在前線，以身軀攔擋軍車，怎麼可能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已身處安全的大後方，竟為個人的安危而撤退，放棄集體的民主抗爭運動，這說得通嗎？

表決應該完了，見程真和馬少方離開，程真看見我，流著淚的說，吾爾開希是對的。我叫她振作，要繼續鬥爭，不要哭。她留了一個簽名在我的筆記簿上面，告知軍隊會來，囑我四時前一定要撤，不要留在廣場。

她和馬沒多說話就離開了。廣播繼續呼籲同學要冷靜，原地坐下，說軍隊不會進入廣場，請大家不要慌張。之後，人民解放軍的指戰員更向廣場上的同學和市民講話，請大家注意，要安定、克制下來，任何事態若發展下來，造成混亂，就會有可能採取行動，強行戒嚴。他保證，如果大家能夠鎮靜，保持良好秩序，部隊是不會採取任何暴力行動。

附近來了些遊行隊伍，大喊：「不許進場，反對戒嚴」的口號。廣播又叫大家保持安靜，並請群眾一起唱國際歌。接近四時半了，沒有發生甚麼危急事情，也沒發現軍隊有任何異動。廣場喇叭傳出廣場學生高喊的集體誓言：「我們宣誓，無論發生任何情況，我們誓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共存亡。我們一定堅持到底，我們不會退縮。」然後廣場全體同學又跟從學生領袖的帶領齊喊口號：「為了祖國，為了明天，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休，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換取共和國更美好的明天。」

充滿激情的宣誓把廣場混亂不安的局面平伏過來，血氣方剛的大學生抖擻精神，以激烈的鼓掌聲，重振士氣。有同學繼續在廣播中發言：「同學們，堅持到底，就是勝利，現在我們的運動不僅僅是大學生，而是全市人民和全國人民的鬥爭。同學們、市民同胞們，讓我們鬥爭到底罷。」



然後「學運之聲」廣播台又分別由女聲及男聲廣播，宣讀緊急關頭的聲明：「現在民運已經轉折到緊急關頭，我們會堅持鬥爭到底，與廣大學生、廣大市民共同獻身：（一）大家要維持秩序，緊守崗位；（二）堅持鬥爭到底；（三）堅持不撤離廣場。」

振奮人心的聲音一個接着一個，市民代表也發言了：「我們全體市民與你們同在，我們與你們並肩作戰到底，團結戰鬥，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勝利屬於正義，勝利屬於人民，人民萬歲，民主萬歲。」

最後王丹代表北高聯發言：「同學們，我是王丹。我代表北高聯宣佈，北高聯是代表廣大學生利益基礎上的一個團體組織，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個人名義作出任何決定。北高聯的決定是：今天我們絕不撤退，我們的信念是要堅持鬥爭到底，絕不退出廣場，誓與市民共存亡。我們的宣言是：為了中國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我們以我們的熱血和生命，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堅持鬥爭到底，絕不退出廣場，誓與人民共存亡。」

天快亮了，軍隊沒有入城闖進廣場，當然也沒來鎮壓學生。吾爾開希激動的宣佈撤退毀了他的聲望。不過，這場運動，學生並沒有把任何一個人視為領袖，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即使任何一個所謂的學生領袖，作出了明顯錯誤的決定，全體同學都會清醒地指出錯誤所在，並集體商議和決策應該如何堅持下去。

這夜，狼沒有來，又虛驚了一場，很大的折騰後，又平安地度過廣場上的這一個晚上，大家總算能夠鬆一口氣了。清晨，在絕食車上熟睡的學生，好像不知道晚上曾經有過激烈緊張的爭論，散開的同學有些爬上車頂靜坐，有些席地躺臥車底下面，在寧靜安然的氣氛中，有清潔工人到來清理垃圾，廣場真的很髒，很臭。

晨光曦微，廣場上、街道上的民眾，完成守夜，紛紛回家休息

了。我只能在早上睡幾個小時，醒來又趕著外出工作。先到天安門廣場，又見軍用直昇機在上空盤旋，投發傳單，呼籲學生盡快撤離廣場，表示還有許多渠道跟學生對話。學生湊熱鬧湧上前搶傳單，白色的單張在空中緩緩散落在廣場上每一個角落。同學搶過來後拿開來看，看完就揉成一團，說：「沒什麼好話。」

我拿不到傳單，看見有一張在絕食車的車頂上，請同學幫我取來，到手後也沒好好看一遍，繼續觀察北京市面的情況。街道的圍欄掛滿橫額布條，其中有一條是北京印染廠寫的，標語句子是：「毛有子上前線，周無子拚命幹，趙有子搞彩電，鄧有子搞募捐，人民有子誰管？」

把傳單帶返北京飯店，打算先傳真回報館。在飯店門前看到曾載我去看軍車的三輪車伕，他在等客，但又不接客。我上前跟他打個招呼，他像等到想要等的人，很高興的對我說：「小姐，我想載你去看坦克。」

這些天來，很多三輪車伕都在車上掛一個牌，說明義載學生。學生很受市民支持，而記者也很受市民尊重。我們都被感動了，本來我早就有打算再去雙井那邊看軍車動靜，由於市面的出租車已經局部恢復正常服務，我原可找相熟的出租車司機載我去遠一點的城郊，但看見車伕那麼熱心，又刻意等我，不好意思推卻，向同事交代一聲，買了些飲品，就隨他的三輪車去了。

三輪車緩慢地在街上走，北京城在戒嚴時期交通癱瘓，糧食物資供應不足，聽說搶購現象十分嚴重，尤其是鹽、油、蠟燭、火柴等必需品。我叫車伕順道看看市場有否搶購現象，經過一些大街小巷，發覺蕭條兩日的北京城，好像回復正常，商店開門營業，照舊有買賣，沒有出現搶購。

在天橋底的牆壁上，市民貼上標語：「疲累戰術，突然襲擊」、「你們在寫歷史」等字句。



到雙井，看不到有學生和軍車，都撤走了，不知到哪兒去？路口有些攔路的公共汽車，學生們把車廂內，當成糾察隊總部及宣傳隊的聯絡站。

問路人知否哪兒尚有軍車？有路人說：「東高地還有，而且是坦克。」問他有多遠，他說：「不遠，一個小時可以到吧！」

車伕的年紀應該有五十歲了，我問他是否想去，怕他辛苦。他說：「小姐，你想去，我一定會送你去。你看過坦克沒有，沒看過，我就載你去看。」

北京市日間天氣非常炎熱，烈日當空，我坐在有篷的座位內，而車伕則無遮擋地任由太陽照晒，還耗力地踏車，看到他汗流浹背，滲透了襯衣。見他口渴了，給他汽水，他說不解渴的。他停在路旁，去附近商店，請店主人給他開水。

從雙井到東高地，路程非常遠，由城市去到綠油油的市郊，車伕帶我到一間小店吃餃子。下車時，他叮囑我不要說自己是從香港來，更不要說是記者，他說：「你口音一聽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你說深圳來，去旅遊逛逛，人家會相信的。」

小店的主人和客人都在談論北京城出現軍隊的罕見現象，又說天安門廣場還有很多學生，都捱壞身體了。小店主人沒去看過學生，但很關心這件事。吃罷，車伕去問路，店主人說：「不遠，很快就到。」走了半個小時，車伕又停下來問路，路人說：「前面就是，沒多遠。」又半個小時，我坐在車上也疲倦和辛苦得睡著了。太陽好猛烈，車伕費力地踏車，說：「怎麼會不遠，卻還是未到？」

大概兩個多小時過去，又經過綠油油的田野，才到達一個小鎮，問了很多路人才找到這個有坦克的地方。

我拿起相機就想拍照，那麼辛苦才到，一定要多拍幾張。有同學來阻止我，我給他們看記者證，他們帶我去見隊長，說可以拍，

我就隨心所欲到處拍，拍的時候盡量避免對著同學的正面，怕給充公後，被極權政府拿著圖片認人對證，抓捕這些學生。

是的，我沒有這種採訪經驗，腦海浮現的是電影《布拉格之戀》（改編自昆德拉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某幾個鏡頭片段。蘇軍壓境，坦克走進街巷，女主角和途人所拍的照片被官員用作認人，多怕人啊！雖然戒嚴之後，我算是小心謹慎多了，但誰知道官員會否真的來抓人，說我違反戒嚴令，把照片拿走？雖然中外記者都不會錯過這次難得的北京採訪機會，不會放過任何場面和鏡頭。在極權政府一日沒正式採取嚴厲措施之前，我們都敢於放膽報導，無畏懼地追蹤尋訪，要把事實真相弄個清楚明白。

學生拉起布條掛在路邊一輛輛的軍車與軍車之間，當作臨時的帳篷，日夜守住，間或看過一隊同學來到，另一隊同學就撤走，原來他們採取了輪班制。同學們見我拿起相機想拍照，都舉起勝利手勢來，他們不怕被我攝進鏡頭，我便放心按下快門，他們說：「在這裏守了三日三夜了，軍隊沒什麼動靜。」

在東高地這裏，軍隊的斗篷車約有十多部，裝甲運兵車（我一直以為是坦克車）有四十部左右，我沒有仔細地四處巡察，但見人們在街上如常的來來往往，在軍車旁邊穿穿插插的通報消息，有些蹲在地上跟學生們討論民主運動抗爭的進展，有些詢問解放軍部隊最新的動向，他們對入城三天的戒嚴部隊停駐於此地已見怪不怪了。

我走到裝甲車前面探問這群學生，很佩服他們不眠不休圍困軍車，不屈不撓獻身勇擋坦克，想起吾爾開希說要撤離廣場，而這些同學在通訊設備極差，後援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只知堅持而不思後退，他們的精神確是可嘉可敬。

同學知道我是記者，完全沒有戒心地與我坦誠交談，我坐在他們中間，才知道他們正與一名年青的解放軍聊天，這解放軍有點害



羞，對我微笑並表示不介意我加入。

我問他們知不知道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他們說，消息傳得很慢，他們不太清楚。我告訴他們，天安門廣場裏面的同學每晚都很焦慮緊張，怕大軍會來鎮壓，昨晚有同學作出了撤退的決定，後來北高聯表決過後，清晨前全體學生宣誓絕不撤退，堅守廣場，誓與人民共存亡。同學聽罷，說：「廣場同學不能撤，廣場是鬥爭的象徵，是最後的防線，必須堅持到底才有希望。」他還拜託我，傳話給廣場同學們知道，他們在這裏堵軍車的人，一定不會讓軍車和坦克進城，一定會在這裏守住，坦克先要壓過他們，才可以前進，他們絕不會讓軍隊佔據廣場。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也愛上這群孩子，他們才是真正勇者。哪怕要他們犧牲，他們也在所不計，比起廣場上說要撤退的人偉大，為保衛廣場挺身而出，面對危難自願無條件地為國捐軀。

坐在旁邊的解放軍沒有說話，很沈默。我問學生，解放軍了解你們嗎？學生說：「解放軍跟我們的關係非常好，現在他們都不怕跟我們交談，有說有笑，他們本來對學運真相不了解，慢慢解釋清楚後，得到他們信任，還告訴我們，在五月十六日接到上級命令要調派進京，沒有說明將要執行什麼任務。換句話說，政府早已部署要派軍隊來對付我們，但五月十八日，李鵬還虛偽地與學生對話，多卑鄙啊！政府根本沒有誠意跟學生解決問題。」

我問旁邊的解放軍，假如上級發佈命令，要來對付學生，會執行任務殺害這些學生嗎？那解放軍說：「我們上級沒有說過要對付學生，我們也不會用槍口對著學生和人民的。」

我相信他說的是真心話，有良心的也不會不講道理對付這些善良的，沒有搞動亂的學生吧！事實上，《人民日報》也刊登了一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揮部所發的《告北京市民書》，解釋部隊來北京是執行戒嚴任務，為維護首都治安，恢復正常秩序，決不是對付

愛國學生的。此外還提到，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會嚴守紀律，並已開展了「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教育。

在京期間，風聲鶴唳，令人迷惑，軍隊若不是來對付學生，是來做什麼？為什麼要派二十萬大軍進城？還出動軍用坦克呢！對付學生根本毋須派遣那麼多解放軍和坦克部隊的。真的，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突如其來的首都戒嚴，遲遲還未動手的坦克壓城，內裏乾坤怎樣才能搞清楚？

我離開東高地之前，還繼續去拍坦克，見軍人從車頂，從車の後門進出。我又偷偷拍了幾個鏡頭，市民從門外窺望車內，對照起來很有趣。不過，車頂一名解放軍見到我，喝令不許拍照，我馬上收起照相機離開，那軍人還在罵我，我快步走開，怕惹麻煩，幸好他沒爬下車來抓我。車伕送我回飯店的路程似乎比去的時候短，可能因為我昏睡過來，沒有知覺。直到入城，經過天安門的時候，才曉得已經接近傍晚。

這晚，在豐台發生過警民衝突的事件，我和阿洗在廣場守夜的時候聽到這則消息，那是大喊狼來了的第三夜，我覺得廣場不會發生鎮壓和衝突事件，所以請阿洗陪我一起去豐台，了解一下前線學生怎樣保衛廣場？

我們截停摩托車風馳電掣地趕去，在六里橋仍然有軍車，市民組織起來行動，一夫當關，振臂高呼，說豐台衝突還未結束，大夥兒便馬上騎自行車趕去聲援。

抵達豐台西倉庫，群眾圍住門口，學生坐在前面維持秩序，又有一批從卡車下來的學生糾察隊前來協助聲援，群眾有些好奇觀望，有些情緒十分激動，學生要聲嘶力竭地叫大家後退，不要給學生幫倒忙，不要給政府有把柄，請大家合作，冷靜下來。

很多學生在無揚音器的情況下喊喚着群眾守秩序，嗓子喊得沙啞了，群眾很聽話，學生喊：「一、二，坐下」的時候，他們都乖



乖的蹲著，避免製造事端。

市民說，看見有軍車及部隊駛進西倉庫；另一市民說，受傷學生都在內面，學生代表現正與裏面的軍隊談判。又一市民說：「我們要來堵住軍車，我們知道在西倉庫裏面地底有一條秘密通道，可以一直走到人民大會堂的，若不堵住他們，就會給他們突破市民攔阻的防線，從地道攻入天安門廣場的了。」

由於場面混亂，很難確定衝突如何發生，事情經過是怎樣的，所以我找一個學生來詳細問清楚。那學生說：「衝突是在九時三十分左右發生的，那時有一大批群眾跟軍隊對峙，學生夾在軍隊和群眾之間，跪在地上不讓群眾前進，忽然間有一軍官大喊：『打！』，士兵就往前衝。於是學生馬上圍起來，手拉手擋成路障，群眾在後面往軍隊裏扔石塊，雙方大打出手，軍隊除下了皮帶，因為我們學生夾在衝突雙方的中間，所以群眾的石塊打在我們身上，軍隊的皮帶也打在我們身上。」

他又說，士兵大概有三百多人，群眾也挺多的，有好幾百人，學生也有一百多人。因為學生的宗旨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所以石塊及皮帶都落在他們身上時，很多同學都受傷了，有一位女同學的頭被打破，一位男同學的眼被打傷，都給送去醫院救治，然後有同學把士兵的頭盔搶過來，好留證據。此時，學生實在支持不住了，群眾都湧過來，官民雙方又再互相衝擊起來。

5·23

風起雲湧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在北京期間，天氣乾燥，日夜溫差大，我是病倒，但沒有臥床不起，最難受的是幾天以來都咳得很厲害，胸口心肺都感覺很痛。阿洗來京援助我，帶來的咳藥水，藥力很強，又有鎮靜安眠作用，可馬上止咳了，但卻手腳痠軟，全身乏力。服用第一口時，沒多久就頭暈眼花，以為自己病重，差點休克昏迷；第二天再服，發現有同樣反應，昏昏沉沉的，嚇得我不敢再吃藥，怕自己反應遲鈍，出外會不支倒下，被迫臥床休養。

我堅持每晚都要到天安門廣場探望學生。這夜，我在廣場碰到一個很可愛的青年學生，那時候氣氛仍然緊張，狼來了的戒備還不能解除。我坐在紀念碑東北側的矮欄上休息，這位青年穿白袍，自我介紹時說是醫科大學的學生，他見我不停的咳嗽，很關切的上前問候，說要帶我去救護站看醫生。

這學生很開朗，笑容滿面，我感激他的關懷，跟他去了救護站，醫生說我應該要多些休息，睡多一點，吃中藥才可以調理好身體。我對他說：「現在沒時間休息，也不能夠病倒呀！」他笑了，給我喉片及藥片，我跟那學生就走了。

我們回到紀念碑靜坐，談天說地，他說喜歡香港一些歌星，很天真活潑的一個孩子，沒跟我嚴肅地談論學運。後來，我想他給我留個名字，他說不喜歡這一套，沒有必要，又說自己常在這裏，我可以找到他的。

他的另一位同學聽我們交談，對我說：「他是怪人。」我問：「他有甚麼怪癖呀？」他阻止那同學說話，我笑他，他靦腆地容許那同學給我告狀，原來是告訴我，他是絕食的同學，不過中途回家，吃了一頓飯之後，又跑回來決定做救護人員，但期間卻一頓飯也沒吃，他是又做救護工作，又絕食的學生。

我問他為甚麼要這樣做？他說：「我來絕食時覺得很有意思，後來覺得廣場亂得一塌糊塗，像你們記者不准進入進廣場採訪，我覺



得不應該嘛！所以我退出，回家了，吃了一頓飯後，覺得很對不起絕食的同学，心裏內疚，要懲罰自己，所以回來工作贖罪，也覺得可以繼續絕食。」

我很懷念這穿白袍的醫科學生，可惜他不肯給我留下聯絡辦法，也許他是對的，廣場上到處都有這純真的希望和情誼，留下美好印象，何須記下名字？

天開始亮的時候，我才回飯店休息。快抵達北京飯店時，有一少婦在街邊叫踏上歸途的市民不要回家，說危機沒過，學生還需要保護。政府在學生最衰弱的時候才會進侵，這是常理，市民比學生還焦急，怕回家休息了，政府才出動軍隊。

經街婦這般勸喻，有些踏自行車的會掉頭回去。那時候忽然間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燈被關掉了，遇上突如其來不尋常的漆黑暗夜，我心裏忽然生了一陣莫名恐懼，於是也趕緊返回廣場，後來才知道天亮前街燈熄滅是正常例行的。

毛像被潑污後刮起風沙驟雨

睡了一個早上，下午才去天安門廣場。各地來京聲援的同學越來越多，市民自發組織的遊行隊伍仍集結在長安街上逡巡。

在天安門城樓下，人聲鼎沸，像發生了甚麼騷亂事件，大家都湊過去看熱鬧。我擠進人群中，只見有群學生手拉手開路一直向前行，中間有幾個同學合力捉住一個人，押他向前行。

我隨即拍了一張照片，想攀過欄杆看清楚一點，怎料一輛木板車駛過，把我夾在欄杆和木板車之間，我爬越欄杆時，板車夾住我的腳趾，痛得我大叫，也嚇得那木板車夫連忙扶我坐在板車上休息，頻說對不起。

知道他不是有意，只怪自己倒霉，休息了一會才一拐一拐地



5月23日喻東岳向毛像潑墨後，被學生誤作破壞者逮住。後無辜被重判，獄中遭受虐待

走，實在很痛，但也不能怪車夫的，圍觀的市民都好奇想知道到底這裏發生了甚麼事，秩序無法控制，我不想在人堆中再添混亂，逕直往廣場去採訪和追查剛才被抓走的人的情況。

在絕食車附近碰到一些同學，說剛才抓到三個便衣，裝扮跟學生模樣，頭帶紅布條，衣服都有簽名的，現在已送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去查問。

我趕去紀念碑時，見學生把這三個便衣圍住，向記者展示他們的身份證和工作證，其中一人是湖南《瀏陽日報》記者喻東岳，他們被學生審問時，說他們是十九日到達北京，認為應號召全國總動員來參與運動，又說是自己決定來此，對自己所幹的負責，喜歡帶他們往哪兒就哪兒。其後，知情的同學說，這三人用雞蛋、墨水投擲和潑向城樓上的毛像，被體育學院的糾察隊員在現場發現，把他們捉住，押來紀念碑總指揮部調查，現在還未明他們的具體動機何在。這三人後來被轉送往公安局。

同學猜疑這三人是便衣公安，別有用心地去進行破壞及挑釁，製造動亂因素，為了表明這事並非學生和市民指示的，在城樓下面



同學馬上掛起「這不是學生、人民幹的」白布橫額。

其實便衣公安混進學生堆中，真是輕而易舉。這時，很多外省同學到京，廣場的紀律已經越來越鬆懈，同學的作戰狀態亦漸漸消失。

在紀念碑的第三層上，有位新華社記者對我透露，已有便衣警察混進新華社，打算在報社實行軍管。我不認識這位記者，但是他很想告訴我實情，他們連向外間通電話也不方便，因為全都有偷聽。

我再去城樓看過究竟，長安街上遊行隊伍絡繹不絕，我抄了幾句市民高舉的橫額標語，例如：「公審李鵬」、「四海翻騰喚民主，五洲震蕩除李鵬。」、「消滅法西斯，自由屬於人民」、「現在到底誰怕誰？」、「抗議戒嚴，要求民主」、「李鵬 人民將審判你」、「要求人大罷免李鵬」、「反對暴政」等

下午三時許，為了再睹毛像如何給塗污，我走到城樓下，拿起傻瓜機照了兩張，立刻給在場維持秩序的同学阻止，他說：「這個不好照，人民不喜歡。」

剛想離開，就發現有官方人員利用雲梯，與城樓上的工作人員配合，把一塊綠色的帆布掛在毛像上，我偷拍了一兩張，明知會拍得不好，但總感到這很不尋常，尤其是官方人員的迅速反應，和人民的反常情結，對毛像好像很有感情。

一位外國人士不理會群眾的喝止，站在高處連拍了好幾張照片，馬上給群眾揪住及企圖毆打，還有人說要拆菲林，幸好有學生在場，協助調解後才得以脫身。群眾的一般反應是感到幹這等事是有辱國家和黨的象徵，毛澤東是神聖不可侵犯和玷污的，他無上權威的幽靈還影響著中國。一個學生對我嘆息地說：「無論是人民、學生和群眾，都絕不希望有此等亂事發生，尤其是怕有藉口給政府抓把柄。」

激進的行為藝術不受歡迎

我記起早前訪問趙少若，他很遺憾五四那天沒幹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他認為應該像打倒孔家店般把毛像栽下來，他曾說，崇拜過毛澤東，但現代中國不需要權威，而是需要民主，這些封建殘餘物必須打倒，才能喚醒人民。

我不知道潑墨一事，趙少若是否有份參與，但我卻感到這三人不一定是便衣公安，他們可能真的只想用自己的行動來表現出一種對抗權威的姿態，企圖喚醒人民。很明顯，現在的群眾不理解、不接受這一套，群眾在清醒和盲目之間徘徊遊移。更令人感到難以理解的是，當毛像被帆布全部覆蓋之後，北京城隨即由晴轉陰，並忽然間刮起大風沙，廣場籠罩著陰森恐怖的氣氛，像天譴般出現一片萬馬齊瘖的現象。好像有人暗中作法，呼風喚雨的把京城變得烏天黑地，並由沙塵暴轉為降下滂沱大雨，人們紛紛找地方躲避風沙和暴雨，這是毛澤東顯靈還是惡魔在作弄人？

難道毛像真的是挑釁不得？老天爺真的認為中國人注定要在毛澤東幽靈的威嚴下甘作順民？奇怪的巧合，竟把人引導到可笑的因果關係的迷信觀念中，我只希望這三人不會有事，趙少若別牽連在內。

幾日後，我碰到趙少若，他告訴我認識這三名潑雞蛋墨汁在毛像上的人，也曾勸他們不要這樣做，他們不聽。但是趙少若卻又想出另外有一件可以大幹一番的事可以做。他說，要把鄧少平、李鵬、楊尚昆的人頭像用油漆畫在長安街上。我問他有何用意？他說：「讓經過的車輛輾過他們，讓遊行的隊伍踐踏他們，挺有意思啊！」我聽他這主意，感到大樂。這時候，民主女神像剛完成，快要運來廣場，若加添這別出心裁的鄧李楊人頭倒地的畫像，實在叫人興奮。



趙少若的宏願沒有實現，原因是沒有經費，也極有可能是因為怕觸怒三名高層領導人，根本沒人會支持他。也幸好他沒幹這事，否則的話，下場跟那塗污毛像的三人一樣，肯定會被判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那三人（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在八九年的八月中被法院判決罪名成立，分別為終身監禁，十多二十年的監禁徒刑，多重的判罪啊！他們果真是觸怒了天庭麼？一幅無生命的毛像，竟因為潑墨宣泄情緒，膽敢向神權挑戰，便落得有這慘澹的牢獄之災，喪失了起碼的自由和人權。這真是一個沒有天理的國家，叫活在這國家裏的人民怎麼能活？剛剛蘇醒的公民意識，剛剛萌芽的民主種子，總是很快就被扼殺和摧毀！

香港傳來李鵬下台的消息

二十三日傍晚，經歷廣場剛刮過的一陣急風驟雨之後，回飯店聽說從香港報館得來的消息，說官方高層召開重大會議，又傳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接納李鵬辭職。聽到這傳聞，我們在北京通宵捱更工作的同事無不感到錯愕。本來李鵬辭職是喜訊，但這不是常理推測可以接受的，更何況這幾天盛傳趙紫陽辭職和遭到軟禁，從種種迹象顯示，趙失勢是更為可信的。

其實，只要簡單分析，再看表面迹象來判斷，這場高層權力鬥爭應該是李鵬穩坐其位，趙紫陽地位不保。據我觀察，趙紫陽在十九日清晨看望絕食學生時流淚，而李鵬晚間發表強硬的黨政軍講話，兩人的態度明顯有別。趙紫陽缺席高層會議，而且也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北京此間已盛傳趙被迫下台。

晚上，我們報館同事匯報北京的見聞，又向內地記者打探消息，歸納所得比較準確的訊息絕非李鵬下台的大喜訊，而是確定趙紫陽失勢，他被指反黨及搞分裂，我們要核實的消息是趙紫陽遭到罷免的正式官方通告，卻沒想到會來自香港傳來李鵬下台的謠傳。

另一方面，我們同事去城郊視察軍車佈防時，發現軍隊只是後撤，而並非撤退，而且在南苑機場還發現有很多新增的部隊乘坐民航飛機抵達北京，這是不可思議的。北京城完全未脫離危機，如果李鵬下台，固然是大家所盼望的，但是卻顯然內有古怪，至低限度我不相信這是事實，儘管我們都希望能成事實。

那晚最先向外發佈這消息的是香港商業電台，查問商台在京記者有關李鵬下台的消息可信性有多大，因為報館想發號外，要我們速報新聞，又說其他報社也趕緊印發號外，想大做文章。商台記者說，這則新聞是香港收到消息後，由在北京採訪的記者報播出街的，據知從香港獲得的消息來源十分可靠。

我知道箇中的內裏乾坤後，更覺得消息不可靠。之前已跟報館總編理論，希望他們不要陷害在北京仍執行採訪工作的記者，若亂發消息，會失信於讀者，也失信於北京學生和市民。我強調，若要發這則消息，必須說明消息來源的出處，引自商台或其他報社都可，千萬別說這是來自北京的某某記者採訪報導。

我想，我不能不據理力爭，在無法求證李鵬下台消息是否真確的情況下，我再三向報館說明我們採訪工作的難處，高層消息很難獲得，而且謠言、傳聞太多，必須要小心處理。

外省學生成為廣場新血

連日來，外省赴京的學生為數相當多，廣場上絕食同學及北京高校同學都已逐漸返回校園，廣場揚起來自外省高校的旗幟，同時他們像注入新血活化了廣場這學運心臟。外地赴京學生組成了自治聯合會，簡稱「外高聯」。

據一位外高聯的代表說，至五月二十三日，外高聯已有一百九十多所外地高校赴京學生參加這次學運，有二十所高校今日趕到，將會陸續還有更多學生會到北京來。



這位外高聯代表又說，外省新聞封鎖厲害，戒嚴期間，外省學生們完全沒有北京消息，而北京亦不知道外省發生甚麼事，即如武漢曾經發放過催淚瓦斯鎮壓學生，很多人都不知道。

關於撤離廣場，他說，同學們都曾經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辯，有認為應該撤，因為已經戒嚴三天了，拖下去不是辦法，市民都疲累了。現在北京市交通癱瘓，是政府不准開工及出車，牛奶、報紙、糧食等被切斷，老百姓和人民開始有怨言。除非現在政府採取行動鎮壓，市民肯定是會支持學生，但若單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要聲援廣場的學生已不容易了，更何況現在已經涉及政治鬥爭。他又說，主張及堅持不撤的認為應該把運動向全國推進及發展，可是現在停止了絕食，各地新聞被嚴格封鎖，運動的蔓延有阻滯，要向其他省市推動民運，只能堅守北京天安門廣場這中心命脈。

其實，學生在戒嚴第二天已打算撤退，凱旋地離開廣場並返回北京校園，好讓各省市赴京同學各自回家，把運動的火種撒向全國，這樣做才有意義。當時大部份同學表示應該作出撤退的準備，撤離後的廣場只剩下院校大旗及營幕，學生可以保留實力輪班制緊守廣場這個重要陣地。

他慨嘆吾爾開希急於宣布撤退的時候太過衝動，不夠冷靜，沒法讓群眾理智思考和討論，一下子把廣場秩序弄亂了，他已經第九次入院了。

6·2 - 6·3

解放軍進城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至三日

按：六月二日下午，侯德建、劉曉波、周舵、高新四君子在紀念碑前開始七十二小時絕食行動，發表《6·2 絕食宣言》，批評政府處理這次學運犯了連串錯誤，李鵬應引咎辭職。同時，亦批評學生財務混亂、物資浪費、有奪權意識。六月二日晚至六月三日，我的記憶空白，從筆記簿抄來一些有關軍隊進城的資料：「前門口有二百名持槍軍人，人民大會堂有二萬人，南池子有一千人，新華門有幾百，永定門及機場附近有一百輛軍車，四周都有軍人，從地下通道進來，歷史博物館和北京地鐵站都有發現部隊和軍警。」回港後，我向香港律師所作的證詞，隱約補白這段記憶。

六月二日晚，從廣播台聽到有軍車撞死三個人。我沒有去到現場，我去了珠市口，我在三個不同的地點，三個不同的時間，見到好幾隊便衣，十七、八歲的軍人，他們在徒步跑，他們流着汗，神色頗為慌張。市民一發現他們便圍着他們，他們的目的是往天安門，但士兵們不能前進，便坐在商店門口。

六月三日早上，我向東行，然後圍着北京城遊一週，在建國門看見有堵軍車，及在市郊見到空的軍車。我再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及與北高聯的同學傾談。獲悉新華門及六部口有衝突，我在傍晚四時左右到六部口，見到幾部被毀爛的汽車，有人走上汽車找殘餘物，地下有玻璃碎及磚頭，汽車包括小型巴士。之後我到新華門，沿途也見到破壞了的車輛，曾在新華門的學生已經離去，現場很多人，很亂。一群同學圍在軍隊前面維持秩序，有些人在游說新華門外的軍隊。

坐車回天安門，到人民大會堂西面，車行不動，我下車徒步前進。下午五時許，到人民大會堂西面，發現好幾千解放軍，坐滿路，人民大會堂的台階及路邊坐了很多市民及學生，圍着坐在路上



的軍人。我站在人民大會堂西面的一條巷觀察軍人。軍人沒什麼表情也沒惡意。我見到一個學生用棍拿着血衣，出示給解放軍看，說解放軍打學生，解放軍沒反應，市民唱國際歌，部份軍隊也唱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群眾也喊「李鵬下台」，當時見到外圍在騷亂，我跟着市民去人民大會堂大閘門口，聽說是軍人向外擲石，企圖挑起事端。下午六時左右，我到達人民大會堂大閘西門口，沿途我看見有些市民向人民大會堂內擲石頭，過了一段時間，我離開人民大會堂回北京飯店寫稿。

摘自《六四見証 四十八名目擊証人的報告》頁486
「六四見証」編輯委員會，一九九零年六月

6·4

廣場死寂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凌晨，我跟馬少方和梁二等約好，一起前往天安門廣場了解情況，我坐在他們騎來的自行車尾，從北京飯店一直去到天安門，前往廣場總指揮部的廣播台帳篷外，守衛的同學和我認識的同學都很樂意給我匯報一些外圍戰況，希望我能夠把消息往海外傳遞開去。同學說，六月三日晚上十時，戒嚴部隊持衝鋒槍在軍事博物館槍殺了一名姓李的北京師範學院女學生。有很多市民在衝突中受傷，有不少人已救不活了。他們估計打死打傷的已有好幾十人了，最可惡的是即使前往救人的，都給打死。

他又說，有很多軍隊都是持著槍刀向群眾衝過來進行廝殺的。

剛好有同學走過來向廣播台匯報，說凌晨零時二十分，有裝甲車載着很多持機關槍的軍兵，已駛往歷史博物館方向的路走去。廣場上不時聽到外圍傳來的槍聲，有學生對我說，剛才有一名英國大使館的參贊被打傷了。

凌晨零時四十分，守衛的同學表示，廣播台要向北側撤退了，因為軍隊已在四面八方把廣場全面包圍，可能會由東南側方向進軍。廣播台這時候呼籲同學手挽手，肩並肩作非暴力的對抗。廣播員又激動地說：「人民軍隊向祖國孩子開槍了，同學們哭喊吧！靜靜地喊吧！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新的一批年青的英雄們加進先烈的隊伍中。」

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又透過廣播發出了最後一道命令，強調他們會堅持和平、非暴力的方式保衛天安門。他們從始至終，都是和平請願，請全體留在天安門的同學和市民們，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作最後的致禮。廣播又呼籲同學要小心有便衣挑釁，請提高警惕。

凌晨一時，在廣場東南側不斷有信號彈向天安門方向發射，信號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空閃光，散落。

一時十分，一位從醫院跑回來的同學，身上沾滿了受傷同學的鮮血，氣急敗壞地表示已經有十七個同學死了。他懇求守衛的同學讓他進去廣播台帳篷內匯報，好讓他能及早通知廣播員不要再作「不還手、不反抗」的呼籲了。雖然這同學獲准進去，但他的意見卻沒被廣播台接納。

廣播台繼續廣播，堅持絕不撤退，又表示要以鮮血來對抗獨裁者的殘暴，並且要向歷史宣布他們會繼續進行這場不屈不撓的鬥爭，要呼喚新生命，讓同學們站起來。

前門口附近傳來一輪槍聲。接着有一位國家機關的領袖，通過廣播向學生說了些激勵的話：「沒有你們做不到的事情，沒有你



們達不到的目的。」他還向廣場上四位絕食者致意，又稱李鵬等一幫人已成歷史罪人，他希望士兵們不要做幫凶，不能對人民動用武力。

廣播台又傳達了來自市民的消息，表示在六里橋附近有幾部裝甲車衝過，把堵截軍車的三名市民壓死了。又宣布，防暴警察已經開實彈真槍，打死打傷很多人。不過，廣播也報導了可喜的消息，說有些軍兵已經倒戈了。

同學們聽到這消息，都十分振奮，士氣大增。廣播台還播出一段說話，表示海內外共有五千多人聲援學生，現在全體華人都團結起來了，希望廣場上的人一起齊唱「龍的傳人」。

廣場上的歌聲悲壯動人。而廣場上空仍不斷有信號彈發放詭異彩光，製造威嚇恐怖的戰場氣氛。

凌晨一時二十五分，我離開了廣播台，想了解廣場四周的情況。群眾已開始把汽水瓶拿出來做武器，不少糾察隊手持木棍，鐵管準備頑抗。剛好有一部公共汽車在人民大會堂門前的路口，從北到南經過，群眾發現車上有解放軍時，馬上用汽水瓶向車擲去。

遠離了廣播台，遙遙的還微弱地聽到廣播，勸喻人民子弟兵不要為政府效力，槍口是不能對著人民的。又呼籲同學和群眾，若手持武器，必須馬上放下，不能動武。

從人民大會堂那邊傳出來的官方喇叭，經常掩蓋了廣場上學生的廣播。官方喇叭的廣播重復又重復地在四周響亮揚起，是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宣布馬上要把天安門清場，廣播說：「天安門廣場是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的中心，是我國舉行政治性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是新中國的象徵。但是，現在天安門廣場已經成了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傳播謠言的市場。為了盡快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根據首都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第一號令，決定立即對天安門

廣場執行清場。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必須立即撤離現場。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告，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群眾，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然而，無論這段緊急通告的廣播如何宏亮地呼籲，不斷地重播，廣場上和外圍四周的學生、市民和人群仍是會聚攏一起，沒有散去，而且只要發現那裏軍隊，學生、市民、工人便都會往那裏跑，希望能盡最後一分力進行游說和圍堵。很多學生都留在廣場上不抗爭，不還手；也有很多學生和工人組成敢死隊，圍坐在軍隊面前，維持秩序，提防衝突爆發，挑起事端。

從外圍回到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和同學對我說，外圍的戒嚴部隊全部都是持槍。他們不斷地亂發槍，有橡皮子彈，也有實彈，但是兩種子彈都同樣會令人受傷、流血、致命。

有一位工人又對我說，從東面建國門來的坦克車壓死了四個人；從長安街東西兩路駛近的裝甲車，也撞死了很多人。他又說，前門口的警察已被打退三次，有軍車被推翻，群眾抓住和打傷了好些軍兵，但市民和同學已經很克制的了。其他市民也告訴我，不久前，有軍車經過時，群眾都是用石頭擲擊軍車的；又說，前門放了很多催淚彈驅散人群。

我環顧天安門廣場四周，對開的長安街已有好幾個火堆，有人燒車，亦有人把工人自治聯合會設在廣場西北角的總部帳篷都放火燒掉了。

一時五十一分，天安門的西側有戒嚴部隊及坦克車駛到，軍隊胡亂發槍，槍聲不絕於耳，群眾為閃避亂彈而往後逃，有人倒地，有人趕忙救援。我躲在廣場西北角的站崗亭後面避過槍林彈雨。

當時，我認識了一位中國《青年報》的男記者，他拿著微型錄



音機報導現場情況。槍聲一停，他立刻拖著我的手往後跑到較安全的地方避開流彈。

二時，群眾給無情無眼不斷亂發過來的子彈嚇怕了，槍聲一響就往後跑，但邊跑邊喊打；槍聲一停，便趁勢再往前衝。連續不斷的槍聲四起，最後我和群眾知道往前衝不管用，軍隊已經殺進來越來越迫近，只能往旁往後的地方躲避。一支精悍、無情的步兵，已在這個時候移進廣場的西北角，靜候進一步的行動。群眾在地上砸磚，找石頭，要向軍隊擲去。

沒多久，軍隊又從路口撤到馬路的一旁去。只見軍隊稍退一步，群眾就向前進一步，面對不絕於耳的槍聲響起，敢於再往前衝的人已明顯地減少了。同時，大批坦克車已列隊駛至路口。

二時十分，我失魂落魄地獨個兒走進廣場，看見天安門東面有裝甲車停放，同時又聽到該處傳來連續不絕的槍聲。官方清場的廣播仍向市民發出警告，定性首都發生的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必須鎮壓。

二時二十二分，我目擊了一個血流披面、受傷極重的學生被送到廣場中央的急救站，受傷同學血流如注，地面血漬斑斑，醫護人員初步急救及包紮傷口後，馬上把他送離廣場，由同學護送及抬去救護車。同學把廣場上的鋼牀拿來作擔架，運走一個同學後，馬上又搬來另一張鋼牀備用。

一直以來，槍聲沒有停止過，人群遇險都會本能地逃散，很多人受傷，中彈倒地，同學馬上湧上前搶救，由四、五個同學合力把傷者運走。

從東南建國門前來的軍車越來越多，到二時三十分，有幾隊解放軍很匆忙的一隊一隊由路口往歷史博物館方向跑去，他們全部手持武器、槍械，一直跑到歷史博物館前與先前已抵達的軍兵匯合，並坐下來候命。學生敢死隊立即調配人手集合過來，重新把軍兵再

次圍住，誓死保衛天安門，而群眾也沒有恐懼地包圍軍隊，保護學生。

二時四十分，我往南面方向走，因為東、西、北面都有槍聲，只有南面較為平靜。我想找電話亭報消息，在前門路口，群眾已把公共汽車搗毀，以攔截軍車，沿途還有很多圍觀的市民。有一位市民自動給我坐自行車尾，載我去找電話亭，又給我向其它市民籌集了很多零錢碎銀，可惜搖了很多個電話也不通，那市民便陪我返回天安門廣場。

路上，那市民對我說，他是從西單趕來的，西單很危險，死傷無數，槍擊厲害。他說，親眼目睹了四人被抬去，而且有發放過催淚彈，因為他在現場遠處旁觀也有被煙催淚的感覺。他又說，市民對軍隊衝擊得很厲害，市民已忍無可忍。

另一位市民聽到我們的交談後，也趨近過來對我說：群眾手無寸鐵，而戒嚴部隊則手持盾牌和武器與群眾對立，群眾被趕跑時，還一邊跑，一邊喊要打倒李鵬。他說，凶狠的軍兵從木樨地過來，市民百姓甚至連老太太都走出來攔阻，但也給無情打倒，軍人還用磚頭來打人。他解開他的衣衫，給我看他被打後的傷痕。

回到廣場，我隱約聽到廣場指揮部的呼籲：「紀念碑下的同學、全體的同學，請盡速到紀念碑集合。市民們，請你們也自動到紀念碑集合。」

三時七十分，四名知識界絕食代表在廣場上的廣播台發出了緊急呼籲，希望解放軍能立刻放下武器，不要開槍對付手無寸鐵的市民。代表說：「我們採取絕食靜坐的方式，維護和平請願的權利，想向政府表達同學的意願，表達我們對政府進行軍管的抗議。現在我們流在這裏的血已經夠多的了，不能再流的了，我們呼籲你們立即派代表到紀念碑下，我們的營地裏來進行談判，我們負責勸服同學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否則，如果你們認為有必要，我們四個人



去找你們進行談判，也是完全可以，即盡速向你們的指揮部傳達這個訊息，謝謝！」

廣播停頓一會後，又續說：「同學們、市民們，請放下你們手中的武器，現在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無論是解放軍方面，還是學生方面，任何人多留一滴血，都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我們呼籲你們馬上派代表到紀念碑來進行談判，必要的話，我們四人可以前往戒嚴總指揮部進行談判，謝謝！」

三時三十分，我跟那市民分手，又獨自前往歷史博物館前看軍兵的動靜，有數十名市民圍住軍兵，向他們苦苦相勸，說：「你們戒嚴來幹嘛？好好保護學生多好！大家都是老百姓，不能這樣橫蠻的對待人民，很多人流血、死亡，他們之中也有可能是你們的親屬，你們當兵的到底是為什麼？為了打自己人的嗎？你們好丟人啊！」有些解放軍表現得很不耐煩，大多都是無動於衷的，只有極少數是強忍著淚，為什麼這些解放軍會變得麻木不仁？

有學生對我說：「這些兵都失去理性，只服從上級的命令，他們只知道市民打他們，因為軍隊也有傷亡，所以他們打人民。」

我又再返回廣場，聽到前門那邊有一陣巨響，像是炮轟。

四時正，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全都被截斷電源，整個廣場漆黑一片，充滿了恐怖氣氛和隨時會有突襲的可能。

天安門四周再有槍聲，廣場指揮部在廣播中說：「同學們，原地靜坐，堅守廣場，我們要看看政府最後的嘴臉，最後的面目是甚麼！」隨後便播放國際歌。在這歌聲中，在這死亡隨時會到臨的關鍵時刻，我已忘記了自己，我只知道我這個多月來在北京的日日夜夜，都是和學生一起經歷這場悲壯的歷史時刻，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也在這裏成長了，在這次革命的洗禮中，我獲得新生，我不怕死。也因此，到底要做歷史的見證，抑或跟隨他們一起壯烈犧牲，在我而言，已經別無選擇。我走到一個帳篷的前面，坐在空置的鋼牀

上，亮起電筒，匆匆忙忙的寫下遺書，個體的我早已消失在國家興亡的大時代、大潮流中了。

四時二十五分，大多數的同學都已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有同學見我還一個人茫然若失地在廣場上四處走動，很擔心我的安危，一直跟著我，想保護我。在廣場的東南面，有一大群市民、工人在廣場南面走過來，他們齊聲喊口號：「中國人，站起來！」他們喊了多遍，聲音十分響亮，也叫人感動，因為他們在廣場最危險的時候走進來，冒死也要來保護學生，與學生共存亡。

這時，來自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廣播傳出侯德健的聲音，他說：「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我是侯德健，我們已經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我們不能再流下去了。同學們、市民們、在場的全體的公民們，我敢說，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了這一場運動的勝利了。直至到今天，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勝利了，同學們，我相信，我相信在廣場上所有的人，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英。」

話未說完，群眾便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們都不怕死。」

群眾馬上應和：「對！」

「但是我們要死得有價值，我代表我們四位絕食的朋友同仁，沒有經過同學的同意，我們作了一件事情，不論同學對我們作這事情有什麼態度，我要把這事情告訴大家。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裏面，我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了。部隊團中尉隸屬51648部隊，當中尉與我們接觸以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的，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們，平安的撤離現場。」

說到這裏，群眾大喊：「不撤！」

侯仍在說話：「我們沒有替大家作這個決定，這個決定的權利



不在我們絕食的四位同仁身上，這個的決定在大家的身上。我希望工人們、同學們、市民們，當我說完這番話以後，你們不要馬上作出決定，請同學們想一想。」又說：「剛剛周舵老師也跟我們一起去的，請周老師也說幾句。」

接著周舵在廣播中發言，他說：「同學們，我們現在保留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化進程就多一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都是我們全國的精英。我們已經答應部隊盡快地勸服同學撤離廣場。他們告訴我們，首先第一，他們已經收到上級的死命令，今天在清晨之前，必須清理好天安門廣場，這一點沒有任何疑問。也就是，他們會不惜任何代價，清理廣場。同學們，面臨這樣一種危急的形勢，我們不能夠再以赤手空拳去對抗四周全副武裝的士兵了。現在已經沒有再談判、商量的餘地了。我們現在必須盡全力保存我們有限的力量，他們傳達的檄文，是必須要在天亮之前開始行動，他們同意在南面留一條通道，我們希望，我們建議同學們以學校為單位，馬上就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地、安靜地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我們自身開始體現民主精神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然後到劉曉波發言，他說：「同學們，同學們，我叫劉曉波，現在我們堅持的一貫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你們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現在我們如果想爭取民主，就要像周舵老師所說的那樣，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希望市民們能夠冷靜下來，這場學生運動離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愛護。你們堅定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你們已為學生作出巨大的犧牲，你們再作犧牲，我們於心不忍，你們能夠保存下來，這是對中國民主的最大貢獻。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能夠冷靜下來，撤離廣場。在天安門廣場，我們已經到了最後關鍵性時刻，能夠做一些具體的民主的事情，少數服從多數。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同學們，不要再加強廣場

的混亂。我們現在必須有秩序地、安全的，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任何犧牲，在現在都是不必要的，市民同志們，我希望你們能夠冷靜冷靜。如果能夠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全體大學生，全首都的公民，全體人民都會感謝你們。」

最後，侯德健又表示：「不管你們怎樣看待我們所做的這個事情，我們希望我們能平平安安的離開這裏。廣場上所有的朋友們、所有的公民，我會到每一個有同學的地方去。不管是工人、市民、學生，我都要看到最後一個人離開這最危險的地方，我才會離開。」

劉曉波立刻表示：「侯德健代表了我們四人的共同信念，不到廣場撤退到最後一人離開，我們四人也不會離開廣場，希望大家協助我們，為了中國未來的民主，大家應該有秩序的撤離。」

周舵也表示同意的說：「我們完全贊成剛才侯德健和劉曉波所提出的意見，我們會堅持到最後一個撤離，我們希望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說服那些感情激動的同學和市民們，他們確實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在感情上是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向他們表示同胞的敬意。現在同學們一定要盡全力保護他們，說服他們和你們一起撤離，帶著他們回到你們的學校，給他們安定好情緒，和他們做朋友，和他們結成生死之交。同學們，現在儘快馬上進行行動。」

侯再補充地說：「我們沒有為同學做這個決定，我們把我們的話說完了，我們希望同學們好好思考這個問題之後，自己為自己作出決定來。」講完後，有群眾鼓掌，但還有很多人說：「不撤！一定要保衛廣場。」

四時四十分，廣場上的燈再又重亮起來，戒嚴部隊已開始戒備，準備進佔廣場。

一位工人自治聯會的常委也通過廣播發出呼籲，他說：「同學們、市民們、工人們，剛才一路以來的槍殺，已經流了很多血了，



戒嚴部隊馬上就要來清場，他們已經向人民刷了一刀，他們刷了一刀以後，他們還有第二刀，我們留在這裏只是無謂犧牲。」

有群眾隨即應和地喊：「對！」

他續說：「同學們，我認為有些同學堅持留在這兒是對他們抱有一種幻想的表現，他們已經毫無人性了，我們不要作無謂犧牲。（群眾鼓掌。）留在這裏是無謂的犧牲，我們要保存、保衛自己的力量，現在馬上要撤離了。」

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接着透過廣播宣佈：「首先，請同學們安靜下來，這裏是廣場指揮部，為保衛廣場的指揮部，敢請各位同學坐下來，就地坐下來，安靜的，手挽手坐下，大家先冷靜一下，讓大家考慮一下。同學們，手拉手，不要分散，我們安靜思考一下，考慮目前的形勢，和我們應該採取的新行動和方案。現在關於撤還是留的決定權，在我們廣場上每一個人用生命、用頭腦思考，是牽涉到廣場上的每一個公民的決定。」

有群眾說：「不要走！」

劉曉波再一次發言：「同學們，在這次運動中，北京市的市民們、工人同胞們，給予我們的學生很大的支持，沒有你們的支持，我們的運動是不會獲得成功的。現在廣場的同學們，安全地撤離，比較有保護的。關鍵是市民們、工人同胞們，我們希望全體同學、全體大學生，擔負起保護市民、保護工人同志們的任務，現在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廣場上的每一個人能夠安全地離開廣場，希望廣大的同學們，在這關鍵時刻，能夠保護市民、保護工人。我們呼籲全體大學生，在這關鍵時刻，我們要齊心合力地保護市民，保護工人們，向天安門的南面有秩序地撤退。」

最後，高新也發表了講話：「在這裏，我們四人已經向廣大同學、市民、工人發出呼籲，希望大家明確當前的形勢，現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東南角還可以撤離。在這一個多月的民主運動中，廣大的

工人、市民，為保護我們的愛國大學生，流的汗、流的血已經夠多了，再不能流血了，再不能流血了。希望我們廣大的大學生，現在和市民、工人積極配合，大家集合在一起，大家有秩序地撤退，大家都冷靜地考慮一下，謝謝大家。」

他又補充一句說：「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了，七點之前，部隊必須清理廣場，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們不能再流血了！謝謝大家，請大家務必冷靜。請工人、市民、廣大的愛國同學們，請你們務必冷靜。」

廣播又傳來廣場指揮部的發言：「撤留的決定權是在於我們在場的每一個公民的，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決定權。」在同學們為撤留問題作決定時，廣場上又揚起從人民大會堂傳來的，官方的，整夜重復不斷的戒嚴部隊緊急清場通告的廣播。

四時四十五分，第一批戒嚴部隊已經潛進廣場，穿越到廣場上的帳篷前面，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進發，這批軍兵荷槍實彈，以作戰對敵的姿勢，衝鋒陷陣的殺入，持槍威嚇坐在前面的同學，並且還有陣陣槍聲，同學仍喊：「不可還手。」

我是不斷聽到有啪啪噠噠的槍聲，軍隊肯定是一路都有開槍的。其中一個持槍的軍兵向我所站的方向走過來。我當時站在接近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東北面，這軍兵恃勢凌人，大肆破壞廣場上學生豎起的旗幟，狠狠地折斷的旗桿扔走，又喝令所有人都要坐下。

有一個本來想走向前的市民，也只得聽命地折回，但是以充滿諷刺的口吻，回來向其他市民說：「人民軍隊為人民，真棒！真棒！大家鼓掌，真威風啊！」群眾也竟真的鼓起掌來，以反諷的形式歡迎解放軍進駐廣場。

那邊遠處傳來學生們唱的國際歌聲，近我這邊的市民也呼應的一起和唱。



只見這批衝鋒的戒嚴部隊，有少部份在旁戒備，唯恐靜坐學生騷亂；而另一大批則已向前衝開一條奔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路，直迫上第三層，持槍的軍兵不斷開槍，在紀念碑下面的學生、市民齊喊：「人民軍隊，不打人民。」群眾越喊越齊，越喊越有力。

但槍聲還是不絕，那時紀念碑上的喇叭傳來了十分微弱的廣播，說：「廣場上的軍兵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養育你們，你們的槍口對着人民……」

餘音未了，軍兵們便不斷向着紀念碑開槍，射擊掛在碑上的喇叭，啪啪噠噠發了很多子彈，掃射得紀念碑迸出火花四起，廣播聲音中止，剎那的寂靜過後，市民和學生激動地大喊：「不許打紀念碑。」

四時五十分，學生開始從紀念碑的台階向南撤退，戒嚴部隊已佔領了紀念碑的第三層，把圍在紀念碑前面的布條、橫額、旗幟、帳篷全部搗毀、破壞，肆意地踐踏，而且還繼續不斷地開槍。

這時候，我向紀念碑北面前方朝西走，想走到最緊張的前線去面對坦克，這時重遇馬少方，他問我：「是否趕着要走？」

我說：「沒有。」

他說：「那麼你趕快走吧！」

但我想知道西面的情況，再往前走，另一位同學楊朝暉說：「進我們的隊伍來。」我本想拒絕，但他們已騰出空位，硬把我拉進他們的隊伍中，說：「進來吧，拜託你，別亂走了。」同學又說：「要提防他們放催淚彈。」

五時正，坦克車已開進廣場，官方的廣播說：「愛國的同學市民們，請與戒嚴部隊合作，恢復國家正常秩序。」又說：「全體市民們，首都現在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學生群眾是那麽安靜地，絕不還手地坐在這塊莊嚴的、神聖的

國家首都中心地，但坦克車卻輾過廣場上所有的帳篷，不理會裏面到底是否還有人留守；又推倒民主女神像，任意破壞和蹂躪。坦克車隊一直駛向前，一直駛近靜坐同學的面前，在坦克車隊後面，還有大批戒嚴部隊從東、西兩側快步地向前移近。

同學說：「真了不起，中國的軍隊！」又說：「壓死了一批老百姓了，手無寸鐵的啊！」

有同學在坦克車進來時，鼓掌地說：「歡迎啊！歡迎！」另一位同學認為太胡鬧了，喝止說：「不要拍手！坐下！」

啪啪的槍聲繼續響過不停，喚我加入隊伍中的馬少方要我撤退，而楊朝暉也喝令我往後撤退，我不願意，我想跟他們一起共同進退。但是他向後面的同學說：「讓開，讓開，讓這女孩進去！把她拉進出！這裏很危險呀！」

我不理會他們的勸退，堅持要共進退。對着坦克車，他們勇敢的說：「來吧！」但看到我還留在這裏，便向後面的同學呼喝：「他媽的，我叫你們讓開，讓這女孩進裏面去。」又對我說：「還在幹嘛呀！看呀！你快往後撤，催淚瓦斯要打了！」

一排排坦克駛到前面，一列列戒嚴部隊已經迫近，槍聲又啪啪噠噠的響起來。

學生開始很有秩序地一批批往後撤退，輪到我們站起來往後撤退時，大家都手挽手唱國際歌，有人還舉起勝利的手勢向著戒嚴部隊，但給在旁互相扶持的同學制止了，因為這些戒嚴部隊軍兵木無表情，在地上拾起折毀帳篷後的木棍，驅趕和揮打學生。

然後還再有槍聲，大家都希望是向天空打的。

有同學一邊撤，一邊說：「誰說要撤的？」一女同學回答說：「他們不是剛才說了嘛！」那同學說：「誰說的，他們坐着，讓他們趕走撤退，氣死人了！老百姓死了好幾百人了，就是讓他們抬出



去也不願意被抬走的啊！」

撤離廣場的隊伍本來很整齊，很有秩序，但戒嚴部隊不給同學時間，既驅趕過來推擠同學，又拿木棍亂棒揮打過來，把撤離的隊伍衝散。我們這排算是最接近坦克的隊伍被衝擊得潰散凌亂，我們被迫擠到窄窄的灌木叢和矮鐵欄邊，沒路可退。同學們極其克制地，恐防會有人踩人的情況發生，不斷大喊：「不要亂，不要擠！」、「拉著手，慢慢走！」、「不許打人！」。

我們這一排被衝散後，人人都接連捱了好幾棍追過來的軍兵無情的棒打推壓。混亂中我被擠進灌木叢裏倒下來，尾隨著我的同學也要倒過來壓踩我，他說：「別擠了！哎呀！我倒下了！別擠了！我起不來了！」同學往旁邊推擠，他們跌倒過來後再起身被推湧出去，但我被壓倒後，沒來得及站起來，只好爬著繞過混亂的人腳鑽出去。

這時，軍兵已在四方八面緊緊的圍攏過來。不是說過留下南面一條通路的嗎？當我們跟着大隊向南撤退時，坦克、軍隊都在四周包圍，戒嚴部隊的年青軍兵惡狠狠的擋在我們前面，我一面跑，一面跌倒，跟同學們四散逃命，軍兵總要貼近過來連番追打，給經過他們面前的每個被打散又狼狽地又跌又爬又跑的同學，狠狠地用木棍揮打和驅趕。我們不敢停下來，邊跑邊捱打的，我又再跌倒時，軍兵趨前打了我兩棍，幸好沒有受傷，但也很痛。他們是用力揮打，毫不留情，很多同學都被擠倒，被打得頭破血流，鮮血還噴在我的身上。

趕快跑出來之後，我只知道已逃過大難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很難過，眼眶充滿了淚水，他們扶著受傷、流血、悲哀、憤怒的同學繼續撤離。

廣場的東南面，歷史博物館附近不斷有救護車把受傷同學載走，同學持著各自的旗號尋找失散了的同校同學，並繼續往南走，他們說要繼續遊行。有一女同學在路旁淒厲地、歇斯底里地大叫。

我也感到頹然迷茫，這恐怖的一夜誰能受得了？！

我隨著同學的隊伍很失落、很悲痛地一起走，再度碰上曾經保護我、拉我歸隊的馬少方，他們手挽手，肩並肩的前行，在心情凝重和沉默無奈的悲痛中，他喚我一起同行，繼續向前走，但旁邊的楊朝暉激動的說：「我累了，我不能走，我不要走，我要留在這裏，我要死在這裏，我不能離開天安門和廣場上的同學。」同學不讓他激動，強行扶他離開。

五時三十分，我跟他們的隊伍分手了。回頭看天安門最後一眼，戒嚴部隊已全部衝上人民英雄紀念碑，包圍住各層，而我知道同學都撤出了，但最後堅守在帳篷、堅持不願撤退、或者撤退時跌倒爬不起來的有多少人？他們會有甚麼遭遇？我已無法知道。我不敢，也不能再走進天安門廣場，去了解到底清場的死傷情況，我不得不離開廣場了。

我找到電話亭搖了個電話報消息、報平安，但電話還是接不通。我又看到另一隊戒嚴部隊從學生撤離的方向湧過來，他們似乎不那麼凶悍，但一直向天安門方向跑，有些人避開他們，也有些群眾極為憤怒地想用石塊襲擊他們，有老婆婆在旁喊著：「不要打了！」我轉左向前門東大街走，實在很惶惑迷惘，也失去了方向感，只覺得真的很痛很累，想截停自行車，但街道上人車稀疏，終於見到一男一女經過，女的自願載我，男的也一路相陪。經過前門北京市公安局，軍兵都坐在地上，附近地面滿布磚塊石頭，相信凌晨以來的一整晚夜，這裏肯定有過激戰。

我們下車繞道走過，軍兵沒有攔阻，沿途明顯地冷清和沒有路人經過。再往前走，人聲嘈雜起來，說前面有軍隊從地下鐵衝上來。男的說要先行一步看個究竟，女的繼續載我時跟我交談，說她是《北京日報》的記者。她說她認得我也是記者，因為在五月四日新聞界出來遊行時見過我，而且我也好像曾經採訪過她。她說：他們已沒辦法做新聞，報社都給軍事管制、嚴格封鎖，而《北京日



報》是最糟透的報紙。

一段路後，我們發現路旁有人受傷，望過去時，赫然發現竟就是先行一步的男子，載我的女記者很憂心地停下來看他，他的眼給石頭擊中，流很多血。女的眼眶都紅了，淚掉下了，我們想辦法帶他去安全地方，他說：「沒事，我沒事，幸好沒擊中眼睛，只是皮外傷。」

後來，男的還一手掩眼，一手駕自行車往北京醫院求醫。我跟他倆分手了，便步行回北京飯店。在長安街上，有被焚燒了的公共汽車，攔在路中央。有一部中型公共汽車經過時，群眾要乘客下車，然後憤怒地擊打汽車玻璃，是誰激怒了群眾？是誰制造了這場動亂？到底這場血債要由誰來償還？北京這五十多天以來，最克制、最善良、最和平、最非暴力的北京市民，在戒嚴令下還努力保持首都秩序井然，市民和市民之間，市民和學生之間，誰也不怪責誰，他們從來沒有乘機打、砸、搶、燒，從來沒有給政府找到製造動亂的把柄。但在這場血腥屠殺的日子裏，他們忍無可忍，他們眼見死的死、傷的傷，人民手無寸鐵，學子一片丹心，以為可以勸服軍兵不進行這場殺戮，但結果換來甚麼呢？

回到酒店，我平安了。我的平安有何意義？外面很多人犧牲了，我也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我的同事說，要全體記者撤離北京回香港。我說：我還有未辦完的事，我要留下來。我頹然地躺下休息了一會兒，在廣場一起撤出來的同學打電話給我，說從天安門向南撤的同學，給軍隊包圍，他們沒路好走，有同學給打死了。之後，又接到一個電話，說北京大學的學生糾察隊凌晨在學院路給軍隊亂槍掃射，死亡人數至少有一千人，戒嚴部隊準備軍管學校了。

天啊！我們敬佩的、勇敢的、堅毅的北大學生慘遭屠殺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然後，民族學院亦有同學來電告訴我，他的學校亦有無數學生死傷，二十人一隊的糾察隊只有數人回來，大家還在統計有多少人失蹤。他說，他親眼目睹學生敢死隊在堵軍車時一排

排被掃射倒下。又說，有一位清華博士生去救一名解放軍時，也給軍隊開槍殺死了。他繼續報告情況，說：軍隊很殘忍，把學生驅趕到路邊靠牆，然後逐個用槍管上的刀刺死。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他親眼看到，而且他去救同學，他身上衣服全都沾滿同學的血。

我跟這同學很熟，他本來還認為政府是對的，同學堅守廣場是過份了一點。這天早上，他在電話中對我說，他對這政府徹底失望了，他不知道還可以做甚麼，也許他會回家鄉。他又說：據他所知，這些戒嚴部隊都是給上級下了一道死命令，若未能在清晨前完成任務，就會全部被槍斃。他還跟我說，有一名坦克車部隊的軍兵，在路上輾死了很多人，但他竟良心發現地走出坦克車，跪在地下，對群眾說：「你們殺死我吧！我不能再這樣殺人。」

最悲慘的事情，最恐怖的場面，竟都在六四這日發生了。我在北京飯店受驚發呆，從天安門廣場那邊還不時傳來槍聲，差不多每隔半小時就一輪的密集槍聲響過不停。

下午，我沒法平靜地留在酒店裏，打算跑去醫院看過究竟。我問司機能否陪我，他思索了一會，說：「行！」他在這夜裏回不到家，家又沒電話，他說自己有太太，有一個七個月大的寶寶。這夜，他在北京飯店的停車場通宵達旦，給橫飛的子彈嚇醒，他的出租車給子彈射穿了幾個洞，他下車也不知道往哪兒躲避，飯店的人又不給他進，所以他說：「我也算是死裏逃生的。」我問他：「陪我出去，不怕嗎？」他沒說甚麼，用手在脖子上做出了自刎的姿勢，勉強地笑說：「現在，人人都得往這想了！」我冒險，要他跟我冒險，太不應該，所以跟他說：「遇上危險，不要理會我，得馬上跑。」他很從容，也不怕，有香港記者知道我外出，也決定聯袂同行。

我們去了協和醫院和北京醫院，路上遇到人群，也不算是太緊張，他們三五成群的通報消息，對北京市變成這樣都很震驚不安，傷痛難耐。到協和醫院，問門前的醫護人員到底有多少傷亡。他們



說，死的有好幾十人，傷的好幾百人，醫院全擠滿人，走廊都躺有很多傷者，醫護人員不夠用，他們也應付不來。到北京醫院，我問坐在路旁的一名學生，他說，他負責把同學救護來這裏，死傷人數無法估計，他看到軍兵把屍體一個一個的疊起來，據他粗略的估計，各校大概會有五分之一學生是傷亡了。坐在醫院前面，有人提到死傷者的慘狀，又形容「開花彈」（達姆彈）的殺傷力，但我對軍事武器沒有一點常識，而且我也沒有勇氣和膽量，走進醫院裏面採訪傷者搶救和屍體堆放的情況。

採訪完了，我們離開醫院，北京市成為一個危城，到處都充滿殺機，大家匆匆忙忙的回去，我和司機走在後面。到北京飯店，司機想看看長安街的情況，我們一起又到街上踴躍了一會兒，街頭仍聚攏了很多人，我們朝天安門的方向前行，突然槍聲響起，人群四散的逃竄。司機往後跑，我則攀過欄杆往北京飯店裏鑽，再往後跑去找司機。槍聲停了，人群又停下不往後跑了。司機在不遠處走過來，笑我逃跑的本領比他高，我著他進來，他說不，還想再看，於是我又攀過欄杆出來跟他一起。

我們找個燈柱位，好能站得高些，想看看天安門到底變成怎麼樣，只見到人群跟遠遠的軍隊對峙，再遠些的便甚麼也看不到了。然而，近處卻看到有三輪木板車把槍聲過後，倒在地上的受傷者抬走。我和司機繼續向前行，行了不多遠，又有一陣槍聲和緊接著人群驚恐的逃跑，我不想跑了，說：「回去吧，誰也不能過去的了。」於是，我們攀過欄杆回北京飯店，在飯店門前站了一會，有從天安門那邊來的人說：「軍隊在燒屍體！」人們都很憤怒，都極憎恨這個竟用如此血腥的暴力手段來殺害自己同胞的政府。我對司機說：「幸好我沒在廣場死去，否則給毀屍滅跡，死得一文不值啊！」可我雖然沒有死去，但卻有很多人不幸地犧牲枉死；就算是不死的，也仍敢於冒死去頑抗，討回血債，人們說：也許北京市會展開巷戰了。

返回房間，給同事責備了一頓，但我和司機卻相視苦笑。

黃昏，大家都在商量撤退的問題，初時以為英國領事館會為我們提供人身安全的保護措施。收拾好行李，便打發司機回家，囑他不要冒險。後來香港在北京的記者齊集後才知道，原來是一場誤會，英國領事館表示對香港記者的安危無能為力。據一些熟悉北京情況的記者表示，北京飯店是軍隊和市民都想霸佔的，是軍事上佔有利位置的據點，所以預測這夜會有危險。他們有些打算到較遠離長安大街的王府飯店過一夜，然後找車到機場去。其實，已有不少記者打算入夜前便到機場等候機位，但由於沿途的安全沒法保證，所以這些撤走的計劃給否定了。我們報館的同事決定留在北京飯店，他們說，明天就一定要撤走。但我仍表示，我實在不想撤，我還想等同學的消息。

夜裏，北大有同學打電話來，我向他求證是否有一千北大學生死了，他說，聽到這個消息，但沒法證實。但據他在校內的調查，有幾十名學生死了，二百多名學生失蹤，不知去向及生死未卜。他相信，夜裏軍隊會佔據校園，逮捕學生領袖，但他們已決定絕不會還手，也不會抵抗。軍隊已經開槍和殺人了，到這麼危急的關頭，他們還堅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則，我們祖國這麼可愛的孩子，這政府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你們的愛國熱忱？

我深深的希望死傷人數真的不是那麼多，我很累了，躺在北京飯店的牀上，很快就昏睡過來。在這個死寂的夜裏，我腦海惡夢連場，出現的景象是一輛輛駛過的軍車和坦克，還有一排排倒下的學生，我一直都沒有哭，淚流不出來。

中國，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到底倒退到哪裏去？這麼悽慘、殘暴的屠殺，為甚麼竟在一場愛國運動熱潮和爭取民主自由的激昂呼聲中出現？為甚麼要在中國歷史上再寫下這血腥的一頁？這專制、獨裁的政權，到底會怎樣收拾這個不堪想像的殘局？我深深的沉鬱哀痛，期待著總有一天，報應會到來的。



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大事紀要

4月15日—6月4日

- 4·15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
- 4·17 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生組成一支遊行隊伍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
- 4·18 北京多所高等院校的學生上街遊行，抵達廣場靜坐，提出七點請願。
- 4·19 部分學生轉移到新華門前靜坐請願，與中南海警衛對峙，遭警方驅散。
- 4·20 北京高校學生決定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爭取結社自由。
- 4·22 中共中央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百萬市民夾道送別靈柩，學生宣佈罷課。
- 4·23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臨時聯合會成立，向全國號召罷課。
- 4·25 包遵信等二百多名知識分子發表公開信，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
- 4·26 中央發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
- 4·27 北高聯組織約五萬名學生上街示威，是北京最大規模爭取民主的遊行。
- 4·28 數百新聞工作者聯名致函中共上海市委，抗議撤銷欽本立

總編輯一職。

- 4·29 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袁木、何東昌等與北京學生進行首次座談對話。
- 4·30 《人民日報》一百五十名記者不滿禁制《世界經濟導報》，要求對話。
- 5·01 北高聯發表《告香港同胞書》，申明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
- 5·02 北高聯選出「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要求與政府進行現場直播的對話。
- 5·03 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指學生組織犯法，幕後有黑手，政府必須追究。
- 5·04 北京近十萬學生和首都新聞界五百名記者參加「為民請命」五四大遊行。
- 5·05 李鵬接見亞銀代表時說，學生罷課和遊行，是政府不贊成的。
- 5·06 學生對話代表團遞交請願信，希望達成對話。
- 5·08 國務院信訪局拒絕承認學生對話代表團的地位，只答覆會多層次對話。
- 5·09 逾千名新聞界聯署向全國記者協會請願，要求新聞自由及總編輯責任制。
- 5·10 數千名學生騎自行車遊行，支持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
- 5·12 北京學生決定在蘇聯總統戈巴卓夫訪華前夕到天安門廣場絕食。
- 5·13 二千多名學生自發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請願，數萬學生聲援。
- 5·14 嚴家祺等著名學者聯署緊急呼籲學生停止絕食。李鐵映等與學生對話。



- 5·15 近六十萬聲援的學生和市民聚集廣場，迎接戈巴卓夫儀式改機場舉行。
- 5·16 近四百名學生暈倒送院治理，有學生宣佈絕水。二百萬北京市民聲援。
- 5·17 逾百萬群眾繼續上街聲援，知識分子發表宣言，鄧小平提議北京戒嚴。
- 5·18 李鵬與學生對話，雙方態度強硬。中共元老會議決定調動軍隊戒嚴。
- 5·19 趙紫陽含淚向學生道歉。李鵬在黨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在北京實行軍管。
- 5·20 李鵬頒布戒嚴令，解放軍奉命入城。逾百萬群眾湧上街頭，阻攔軍車。
- 5·21 首都實施新聞封鎖。軍方派出直升機撒傳單。中共元老商議罷免趙紫陽。
- 5·22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舉行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依法律條文起草的章程。
- 5·23 北京有政府機關幹部加入百萬人遊行。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遭潑污。
- 5·24 楊尚昆在軍委會議稱學潮是動亂，趙紫陽沒執行中央指示，必須撤職。
- 5·25 李鵬發表致戒嚴部隊的慰問信。各軍區表態支持。趙紫陽被指反黨。
- 5·26 陳雲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發表支持李鵬及楊尚昆戒嚴決定的講話。
- 5·27 北高聯號召全球華人民主遊行。香港舉行「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

- 5·28 逾百萬全球華人響應號召舉行大遊行，聲援愛國民主運動。
- 5·29 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決定將撤離廣場日期，延至六月二十日人大會議後。
- 5·30 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豎立起來。首都工人自治聯會三名代表被捕。
- 5·31 被捕的三名工自聯領袖獲釋。中共當局組織市郊農民遊行支持李鵬。
- 6·01 柴玲及封從德聲稱被綁架。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致函慰問戒嚴部隊。
- 6·02 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四君子開始絕食。有軍車入城撞死三人。
- 6·03 **中共中央決定清場**
- 凌晨** 逾萬戒嚴部隊由東、西兩面分頭推進入城，徒步跑往天安門的子弟兵遭市民包圍堵截。
- 早上** 北京群眾在街上一輛停駛的旅遊巴士上，發現衝鋒槍、手榴彈、菜刀等武器。北京城氣氛緊張。
- 中午** 中央電視台的廣播，指軍民發生武力衝突，軍警採用催淚瓦斯和電警棍驅趕人群。
- 16：00 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指令翌日六時前要完成任務，並宣佈「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 傍晚** 大批解放軍駐扎在人民大會堂外，與群眾對峙，開始傷人。
- 19：00 中央發出最後通牒，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播放戒嚴部隊緊急通告，宣佈「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



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

- 22 : 00 一批批頭戴鋼盔，手持刺刀衝鋒槍的軍隊已經從四面八方入城朝天安門廣場進發，軍警在廣場以西發射催淚彈、毆打和驅散群眾、街上不斷發出廣播警告市民不得上街。裝甲車輾壓路障，為解放軍及坦克開路，士兵向攔截的市民開槍，其中木樨地是死傷最多的地方，該處聚集數千人，部分人用碎磚頭砸打戒嚴部隊，軍隊立即一排排沖上大橋，邊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邊向投石頭的市民開槍。軍隊時而向天開槍，時而對正人群掃射，有人中彈倒下。民眾不斷向後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軍隊用衝鋒槍向罵聲掃射，約百名學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邊的復興醫院。復興門外大街兩旁的市民從自家窗戶上探出頭來痛罵，也有人從窗口上往馬路上投東西，軍隊開槍還擊，從木樨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左右的路段，兩旁建築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濺，有人在樓上也被子彈打死。

6·04 屠城 凌晨

廣場上的學生知道鎮壓開始，以為軍人只用橡膠子彈和催淚彈鎮壓。此時不斷有人跑入廣場緊急報告，指軍隊荷槍實彈掃射示威者，廣場陷入驚恐。軍隊主要從西面向廣場逼進，向人群密集的地方瘋狂射擊，殘殺平民，為裝甲坦克開路，很多攔截的群眾倒下，軍隊發射軍事禁用的達姆彈，俗稱開花彈，中彈者傷勢嚴重，醫院爆滿。

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不斷廣播《緊急通告》：「北京發生動亂，戒嚴部隊要執行任務，立即清場。天安門廣場發生反革命暴亂，所有人必須立即撤離，戒嚴部隊有權對違抗者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

- 02 : 00 廣場剩下數千名學生和市民。軍隊開進廣場，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
- 03 : 00 侯德健等向軍隊緊急呼籲，希望停止武力，不要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並表示願與軍方談判，勸學生撤離廣場。
- 04 : 00 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
- 04 : 40 戒嚴部隊衝上紀念碑台階，一路槍聲不絕。
- 05 : 00 士兵佔據紀念碑，向掛在紀念碑學生的廣播喇叭狂開槍。坦克已開進廣場，推倒民主女神像，輾毀所有帳篷。戒嚴部隊棍打學生，驅趕學生往南面撤退。
- 清晨** 學生隊伍返回校園的途中，自六部口轉西而行，坦克自後駛來，向人群衝撞，輾過走避不及的群眾。
- 06 : 25 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英語廣播員報道：「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香港的《文匯報》的頭版標題：「建國四十周年京華竟現大慘劇 軍警亂槍掃射強進天安門廣場首都數百民眾血染十里長安街」

中國歷史上最悲慘的一頁在北京發生了，全副武裝的軍人在坦克和軍車的掩護下向市區內四散的群眾開槍，殺害無辜路過的途人，死傷難以統計，官方至今仍拒絕公開六四屠城的死難真相。

人物專訪

周勇軍

王丹

吾爾開希

馬少方

趙少若

蘇曉康





前言

專訪學生領袖

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

學潮一浪接一浪的過去，北京高校學生仍堅持努力不懈，保留鬥爭的權利，他們曾經得到意想不到的輝煌成績，四二七大遊行之後再舉行五四大遊行，勝利似乎來得很輕易，學生好像鬆懈下來，到底爭取的是甚麼？真正取得的成果又是甚麼？這就要看他們的毅力能耐，和怎樣進行學運不息的持久戰了。

四一五胡耀邦逝世後，學潮醞釀爆發，高年級的研究生、博士生推動學潮，本科生隨即呼應，早期在天安門的多次靜坐中，都是以「乞求」的形式，爭取民主改革。

發展到四二六《人民日報》刊登強硬語調的社論後，學生情緒便已到達忍無可忍的地步。「乞求」是無用的，政府若壓制只會帶來更大的反抗。四二七那天，學生天不怕、地不怕，帶着沉重的、不惜流血犧牲的心情，衝破警察的攔阻圍堵。他們勝利了，遊行聲勢浩大，政府終於願意跟他們對話了。

匆匆的，四二九來了一次對話。學生說：「這是騙人的！這是一齣荒謬劇！」對話戲劇性地上演了，但劇終時給學生大喝倒采，他們要真正有代表性的人上台表演真誠對話，他們要有自己的選角權利，他們要認真的進行對話，他們要求能言之有物地表達學生及民眾的不滿，他們絕不容許瞞天過海的胡混過去。

真正的對話始終沒有到來，學生還在等，但政府不承認他們組成的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的合法性，他們等得不耐煩了，五四便

要再來一次大行動。

五四遊行不及四二七的轟烈，他們心裏是很明白的，很多同學都被拖得太長的學潮弄得筋疲力竭，他們開始要思考到底學運應向哪個方向發展？他們怎樣才能自強不息地繼續堅持鬥爭下去？

雖然學生還在復課和罷課中猶疑，雖然他們明知道學生的力量是有限的，國家的民主改革過程是漫長艱辛的，一切都不可能一蹴即就。但是，他們還年少氣盛，他們仍深深不忿，他們想爭取的太多，所得着的太少，一切都太不實在了。他們還想繼續往前走，走得多遠就多遠，他們還要堅持下去。

五一五戈巴卓夫訪華，他們還會有新的行動嗎？

江山代有才人出。這次學潮造就了幾個學生領袖人物，他們舉起揚音器在同學群中發表演說，高喊口號。他們備受中外記者包圍，要求專訪及透露行動消息，他們一下子成為國際矚目的人物。學潮中到底他們扮演甚麼角色？他們抱着怎樣的心情投入學運？他們的個性有何特點，促成了他們願意拋頭顱、灑熱血，哪怕要作出犧牲，也敢於站在同學和群眾前面，推動學潮發展？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在學潮中，把各高校凝聚及團結起來，令每次行動都能在較有組織的情況下發動。北高聯的常委和主席不斷地有更替改換，主席更是七天一任。有說不想目標經常集中在一、兩個人身上；有說某些常委多次犯錯，已被罷免或引咎辭職；又有說因某君背景複雜，為避免嫌疑，他應該退下來。

北高聯在決策和組織方面，確實是曾經多番犯過錯誤和表現得不成熟。他們還只是初次認識和嘗試實踐所謂的民主程序，他們還在摸索這場政治運動的節奏，他們需要時間逐步掌握這場政治遊戲的動作，要怎樣組織、協調、行動、指揮，才會產生高潮迭起的出色效果？



訪周勇軍

「犯錯是因為不想同學過激造成流血」

周勇軍最早冒出頭來，悼胡時在人民大會堂前下跪，曾擔任北高聯主席，他本身是政法大學八五年政治系的學生。在學潮期間被同學指責他曾經犯過兩次嚴重的錯誤。首先是四二七遊行前的凌晨時份，到各校張貼告示宣布取消遊行；其次是五四天安門廣場的集會後，他站出來宣布五五復課，而這些舉動均沒有獲得北高聯的授權，他要為此承擔個人責任。

犯第一次的錯誤後，他退下來，由吾爾開希取代了他的主席位置；到犯第二次的錯誤後，他被逐出北高聯，不能再擔當常委職位。

記者問周勇軍，四二七凌晨臨時決定取銷遊行，是不是因為害怕？他提高嗓子，帶着激動和感到有點委屈地說：「是我最先提出遊行，北高聯很多代表都有退縮之意，後來大家都決定遊行了。四二六晚上，很多高校代表包括吾爾開希都來問我，是否可以不去，因為有消息說軍隊已抵達天安門準備鎮壓，學校附近又有武警駐防，學生上街會有危險。」

「事實上，吾爾開希也發了聲明表示可以不去遊行。凌晨四時，我以個人名義發消息取消遊行，但同學情緒已到頂點，再阻也阻不來。這也正好表示，學生運動是自發的，非少數人可以操縱的。其實，我決定取消遊行不是因為我怕，政府整我也不怕。我也不是猶疑不決，但我當時考慮到學生會有犧牲和流血，就對不住同學，對學運也有打擊。我的顧慮是若上街遊行過激，軍警鎮壓，反而會是民主運動的倒退。」

「雖然同學對我不理解，但是我會以實際行動表示我不是懦夫，我沒有退縮。至於當天沒去遊行，我實在也感到有點遺憾，下午我去到天安門時，已看不到甚麼了。」

五四那天，周勇軍在天安門向同學宣布五五復課，那時候，同學好像有點失落。後來堅持繼續罷課的院校同學對周勇軍更加不理解了。對周勇軍的為人，有同學表示，他很冷靜、理性，但把持不定，有點膽怯。其實，他現在才二十二歲，今年就要畢業了。他出生於四川，母親是農民，父親是國家幹部，他說：「我家庭很普通，沒甚麼特別。」

跟他談到自己在學潮中扮演甚麼角色，他表示，自己在大學生中是較理性和成熟。他發表演說時，都是很希望同學能保持冷靜，避免一些偏激的思想及言論，把一些同學的情緒引導到正確方向，不致於盲目地傾向一時的激情。他在四一七那天開始參與學潮，後來組織新華門前的靜坐，並成為自發組成的政法大學籌委會主席。他承認，學運前自己是個默默無聞的人，很少機會公開發表個人的觀點。學潮期間，他把握了機會把自己的想法和政治觀點都表達出來了。

問他希望學潮能達致甚麼？他說：「希望中國能以民主法治限制貪腐官僚的產生，把封建殘餘思想推翻。」但他深明學生力量十分有限，上街遊行靜坐只是希望喚醒國家人民，或起點啟蒙作用。

他說：「學生的行動只是一種政治熱情，若要實現學生所爭取的，還只能靠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各階層人士紛紛起來，要求民



主、自由、法治、人權才行。也因此，學生希望有公開的對話，向政府表達意見之餘，也想借此給全國人民提供思考元素。」

在北高聯，他想做一個領袖人物，也確信自己理性，這樣才能對學運有幫助。他又說：「北高聯常委經常更換，主席七天便要再選一次，這樣可起保護同學及轉換注意力的作用。」

至於學潮中，有沒有人恐嚇過他們？他說沒有，而且他相信政府不會壓得太厲害，更不會把他們拉去槍斃，所以他沒有像吾爾開希那樣寫下遺書。

提到吾爾開希，他說：「這入很有激情，但思想的深、廣度不夠。」王丹呢？他說：「王丹背景複雜，已給北大罷免了，原因是對所謂『一小撮人』煽動學潮的講法避嫌。」



訪王丹

「擔憂學生內部失控會導致運動的發展偏離軌道」

北大歷史系八八年學生王丹否認退下來是因為背景複雜，他說：「退下來的原因是，學運發展至今，已很感疲累了，而且自己的學識能力也不高，所以希望選出更有能力的同學，在學運中繼續發揮作用。」

王丹的所謂背景複雜，跟方勵之有關嗎？他說：「我跟方勵之只是私人關係，我很敬佩他的勇氣和政見。在知識分子中，他敢於批評政府和辯明事理，希望能以知識分子的團結力量向政府施壓，為民主化奠定堅穩的基礎。」

他最敬佩的人物除了方勵之，還曾經崇拜過周恩來，而現在他沒有真正崇拜任何一個人物，他希望有一個能結合所有名人優點於一身的人物讓他可以崇拜。

另一個與個人背景有關的就是他的家庭，他說：「我父母親都是知識分子，都在北大畢業，我是在北京成長和生活，父親對我的政治觀點和活動，是沒有加上任何滲透和影響，只要是不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他們也會表示支持的。」

個人方面，他形容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他說：「民主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最大限度內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也希望我能以社會良心的身份，對一切自由、民主方面不公的事情提出批評，起知識分子的獨立作用。」

關於中國前途，他認為個人力量及大家的力量可推動民主化進程的發展。他說：「中國現在已到了關鍵時刻，需要有人為中國發展作出努力，拋棄一切顧慮，勇敢地站出來。」

學潮中敢於站出來領導運動的人，他認為其實都不是能力很大的人。他感慨地說：「假如能有能力更強的人推動運動，應該會更符合民主化的發展，可惜這些同學還得顧慮將來的前途，所以不敢站出來。」



問他個人在學潮中敢於站出來，是否已作出了犧牲的打算？他說：「這感受還不算很強烈。學潮發展至今，我覺得相當滿意，因為至少已產生了一定的政治收效，但也不能存太大的幻想。現時只是朝著一個方向，希望能喚起民眾的熱情，並在同學中成立正式組織，繼續運作。」

他續說：「學運還沒有結束，我們會在校園內建設更多民主機制，同時知識分子寫了倡議書，敢站出來在學生中做工作，這是非常可喜的進步。」

學潮是否把他造就成為一位學生領袖？他說：「我個人可以作為一位精神領袖，但我做不成一個政治家。我希望自己能起一種形而上的作用，把我和民主運動連繫起來。」

對其他學生領袖有何看法？他說：「吾爾開希很有魄力、氣度和勇氣；周勇軍則不夠堅定，所以在做決策時曾有失誤。不過，我覺得在這場運動中，有人敢站出來，已經很不錯的了。對學生領袖不能太苛刻，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缺點，若過份苛求，將不利於民主事業的發展。」

四二七之後，他和吾爾開希都得到消息，他倆已被點名，可能會被抓去。他說：「當時確是覺得有危險，所以不敢一個人獨自外出，怕會無聲無息地被幹掉了。吾爾開希那時候躲起來，也是這個原因。」

往後的危機呢？政府會否來「秋後大算賬」？他說：「沒有太大的恐懼，可能將來會被關進牢裏幾年吧！但我走出來，做了應該做的事情。」反而在這一刻，他隱約地透露了一些深層的隱憂，他說：「我擔心的不是來自官方的壓力，因為壓得愈緊只會惹來更大規模的反抗，所以估計政府不會這樣做。」

究竟擔憂些甚麼？他續說：「我一直有種來自第六感覺的擔憂，不很明確的。我害怕學生內部某些事情，會導致運動的發展偏

離軌道。但具體是怎樣呢？我還不太清楚，但以後這問題應該會逐漸顯現出來的。」

學潮過後，學生好像鬆散下來了。他承認這危險性是存在的，不過北大同學還熱情高漲，北大有自己的傳統，學生人數多，思想堅定的人也很多，所以能夠繼續堅持下去，沒有像其他高校般慢慢平息過來。他說：「北大還會繼續這種民主的呼聲，在學運中扮演中堅力量的角色。」



訪吾爾開希

「擔心後半輩子是被人主宰和安排」

北京師範大學出了一位領袖人物，在領導學運時信心十足地拿起揚音器演講，大力鼓動學生的情緒，帶領遊行隊伍突破軍警圍堵。他膽色過人，能夠連任兩屆北高聯的主席不倒，他的名字叫吾爾開希。



跟他做訪問時，他抽着駱駝牌香煙。他說：「我的名字在新疆語的意思是駝峰」。學潮期間，中外記者都找他做訪問，他成為這場運動的明星。

叫他先介紹自己。他說這問題已回答得滾瓜爛熟了。「我二十一歲，生於北京。爸爸是新疆地區編撰委員會副主任，是幹部、作家、翻譯家及研究家，算是文人名人，但毫無政治背景可言。媽媽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現在做編輯工作，仍留在新疆。而我爸爸現時則在北京黨校工作。」

四二七大遊行出發前，他寫了一封遺書給他的媽媽。他說：「我父母希望我能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對這次學運，都是天下父母心嘛！他們都想我平平安安，在這基礎下，也希望我能有所作為，成為一個比較出色的人。」

假如給抓了，會很傷父母的心啊！他說：「我爸爸已對我說，行動策略首先要考慮自身安全為主，其他的應該可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但父母還曾一再強調要考慮他們，因為若一旦出事了，他們肯定會傷心，所以對我來說，也多多少少會有點顧慮和構成壓力。」

五四遊行前幾天，他隱匿起來了。他說：「這與上述考慮有點關係，但主要是為了保存自己到五四，可以舉行大規模的行動，而不想自己有任何不測。我從來都沒有害怕，躲起來只是考慮到學運及同學，因為萬一有不測，會對學運及父母造成沉重打擊，所以我不得不保護自己。」

現時，他沒法知道危機是否已經過去，但他相信自己隨時會有可能被抓去，而且秋後不算帳大概是沒有可能的。他說：「將來肯定會出事，視乎大小而已。現在我也沒有太多時間為自己考慮將來，我只想自己在未出問題之前，努力幹好該幹的事情。」

有否作好任何犧牲的打算？他說：「最大的犧牲是自己的前程，因為將來我可能無法按自己的意願來選擇生活，哪怕是坐牢，

判五年、十年、二十年也好，往後的日子還屬於自己的。但假如自己的後半輩子是被別人以有效的辦法來主宰和安排，對我來說，是最大的犧牲。」

死亡呢？「二十歲就完成，那已不錯了。我所寫的遺書，也不代表甚麼，因為據當時的情況，很難估計會否失去自由和生命，所以要作最壞的打算。」他承認自己的理論水平不夠高，學潮過後，學運仍將永遠不停地形成下去。在學潮稍為平靜後，他會與曾經積極參與學潮的人，好好坐下來為這次學生運動寫文章。

問他最崇拜的人是誰？他答：「貝多芬。我愛聽交響樂，特別欣賞第五及第九交響樂，尤其最喜歡的是合唱《快樂頌》中那種天下大同的思想境界，我非常崇拜貝多芬和他的音樂所體現的崇高理想。」

還有呢？「我也很崇拜林肯，因為一百多年前，美國還不那麼文明，還存在很落後和不公平的黑奴政策，當時林肯的貢獻不僅僅是解放黑奴，還在人類史上的人權運動，將人權和個體解放的思想大大的提高，所以我對林肯比較崇敬。」

個人的理想是甚麼？「要能不停地奮鬥就可以了！」他認為自己可能成不了政治家。

對中國的期望呢？「我常想，中國應該是一個美麗的國家，應該是富強的、民主的，每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社會生活方式。這樣的一個國家，我常常用美麗這個詞，我希望中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現在這美麗還缺少很多東西。」

學潮令吾爾開希成熟了很多，他覺得自己的分析和觀察能力都有提高，學潮帶給他最大的感受是「團結的力量」。作為學生領袖，覺得自己是否有這方面的才能？他說：「我們搞的是一場民主革命運動，民主體制是不需要領袖的。這場學生運動是有一種自發的、客觀的力量存在。我只是曾經作領導者之一而已。」

擔任北高聯的主席，有何期望？「我希望北高聯可合法地存



在。目前大陸的法治仍然很不健全，中央定的調子就是法，說非法就是非法，至於非甚麼法就無從知道了。」

學潮應朝哪個方向發展？「應該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現時，我們的學生運動，已經將民主思潮打開了一個缺口，將來民主意識將會更為拓大。以後，會繼續進行校園的民主改革，而剷除腐敗，打倒官倒等口號，還會保存下來。我們學生的能力有限，將來的運動，應該走向與工農相接合的道路。但是，現在的歷史時機還未成熟。」

吾爾開希，曾經被批評為高傲、衝動。他說：「我並不高傲，可能是個人因素，應該是太自負吧！說我衝動，我會盡量克服的，但我很有信心，將來我可以成為一個名人的。」

這次學潮是歷史性的，他沒想到會這麼快自己便成名了，所以他的確表現得有點沾沾自喜。記者提醒他，還要在很多方面下工夫，他點頭同意，說：「是的，作為名人，一定要加強自身修養，我須要在這方面有所提高。也許，這一次我是糊裏糊塗地成名了，但也許我的知名度會更高，那時候就不會那麼容易讓人家一眼就挑出毛病來。不過，現在我被人看出的毛病，也可能就是我可愛之處吧！」

北師大曾經有一張大字報貼出來，是批評吾爾開希的：「你不要在反特權中搞特權，不要在爭民主中不要民主。」

前一陣子的學潮，他經常坐轎車出入飯店，抽名牌香煙，多次召開中外記者會。對大字報給他的抨擊，他說沒有看見過，他很不屑地自辯說：「我是用自己的錢，犯不着別人來管，我也不是行使特權。在民主進程，同學站出來代表其他人說話，一些人的民主就可能要被犧牲了。」

他的秘書女友程真一直陪伴着他，她補充說：「其實我們在學潮中也貼了很多錢出來，我把自己準備去外國留學的錢都拿出來用了，搞完這次運動後，大抵政府也不會給我出國留學的機會了。」



訪馬少方

「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呼喚民族醒覺」

今次學潮，大抵上不能說是因為有某些特別出眾的人物在領導着學生。整個過程，每個學生都眾志成城，滿腔熱情，抱着愛國憂民的心情，自發地組織了多次學生大規模的集體行動。

學生領袖的出現，可能是因為他們掌握了一些消息，直接參與行動的籌劃和決策，所以成為焦點人物及採訪目標。

記者曾與兩位比較能顧及理論層面，及思想較為深刻的學生訪談，他們都曾經做過學生領袖，不過在學運初期，一直都拒絕接受記者的訪問。

其中一位是中國電影學院的高年級學生馬少方，他認為農民革命是絕不能達成民主這一步，只有通過知識份子的革命和覺醒，一次又一次經過漫長的鬥爭，才會取得一些勝利。

他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精英階層，有才智和民主思想，能



組成龐大的力量，提出不同的政見，及批評政府的錯誤。我認為，在這次學潮中，此趨勢已逐漸形成。雖然我們大陸的知識分子地位很低，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在今次學潮中，學生採取溫和態度和非暴力的方式爭取，也正好反映中華民族的性格是善良的。幸好歷史的潮流方向是越來越重視知識的發展，尊重知識分子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其地位將可獲社會普遍的承認。」

馬少方，曾經是北高聯的常委。他說：「北高聯在學運中其實沒起多大作用，常委、主席也不能說是學生領袖，因為這幾個人學生中是沒有號召力、感染力，亦沒有傳播過任何思想。他們的任務只是指定口號，決定遊行時間和路線，其他事情都是各高校學生自治會自行處理的。」

他又說：「學運之所以能夠一浪高過一浪，主要原因是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失策，對學運估計錯誤。另一方面，同學間通過大字報的宣傳，也大大鼓動了學生的情緒。今次學潮並沒有產生過學生領袖，這些帶頭的同學其實只是敢說話，他們不能形成新權威，也未能產生凝聚同學時所需的精神力量。其實，我們是一盤散沙，只不過組織了一條氣勢龐大的遊行隊伍。我們學生自己和北高聯組織本身，都經常會有犯錯和失誤，有時候某些行動也會刺傷了同學的感情，於是便會對學生自治組織本身失去信心，這對往後學生運動的發展會有不好的影響。」

訪趙少若

「學生運動是在承擔中為未來書寫歷史」



另一位比較激進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趙少若表示，學運發展到現階段，應該要從理論上澄清一些問題，包括應該好好反思一下，這幾十年來，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對人民無可避免的思想控制。

他認為：「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並未能真正打倒傳統封建思想，但盲目地引進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的命運，迎接新一代，馬克思主義是應該要丟棄的了。」

他續說：「現代中國的道德觀、價值觀和思想都很麻木，假如書店不賣馬克思的著作，不宣傳這套思想，中國就應該會有進步了。」所以，他倡議成立全國民主學生黨，以便更具影響力及更廣泛地被社會各界人士注目，爭取人民的支持，逐漸發展成為具合法地位的民主黨派之一。

「學運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能以民主學生黨的組織出現，有民主理想的最高綱領和思想指導，應該可以將學生心聲很快地在民間發生作用。」可是現時學生運動還主張要擁護四個堅持，他續說：「這是手段，否則會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就很容易有借



口消滅學生運動。如果社會主義是阻礙民主的發展，同學是應該要有勇氣否定它，但是很明顯現在時機尚未成熟。」

雖然他的想法比較激進，但他強調：「我贊成用和平手段爭取，不希望有暴力打殺或你死我活的場面。不過，我支持應該採取一種可能會引起將學運推向高潮的一些具破壞性和象徵意義的行動，例如：將天安門的毛澤東像栽下來，或者把天安門前和新華門前的石獅子推倒，就像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我覺得在五四那天，應該幹這種有象徵性意義的行為藝術出來。可惜那天沒有實現，整個遊行活動也有很多失誤。」

「毛澤東像是這個國家的典型代表，在今日已再沒有甚麼意思了；石獅子猙獰面目，像是要把反對他的人都吞噬去，這也太霸道了。如果能推翻這些阻礙社會進步和發展的象徵物，對群眾應該可以起極大的喚醒作用。」

他又說：「在學潮中，我曾經站過出來發表多次講話，我們的行動是在承擔中為未來書寫歷史。學生是對的，並且已經醒悟過來了，但民眾還是普遍地接受共產黨的威信，及政府給他們規定了的思維模式。我們這次運動的根本使命與五四不同，今日中國面對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國家都面對的問題。我們這場學生運動帶來的成果，不單為中國歷史寫下重要的一頁，也將會在世界歷史上取得很重要的啟發作用。」

再訪馬少方談學運組織及決議過程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按：八九年五月底在北京跟馬少方做了一次專訪，大約一個月後，我才整理稿件出來。十九年後，翻閱陳年舊稿後不久，我竟然有機會跟他在香港再次見面，呼喚記憶，靈魂相遇，恍如隔世。他說，坐牢也沒大不了，不必恐懼！我說，我沒法擺脫恐懼，雖然我沒坐過牢。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快到了，他是首批發起《零八憲章》的聯署人，我們曾經失去聯絡。

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再跟馬少方專訪傾談，這次具體談到學生組織之間的問題。我問他對話代表團、絕食團和北高聯之間的關係及意見是否有分歧。

他說，很顯然這三個組織對絕食或其他一些重大的決議，是曾經出現很大的意見分歧。他認為，針對絕食活動來說，北高聯和對話團都應該尊重絕食同學的意見。事實上，在絕食活動以後，北高聯只持理解及同情的態度，但北高聯是應該表示支持的。

他解釋絕食期間這三個組織之間的關係。北高聯是一個長期性的組織，絕食團和對話團都是臨時的組織，本來後二者是應該服從前者的領導，而三者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由於絕食同學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在廣場用生命來死諫政府，因此，北高聯和對話團便應該盡最大可能服從或幫助絕食同學達到絕食的目標。在絕食七天的活動期間，這兩個團體都致力做好這方向的工作，可惜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徹底。

五月十四日閻明復等政府官方與學生對話，對話團和絕食團有否好好的聯繫？他表示，當日絕食團的代表有出席對話會場，但沒有發言權，也沒有代表性，只是聆聽，以及由程真讀出一封遺書，表示廣場絕食同學的意願。

當日，對話團堅持要展開對話，認為這是難得的機會，可以解



決一些問題。但是絕食團同學則認為，政府說過會廣泛的與各階層展開多層次的對話，而絕食團要求對話有現場直播和不許拖延的，最後政府不答允有現場直播，顯示政府沒有誠意展開真誠對話，對話團就完全沒有理由要與政府繼續對話下去，這點對話團是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所以便終止會議，沒與政府繼續對話。

馬少方說，他後來也到了統戰部把絕食同學請離場，因為絕食團是不應參加對話團與政府的對話。

絕食是由幾位同學倡議的，包括王丹、吾爾開希、楊朝暉和馬少方等，這些絕食發起人是否想當然地成為絕食同學的代表呢？他說，事實上，很多同學都沒有把發起人視作絕食團的代表。

絕食是每一個同學自願自發參加的，即使中途退出也是自願性質。不過，大家都要遵守絕食宣言，亦即：「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換言之，任何人違反這條，便都不能算作絕食團的人。

他承認在絕食期間未及做好的一件工作是，沒有盡快普選產生一個絕食團的領導機關，不過由於緊急關頭，倡議者暫代這任務也未嘗不可，因為絕食宣言及誓詞是由倡議的同學起草，以發起和宣揚共同追求的政治目的，這是參加絕食的同學應該服從和守諾的。

既然同學宣誓說過：「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為何會在五月十九日決定停止絕食？他說，其實有八成同學是不贊成這決議的，他認為作出停止絕食的決定是草率、倉促和沒有道理的。

他表示，由於同學用生命死諫政府，只要有一個同學不同意，也就不好宣布停止絕食，其他同學若不願絕食可以自願退出，因為當時大家曾經說過，若停止絕食要百分之百的同學同意才行。後來作出了停止絕食的宣布，他個人表示很失望。

當時柴玲擔任廣場絕食團指揮，由於有很多同學被抬進醫院，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召開了各校代表會議，結果五十二票同意，四十票反對，兩票棄權，基於少數服從多數，作出了停止絕食的決

定，由柴玲宣布。

絕食在五月十三日開始，戈巴卓夫在五月十五日訪華，到底在選擇日期的時間考慮方面是否有任何關聯？

他說，五月十一日已決定絕食，而同學都知道政府在五月十二日有對話的答覆，在得到答覆後才決定絕食時間。由於政府的答覆是允許對話團派二十名代表，而學聯則可以派四十名代表，一起進行六十人的對話，而非單獨與對話團對話，這簡直是欺騙，所以同學決定用絕食作為手段示威抗議。

他認為，考慮五月十三日絕食，其實是有給政府讓步，因為當時考慮到十五日就是戈氏訪華，同學假定有兩日，約四十多小時時間給政府作決定，而絕食在十二日便宣布，政府是完全知道的，不過沒有誠意跟學生對話而已！

事實上，在絕食期間，有些同學認為絕食乃過激的行動，太快把學運推到盡頭，將來除了自焚外，很難再有其他行動，比這次行動更徹底的了。

馬少方對此點並不苟同，他說，鬥爭的手段中，自焚、絕水和大串連的激進程度遠遠超過絕食，他認為在這時期選擇絕食抗議是恰當的，因為第一次學運的高潮是屬於低估時期，而一切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怎樣才能給政府施加壓力，把學運推向第二個高潮呢？同學已採取非暴力和平方式進行遊行、罷課、靜坐等抗議行動，這些都不能促使政府給正義讓路，同學唯有選擇絕食了。

個多月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請願行動，令同學疲於奔命，但政府反應冷淡，似乎這次學運是甚麼結果也達不到了。

他認為，從狹義來說，這次運動確是得不到原先所要求的：「不是動亂，必須平反」、「平等對話，現場直播」等目的，但是卻從細小的要求，達到更大的目的，亦即重要的結果和有意義的目的都達成了。現在，人民對這個政府徹底失望，願意站出來要求改



革或解散這個政府，要求重新組織一個人民信任的政府，亦即有利於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對民主改革起巨大的推動作用，向前邁進了第一步。

五月十五日凌晨，十二名知識分子前往廣場聲援學生，以戴晴為代表，向同學提出兩點撤離廣場的條件：一．在《光明日報》全版刊登記者訪問知識分子，肯定這次愛國運動的文章；二．讓李鵬、趙紫陽站在廣場中，跟學生講句問候的說話。似乎這兩點要求蓋過了絕食同學原先的要求，知識分子的插手反映了甚麼？

馬少方毫不客氣地說，十二名知識分子修改同學的要求，這種求變通的做法，完全是知識分子那種奴性，亦即改良主義思想所導致。其實，他們早就已經知道政府不可能答應同學的兩點要求，所以希望能勸服同學放棄鬥爭，但這是廣場上絕食的同學所不能夠接受的。

固然，同學們內心會感謝知識分子的關心和愛護，但是對同學的要求採改良主義的態度，從同學們對戴晴的呼籲有異議的聲音可見，這是不受歡迎的。反觀知識分子的要求，其實也並非容易達到，是否他們跟高層有協議？

據馬少方所知，十二名知識分子是曾經到統戰部發表他們的聲明，因為在分析過中國政治形勢後，知道政府不會答應學生的要求，所以變通一下。一方面考慮到同學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也能給政府留一個下台階，以為能通過知識分子在學生中間的影響力來幫助政府渡過這次難關。

他認為，知識分子一直不敢與政府對立，跟學生所堅持的不同，到底甚麼時候才是民主進程的最好時機？還要等一百四十年嗎？幾代人之後再等幾代人就能沒錯嗎？他強調，民主不是自然而然到來的，是爭取得來的，如果不爭取，就永遠都不會來。經濟發展、利益衝突和權力分配，牽涉到人性、人的慾望等私利問題，如果不去施壓，它只會膨脹而不會收斂的。

到了五月十七日，絕食活動把人民喚醒過來，數百萬壯觀的人群參加全市人民大遊行，嚴重打擊政府的絕對權力和共產黨的威信，同學有否利用這個良機，把學生的鬥爭跟市民、工人和知識分子的鬥爭結合起來，成為大聯盟？

馬少方表示，其實最好是在五月十八日能停止絕食，把學生力量加進人民民主運動中，直接投入全民愛國民主運動的大潮流去。可惜，廣場出現了失控狀態，誰也不能勸服同學們停止絕食，因為當時同學的眼睛只是盯住所要求的兩點。

他說，這失控現象也正好反映同學對民主的認識並不屬於科學化的民主，而是處於與政府對立的局面。這是爭取民主過程中的重大失誤，不過在以後更大的運動中，亦可為同學們提供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同學到底怎樣做決定的呢？為甚麼會出現失控？

馬少方說，廣場指揮部做決議時，是由在場的各校全體同學委派代表出來商議和表決的，但是柴玲能代表北大，程真能代表北師大嗎？她們能否真正代表各自院校同學的思想，本身就存在問題。事實上，出來表決的同學，都表示能代表學校，而學生能否代表同學的意願，就要視乎同學代表能否把每個同學的反對意見，採納及補充為自己的意見，或者盡量令反對的接納自己的意見，試圖說服他們。

五月十五日凌晨，絕食同學在天安門廣場為應否轉移一下的問題爭論，當時同學已經否決了十二名知識分子的兩點要求，也不等李鵬和趙紫陽出來了。同學認為他們到廣場來說聲你們好，沒必要了，同學也不會撤退的，因為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只是一種欺騙，對學生不公平。

由於戈巴卓夫訪華，同學為轉移絕食場地的問題傷透腦筋，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贊成轉移，希望絕食同學以大局為重。當時，這



些自願出來絕食的同學對政府還抱有一絲希望，還未完全失望，所以沒有理由不給政府作一些讓步，向全國人民表示，同學對政府還抱有誠意。但是，另一方面亦有很多同學認為，既然絕食是用生命來向政府死諫，政府一直以來對同學沒有誠意，同學又有甚麼理由讓步？

兩種不同的意見，由五月十四日上午爭論到十五日凌晨還沒有結果。馬少方說，主張轉移的同學不希望影響戈巴卓夫的訪華行程，同時亦希望表明絕食跟戈巴卓夫訪華沒有直接聯繫，而且所有同學對戈巴卓夫訪華都表示歡迎的，所以十五日凌晨六時許，絕食同學採取了由紀念碑的北側轉移到東側的行動。

其實在採取這行動之前，反對轉移的意見亦很強，所以曾經宣布過原地不動。當時意見存在很大分歧，學生領袖無法說服絕食同學，最後吾爾開希以個人身份勸同學顧全大局，貫徹愛國精神，希望同學接納他們的意見，挪一挪讓出廣場中央的地方，歡迎戈巴卓夫到訪。馬少方當時亦有發言，他認為由北側轉移到東側是順乎民意，有利於堅持鬥爭，乃是明智之舉，所以可供同學參考。

終於轉移行動成功了，同學收拾被舖，拖着疲憊的身軀，由學生糾察隊開路，順利轉移了，然而，轉移過程中，卻也有很多同學不支暈倒。其實，即使轉移，結果還是佔用了廣場的一側，外交禮節上的歡迎儀式始終無法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而且廣場實在髒臭得很厲害，滿地垃圾、紙碎、破瓶，戈巴卓夫肯定不能來啊！

馬少方說，這是策略問題，不佔用北側，政府就不能向同學施壓，但是絕食的地點一定要堅持在廣場，這是不能改的。不過，同學也真的沒有考慮到政府是這樣無賴，絕食了四十多小時，還不給同學答覆。

他也承認，只挪一挪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用，但至少可以表示對戈巴卓夫的歡迎和尊重，因為戈氏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政治改革

家，而中國的問題正是政治體制不改革，所以歡迎戈氏訪華，是希望中國政府能向戈氏學習，進行徹底的，根本性的改革。

絕食的七天裏，他說在繼續絕食和停止絕食之間是曾經有過猶疑，但是見到同學一批批倒下時，他再沒有猶疑了，主要是因為有救護設施，同學的生命並沒有太大危險，而且繼續堅持絕食是希望迫使政府能夠滿足同學的要求。

在絕食到了第五、第六天，北京出現了大規模全市人民大遊行，但是仍未能促請政府答應同學的訴求。當市民也起來的時候，便已經變成由市民採取實質行動，將學運性質定性為「愛國」而不是「動亂」了。

他說，戈巴卓夫結束訪華行程後，李鵬曾經看望過學生，但學生認為李鵬是以政治投機分子身份到廣場，沒半點人道主義思想，對三千多名絕食同學的死活毫不關心。很明顯，李鵬關心的是內部政治的權力鬥爭，要奪回他認為必須奪取的權力。

至於趙紫陽也來看望學生，他不敢說趙紫陽是不帶政治目的來廣場，肯定是有的。但那天，趙非常誠懇地勸同學停止絕食和返回校園，並掉下眼淚，這至少是有良心和站在人道立場，對每條生命愛護，而李鵬連這點人性也沒有。

之後，李鵬與同學見面、談話毫無誠意，令同學十分失望。李鵬曾說，要紅十字會把廣場上所有絕食同學全部送去醫院好好護理。當晚，絕食同學因避雨已走上絕食車，他們恐防政府真的強行把他們一車車運走，有同學激動得把絕食車的車輪刺破，使車不能開動。

對話又再不歡而散。馬少方表示，他不贊成絕食團跟政府有這種接觸，因為既然這是用生命來死諫政府，向政府提出請願和要求，就不應該有任何政治上的買賣。

政府怎樣表態，同學才能滿意呢？



馬說，中國政府應該盡快通過新聞媒界直接及以實質行動來滿足同學的要求，而沒有必要跟李鵬接觸。

同學在甚麼時候發現政府內部權力鬥爭激烈的呢？

他說，在同學未進行鬥爭之前，已經知道政府內部派系鬥爭非常激烈，而兩派都想利用學運整黨和推翻另一派。學生是沒有能力逃避或不被他們利用，但是有能力主宰自己和作出抉擇。

總之，不管那派上台，阻礙民主進程的就反對，推動民主化進程的就支持。五月二十日，李鵬宣布戒嚴、軍管，這是中國的大倒退。這個人不可能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會為中國帶來貧窮和落後，所以要徹底反抗他的領導。他說，同學已清楚看到這個政府是他媽的王八蛋呀！

政府的態度很強硬，而學生的組織又因為缺乏經驗而渙散，沒法協調行動，很多外省同學湧到北京，但廣場缺乏有力的領導和指揮，市民不可能持續地早晚去堵軍車，每天給廣場同學送水送吃的了，運動這時已呈膠着狀態，令人擔憂。

馬說，撤留問題爭論了好幾回，往後運動該怎樣發展誰也估量不到。現在已不可能撤了，天安門廣場必須堅守，因為很明顯它已成為民主的象徵地，留在天安門就表示民運尚未結束。學運已經成為民運，北京天安門廣場這地方更成為全國人民民主運動的聖地標誌，任何撤退的決定都不能符合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人民心理。

到底要堅持到甚麼時候，沒有人知道，因為這是長期的鬥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不過，留在廣場就一定要搞好秩序、組織人員及注意衛生問題，這些整頓工作後來也慢慢展開了。

至於大串連的工作，其實亦醞釀着開展，當時不少外省來京的同學都回去把北京的情況廣泛宣傳，而北高聯也有人建議空校運動，有組織地向各地統一宣傳，同學是策劃着一次比文革大串連更有組織，和更明確的宣傳綱領的。

將現在的運動跟文革比較，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馬少方說，他還沒有很深刻地思考這個問題，不過文革是自上而下蔓延至全國，基本上是否定民主和人權，這跟今次運動完全是自發的，要求民主和人權很不相同。文革時期的大串連是很有目的地將官方的宣傳深入到社會各階層及每一個角落，如果這次運動進展到大串連的話，問題就複雜得多了。

對學生而言，現在是面對着新聞封鎖，如果不走到全國每一個角落，就很難讓全國人知道，北京到底發生甚麼事。因此，是新聞封鎖迫使大學生走上大串連這一步，希望廣泛地將北京的學運訊息和民主思想，傳達到全國各地。

談到會否造成文革時期的大動亂，他認為，北京人完全有能力維持現狀，有信心將這場運動拉到大串連這一步。因為在這個多月來，北京沒有混亂，也沒有動亂。而且，他相信北高聯是有能力讓同學有秩序地到各個省份去宣傳鬥爭的方向，把北京同學和市民的非暴力和平鬥爭方式帶到全國各省，這樣就能令鬥爭越燒越旺，而各省地區也能通過這場非暴力和平的鬥爭令社會安定、和平，這跟文革時期也很不一樣了。

學生是反對暴力，反對流血的，畢竟他們還年青，還比較熱愛生命。他說，同學都希望這政府能夠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流血。但是，假如政府真的希望造成流血事件，也許這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這流氓政府越早做這一步，它就越快倒台。當然，這群年青的同學，還沒有經歷過文革及「四五」天安門事件，始終還是顯得感性激情一點，是否真的對流血、死亡沒有恐懼害怕？

馬少方說，同學是有點怕的，也不敢說所有學生都不怕流血。事實上，這流氓政府也曾有過鎮壓的先例，實在不能不提防他們會下毒手。



後記

六月四日，這流氓政府終於下毒手，用坦克車、裝甲車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用衝鋒槍、達姆彈槍殺手無寸鐵的市民。慘烈的大屠殺引起民憤，恐怖還在延續，這政權仍以猙獰的面孔進行輾壓、吞噬、殺戮、炸裂，血還在流，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完結。

跟馬少方做訪問時，當然沒估計到會有這殘酷暴戾的結局。那天他還透露，會以北高聯為中心，另外搞一個民運組織，類似成立一個獨立的民主黨派，成員由普選產生，而最高綱領及總原則還在草擬中。

過幾日，他又表示會去其他省份大串連。六月一日出發了，六月二日我們還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六月三日晚他趕回來，因為吾爾開希通知他，北京形勢十分緊張。六月四日屠城的時候，他在廣場站在第一線，坦克駛近時，他無畏地迎着坦克。後來跟隨大隊撤退，他與勇敢不怕赴死的同學，安全地撤離天安門廣場。

後來聽說他六月五日離開了北京，逃亡到廣州。他變成被政府追捕的學生領袖通緝犯之一，最後的消息是六月十七日，他在廣州向公安投案。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專訪八九年剛逃亡到香港的蘇曉康

「學生被一步步迫向對抗」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



按：這是一九八九年九月蘇曉康逃亡香港時，接受我獨家訪問整理出來的對話筆錄，這份採訪稿從沒有發表。二十年後，我和蘇曉康在電郵聯繫上，徵得他的同意，公開當年他剛踏足香港，驚魂尚未甫定，接受我這陌生女子的採訪。那時，我帶著興奮的心情跟自己仰慕的啟蒙作家見面，認識他憂傷的眼神和敏銳的思路。結束訪問時，他眼泛淚光告訴我，失去大地的流亡作家是沒有生命的，他在百日流亡面對最恐怖的一刻，是決定逃亡出走後，有接頭人拿著他兒子的照片來憑相認人，他一下子全然崩潰了。我親歷「六四」時沒有流過眼淚，回家後只是牽腸掛肚，茫然若失，直至遇見他，我才認出。正巧他離開香港那天，是「六四」百日祭，勾起廣場清場時的恐怖血光印記，坦克進城輾軋人體和開槍鎮壓摧殘心靈的幕幕景象，難以磨滅，我第一次躲起來失聲痛哭。自此以後，我經常抑鬱終日，熱淚盈眶。

記者：可否先談談你的流亡生活和感受？

蘇曉康：我是從五月二十二日開始逃亡，直到最近已經歷了一百多天的恐怖生活，現在剛剛平靜下來，所以許多問題沒有好



好地想。人在恐怖當中，很多問題不能想得出來，只能想些現實的、生存的問題。說來很可笑的，我躲得比較早。我在戒嚴令一下就躲起來，為甚麼呢？因為我知道中國的局面一進入白色恐怖的話，他們馬上就會抓人，我有這種預感。

去年，公安部就列出十大現象，即反對共產黨的十種人，其中第六種就是我，就是以蘇曉康為代表的文化政治勢力，其餘包括第一種是方勵之啦，還有王軍濤等都是，金觀濤的《走向未來》叢書等學派都是，再加上《河殤》這場風波，我是預感到如果中國一旦有大的逆轉的話，我們肯定非常困難，因此戒嚴令一下，我在凌晨從廣播中聽到消息，第二天我就走了。

他們已經對知識份子及文藝方面的作品上壓制你、批判你，例如，《河殤》給批判，《烏托邦祭》給封殺，我搞的《五四》片集搞了一半不讓搞了，這都是宣傳部或是出版局出面，但在他們的後面還有公安部，公安部從來沒有露過面，但他們已經把我們作為監視的物件。我說的十種人，是去年的事情，今年年初不是搞了個三十多人的簽名嗎？之後，據說，個把星期約十天左右，就是陳軍出事前後，三十三名簽名的全部都被監視了，有特務在家門口附近盯住你、跟蹤你。

記者：你也發現自己給跟蹤、監視嗎？

蘇曉康：我沒發現，我比較遲鈍，也沒經歷過這事，看不出哪些人是特務。後來，老木告訴我，最近有人盯你，種種迹象說明，如果大局穩定，他們只會從意識形態上批判、壓制，而不會威脅你的人身安全。一旦出現大衝突，就必然抓你，這事以前就有預感。所以，我這種狀態、處境也使我

在學潮當中不是那麼很積極。我想先談談這一百多天躲起來的感受，我感覺到危險，但我不大相信會抓我。開槍之前，我離開北京，但並未真正躲起來，到六月開槍以後，馬上知道白色恐怖就要來了，我才真的藏起來。當我真的知道七人通緝令時，當時心情，怎麼說，總覺得很冤枉，好像夠不上要通緝我，夠不上被通緝的資格和條件，因為當時通緝是按照參與學潮的程度，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參與過甚麼，怎會通緝我呢？但我的朋友們比我都清醒，就認為你是跑掉的，肯定要抓你。當時心情，一方面感到很委屈、冤枉；另外就總是抱有幻想，因為從廣播裏、電視裏看到了甚麼，人大常委會萬里講的要以法律為根據，以事實為準繩；民主黨派的領袖們都給中共提出來，要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區別罪與非罪的界線，聽到這話，覺得很對自己的心情，覺得不會對我怎樣。

但你瞧，它已經開槍了，我當時還有這麼的幻想，認為他不至於這麼瘋狂，我甚至去找了刑法看一看，給我定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要判幾年徒刑。人在那個時候，說起來很可笑呀！但確實是真的，後來藏得更加秘密，更跟外界切斷一切聯繫，電視也看不到，甚麼也沒有，躲在屋裏，不能出去，不能開燈。有一度精神已經崩潰了，每時每刻都恐怖緊張，沒辦法，睡不著覺，食不下飯。後來我的朋友們，明確的告訴我，你不要抱任何幻想，抓住你，起碼要二十年徒刑，甚至會殺了。我過去一直不太相信，直至我出來以後，我才感覺到，確實是這樣的。從我自己的經歷來看中國知識份子，對於暴力，對於共產黨殘暴的本質認識很少，起碼我是這樣，雖然我經過文化大革命，看過很多殘暴的事情，但臨到真的領教時，總不大相信。

當然，我躲起來以後，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廣場發生甚



麼事？電視看到一點，很多事情不瞭解，北京全國濫捕濫殺的情況也不太瞭解。我後來才逐漸的聽到我的許多朋友被捕，很多跟我合作寫東西的都給抓去，甚至刊物發了我的作品，編過我的作品的編輯都被捕了，真的覺得他們確實是瘋了。

那麼出來的事情也是這樣，原本是不想出來的，一直不想出來。後來才覺得絕望了，沒辦法，不想就這樣被抓去後，恐怕就活不成了。可以說，學生也好，人民也好，知識份子也好，對於他們敢於向人開槍、屠殺，以至屠殺後的白色恐怖，是毫無思想準備的。到了這一步，我想了很多的問題，能夠跑出來，做點甚麼？一開始想，比較簡單，總覺得我是寫東西的，他的作用就在他的作品上，去做職業革命家？不是我們的所長呀！開始時不是太想直接去從事所謂民主運動。去海外後，還是想能夠保持一個作家的身份，寫點東西。出來之後這幾天，我所想的有了點變化，怎麼說，我覺得那麼多朋友營救我，香港的朋友冒生命危險，出了那麼多錢把我們救出來，到底為了甚麼？叫我們去海外當流亡作家？還有，我們到底還可以寫些甚麼呢？寫的東西不能給大陸裏面的人看又有甚麼意義？海外誰要看這些東西呢？這就是很矛盾，不知道流亡的角色怎樣扮演，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從八五年以來吧，我有一個原則，就是我以我的作品發言，我不作其他表白。所以，當《河殤》遭到極大爭論的時候，我的合作者都出去到處講，但我不講，我不願意講，我覺得我的作品就是我最好的發言。

另外，我在北京的時候，也不大參與知識界的活動。我參與比較多的是文學界的事情，討論我的作品吧，超出我的範疇，一般我都不去，我覺得我畢竟跟那些搞理論的人不

太一樣。搞理論問題可以對形勢、對局勢、對政治問題發表他們的見解；我們搞文學的，也不大能說清楚，只能寫作品，通過作品來表達我自己的想法，對與不對由社會去評價。

可是，後越來越來不行，越來越把你往那個上面推，特別是《河殤》之後，他們把這些文學作品都看成是政治問題。《河殤》問題是這樣的，在國內，官方認為我們反動，污蔑中華民族，詆毀中國偉大的傳統，就這麼一個調子；海外、港臺，特別是臺灣，罵我們是不敢批評共產黨社會主義，而去批評老祖宗，這兩者都是把《河殤》當作政治問題來看待。

我們的出發點不是從政治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是檢討中國傳統得失，當然了，我們表達了一種政治現實，而且盡可能容納許多許多的觀點，這不僅是我的觀點，我還把很多觀點歸納起來，所以《河殤》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就是它裏面有很多矛盾的，原因就在於集大成，很多觀點都彙集起來，觀眾可以看，自己去作判斷，我不怎麼提供結論。我提供的結論也是一種形象型的，或者是情緒型的東西，由於它的反響很強烈，結果被上層政治權力鬥爭利用，把我們擺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上。

另外，在報告文學界，我被他們說成是繼劉賓雁之後，繼承劉賓雁那種報告文學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作家，認為我是第三代報告文學作家，這一批人批判現實主義，揭露現實問題的。我當然不覺得完全是這樣，有繼承的一面，但也有變化的一面，我覺得這種批判現實主義是一種傳統，也不一定是繼承劉賓雁，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它就是批判現實，它的功利性很強。從梁啟超開始，談小說功能，它就是一種政治功能，講得很明顯的，講救國喚起民眾，可



我們這種批判現實主義的流派，就在政治上被擔上很重的政治色彩，儘管你口上說不參與政治，不參與具體政治活動，但是官方還是把你看成是政治上的一種反映。

記 者：現在中共把你們這些作品看成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你認為公平嗎？

蘇曉康：當然不公平啦！我對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不同意呀！是很荒謬的提法，甚麼是資產階級自由？根本不成立。為甚麼胡耀邦、趙紫陽在反自由化問題跟他們的看法不一致？首先就是這個提法有問題。不錯，我們從文學角度想對人民啟蒙，這點毫不諱言。不僅官方這樣批評我，連評論界也這樣批評我，說我們是政治功利主義，有政治目的。他們認為他們搞純文學的沒有功利，為藝術而藝術的。結果在學潮起來後，我在上海去領獎，上海《解放日報》搞了一個文學新人獎，上海有一派評論家也罵我，批評我是功利主義，認為我代表文學上非常墮落的功利主義。我是記者出身，然後轉去搞文藝創作，那我就帶有一種記者的特點，寫的東西都是真實的，我覺得虛構的東西沒有真實的那麼感人，而依我的看法，中國的文學一直接近現實生活，內容上很淺顯，形式上就很難有比較高級的發展。因此我覺得文學應該分成兩個方面去走，一部份作家應該去寫現實的東西，人民都看這些；另一部份作家完全可以自我追求、孤芳自賞，鑽象牙塔，沒關係。可以發展文學的純形式，不要排他。現在互相排斥，爭吵得很厲害。

記 者：這次學運發展到民運，中共政府常說幕後有黑手，但知識界很遲才出來，是甚麼原因？是否時機不成熟？

蘇曉康：首先，中國的民主運動，從粉碎四人幫之後，西單民主牆遭到壓制，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發展，作為運動言是這樣。這不是時機問題，它從整個群眾基礎、理論準備、實際經驗，都有欠缺，往往是碰到一個偶然契機，就爆發出來。這個跟中國的社會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有關，尖銳時就容易爆發出來，所以它不是很自覺的，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偶然性。

從西單民主牆之後，中國知識份子實際上不斷積累，不斷地從各方面檢討中國文化、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不斷地進行思想啟蒙，沒有一個自覺的意識搞政治運動。知識界遠遠沒達到這一層次，首先大家不敢組織起來。包括這幾次出現的學潮，它所追求的價值目標，跟民主根本是兩回事情，不是追求人權這東西，追求的是反腐敗、反官倒、反貪污這些平均主義的要求，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要求。

方勵之在這方面，我覺得他是比較超前的，他抓住了人權的問題，可是回應的人卻極少。一般的工人、老百姓對這個不會感興趣，雖是最基本的，但中國人沒有這觀念，思想解放運動雖然進行了十年，但是禁區太多呀！每想突破一個禁區，馬上帶來極大的壓制，從清除精神污染，到批判自由化，不斷突破禁區。八六、八七年的學潮，學生堅持不提工資問題，運動由上海學生最先鬧的，工人就要求你們要提工資，我們就跟你們一起上街，但學生堅持不提。當時大學生在這問題還是比較清醒，這種口號，反對漲價、通脹，是很低的經濟要求，我們現在要提更高的政治要求，所以後來很多人批評學生，認為學生太幼稚了，不去團結工人。那時候，經濟改革，是要漲價的呀！不漲不成，這是經濟規律，但那是工人反對的目標，學生不願意苟同，結果得不到工人支持。



這就可以看得出，中國人在民主化、現代化上，不同的利益集團，不同階層的目標完全不一樣，這目標上就沒有辦法統一，它就無法形成一個很有目的、有秩序的群眾運動，它必然是狂風暴雨的來臨，狂風暴雨的退去，理論上沒有準備。

我覺得這次學潮也是這樣，以胡耀邦之死而突發，本身就很像四五運動，也跟八七學潮非常像。

初期知識界怎樣我說不清楚，我自己當時的看法就覺得又是借一個死去的人做文章，我猜學生的心態，覺得上一次學潮把胡耀邦弄倒了，這次胡耀邦死了，學生有一種內疚的心情，我看過很多學生寫的輓聯，以嘲諷、調侃、戲謔來表達學生那時候的複雜心情。很明顯，它背後還是對中國出現倒退有一種反抗和希望改革向前。依我們的看法認為，由於八六、八七年學潮的失敗，大學生出現一種非常嚴重的幻滅，他們的口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關我屁事」。他們不願意關心政治了。我在大學教書，當時的大學生都很頹廢，他們被批評為文化上營養不良、政治上虛無主義、道德上墮落的一代。

當時，我也想寫這一類的報告文學，講八六年學潮的這一代青年，最優秀的大學生，對一切都失望了、幻滅了。不過，這一次，我發現這判斷是不對的，說他們營養不良、道德墮落、政治虛無也好，完全不對，這次學潮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這次把學生鎮壓以後，我也曾一度認為，這會對下面的一代造成很大的影響。後來我想，中國青年不會幻滅的，他們會更加厲害。這要我們好好研究這個現象，涉及對這一代青年總體上的把握。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比較著名的有《第四代人》，分析這一代大學生的，用我剛才所說的那一類調子，這本書的其中一個作者就曾

公開寫文章，支持鎮壓，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

記者：知識界在八九學潮中，以改良主義的姿態出現，學生並不十分接受，知識界是怎樣出來的呢？

蘇曉康：悼胡以後，北京的大學很熱鬧，眼看一場學潮要來。我想可能會跟八七年差不多，鬧一鬧就過去了，我們也有一個想法，這東西肯定會被政治上層的權力鬥爭所利用，是必然的，誰利用它，誰高明，利用學潮達到權力重新分配、更迭的目的。那時候趙紫陽地位受到威脅，改革出現問題，被攻擊得很厲害，鄧小平還是想協調的，可是學潮爆發了，極像胡耀邦當年情況。因此，我個人覺得歷史肯定會重演，所以不想參與。而很多人跟我的心情也一樣，都看過這一幕，所以沒有在意。

後來，四月二十日凌晨新華門事件，十九日晚上就有北大的幾個青年教師來找我，講及新華門警察打人，壓死了一個學生，他們指責我，問我為甚麼到現在，知識界沒有一個人出來？說學生就是看了你們的書、你們的文章，是被你們啟蒙起來的，而學生現在站出來了，你們卻不動。我也覺得確實是這樣的，起碼，知識界應該出來，提醒政府，應該跟學生對話，不能用武力鎮壓，起碼要說這麼一句公道話，所以首都知識界作為一個局外的、第三者的角色開始介入這場學潮。

第二天，包遵信發起了聲明，二十一日開始了簽名，我也簽了。包說，這是知識界的第一次介入，還想帶有知識份子獨立不參與政治的、完全是站在政府和學生之外的這樣的情況。這也很自然，整個知識界對學潮毫無思想準備，也不大贊成學生這樣弄。



記者：為甚麼還說知識份子幕後黑手？

蘇曉康：這完全是無稽之談。當然，要說這幾年所作的事情對學生造成的思想上影響，我們無法推脫。你說這就是策劃動亂，說知識界搞了這樣那樣的沙龍、討論會都是策劃動亂，在法律上根本說不通的。知識界這些年來的確對中國的問題提出了很多這樣那樣的解釋，做了這樣那樣的宣傳和啟蒙工作，在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當中引起了很巨大的影響，但人民接受它呀！我覺得，完全沒有甚麼處心積慮、有計劃、有計謀的去組織這一場學潮，誰也組織不來。我當時的感覺是，這批學生，當時誰也操縱不了，別說知識份子能操縱，連政府也操縱不了，沒人能操縱得了。

記者：你怎樣反思這場學運，以及它起了甚麼作用？

蘇曉康：四月二十七日那天，我從上海返回北京，中午一到火車站，交通就全面中斷，北京市學生大遊行呀！我在上海只聽說「四二六社論」，上海學生也想動，但上海市委壓得很厲害，結果同濟大學九個學生來找我，想問我意見，會議上的人很怕學生來找，說我回北京了。

在北京，人們對我說，四二七的遊行多壯觀呀！我突然覺得學生了不起，不得了，因為學生打出了憲法的旗幟，打出了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而且組織得非常有序。從四二七大遊行，知識界就看到這次運動超越上一次，有一種理性的、秩序的東西在支配它，而且受到百萬北京市民的擁護。

如果分析一下在中國怎樣搞民主運動才能搞得成功，要爭取盡可能多的人使獨裁政府害怕，這實際上在四二七大遊

行已經作出來了。很明顯呀！像八七年的學潮，學生提出很理論化的口號：「要民主、要自由，反獨裁」，沒用的，老百姓不跟你呼應，產生不了共鳴，而且要喊「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這口號，老百姓根本不敢跟你站在一起的。

所以，四二七大遊行出現以後，知識界就有人出來組織了，新聞界、文藝界、理論界也站出來，都受了感染，而且實在是學生表現的理性精神和秩序，在這前提下才敢這樣站出來逼使官方讓步，是在這個基點下，統一起來。後來問題很複雜了，就是官方不退步。我現在才感覺到，是老人政治不肯在四二六社論往後退，他們以為往後退就完蛋。這邏輯對他們來說是對的，因為四二七表現出來的一種巨大的正義力量，他們面對的再不是過去那愚昧的、暴動的、騷亂的群眾；他們面對的是非常策略、非常克制、非常難對付的群眾，其實任何獨裁政府最怕的就是這個。如果是一群暴民，它不怕，以安全理由鎮壓就完了。但這情況下退的話，的確共產黨可能要走一條新的道路，再也不可能獨裁的局面。我把整個政府看成是一個舊的傳統中央集團，把整個人民群眾看成是要求民主力量，所以它面對的是一種力量，這力量是按照民主程序，按照現代政治手段來進行一種非暴力、和平的這麼一種民主運動，這是任何一個獨裁政府最害怕的。所以我現在認為，經歷了六四屠殺之後，我們還有沒有信心，有沒有勇氣，仍然堅持一種理性的、非暴力的鬥爭？是不是六四殺了人啦，我們也只有用暴力對付暴力，是否應該這樣？

四二七是一個很大的轉折，是一個真正的現代民主運動。如果中國有現代民主運動的話，就是從四二七誕生的，而且是由學生創造的。至於學生怎會這樣出來的，按照陳希



同報告說，是有人在後面出主意的。我不在北京，據我所知，也不可能有人操縱學生，因為學生也有矛盾分歧，能產生這種共識，最後大家贊成這方式，這說明是學生自己創造的。

因此，過去對學生的判斷是錯誤的，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一代，不對嘛！他們在關鍵時刻，是非常理性嘛！他們一開始就讓全世界、全國人民目瞪口呆。據說鄧小平看了四二七大遊行的錄影後，連連叫後悔呀！連連說上當、上當！不知這是真還是假，反正當時共產黨一籌莫展，沒辦法。看學生扛著憲法，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原則，警察沒辦法只有撤。有人說，學生打著紅旗反紅旗，包括我們一些知識份子也說學生是實用主義，不是啊！這就叫做理性，因為他們看準了在中國當前甚麼樣的口號，甚麼樣的方式，能夠團結最大多數，使獨裁政權感到害怕，這就是理性，是最高級的政治智慧。

記者：為甚麼政府會表現得一錯再錯，學生也好像一樣，錯過了機會？

蘇曉康：這裏面，有一種難以避免的命運在裏面，悲劇性的東西。這麼一批優秀的學生，碰著的恰恰是一個腐朽的老人政治，它有它的偶然性在裏面，如果這樣一場學潮，爆發的是在四人幫的時候，鄧小平只有七十多歲，整個共產黨政權沒有那麼腐敗，它也沒有感覺到那麼巨大的威脅，是不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這種堅決拒絕對話，堅決拒絕用和平的秩序、法律的形式來解決矛盾，反而訴諸暴力，一步步把學生逼向對抗，完全是用心很明顯，你不是說不動手，和平嗎？我就逼得你要跟我打，這一打，一動手，就有藉口把你打死。

對方就是這麼一個東西，之所以會這樣，跟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是這麼一種心理狀態有關係。我覺得有特殊性的，不是必然的，因此我不同意絕對要推翻共產黨，我不這麼認為，只有某種特殊性，並非共產黨必然要這樣做，他們現在的統治是長久不了的，是冒天下大不韙呀！

記者：現在的中國，就一個人便可以破壞了改革。這一個人或幾個人就可以消滅整個中國的希望了！

蘇曉康：是這樣子的，他一個獨夫民賊就可以把整個中國這民族向前進的希望破滅了，但結果是甚麼？戊戌變法之後，辛亥革命就起來打倒皇朝，孫中山以為這政權一旦打倒，他就可以搞共和了，結果歷史不是這樣，他一打倒皇帝，遍地就是軍閥混戰。從一九一零年辛亥革命一直到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基本上統一中國，整整十七年，中國一片混戰，人民塗炭，整個生產力給摧毀，甚麼現代化都沒有。孫中山在討袁之後講過這樣的話：「軍閥混戰，世道黑暗，比沒有皇帝更糟糕。」這用現代化理論來說，你把東方政治打掉後，想重新組織它非常困難，最好的辦法，最高級的智慧是改變它，在它不崩潰的情況下改良，人民付出的代價是最少的。打掉它的結果也還是沒有現代化，所以事情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

記者：知識界表現得很軟弱。你們不敢闖過去，所有難題還存在，沒有一個突破性。

蘇曉康：不是軟弱的問題，這怎麼是軟弱？誰能突破？學生能用拚死到底的方法解決問題嗎？坦克壓過來，機關槍一開，不照樣打敗？血也流了，沒有用的，中國照樣是黑暗的，不能解決問題呀！趙紫陽垮臺了，本來趙不垮臺還有點希



望，現在我們沒有甚麼了，你想組織武裝跟他打，不靠外國勢力支持，不可能。你想等中國人民覺醒，不可能。只能等甚麼？只能等鄧小平死，鄧死後，它內部的權力之爭重新爆發，然後才可以借助這種力量。不把趙弄垮臺，趙還當總書記，改革還能維持下去，那多好呢！

用武裝鬥爭的辦法，結果把它打垮之後，你自己也異化，你起來也會跟它一樣的。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暴力就在這兒，共產黨本來是一群知識份子組織起來，後來遭國民黨鎮壓以後，他就覺得要自己武裝起來，搞自己的軍隊，毛澤東起來了。搞武裝的結果，把共產黨全部都異化掉了，等它奪取政權以後，他自己又變成比國民黨還要壞的黨，就出了一個比國民黨還要壞的政權，而靠五四精神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完全沒有繼承五四精神。

這次學潮、四二七遊行，後來走到絕食。按照學生當時的心理狀態，用遊行、用對話，種種辦法都不行的情況下，學生有點兒絕望了，那麼就採取了一種最激烈的方式，就是以傷害自己來跟政府碰，所謂甘地主義，他們也是把對方假設成是理性、有良知的。那麼，這行動的結果是甚麼？它感動了整個人民，是一種道德的力量，這跟開始時候的理性有點變了，不太一樣。這是傷害我自己，大家都同情我，整個學潮，民主運動已經沒有甚麼政治上的口號或目標，學生與官方談的是一些很具體的問題：學生要求平反、直播，而官方就要求停止絕食。結果，當兵的挨了打，特別是那幾個被燒死的，北京老百姓也不是那麼恨當兵的，是同情當兵的，也是一種道德、情緒化的東西產生作用，中國就是這樣，誰弱我就同情誰。很多人轉去同情解放軍，解放軍可憐啦！

所以學潮到後來，放棄了理性精神，而轉去求道德、感情

的元素，我覺得本身就是一種異化，已經離開了它開始時的路向。從絕食開始，整個北京老百姓都給召喚起來，那麼老百姓是被什麼東西召喚起來呢？是從同情的、可憐的，每一個街道老太太都可給召喚走來，看起來轟轟烈烈，非常感人，但它並沒有起到甚麼特別積極的作用，到最後就導致完全失控、完全情緒化了。全民上街堵軍車，確實是悲壯呀！但這時候，已經沒任何辦法來妥協了，找不到任何轉機了，一步步的逼到最後，趙紫陽就這麼樣的攤牌被撤了。靠這樣的一種力量，是不是能夠逼使中共退一步呢？按道理是可以的，可是你碰到的是一個極端腐敗，極端政治恐懼症的一批老人，他們更覺得沒有路可以退，必須鎮壓了。

記者：制度有問題，毛病很多……

蘇曉康：沒問題的，問題是你怎樣改變制度，毛病很多，一定可以慢慢改。我們就是想辦法叫制度變，不是就在做這個工作嗎？中國的問題很明顯，首先必須改變經濟制度，造就一批中產階級，這個社會整個基礎就會變了。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就是這樣搞出來的，商人產生了企業家，成了獨立階層以後，它就會提出政治上的要求，就要跟貴族爭天下。中國也是這樣，從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之後，然後產生了這一批個體戶也好、企業家也好，或者中產階級也好，這要先形成，跟知識界的力量結合起來以後，就能形成很龐大的社會力量，就可以從經濟自由化發展到政治的民主化。

你說，打倒共產黨，誰去打倒它，可能打倒它嗎？沒有可能。蘇聯的例子很清楚，蘇聯共產黨出了一個戈巴卓夫，他要改，他自己要挖自己的根基，當然戈的現象還值得深



研，起碼要比布列日涅夫好得多。中國還不是十年文革迫出鄧小平，改了十年後中國還有很多變化，然後就產生了趙紫陽、胡耀邦。現在的問題是保守派把趙紫陽、胡耀邦擠下去，又把鄧小平拉回去了，鄧小平自己要回去了，他倒退了。不是說鄧小平開始就是壞蛋，或者共產黨從四人幫以後就沒有好過，不是這個結論吧。

所以我們說還要寄希望於此，道理就在此呀！它已經出現公開開明的力量，已經出現願意改革的苗頭，還要設法使這種力量壯大起來，讓它主動的領中國走過去。你如果把它推翻掉，你們既沒有手段，也沒有這力量，沒有這個可能，那麼就是白說呀！沒有用！這就是我說的，為甚麼學生打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社會主義、共產黨的口號能夠取得重大的勝利。想想，這口號，這東西，學生勝利了，而且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和讚賞，而且它只能在反腐敗、反官倒這樣的一個最低要求下才成，如果提的要求很高，沒有人敢支持，學生運動就搞不成，搞不起來，就不會對中國社會有任何改變。

記者：就是說，不這樣就會脫離現實性。

蘇曉康：當然，你不可能搞起這民主運動來，香港也是呀！你現在弄幾個人說我們香港獨立，不跟共產黨走，有多少人跟著你上街？道理是一樣的。香港能提這口號嗎？這口號在大陸跟打倒共產黨一樣。

記者：如何評價現在的中國共產黨？

蘇曉康：中國共產黨，說起來非常複雜。中國社會在辛亥革命，軍閥混戰，皇權垮臺之後，首先的任務是統一，剷除軍閥，統一中國。國民黨基本統一了中國，所以二七年以後，蔣

介石開始現代化；三七年抗戰爆發了，中國現代化停止；八年抗戰下來，國民黨腐敗，這時候共產黨起來，它掌握了中國大陸；四九年是中國又來一次統一，又開始回到可以走上現代化的開端，就跟二七年一樣的，又回到這。所以在辛亥以來到一九四九年，這五十年的歷史，基本上對中國來說就是統一的問題，回到原來晚清皇朝那一個基礎上去，才可能往前走，這責任不在辛亥革命，責任在滿清皇朝，它不敢前進，人民就把它推翻。但推翻的結果不是現代化成功，而是一塌糊塗，然後又要五十年的時間去統一中國，再搞現代化。

四九年中國共產黨統一中國，應該是功勞最大，中國人民開始有了一些希望，中國現代化是有可能的。可是由於中共走了一條武裝鬥爭的道路，武裝鬥爭奪取政權靠誰？靠不了知識份子，靠不了工人，就是靠農民，農民是非常落後、狹隘的，共產黨就是靠農民奪取政權，建立一個農民黨，它依靠的不是知識份子，依靠的是王震等這一批人。他們掌權後，把整個中國倒退了，他否定了科學、否定了民主，毛澤東想把經濟搞起來，就搞了個大躍進，胡搞的。

二次大戰之後，日本、東歐各國都在搞經濟，人家的路子都走對了，十年、二十年就飛起來。而中國呢？雖然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代價，但是整個路子不對，它整個的領導人根本不懂經濟，還有公有制這問題，然後三十年下來，一貧如洗，犯了很大的錯誤。應當說，在四人幫以後，共產黨意識到這一點，那麼我覺得就是很大的進步，他就開始從一個腐敗的、一個沒有希望的政治力量，變成一個比較開明、有希望的政治力量。在中國還未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取代的情況下，他採取這樣的轉折，是非常好的事



情，所以這十年中國的變化很大，這十年比前三十年的變化還要大。

一個三十年幹了那麼多壞事的共產黨，在四人幫以後，也還出現這一個轉機，作了點好事，而且它一旦做好事，幹一點聰明的事情，中國社會能發生這麼大的一個變化，客觀的看，它靠的是黨內出現一些比較清醒的人，也就是共產黨內裏不是全都是混蛋的呀！

記者：中國改革開放是必然，現在問題就是開放改革以後，問題更多，官倒、腐敗都出現了！

蘇曉康：開放改革並不是說比文革還要糟糕，不能這麼說，開放改革出現問題，是新的問題，並不是文革、大躍進的問題，它是一種新的問題。新的問題根基在哪裏？根基不在開放改革，恰恰在於它不肯突破那些界線，這界線就是堅持四個基本原則，它不肯突破它，所以出現了弊端。官倒是怎樣造成的？是雙軌製造成的。一方面它想經濟富起來，它就搞了自由經濟，但按堅持四項原則，就要實行計劃經濟，這就形成了問題；腐敗的問題也是一樣，因為一黨執政，不肯搞權力制衡。他本來造成文革、大躍進，三十年的弊端就在於權力高度集中，領導說了算，領導者判斷對，那麼發展就好；他判斷失誤，人民就遭殃，這個機制就是這樣，而現在還堅持這些。所以不能說，改革十年出現問題更嚴重，每個人的生活比起四人幫時代好得多，當然，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更高的一些問題，例如我寫過教育問題，這過去是不能提的，現在，我把問題提出來了。這是為千年萬年大計考慮，就提醒你現在還有失誤，要重視教育問題，並不是說，現在的教育比文化大革命時

代還要糟糕。

十年改革，鄧小平走的路對呀！大家都對中國很有希望。現在，他媽的，他糊塗了，大家就跟著遭殃，這還是機制造成。走到這一步，大家考慮最多的就是改變這個機制，應該改變這機制，趙紫陽就是做這事情，拚命想改這機制，改機制時就碰到四個原則。要碰它，問題就發生了，問題在哪兒呢？就這批老壞蛋感到一碰它，他們就全完蛋了，他們的天下就沒有了，他們不讓你碰，也就導致了現在這一系列的問題。

記者：開放改革若不從政治改革開始怎麼行？你說從經濟改革成功啦，由一批人衝過去，把政治也改革過來，但現在的問題是經濟改革本身，從制度方面沒有改變的話，官倒、老人幫都是一樣，從改革中得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所得到的利益最多，他們最先富起來。

蘇曉康：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沒有這個改革，完全是計劃經濟情況下，他們得到更多。現在就是要公開化、透明化。老百姓看見了，你們辦公司，可以弄錢，那是有數位在帳面上，可以看到。在這之前，未有自由經濟，未有雙軌制之前，他可隨便得到更多，厲害得很多，他可以隨便動用國庫的錢去買東西。

記者：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如果制度不變，怎可以改變到成為西方的那一套？制度上容許雙軌制是不成的。

蘇曉康：雙軌制是過渡狀態嘛！

記者：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改良時，容許太長的過渡期，裏面腐敗的問題，有毛病的地方，無辦法，無能力去改，現在不就



是這樣嗎？

蘇曉康：不，你現在要首先肯定，要明確一點，雙軌制比只是一種計劃經濟要好吧，是一個進步，不能說雙軌制現在出現問題，我們乾脆就回到計劃經濟去，現在就是李鵬的辦法，他們解決現在雙軌制的腐敗問題，就這辦法，就是倒退。我們認為解決雙軌制問題，辦法就是再往前走，不要走計劃經濟。

記者：我就是想說，雙軌制之後沒法再往前走呀！

蘇曉康：我們是從計劃經濟走出來的呀！走成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並存在一起。我們前進了一步就出現問題了，解決了問題，就再往前走嘛！現在它不讓你走，改革、非改革的爭論就在這嘛！批趙紫陽搞資本主義就在這，趙就是解決了問題，往前走一步，他們現在就要倒退回去了，就這麼簡單的問題，怎能說是改革帶來的問題比過去還嚴重，問題更大呢？

記者：現在改革本身，很多很多問題還未能想得通。

蘇曉康：因為中國未有搞過現代化，從領導人到學者、理論者，都一塌糊塗，有各種各樣的觀點。話說回來，確實有一個觀點，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從所有制的角度來看，它原來是國家所有制，就叫國家壟斷制，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它變成私有制，怎麼變？

現在中國並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它的經濟形態是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說，國家代表人民佔有財產，國家是空的，所以實質是官僚佔有財產制。在這情況下，你把它變成人民佔有，人民以私人身份佔有，也就是說私有制，怎麼變？它已經是國家所有制，這是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

面臨的一個大的經濟改變。波蘭、匈牙利也好，所有國家都有探討這個問題。例如，臺灣，它沒有這個問題，香港也不會。我們現在就有這個問題，如果你這種分配不公，就會影響社會變動，老百姓不幹，憑甚麼你拿那麼多？

記者：他們不容許你改，我們就要推翻它。

蘇曉康：問題沒有這麼簡單，你推翻得了它嗎？你有這力量嗎？不推翻它，我照樣等待時機，中國還有變化，不會沒有變化。

記者：但變化卻鞏固了他們的勢力。

蘇曉康：不見得，這十年，你不能否認這十年已經有很大的變化。反過來說，這次學生運動一搞以後，人民犧牲，死了很多人。但是共產黨在全世界、全中國人民沒有像今天這樣喪失威信，它的統治合法性都受到了挑戰，在這個之前，他們沒有受到挑戰。這三十年作孽那麼多，它統治的合法性完全沒有了，這學潮以後，他完了。

所以垮臺是指日可待的，但我不是說共產黨垮臺，而是老人政治垮臺，共產黨的實力那麼強，不易垮的。而且這個時候，共產黨一垮，那麼政治多元化、反對黨就會出現，肯定這是要爆發的事情，是吧！

雖然造成很大的犧牲，但是垮臺也好呀！假如一直以來，共產黨沒表現得那麼惡、那麼壞的時候，人民還對它抱有很多很多希望，這麼一來，等鄧小平死，中國社會將會出現非常複雜的局面。

餘生心緒

1989·7·3 - 1990·12·31

一年了，誰能忘記。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何必說。

瞿秋白《多餘的話》

1989·7·3

北京發生了甚麼事？

給香港中學生的演講稿

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北京的屠城事件到明天就剛剛要到一個月了。大家都曾經情緒低落，到現在我們仍然帶著沉痛的心情為死難者悲哀，為中國的現狀苦惱，到底北京發生了甚麼事？

現在中共發動宣傳攻勢，指責海外傳媒造謠，《人民日報》點名批評香港兩家電視台和指責各新聞報紙發放錯誤消息等。我作為記者，在北京的採訪期間，我確實感到消息非常的不靈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們只能靠現場觀察，或者聽聞某些消息透露，要想找官方反應或追查事實，完全沒有任何渠道或途徑，造成這種現象，自然是跟大陸的新聞封鎖和報禁有關。

北京跟香港不同，香港發動遊行很容易做宣傳，物資亦很豐富，路程相對較短，而且可以事先申請，有警方協助維持秩序。北京情況完全靠校園內的大字報宣傳，學生自己組織的廣播台，和深入民間搞論壇發表演說、向群眾講話及自行組織官方所謂的非法團體，秘密召

開會議來決定行動綱領、目標、路線及口號等，條件非常艱巨，不可以像香港可以在報紙登廣告發表聲明，不可以批評政府，不可能用電話、影印機、傳真機等盡快將消息發布和散發傳遞。

北京的報紙都是黨報，中共的喉舌，不會為人民說話，所以學生非常憤怒，他們只不過是因為悼念胡耀邦而上街，遊行集會都很有秩序，沒有製造動亂。但是，人民日報的社論激發他們在悼胡後要再次上街要求對話，擔心軍警鎮壓，四二七遊行前，很多學生都寫下遺言，貼大字報對媽媽說，我沒錯。

我們在香港上街遊行可以大搖大擺，有警察沿途保護；他們在北京上街遊行是要冒生命危險，要衝破警察的防線。他們沒有辦法找到書寫橫額的布條，把床單、被袋也拿來寫標語、口號。他們沒有擴音器，喊口號喊破喉嚨，一些支持他們的市民，捐錢給他們買手提揚音喇叭。

他們由校園步行到天安門，至少要五個小時，有時候遇上公安的攔阻而延誤了，再加上回程又要繞一個大圈，所以每次上街遊行都會花上一整天，沒吃沒喝，靠好心的市民拋麵包給他們吃和送水給他們喝。

面對消息的封鎖，政府不斷的恐嚇或者分化反間破壞，學生們只能靠大字報和傳單來互通消息，他們在校園內手抄大字報，在廣場上用最原始的手動油印機廣發傳單，這些寶貴的原始資料只供即時傳閱，有限流通，不能保存，萬一鎮壓出事要徹底燒毀，以免秋後算賬成為罪證。北京的學生，就是在這艱苦的環境裏抗爭，通宵留守在廣場睡在地上，靜坐的地方又髒又亂又擠迫，平日吃的東西都不夠營養，宿舍飯堂限時限刻用膳，開會或遊行晚歸就甚麼吃的東西都沒有了。

我在北京採訪了四十日，我知道發生甚麼事。假如說我們香港新聞界造謠，我們會跟北京新聞界一樣非常沉痛，十分遺憾。他



們在五四遊行時豎起一條橫額，說：「新聞要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要說我們記者造謠，可以說是政府逼出來的，因為他們不說真話，我們沒法知道真相。

北京學生要求公開的、平等的對話。四月二十九日是學生與袁木等人第一次對話，香港傳媒和外國傳媒沒得進場採訪，我們在門外守候，內地的新聞記者可以內進，我們只得訪問吾爾開希和對話後出來的學生代表；若追問政府官方，官員不會回答問題，完全沒有反應。

唯一一次的記者會是五月三日，袁木、何東昌見記者，因為學生計劃「五四」遊行，要看官方反應和會否鎮壓。在記者會上袁木的面孔，大家在電視鏡頭畫面看到了，他說：有一小撮人在幕後操縱。又說：學生要求與他們平起平坐，限期答覆等都太過幼稚天真。這些官方的論調、口吻，根本無助於解決一發不可收拾的學潮問題，亦無誠意與學生溝通以平息之間的矛盾情緒。

「五四」遊行人數和聲勢不及「四二七」大遊行，學生意識到，學運可能會陷入低潮，他們心裏焦急，認為應該可以乘勢繼續引發第二個高潮。「五一三」的絕食行動，成功地掀起了史無前例的一場偉大的運動，比「五四」更轟烈，因為絕食引起了全民關注及全球矚目，令這場運動由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演變為人民愛國民主運動。

這時候，政府無法化解問題未能好好收拾危機局面了。學生要求平反，要求對話，一直等待政府的正面回覆，可是官方卻死不認錯，採拖延態度，終於局面發展到連學生也無法控制。

以後，北京差不多天天都出現全市人民大遊行的壯觀場面時，竟然可以沒有公安在市內攔阻或者維持秩序，北京城全靠學生組織的糾察隊，手拉手勸喻市民不要進入商業大街遊行，以免混亂造成打砸搶燒事件；又要求群眾不要衝擊政府機關，以免給政府有制止

動亂的借口；又叫市民不要喊出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口號，以免給政府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的指控。

學生既參與遊行、絕食，又要做糾察維持秩序，而且日日夜夜提心吊膽，不知道政府何時會來鎮壓。不過他們非常克制，仍然堅持要進行和平非暴力的鬥爭，希望政府也採取和平方法解決，可惜最後結果卻事與願違。

五月十九日晚，廣場宣布停止絕食，改為靜坐。而李鵬則在黨政軍大會發表嚴厲的講話，五月二十日早上十時宣布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而軍隊則早已出動要進入京城執行戒嚴任務。

北京市民和學生走上街頭，漏夜趕到城郊堵截軍車，向解放軍解釋北京情況，希望他們不要對付人民。軍隊多天以來沒有看過報紙，只學習《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更可恥的是，李鵬跟廣場絕食學生談話之前，已調動軍隊作好部署來到京城值勤，可見李鵬政府根本沒有誠意解決問題，宣佈戒嚴是為軍管作準備。

北京市民和學生都沒有退路了，一旦流血衝突，全面軍管，中國就會倒退起碼五十年，中國能有多少個十年，多少個五十年？北京市民和學生都非常克制，堅持和平，一直避免發生動亂或暴力衝突，即使有交通意外發生，馬上趕去救人；自行車不小心互相碰撞，急忙道歉，說：都是李鵬不好；即使真的爭吵起來，途人也幫理不幫親，說：「還吵甚麼，現在中國已經夠亂了，還嫌不夠嗎？」

戒嚴期間，記者採訪有限制，只能聽小道消息，自然有可信，也有不可信的。有很多資深記者都說，從來沒有試過新聞報導這麼難做，有太多事情不知道，也有太多消息無法証實，而且，記者的限制亦實在太多，我們都違反了戒嚴令的規定。

戒嚴的第一和第二天，氣氛最緊張，每晚都以為軍隊會鎮壓、清場。我們冒險去天安門，草木皆兵，學生派口罩、濕毛巾，組織敢死隊，跟市民在天安門外圍一起保衛廣場，就像打仗一樣，但是



原則仍然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我在北京，只是知道北京學生所追求的是甚麼，所爭取的是甚麼，也知道市民為甚麼支持學生，為甚麼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紛紛上街保護學生，甚至捐錢、捐禦寒衣物，送水送飯，對這四十多天群眾運動造成的麻煩無怨無恨，因為大家都是為了國家民主富強，希望中國未來會更好。

軍隊入城後，三日三夜，政府沒有提供糧食配給，全靠市民送水送飯，他們跟學生慢慢建立了良好的關係，甚至稍為後撤，然而增援的軍兵不斷調派入京，重新佈防，潛進大街小巷，沒有人知道政府為何要派幾十萬部隊重兵進駐北京，後來中央電視台說不是來對付學生和人民的，又慰勞解放軍，進行思想工作，戒嚴十幾天後，城內一點動靜都沒有，市民的警覺性也鬆懈過來。

到五月底民主女神像豎立起來，四名知識分子宣布絕食，運動又再度引起新的高潮。政府就在這個時候開始動手了。先是有政府派錢的工農兵遊行，各機關、政府建築物及飯店大廈都有支持官方的旗號標語打出來。然後又抓捕工人自治會成員，六月二日晚撞死三個途人，便衣軍人慌忙向天安門跑去，遺棄一批軍械等等，這一切無聲無息暗地進行，全都是政府刻意製造暴亂的先兆。

屠城，我在天安門廣場留守了一整夜，我相信有些軍兵算是克制，廣場的死傷不算太多，我有逃避過槍彈，也目擊坦克駛入廣場，推倒民主女神，輾過學生帳篷，所以開槍肯定有，死傷肯定是有，只不過死在廣場上的數目並非成千上萬而已。

「六四」是發出恐怖槍聲的第一響，現在國內的大搜捕才是真正恐怖的開始，這國家可以不經過司法部門而直接抓捕和懲治民運分子，要他們關進大牢接受勞動教養，除非他們可以成功偷渡離開大陸，否則中國追求民主自由的受難者，將跟為愛國而犧牲的死難者一樣，身體和靈魂都永劫不復地被長期囚禁。

「六四」之後，有些北京市民可能在「六四」當天搜集一些軍械、武器，準備打巷戰洩憤。可是阻擋不了坦克輾壓和不絕於耳的槍聲，白色恐怖籠罩整個北京城，很多學生都撤出校園，離開北京，返回家鄉或逃亡異地。但是我覺得他們肯定會再來，因為人心不死。

我也相信，這政權不會太長久，因為這政府已搞得整個國家千瘡百孔，不是感冒傷風，而是癌症惡瘤，會蔓延下去，屬於整個制度的結構性腐敗朽壞。一旦經濟崩潰，或出現大飢荒，這政府就肯定會垮台了。

在北京，我看見善良的中國人，無私地為了理想奉獻一切。在天安門廣場上，他們真正組織了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理想共和國度，資產階級的私利被當權者壟斷，做官的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剝削人民，這個國家分明就不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了。

十年經濟改革，富了這些貪官污吏，就是魯迅所說的吃人者。農村土地荒廢，農民含淚離開泥土，因為他們耕田無所得，連化肥、水電、工資等甚麼都補貼不上。經濟改革最受苦害的是這些與土地有密切關係的農民，當官的從來沒有照顧過他們，跟毛澤東時期的公社不同，所以在全市遊行時，農民都上街，他們喊的口號是：「毛澤東，像太陽，照到哪裏哪裏亮。鄧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中國的問題是一個爛攤子，誰上台下台都不容易收拾，但是專制封建、官僚貪污、偶像崇拜等，是最根本的腐蝕性東西，如果不作徹底的文化改造或思想啟蒙，要救國不容易，中國仍有一段很長的艱苦道路要走，中國人仍然要承受一場又一場的劫難。

謝謝大家。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



1989·10·1

國殤日感懷

從「六四」迷霧清醒過來的時候，我只發現更大的悲哀和苦悶，這一切就都是我想看見的嗎？我陷入一種自我迷惑的境地，甚至是燈蛾撲火般的非理性盲目表現，所爭的是一場政治風波的餘音未了，勾起的是斷腸思念的剎那光影。以後，我再聽不到這種驚雷，看不見這種靈光，振奮人心的力量哪兒去了？於是，我又嘆息了！

正當我吞雲吐霧自陷於迷惑時，我自亂了，失卻了依傍，只有孤單力弱的掙扎，愛莫能助的酸楚，最後，我又得重回一種正常生活秩序中的寂寞與無助。失卻了理想的支撐，接受現實的痛灸，我愛我的生與死，我愛這場挑戰的歷練，卻感慨於最後是落空了的希望，唏噓的認定命運的無奈。

為何總是事與願違？為何總是不可強求？我到底想躲到哪裏去？我到底想追求甚麼？真的是遙不可及嗎？我哭了，為的是我想為之捨生的東西原來是不存在的，即使努力把它爭取過來，它也會變質。原來這一切根本就沒有所謂本質性的永恒存有，它流動着，變化着，隨時會幻化成惡魔侵蝕人們的心志，不讓你對它有過份的期望，甚至會誘你走入迷霧中永不超生。

我發現這的時候，本來就早該認識它的虛妄，可我又不甘心，硬要再去碰它。到頭來，我得承認，這裏頭確實沒有玄機，只有千變萬化的人性表現；沒有一致性的模式、形相，但會輪迴不息地給人一種錯覺。既是可愛、可取；同時也是可厭、可棄。

我會詛咒、責罵一些不善、不美的人與事，不算是憤世嫉俗吧！

我只憑偏面的觀察去認清人們的表現和事實真相，我目光準確嗎？

我開始覺得很多這些已經逃亡出來的人，有些人根本就沒嚐過其甚麼政治迫害，他們憑甚麼一定要出來？出來之後為甚麼急切期望能夠尋求第三國的政治庇護？為甚麼他們可以只顧個人的前途和聲望，而不惜把國家與人民都拋棄了？

我們不捨棄八九民運的風采和理想，他們卻利用這份對理想的深愛逃亡出來，取得自身的安全後便再不去建立真正的民主精神，不再堅持為國為民的理想革命而鬥爭了嗎？我哭，因為我看不見希望，看不見逃出生天的人能真正體現北京人堵軍車、攔坦克的那種無畏精神，看不見這些走投無路的人能在國內或海外的民運人士身上找到出路。

逝者已矣，國慶成為國殤。我摸不清也找不到焦點，更見不到光明與喜悅，只有寂寞追憶的無限悲痛，傷逝者無生者為他們奮鬥，只餘下無盡眼淚和無奈嘆息。悼犧牲者愛國激情沒法延續，哀偷生者忍辱哭喊不起漣漪，還有痛逃亡者鬥爭失去方寸。雖說是激情過後，實質上是生悠悠，死悠悠，一切復歸於無有。

我竟無留戀地想捨棄，不是因為我意志不夠堅定，而是我不知道往後行動所投身對象是否值得、是否可愛？是否可以獻身、甚至犧牲？我其實鄙視我的所作所為給愚昧所欺騙。我曾看見正義，卻不能為正義伸張，反變成為私利者服務。面對這現實，除瞠目結舌外，我無言無淚，於是我鄙視我為愚昧者服務的愚昧，我不求崇高偉大的誇獎讚美，外加的榮譽從來不屬於我，也非我所渴求追逐，我只求對得起自己的義憤和北京的死難同胞。我雖不曾親眼看見有人中槍倒斃長安街頭，也沒有親眼看見坦克輾壓過的血肉模糊，但是我是親眼看見天安門廣場上躺在血泊中仍淌血的傷者和不斷被抬走的義士，我們親眼看見坦克駛進來，解放軍開槍打人，面對恐怖懼慄的場面，生有何可戀？而逃出來之後，現實的殘酷性要我認清，我不該盲目追求不存在的真理，一個本質在變，永無定性的東



西能被視作真理嗎？我在邊緣徘徊、疑惑。

在無言的抗爭中，我奮鬥，力持堅毅，更甚者，我還想向惡勢力挑戰，哪怕是卵擊石，我總覺得這樣才對得起自己在廣場上所留下的遺言。儘管有人為我此舉而對我另眼相看，又或者被我的選擇而感動，可我從來不想表白我到底為甚麼會這樣，因為我實在無法解釋。生死從來就是不可解的，任何語言的詮釋都無法盡得表白的內蘊，一切、一切皆盡歸於無言。

當支聯會自詡於救出了一些響噹噹的人物時，我卻傷感於應該救的人沒法救出來，我哭一些無名英雄在顫慄中找不到出路和生的轉機。他們有些寧死、寧坐牢，也不想棄國逃亡；而跑出來的人卻在海外叫嚷着、吵鬧着，瞎着眼睛說謊，可他們能為六四死難者和關在牢獄的囚徒，或仍在驚惶逃亡的倖存者幹些甚麼？他們很光采，他們很幸運地到了自由土地，還播甚麼謠言，幹甚麼敗行？可悲啊！對囚禁在冤獄大牢和受制於惡魔巨爪中的十一億中國同胞，他們能獻出多少愛與關懷？能給予多少人脫離苦難的期望？最後他們願意再重回故土嗎？

我在尋覓革命的火花和種子，我想見烈燄的熾熱光采和新芽的茁壯成長。我是否錯誤地把希望投播在一塊寸草不生的沙漠上，所以無法造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生生不息的燎原效應？

我又變得頹廢了，從高燒到降溫至冷漠，我才明白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一切都是虛妄迷幻，沒有甚麼比現實的東西更現實，塵歸塵，土歸土，我們看不見真善美的理想世界。荒原沒得到培育，貧瘠的土壤裏，人們還在淌血流淚，熱愛他們的情懷無法表露，埋藏在心底裏，我痴迷瘋狂地問：我所愛的為甚麼沒得到愛，而我詛咒的為甚麼還沒受到譴責？

惡勢力在擴張，那些頑固的老人說，他們打江山得來的國土，要他們才能佔據和奴役人民，把人看成螻蟻，任由他們肆虐踐踏，

誰也無權愛護挽救。

領導人天天出來說話，他們說很多大而不當的話，把中國領土上的人民緊緊地關鎖着，指責外國干涉他們的內政，不得收容窩藏他們的囚犯。成千上萬曾經為中國奮鬥犧牲的人，到底給誰在指手劃腳，甚至想全世界的人都要聽命服從，想全中國的人都受到嚴密監控封閉，變成可以任意踐踏的蟻民？瞧那些唯利是圖的人又回復阿諛奉承的態度，作客於一塊死亡腐臭、殘廢不育的土壤上；瞧那些老態龍鍾的當權者多高興，多自得其樂地盤據江山，毀屍滅跡。政治的現實，政治的把戲，政治的殘酷，說理說不清，只好嘔吐。

非理性的行為幹了出來，大屠殺和鎮壓之後還要用強權歪理來掩飾，來推卸責任，為何還要聽這些狗屁不通的暴力謊言？誰能揭示事實真相，讓民憤積怨有宣泄渠道，到底良知真理何在？！

十月一日，又是一個悲哀的日子，我能與誰同哭？我不想把身體捱壞，但我確實感到身心俱損，心力交瘁。我拋棄個人不為別的，只想證明我曾存在，當我如一縷輕煙般消逝後，希望輕煙的飄渺還能存於不可實證的記憶中。不想留芳百世，只想明哲保身，愛我的生與死。

四十年前的十月一日，新中國誕生了，人民得到解放了！曾幾何時，這些期盼確把滿懷理想與希望的人投身和吸引進去作出奉獻。十年後革命元老以其老朽的生命腐蝕新中國的成長，使中國不能成型，沒有長進之餘，更倒退到沒法辨認它到底該屬於哪世代的產物。不斷地東歪西斜，把活在中國土地上的人民顛簸流離於雖生猶死，委曲求存的荒涼世道中，人民吃不飽，沒好好地成長，也沒好好地接受教育，自離娘胎後就長期地給折磨、壓迫、蒙騙、虐待、操控、殘害……

掙扎着急切想尋條生路的人，在權力鬥爭的震盪中再被擊碎了做人的基本條件和生存的意欲，誰才能具有站起來的資格？中國



人，你們的苦難和悲劇的命運是誰給你們製造的？為甚麼作惡多端的劊子手，還能高高在上，把持至尊的權力去抽打和鞭笞一切異己者？這毀滅的力量之源是誰給予供養？

我以為有希望的東西沒給我希望，而一直以來沒希望的東西卻繼續增加我絕望的情緒，我現在才弄清楚我的痛苦是多麼的荒謬，多麼的怪誕，而我雖仍不甘心，卻已出離不了這悽愴酸楚的悲涼。

我不是變得沒有期待，而只是覺得我的期待變得虛無和不實在。我從來沒想過要逃，即使中國現政權的醜陋和惡毒會存在百年、千年，我還是要說，它不會有好下場的。也許我們會粉身碎骨，沒好下場在先，我仍相信總有一日，殘局是會被收拾、整頓的。

惡勢力儘管得意下去，但他害得這代人不安樂，怨恨會轉化為力量。我期待着造反和革命能成就新事物，在倒毀的廢墟和寒酷的荒原上，有堅毅勤懇的中國人重整頹垣敗瓦和開墾貧瘠土壤，經過慘痛的拓荒歷煉，進行苦澀的艱辛重建之後，一定能夠有可貴的新生命誕生出來，繼續創造人民書寫的歷史，而我，只得寄望於此。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國殤日

1990.6.3

逝去的並沒有白白犧牲

一年後重訪北京見聞

久違了，北京。

去年在北京逗留過，今年再度踏足北京，重臨之際，唏噓過後又是憂思。

北京給我的印象還是暖暖的，北京人給我的感情還是溫和的。儘管物事遷移，想捕捉、想抓緊的是人間有情和人性本善，這些仍能一一在腦海中記住、保留。

殘暴的現實叫人震撼、悲哀；壓抑的空間叫人惋惜、難過。然而人心不死的事實卻又叫人暗暗驚喜，拖沓了一年的時間即使沖淡了一些人的激情，但卻令人更加清醒。

逝去的一切並沒有白白犧牲，短暫的消沉不代表永恆，期待着的變化不一定會來得那麼戲劇化，總會有新機、有希望的。我看到沉默中透現出來的，是人具有強韌的生命力。

無疑，人變得隨機了，像失去了主動出擊的能力，但不失為一種順應時勢，好保住將來有還擊的餘地。這是一個警察國家，在荷槍實彈、嚴密監視的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環境裏，人能存活已算僥倖，實在不忍見他們繼續作無謂的犧牲！

心隱隱地痛，活在優裕環境的人，實難想像他們是如何地忍辱偷生。瘦弱的身軀拖着疲憊的心靈，擔負民族包袱的重擔，連舒一口氣也是微弱的，悄然無聲的，不敢有所動靜，然而也未敢忘懷祖國的苦難。

經歷過連綿不斷的鬥爭，對於高遠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和漂亮、激昂的口號，他們不是喪失了熱情，只是在高壓的控制和極權的統治下，對他們來說，實在太陌生、太奢侈，因為他們活在一個整人的社會裏，自身難保，連起碼的溫飽問題也解決不了。

一個在貧窮農村成長的大學生對我說，他自小接受黨的教育及宣傳，只懂頌揚社會主義而不遺餘力地為資本主義抹黑，對香港的



印象盡是聲色犬馬，嫖酒賭毒等腐化、黑暗的一面。但現在他很羨慕我，覺得我是活在天堂裏。

在這時候，我無法向他解釋事物具兩面性而非單一的非黑即白，當他問我對北京的印象時，我說，我喜歡北京的單純和質樸，北京人的誠實和勇敢。

我常想，暴力是解決不到問題的，手上沾血的領導人肯定會寢食不安，雖然他們仍能穩妥地守着得來不易的江山，但是始終不會得到人民的信服。老百姓說，老人很快會死的，就瞧他們是否能死得安樂！

我又奇怪，為甚麼這暴政竟如斯迷戀暴力，而對「和平演變」有着如此難於理喻的恐懼和抗拒，難道他們真想迫得人民要以暴易暴，才能貫徹他們所自恃暴力萬能的信仰，甚至要將這種思想向人民滲透，並從行動上展示軍警的武器和威力足可懾服群眾，以迎戰蘇聯東歐式「和平演變」的不流血政變？

落後的中國要想不成為西方的附庸，請先別胡說八道，也別再對外國評論聲討謾罵。中國已經大倒退了，為甚麼還不趕緊作好自強的準備？為甚麼只懂欺壓人民，殘暴對待異己？其實這正是一種加速滅亡的自毀，更何況思想和言論的壓制，只會嚴重妨礙一個國家的正常發展。要維護一個國家的尊嚴，就請別再撕破自己的容臉，然後胡鬧地醜化別人，這可恥的舉動能獲得普遍認同嗎？

該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愚昧吧！哀我中華，誰沒有對你關愛、眷戀？然而，你盡露醜態，還肆意地、狠毒地對善良的人民予以懲治，毫無情義可言，這罪行你能開脫嗎？連人家對仍遭無理關押在牢獄中的被捕人士，伸張正義，略盡綿力去維護基本人權所應享的保障而作出呼籲，也被指為干涉內政；人家同情北京學生和支持中國民運，就說成是對平暴真相懵懂無知。

難道就只有這些當權的人眼睛雪亮，能代表真理發言，別人都

被蒙着眼睛只會說瞎話？哀我中華，這批戀棧權力，迷信暴力的老人還在壓榨和統治人民，仍繼續張牙舞爪，隨時揮動屠刀指嚇或殺害同胞，在這黑暗國度裏，是否真的不可能逃過歷史循環的劫數？這多災多難的民族將無可避免地要面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可悲現實？又再看中國人枯黃的面孔，僵僵的身軀，若再出現官迫民反的缺堤性抗暴行動時，到底會是勝利激昂的凱旋曲，抑或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哀號聲？

每想到此，就不忍再想下去。但願能見中國美好，人民安康，但願這小小的祝福並非遙遙無期，也只好默默祈求上蒼保佑吾民吾土。

（原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

1990.6.4 一位記者的剖白

一年了，誰能忘記。

我不想剖白，因為確實是在很長的一段日子裏，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生命——常常想哭也想到死亡。

生者與逝者，在這世代，如此飄忽，生命何價？尤其是在中國，人權、自由和公理何在？犧牲了生命換取了甚麼？在牢獄中的良心囚徒在等待甚麼？

有人罵侯德健窩囊，因為他說過他沒有親眼看見廣場上有死



人。我說，我在廣場也沒有親眼看見死人，但我看見有人倒下，有人給抬走，有人還在血泊中淌血。我知道我的見證沒有控訴力，但我沒有說謊，我也相信侯德健沒有說謊。

無論廣場有沒有死人，「六四」死了多少人，說到底，這個拿槍對付人民，用坦克輾壓人民的政府，是太殘暴，該詛咒的。

有人說，侯德健六四那天在廣場的表現很了不起，他救了許多人的命。但那時候，很多堅持不撤的人罵侯德健窩囊，「要撤自己撤，我們不撤。」

我常想，如果不撤而又真的血洗天安門的話，這犧牲能爆發怎麼樣的光采，會導致民運的成功嗎？

爭取民主必然要有所犧牲，以換取人民的醒覺。因此，我會問是不是因為死人死得不夠，所以只有窩囊，沒有英雄？

我跟人討論這個問題時，有人說我患了「廣場病」。

「六四」之後，誰沒有夢魘？

可幸我沒有目睹血肉模糊的屍體，所以我還能活。但當我重看錄影帶一幕幕驚心動魄的鏡頭時，我沒問自己那時候為甚麼不怕，但眼淚直流。到現在，每次翻看「六四」的東西都流淚。

最初，我常夢見軍車被燒，人群在躲在跑。後來聽到一些認識的朋友被抓的消息，我心很痛，我夢見自己為他們求情，哭着想找人幫忙他們，但無補於事。

相比於「六四」的血腥暴力，我發覺我更受不了的是「六四」以後白色恐怖的氣氛。死只是一次過的，但活着卻是不斷的折磨，活受罪啊！為甚麼這殘暴政權沒遭天譴，他的罪要讓無辜的人民為它承受苦難？

一直有衝動想跑回大陸，不是想去做英雄或烈士，只是想繼續關懷祖國，和了解還在那裏受苦的人民如何生活。現在，是一個沒

有英雄的年代，也不再是到了水深火熱，要革命流血的時候。

在高壓之下，人活着，還有一口不服的氣。他們說，要跟老人家鬥，看誰的命長。我想，中共的氣數還未盡，只看專制獨裁的老人是否願意讓位給智慧領導的集體，容許人民有呼吸的空間，發言的機會。

能活下去的，不管一個人的存在是多麼渺小，在跟老人家拚命的同時，別忘記有人為追求民主中國，把自己的命豁了出去；有人被侵犯了基本的天賦人權，和喪失了應有的自由，至今還被關在牢獄裏。

我們要為他們討回這個公道，中國人不能再窩囊了，該努力堅持下去，要勇於站立起來，堂堂正正，不亢不卑的繼續做人。

（原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

1990.6.5

去年的北京，今日의香港 「六四」一周年悼文

一九九零年六月三日，香港有數以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遊行，呼籲大陸釋放民運人士。

我穿上素服，挑了一件從北京帶回來的白色T恤，是紀念「五四」，後面印着「V」字勝利手勢的。到中環遮打行人專用區等候出發時，我舉起了「釋放魏京生」和「釋放韓東方」的示威牌，希望這小小的動作能表達我對爭取自由中國的一點訴求。



這一天，我不是做記者，我想做群眾，去體驗人民的力量。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我在北京採訪學生的「五四為民請命」大遊行時，手拉着手維持遊行秩序的學生糾察隊常容許我走進隊伍中，我跟着他們一起走了七、八個小時，雖然沒跟他們一起喊口號，但我第一次在遊行的隊伍中感受到學生們那種追求民主自由，渴望前進的熱情。

我還記得，那天是首都新聞界首次敢於拿着旗幟要求新聞自由，記者們舉起了「新聞要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的橫額加入遊行隊伍。如今，報社軍管，全面報禁，他們有不少人首當其衝地遭到嚴厲壓制迫害，並且身陷囹圄。

在大陸，爭民主遭到殘暴鎮壓，說真話被指控為造謠，一切一切都變本加厲地以逆轉方向發展，這趨勢要維持多久？

去年的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北大採訪時碰到韓東方，順道載他返回天安門廣場，路上很多阻滯，軍隊已經入城。當時，中共官兵的催淚彈正向人民施放，驅散天街上街示威的人群。經過新華門，我們下車，韓東方流着淚向鎮守的解放軍說，自己也當過兵，勸他們要看清中共的真面目，別把槍口對着人民。他回頭對我說，解放軍也是無辜的，他只希望解放軍能站在人民這一邊。我看見有些解放軍受到感動，也流下眼淚了！

為了說明爭取民主自由的人心不死，為了表達人民希望中國富強美好，為了抗議殘暴政權的橫蠻無理，為了宣洩學生內心壓抑的憤怒熱血，也為了顯示群眾無權勢者的動人力量，也為了對無辜被囚禁的異見者表達關懷同情，數以萬計的人願意匯聚起來向屠殺平民百姓的專制獨裁的當權者示威。

我走進遊行隊伍中，初時只是柔弱地輕聲隨着人群喊口號，後來我也跟着以響亮的呼聲高喊「釋放民運人士」。

香港這支遊行隊伍很壯觀，人民不是湊熱鬧的，星期天不去休息放假，來這兒壯大聲勢，正好表示香港人不冷漠、不沉默。香港

人受到北京學生運動和愛國民主運動的啟發，要通過行動表示對暴力、專制的憎厭，對和平、正義的熱愛。

我珍惜群眾這一點一滴匯聚而成的力量，我尊重作為群眾能夠享受這種基本遊行權利和集會自由，而且在需要我們站出來的時候好好行使運用。我以身為香港人，又能與這麼多的香港人一起呼吸和前進而感到驕傲，因為我們也是中國人，有共通的感情和心願。

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再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到維園參加燭光集會，對去年「六四」的死難同胞表達沉痛的哀思和悼念。

我同樣不以記者的身份到維園，人潮如貫的進入球場，我跟着長長的人龍走到第五場區才有空位坐下，雖然無法看見台上講壇和錄像屏幕，但仍能感受到作為群眾參與這活動的意義。

燃點起白燭，開始有燭淚的時候，旁人和我也有眼淚潛然而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在北京親身經歷廣場撤離和屠城的經過，劫後餘生，難以言喻的創痛曾把我帶向悲傷哀痛的絕處。他們開槍殺人了，許多無辜的人給殺死了！血與淚在這一天的能流盡嗎？那天那夜，我沒流血、沒眼淚也沒思想，在迷惘茫然的錐心刺痛中，我聽到首都不絕於耳的恐怖槍聲和人民不斷傳來的慘痛泣訴。

我從來不求神靈保佑，不問蒼天為甚麼會出現這場慘絕人寰的屠城殺戮。中國的悲劇總是不斷不絕的發生，我們慘叫、我們嚎哭、我們犧牲、我們哀鳴，但是如何才能離開這苦痛呢？

這一個晚上，高舉燭光，人海在香港維園中燃起一點點燭光，遙寄着無限的哀悼和祝禱死難者安息的時候，這種莊嚴低泣和憂患與共的氣氛；與那一個晚上，群情澎湃，人海在北京天安門飄揚着旗幟，守護着熱切期待的民主自由信念的時候，那種慷慨激昂和敢死赴義的氣魄，雖然無可相比，但是在此際黯啞無光的黑暗國度裏，這幽幽的燭光在搖曳，閃閃的火炬在擺動，我們的行動同樣是神聖的，都是期待中國能重見光明。



於是，我發現除了哀思，還有希望。六四英烈犧牲了，但千千萬萬的人都會記得。我低頭看到燭淚上躺着一隻撲向燭光的飛蟲，它燃亮起一點微光便死了，靜謐地完成了它追求光明的任務，這理想在莊嚴的燭光下永存在人們心中，而且會繼續有人勇敢承傳，不怕犧牲。

在集會上，夏其龍神父敲起鑿鐘，繚繞的鐘鳴帶引我們到屬靈的境界。我默默祈禱，願鐘聲超度亡靈讓死者安息，也祈求上帝拯救苦難的中國同胞，釋放受囚的民運分子。在這陰柔之美的鐘聲迴響中，我了解人的卑微，低頭把這小小的心願寄托在遙遠的彼岸。

接著，朱耀明牧師以悲慟憤慨的感情，宣述着中共現政權進行人間迫害，無數受傷的心靈在恐怖中經過營救，暫能脫身而獲得了自由和新生，一種屬世救度的行動也給了我力量。流過淚後，再站起來，敢於面對傷痛，永不退縮。上帝的大能，可以在渺小的個人身上，透過堅定不移的勇氣和信心，擺脫罪惡的糾纏。在這陽剛之氣的響亮演說中，增強了在此岸繼續努力的生存意志，昂首踏上這條爭取民主自由的漫漫長路。

一九九零年六月五日

1990.6.26

甚麼時候能好好的睡一會

世界杯的熱潮又掀起了許多人一陣子情緒起伏。每場賽事都有可供議論的話題，就如政局的變幻，神來之筆，忽然間又把難題化

諸無形，何苦痴纏下去呢？

這兩個星期以來，我給自己的思想放假去了，是臥病一整天，感到無比疲累和軟弱無力之後，告訴自己別再壓迫自己去思考過份沉重的問題，放鬆一下吧！於是我不看書，不寫東西，做完一整天沉悶的工作後，不問這天過得怎麼樣，不強求每天都有新發現，只想好好坐下來，喝一罐啤酒，不是借酒消愁，而是想冰凍一下已發熱年多的身軀，把腦袋和心中的抑鬱都撇在一旁，看一場球賽，直至倦極而昏睡過去，便覺得這天比以前的每一天都容易度過了。

天氣酷熱，容易鬧頭痛。進出冷氣間，一冷一熱之際，挺受不了。一時間冷得發抖打顫，一時間又熱得大汗淋漓。像政治氣候一樣，常出其不意地，忽而風寒，忽而發熱，既有主觀成分，又有客觀因素。

這年多以來，被中國政治問題牽着鼻子走，鬧得整個人不是頭昏腦脹，就是哭哭啼啼；既倒下了，又不得不強撐着要堅持下去；時而心灰意冷，但又不能忘懷一切。持續的紛爭，令人眼花繚亂，像足球賽事常常爆冷，沒想到腳法飄忽的，卻如此入球；明明實力強雄的，卻碰上倒運。有人歡笑有人愁，我也忽地感到有點痴，到底此時此刻，該愁還是該笑？

我笑得最痛快的是看到李後竟白痴地說：「香港鬧得最厲害，是第一啦！這個很像基地，還罵甚麼一黨專制，說我是禽獸。」我笑李後傻得自認是禽獸，誰罵過他們？以前，有人罵他們是屠夫，作禽獸行為吧！但現在還有人公然地這樣罵嗎？要是他們沒作過中國人打中國人，殘害自己同胞的行為，這些可能有說過，也可能沒說過的話會觸怒他們嗎？

這些年，中國人的命運是如此可悲，那麼多外逃民運人士被流放，家國歸不得，也很明顯是有不願和不能歸去的了。

現在中共確是技窮了！還能耍甚麼花招？她只想大家眼看手勿動，誰想吃中國的肥肉，可以，但是要討價還價。然而等交易協議



達成，這肥肉已不新鮮，甚至發臭生蛆蟲了，因為中共根本不懂得怎樣好好地把自己包裝打扮，保存在最佳狀態叫價待沽。

中國的愚昧既叫人吃驚，也叫人垂淚。這千年的輝煌歷史，五光十色的文物寶藏，最後只剩下愚昧，和彌留於等待發霉朽腐的老昏病殘當中。其實，我們多麼希望能和其他許多國家的球迷一樣，跟自己擁護的球隊同聲喝采、歡呼和互相擁抱、稱慶。就算失敗而黯然下淚，也比面對中國而鬱鬱寡歡的滋味好受，但中國的球籍在哪兒？

前幾天，看到一期雜誌上血腥的照片，我忽然哭喊起來說，以後也不要再給我看到關於「六四」的東西。我很難過，因為它已整整把我一年多的時間佔據，日日夜夜，疲於奔命，多少個無眠夜的折磨，多少天為種種事情困擾悲痛。終於，到這一刻發現局勢多多少少有和緩和微妙的轉變時，我整個人在上升與下沉的起伏中，覺得自己應該和已經置身度外了。

很想很想休息。但沒有吾爾開希、柴玲、許家屯、侯德健、方勵之的政治風險和特權，所以未能隨着時勢的轉變而遠去，或者有目的地奮鬥，只能頹然倒下，等待另一回的蘇醒。

夢想與現實，不管是多麼淒慘和悲壯；思想與情緒，無論是怎樣困結和麻木；天與地，難道就容不下個人的存在？說真的，沒想過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唯願人能好好的活，何等卑微，何等渺小，人啊！人。

以前，很怕自己無病呻吟或者鬧情緒病，但經此一役之後，我才發現病與不病都無關痛癢，因為生死的問題更為深奧、廣闊，而悲天憫人在今天竟是如此真實地有所依據，絕非憑空臆測。這深刻的感受令我挺不過去，我只得承認我是受了傷，因為在我沉痛地面對和迴避現實時，往往是別無選擇地要認定我所在的處境，然後才能再去考慮到底是繼續病倒，抑或再站起來。

我想休息，所以我病。我不想病，所以我要撐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在胡扯些甚麼？我想說的，沒法組織起來，也不知該怎麼說。現在，我沒法說，因為我的思想還未作好準備。

我很疲倦，但沒做過甚麼體力勞動，為甚麼會感到疲倦軟弱？是因為我們做的沒有甚麼值得重提嗎？我想良心能過得去，但即使良心能過，事情卻仍未能過的時候，我該面對良心，還是面對事情呢？

隱隱約約的，像看見又如看不見；是想聽到又不想聽；是明明知道，又說我是應該不知道的。這吊詭的詭異把我引進另一個迷離境界中，世界在變，人也移動，我曾經是我，也曾經不是我。我不比昨日的我好，也不能預期明日的我是誰，到底我應否再繼續去問，去追尋我是誰，誰是我嗎？

生命的歷程還會延續，歷史的血脈還在流動，地球的移動還未停息。我睜開眼睛在看，也閉上眼睛沉思，好讓瞬息萬變的時代帶着我走，因為我的步伐注定是無法超前的，只好亦步亦趨地嘗試緊跟，跟不上就把我拖住也好，別把我甩出去就是了。我不想游離，不要像野鬼遊魂在荒原哭號，更不想再度碰上豺狼猛獸把我的心靈撕扯，既顫慄又痛楚地淌血待斃，魂飛魄散。

我希望時代能帶領我們，不要把我們當成孤兒給遺棄；但也不想時代過份的驕縱寵幸我們，忘記苦難人民書寫的歷史。我們只想歡笑與悲哀都是真實的，同時能讓人們能更加成熟，悲劇不再重演。

往前走，是苦是樂，我不計較，只要不被摔掉或者茫茫無知。何處是涯，何處是岸也沒所謂，但不要渾沌一片，無始無終。

步履維艱，路漫漫兮，是難行的，我已經上路了，忘記何時出發，也不知歸期，像一個過客，浮過生命海，飄泊在人間。

（原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九零年七月八日）



1990·10·7

民運採訪經驗談

八九民運之前，我完全沒有採訪民運的經驗，也沒有返大陸進行過任何中國新聞的採訪。因緣際會，胡耀邦的死觸發起學運與民運的五十天所謂「風波」，記者的捲入和介入可能會是必然的，尤其是我們這一批將會在九七回歸大陸的境外同胞，所以港澳記者的角色更加特殊。

去年的民運，我整整有四十天是日以繼夜，不停地進行有關學運和民運的採訪。由於沒有大陸採訪的經驗和聯絡網，所以接觸面僅局限於學生、市民、工人及群眾，而無法與知識分子及官方高層取得消息和線報。正因為是採訪學運和民運，所以雖然沒有經驗，但還可以應付得來。

如果談採訪見聞，在這四十天內，我採訪過學運明星，也接觸到許多熱血的青年學生、勇敢的北京市民、敢死隊、工人等。到今日，我仍然能用難忘來形容，因為當時的北京確是叫人振奮和激動的。

正因此，在自覺和不自覺之間，我慢慢意識到並承認我對民運的介入，漸有融為一體的感受。雖然當時我是努力嘗試抽離，想以客觀及中立方式處理新聞，但事實上，我無可避免地會有傾向性，加上是非黑白實在太分明，正義和良知不必常常掛在嘴邊，卻會左右一個人的判斷和行為。於是我越來越發現自己在採訪大陸新聞時，難以擺脫這種傾向性的報導。

六四鎮壓之後，一切都進入白色恐怖的低潮中，採訪民運的困難比在北京學潮期間的實地採訪更加令人感到壓抑。在北京採訪民運時，可能因為同心同德，在執行採訪工作時迫切感到要廣泛報

導，盡可能把北京實況告訴讀者，而同時北京人亦會以同樣的心情，希望我們將事實真相向海外傳開，要我們為整場運動做見證。我自己做記者有三年了，身為記者的意義在這一刻才真正強烈地意識到，並確切地感觸到其重要性何在。活着留下來做見證，可以說與犧牲同樣神聖，所以記者受到北京人的保護和很多的協助，希望讓記者能知道更多底蘊，好能更詳盡地如實報導。在天安門廣場「六四」屠城的那一夜，我接受過好幾位市民親切地跟我握手，互相道謝；我也感覺到總有陌生人在背後暗地跟蹤和保護我，遇到槍林彈雨，會拖着我手一起後退躲避；而學生也緊張地要趕我離開坦克正要壓過來的前線，要我撤離到較為安全的地方。

對於六月五日我要倉惶逃離北京，是一直感到非常遺憾和痛心的。當時即使無法再做採訪和報導新聞，但也可以說是最需要記者留守的時候，無奈我們港澳記者確實沒有暴動戰亂時期的採訪經驗，在這個政府大開殺戒，到處危機重重的境況下，北京城街道周圍都看見坦克軍車，都聽見部隊亂放的槍聲，我們根本完成不到新聞工作者的任務。於是，活着留下做見證成為一定要離開的依據，香港記者就這樣全部大撤退了。

往後就是白色恐怖的清洗、通緝、追捕和剿滅。新聞封鎖令記者工作無從入手，甚至連追查或引證任何一個學生的下落，或工人是否被捕、有否聆訊等都全然不知、毫無頭緒。營救行動、地下通道，以及海外流亡人士去向、民運組織的延伸活動，成為傳媒焦點，但是關於逃亡路線和營救過程，由於要顧及當事人和參與行動者的人身安危，以及保護國內民運人士的外逃情報、成功救人的機會等，凡觸及有關這些方面的採訪報導，考驗一位記者的新聞道德操守，而不是搶消息報頭條新聞的靈敏觸覺。

現時，採訪民運新聞，仍然要面對很多盲點，除了要保護消息來源外，更大的困難是根本沒有可能接觸到任何消息來源，也無法找到任何對口的機關和人物，去澄清或核實任何一宗新聞報導的真確性。



此外，除了這些極高難度的問題無法克服之外，還有的是記者申請往大陸採訪的七條規定，我想，若要進行民運消息的新聞採訪或報導的話，肯定是不可能完全遵守這七項規定。就正如去年北京民運的戒嚴令頒布之後的一段期間要無視禁令進行違規採訪一樣，視乎記者有否膽色和勇氣。但是今非昔比，當時北京全民皆兵，百姓義無反顧；現下，經歷過血腥槍殺和坦克輾壓的恐怖場面之後，北京人盡皆默然無聲。今年我曾回去採訪，很明顯知道大家都有許多的顧忌，完全不敢談論當時的情境和那夜的恐怖，已經再也不能暢所欲言了。

亞運今日結束。亞運之前，據一些新聞報導，社科院及中共幹部都要接受高層下達的命令，不准他們接觸海外傳媒和記者。中共唯恐七條規定掩蓋不住記者耳目，還要受操控的學者職工必須自我封口，不准說話，試問在這種情況之下，還是否能有任何民運消息外泄，或人民的訴求聲音可以揚開呢？

老實說，無論民運消息有否泄露，像我們這類記者已經備受打擊和十分洩氣了。本來我是想強撐下去的，但是無法承受長期的壓抑，也不想再面對中共官僚無恥的嘴臉。雖然，我仍然不死心，我仍然很關心被捕民運人士的情況，和在逃學生的安危。不過，在大陸進行採訪工作的困難，確實難以想像和無法承受。我很想回大陸，但是每次入境後都有提心吊膽的恐懼，早已知道的是酒店房間電話被竊聽；每次外出都有被跟蹤監視；常有無形的壓力擔憂被訪者，或採訪過的朋友遭受牽連，會隨即被調查、迫供、問訊或處分；而更大的恐怖是不知道會否因為曾經進行採訪報導，而被視為觸犯國家安全法，洩漏國家機密，被公安特務秘密抓去扣留、盤問、判刑和監禁？

記者的身份與非記者的身份，記者的介入與不介入，難分難解。我經驗有限，處於兩難之中，只能停到這裏。

一九九零年十月七日

1990·12·31

黃泉路上獨來獨往

編者按：這是淑芳在八九六四血腥鎮壓後一年多所寫的稿，充滿悲慟傷情，以及自責自虐的詛咒，讀來令人駭然心酸，深感到她錯踏一步便已奔赴黃泉路了。我審閱時戚戚不安，有意刪掉此稿。不過，三思後還是保留下來，讓讀者體會到殘暴可怕的經歷對淑芳所造成的心靈創傷，更重要的是必須從傷痛中再站立起來。

近年，淑芳積極參與民主發展事工，知道她已漸漸走出幽谷。今年香港維園舉行的「六四」二十周年燭光集會，大會估計有十五萬人出席，更有許多八九後出生的年青人到來，淑芳說她看見「希望」，不滅的燭光，撫平傷痛，照亮中國。

當我感到朋友越來越少，隔膜越來越大，人越來越孤獨的時候，我越來越體會到內心的空虛，和一種莫名的痛苦感覺在煎熬着，叫我灼痛難受。

常唸着瞿秋白引自詩經的一首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而我最不想記住的另一句，是一位朋友，因看了我寫「六四」的文章而想跟我結識，他很了解我的心情，對我



說：「黃泉路上獨來獨往」。

昨晚看《六十分鐘時事雜誌》，有一段是講羅馬尼亞女記者在暴君在位時，跟着官方造謠，後來她投奔美國，羅馬尼亞革命後她回國，憶述她當時怎樣剪接及假造聲音來蒙騙觀眾。羅國人民面對記者不敢說真話，要忍受因暴君施政帶來全民的悲慘生活，以及帶給下一代痛苦的命運。暴君不但窮奢極侈，還強迫人民生育，製造人口，於是出現很多孤兒，得不到愛的孩子，對外界一切都陌生，沒有人撫育懷抱，只能孤獨瑟縮並且不斷搖擺身體，看到這些情景，叫人不寒而慄。這位女記者卻只能軟弱地承認自己曾為舊政權服務，感到非常難過。她始終沒法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她應否向人民道歉，表示過錯。她說，在暴政壓迫下根本沒法反抗，抵擋不住一定會死的，死了就會連認錯的機會也沒有，所以才忍辱偷生地活下來。

我不知道這時代為何會有這麼多的折磨。有時候會想到為甚麼人類會不斷製造痛苦和悲劇，無情地踐踏生命和存在的價值？要建造理想美好的世界，何等渺茫、無望！

有人說，因為九七，不敢結婚，也似乎沒法安穩下來。我想：因為九七，我後悔結婚給另一半牽纏着，而我一定不可以有孩子，製造新生命在一個動盪的世代中，不是不信任他有能力活着及延續人類的希望，而是我沒法承擔得起我要面對他的時候，我的懊喪和憂鬱。

以前，我總說，我不要我的孩子像我那樣，沒有愉快的童年。我能否自我壓抑地克制自己不可以像躁狂發瘋的女人般對孩子動粗或咒罵呢？我其實是很想擁抱孩子，親親孩子，好像在孩子的世界裏，一切都會過去，新的就在眼前。可是，自從我決定不要孩子後，我再沒空想這些，只知道我的生命將會繼續拖沓，是匱乏、空白和零碎、瑣細的，我將永遠沒有盼望和喜悅。

一直以來，我都是在愁緒和沒有笑容的日子裏渡過，我最不希

望日子虛耗、荒廢，總覺得要讀的書太多，要做的事太多，而我又常常給自己借口令很多事情半途而廢，或沒功而回。於是，我一直都很失敗，是道道地地的失敗者。

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眼光也不夠遠大。小時候，老師給我的評語是「沉默好學」，或許我會比許多人出眾，但一定要用功和努力，不是靠天資可以不勞而獲的那種人。

着實，我盡了許多努力。但無論是學業、事業，我仍舊是一無是處，毫無成就。雖然曾有人賞識我，但是無補於事，我依然沒有在學問和資歷上爭取更好的機會或更高的認可；而事業方面，更一直在多勞低薪而付出超乎尋常的重壓下捱過日子。向來我都不會計較，因為生活條件不算太壞，自己掙回來的沒虧欠別人，我覺得無愧。

很疲倦，長期失眠，長期酗酒，長期在煩困和苦悶中度日。我總覺得自己的生命不會太長，如果要我長壽，是上帝給我的懲罰而非恩賜。我常有種來日無多的感覺。於是，很想拚命多做點事情，不喜歡享樂，總以為是一種奢侈，現在不是奢侈的時候，也奢侈不來。

「六四」那夜，我沒堅持到底。我嘗試過要留守到最後一刻，不跟隨人群逃散。可是當官兵打人時，本能的反應是奔跑，意志無法戰勝自然，命定我要接受以後那種命不該絕的苦困，那種想死又死不去的折磨。

知道嗎？生無可戀是最悲哀的存在狀態。不幸地，我太接近這種存在狀態。有時候我會問上帝，為甚麼對我這逃兵叛徒要作如此嚴苛的試煉？我其實可以簡簡單單、瘋瘋癲癲的過日子。為甚麼偏偏我就是比別人多了一些悲戚愁緒的感傷，總是無法快樂起來，為甚麼？

我會不服氣的。當我覺得我並非沒能力去作某些事情，但倒霉



的是，我不被接受去做我想擔負起來的任務時，我是會無比地感到沮喪。

我哭，因為我太孤獨。我想死，因為我無法承擔和救贖我的罪。我害怕對一個不存在的東西說話，我有太多這種經歷，我討厭再要我這樣的折騰下去。如果上帝的恩典是存在的話，最大的福氣是在一個想死的人面前實現這唯一的冀求。可惜，兌現上帝的大能往往是在不可能出現的情況下發生，我從來沒碰上過這份恩典。但是，我還是記住齊克果說過，當一個人在路上想到死亡，而忽然間天上掉下一件硬物把他砸死，這人是得到上帝的最大恩典。於是，我老是想著，甚麼時候上帝真的會給我這份恩典？

一年了，我終於證實我不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因為一年前出現的問題，一年後依舊沒有解決。很明顯，我困惑多時的問題，原來，我一直在逃避著去面對，同時，我亦以為我其實是無能力去面對。

我不能逃避了。我是應該勇於面對的，但到底我該面對甚麼？面對我的人生？我的事業？我的未來計劃？我的過去？還是，我的愛心？我的感情？是我無法承受的愛？抑或逃避面對的情？

你一直是在這感情中扮演角色，我奇怪為何會是你，因為你好像很遙遠又很親切的一個人。為了你，我不知道我的夢在哪兒？我想，若即若離的愛，遙不可觸的情，你的逃避恰巧也是我所不能面對的。你是誰？你在哪？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我對新年的感懷比對生日更深刻。每年我都有些遺憾和懊悔，因為我會責備自己為何這麼容易又一年。這一年，我一無所有。

我不希望一九九一年是世界末日或者甚麼經濟大衰退會出現蕭條現象等。一九九一年能否是一個希望之年，就在於這一年還能否見到一些希望之光，這是無聊的，因為這是循環論證的謬誤語句。

就正如我承認我是有罪之身，於是我不斷的犯罪就不覺得是有罪之人一樣，這是荒誕的，因為這是明知故犯的死不認錯。

如果連你也不理解我，這世界對我而言，是太殘忍了。如果連你也要拋棄我，這國家對我而言，是太可恥了。但我又從來也不作太虛妄的奢求，好像我的個性不好爭執辯駁一樣，有甚麼話好說呢？

以前，試過把安眠藥積存下來。可是，要吃的時候，還是慢慢把藥吃光了，當想睡而睡不着的時候，吃藥是最簡單和直接的方法，短暫昏迷可以讓人空靈地遊走太虛，擺脫痛苦。

我又時常會覺得身體越來越不好，除了容易倦怠和無力之外，我還發現身體好像多了些毛病。多希望這是絕症，讓我時日無多。

假如我死了，不要為我哭泣。雖然我一直夢想着記得我的人應該會有一些。但我想，去年今日我面對過的問題，今年的同一日我仍未找到答案就明顯表示，我根本就是一個缺乏勇氣的人。正如，我還未能打定主意是否去北京闖關一樣，一、二月去和六、七月去，或者九、十月去，都有很大的分別，我實在太孤獨，太無助了，我能為他們做甚麼呢？

不想罵人的時候，只好罵自己，詛咒自己。

活得太辛苦了，所以，好想一死了之。

別為我傷心，生命若有解脫，對我將會是無比的喜悅。我在這世上沒有甚麼東西留下來，也不願意留下一些甚麼。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時

廿年傷痕

廿年後的今天
我的八九六四

仍然是一個
刻骨銘心
難以磨滅的
創傷





2009·4·27

廿載的心靈傷痛

為甚麼我對「六四」靜默

二十年前，我是香港一家報館負責專題報道的記者。原計劃就「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寫特輯，卻沒料想到會留在北京採訪學生運動，最後竟以壯烈的「六四」事件結束。

那年的「五四」大遊行，是我第一次親身感受到青年學生浩蕩的愛國情懷，和北京市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堅韌鬥志。學生衝破武警防線後，排成長長的一列、一列的遊行隊伍。因我是來自香港的記者，被熱烈招呼加入遊行隊伍，並受到學生們的保護。當我在首都新聞界的「新聞自由」、「要說真話」的橫額下，和大夥一起進入示威現場的時候，我已意識到自己既難於抽離現場，又自然而然地捲入他們的行動。我在直接介入事件成為參加遊行一份子，和作為記者堅持要作客觀中肯報導這兩者之間的角色重疊了。也許，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刻、這澎湃的時代洪流裏，是無可避免的二而為一，難以置身事外地冷待事態的發展。直到「六四」那個凌晨，我和大夥學生冒死堅持留在天安門廣場到黎明清場，以盡我的天職。為了對家人和親友作最後的交代，在面臨絕望和生命危險的時候，寫下我的遺言！

這次親證一個公民意識如何由醒覺走向死亡，給我留下永難磨滅的傷痛，而我的中國魂，也隨著「六四」廣場燈光熄滅那一刻，自行宣布了共存亡的遺言誓約。我目擊坦克推倒民主女神，

粉碎了這場運動的象徵，再遇上戒嚴部隊開槍殺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射啞仍在廣播自由之聲的喇叭。經歷過了我視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死寂，我這個劫後的倖存者，再看不到希望，臉容也沒了歡笑。歲月流逝，我也沒法忘卻我的魂魄長久定格在六四屠城那一夜。

作為一個堅持留守廣場，經歷了魂靈離散，最後跟隨學生一起撤離。在別人的掩護下，我只捱了軍隊幾棍。當時，我沒流半滴眼淚，只悲憤無奈地隨大隊撤退。回望廣場最後一面時，是再無能力勇往直前，或者膽敢跑回坦克車和紀念碑面前，呼喚失散的魂靈回來歸隊，重整旗幟。

離開廣場，返回北京飯店，接連聽到恐怖的死傷消息，一幕幕槍殺屠城的夢魘就根植在腦海裏，揮之不去。對於外面的槍聲，我早已麻木，只感到周圍有無數冤魂，沉重地附在仍然活着的人的身上。從此以後，我就移不走胸口這塊抑鬱大石。它持續不斷干擾我的血脈心跳，刺激我噴湧的淚泉。那時候，我只願自己死在廣場，伴隨失喪的魂靈給超渡遠去，不願身心俱喪地苟延殘喘。

雖說是個生還者回來作見證，我所目擊的廣場流血，並未能構成有力的控訴。坊間充斥著北京血流成河的屠城話語，我卻提供不到誇誇其詞的有關北京暴力鎮壓和血腥屠殺的證辭。然而，我失去了看不見的魂魄和活在黑暗絕望中期待光明的希望。我想訴說出廣場燈光和喇叭聲熄滅後，那難言的悲愴和內心的恐懼。我因心靈受創和思緒混亂而不敢站出來公開說話。只當聽到「你果真是廣場最後一位撤離的香港記者？那就足以證明天安門沒有死人，戒嚴部隊的清場行動是克制的」這樣的冷血的質疑時，我才想為廣場領袖勸喻學生和平撤離盡了最大努力辯白。可惜，就是因為廣場上白流的血沒有控訴力，於是長安街上的瘋狂狙擊和坦克輾壓人群的恐怖圖片影像，就不再震撼了。隨後我沒為「六四」發聲，像啞巴一



樣，說不出心底的悲痛。

直到「六四」十周年，兒子八歲的時候，我仍舊帶著他去維園參加燭光集會。每次都跟他說，我很想有機會在「六四」平反後，帶他到北京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講述媽媽心底的痕傷。一九九九年六月，睡前說故事時，他好奇地揭開「六四」畫冊，看見其中一幅的角落有我，叫嚷著：「媽媽，你是出了名的人？」他為我感到光榮。我才第一次跟他細說當年那夜在廣場上，怎樣面對軍隊開槍，怎樣躲避頭上的流彈，看到有人倒在血泊裏，最後見坦克駛入廣場。我幸沒受傷，氣氛卻非常恐怖。

他還沒聽完我的敘述，就搶白地說：「媽咪，我去拿刀劍機槍來幫你打退他們。」我說：「他們用的真槍實彈，還有坦克。」他想了想：「好，我用原子彈去炸死他們。」當下，我嚇得心裏更加恐懼不安，我說：「學生手無寸鐵，堅持和平非暴力，絕對不能以暴易暴。」他當然不能理解，沒聽進去，繼續不斷地想用更超級、更先進的武器來對付他們，一心只想幫我報仇雪恨。我再三解釋，不能使用暴力，不許復仇。最後，我閉口了，因為無法中斷他滿腦子抗暴的念頭。我又再度沉默了，他感覺到我是活在悲哀憂愁的痛苦黑暗當中。到他長大以後，我沒再向他提起我的「六四」傷口，不想讓血腥暴力繼續在他的心靈滋長，而他也不太願意再跟我一起去參加維園燭光集會。

廿年後的今天，我的八九六四仍然是一個刻骨銘心，難以磨滅的創傷。眼淚暗暗自流，忍着痛不喊一聲，靜默地活了下來。我不想憶述見證，只卑微地希望專制極權政府不要迫害弱者，別再向受傷者施虐關押；更希望不明白屠城真相者，別以為我是得了創傷後遺症的精神病，要關進瘋人病院隔離禁閉。同時，我只想下一代能夠認清中共將「六四」真相掩蓋和消滅人民聲音之後，不單上千死難亡靈已成無主冤魂，流離失散，生還者也要獨自面對難以撫慰的心靈痛楚。我憂思當前更大的災劫禍患，是整整一代中華兒女失去

理想、熱血，中國人民失魂落魄地活在恐怖仇恨裏，失去光明的希望和喊不出自由的呼聲。

這三個靜默，長期積壓在心頭，時刻以陣陣的麻痺酸痛提醒我，要鼓起勇氣，即使虛弱無力，也得申吐一口怨氣，吟訴一聲哀歎，以回應那夜失落在廣場的魂靈，對我一息尚存的意識心所作的召喚。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2009·5·4

睹物思人

天安門兄弟

我曾經珍藏一件填滿了「六四」學生名字的T恤和一個殘留幾滴血的白色布口罩。當時廣場上絕食的學生，把自己的心聲訴求連同簽名記下來，寫在身體不同的部位和隨身的物品上，包括手臂、臉龐、額頭、衣服、纏頭布條、橫額、旗幟、帽、雨傘……。當時，我拿著一件在北京大學買的T恤，請他們簽名留念。



去年馬少方來訪。廿年前的「六四」，在天安門廣場最後清場撤離之後，我們首次重逢，他細心地觀看這些文物、圖片和T恤留言。他發現很多同學的蹤影，又形容大家的近況音容，還在T恤上看到「六四」遇難學生吳向東的簽名。那夜，我們被部隊槍口和棍棒追打下逃命，那口罩上的血迹，就是同學被打到頭破血流時噴濺出來的。我那時只顧拚命地連跌帶爬的跑出來，也沒能力去照顧受傷者，誰知道最後有多少人倒下不起呢？離開廣場之後，我好好地保管了這些文物和每一個留下來的名字，等待再見的日子。

在《天安門兄弟》這首歌的開頭，聽到一串熟悉「我是……」的名字：封從德、張伯笠、郭慧、張茂盛、熊焱、劉偉、周鋒鎖、王龍蒙、魯德成、王丹、方政、雪濤、吳仁華、張健，到最後那句「我是馬少方」，我又回到廣場的昂揚激情，聲調是那麼的豪氣。盤古樂隊段信軍的曲，張健的詞，由張健和王龍蒙合唱，他們是「六四」學生，張健那夜中了三槍，子彈還留在骨肉裏，他們真情演繹這首歌，是要獻給殉難兄弟們的英靈。生還者唸出自己的名字，呼喚著記憶，我沒聽清楚張茂盛的名字。他是誰呀？兄弟們說：「他是所謂的『暴徒』死緩出來了的。」

我告訴天安門兄弟，我跟馬少方那夜守在廣場最前線，是第一排看著坦克駛進的，危急關頭，他喝令我退下，要其他學生讓開和保護我。張健回我說：「馬少方我們是二十年沒有通話，那天在盤古段信軍家給他打通，他二話沒有說，就錄製了，他是在喊著的，他說：『張健，我是馬少方』，說了三遍。後面是『子彈要留著啊！我要看看。』哈哈哈。老樣子和脾氣沒有變。似乎一聲令下又在衝鋒了。真是兄弟。」

我眼淚又流下來了，患難與共的真兄弟啊！我終於明白，為甚麼馬少方在通緝令下第一個走去投案，坐了幾年牢，出來又繼續奮鬥，儘管敏感時刻仍持續遭受迫害和監視審查，可他還是選擇留在中國堅持不肯離去。我們見面時曾談到經過「六四」白色恐怖後

的無數個漫漫暗夜，我得了憂鬱症和驚恐症，經常失眠，而且都是凌晨四點鐘驚醒過來，再也睡不著。我心底埋下了許多的悲痛、憂傷、畏懼和想死的念頭。而他，是真正受過苦難囚禁，卻對我說：「坐幾年牢，被虐待，受恐嚇，挺過來了，沒有甚麼好害怕的。」我說：「我是真怕，受不了，那擔憂與畏懼。」還有，未超度的亡靈在中陰界的哀鳴和呼嘯，說不出的悲傷，我有感應，催淚的心痛，窒息而沉重，好像我也跟隨他們死了好幾次，卻未能為他們解冤仇、了心願，總是不捨的彌留靈異空間，不能升天遠去。

是的，活著的真兄弟，對著軍隊坦克，大喊：「來吧！」仍然是大無畏的。我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恢復元氣，在死蔭幽谷來一聲獅子吼去呼喚失散魂靈，重拾「六四」的記憶、感懷和情義，了無牽掛的一起回祖國的土地安息。

可惜，那珍貴的遺物最後給丟失了，我難言傷痛，只剩下幾張照片和片言隻語。可幸，這親切的聲音影像還在，我難掩戀慕，誰也忘不了，亡靈托附和聚攏起來，情常在，思憶念想，永存人們心中。

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



張健 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糾察隊總隊長，六月四日凌晨連中三槍受重傷，現流亡法國

附《天安門兄弟》

——「六四」學生真情演繹，獻給殉難兄弟們的英靈

詞 / 張健 曲 / 段信軍 編曲 / 蟲子 唱 / 張健 王龍蒙

兄弟你在哪裏
是否記得風雨裏烈日下
我們緊握著手 沒有畏懼

兄弟你在哪裏
六月的夜你滑倒在地
我怎麼無法 將你喚醒

兄弟你在哪裏
是否記得槍火中吶喊裏
你我跳動的心 緊緊相依

兄弟你在哪裏
縱然過去千年萬年
不變的你的風采 永駐在一九八九

無情的子彈穿不透理想
自由的胸膛比坦克更堅強
我們的誓言是不熄的火焰
青春的熱血永遠不會風乾

活碑底層

六四底層列傳

六四軍人列傳





六四底層列傳

黃河清 編錄

蔡淑芳 整理

目錄

代序 關注「六四暴徒」，還他們一個光榮的定位 武文建	303
編錄者說明	304
六四底層列傳	
一、英雄譜（49人、集體1140人）	305
二、無名氏英雄譜（6人、3群體）	313
三、孩子老人遭射殺死難者（5人）	315
四、遭坦克軍車碾殺者（21人）	315
五、遭刺刀捅死者（2人）	317
六、救援傷員遭射殺者（9人）	317
七、躲藏逃跑仍遭射殺者（5人）	318
八、遭炸子射殺者（15人）	318
九、遭槍擊後不准救治致死者（3人）	320
十、在天安門廣場遭追殺者（7人）	320
十一、遭射殺後獲撫恤金者（6人）	320
十二、在家中遭射殺者（7人）	321
十三、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者（12人）	322
十四、堅持不撤死活未明者（400 - 500人）	323

十五、北京城各地遭射殺死傷者（113人死、76人傷殘）	323
十六、不堪折磨自殺者（3人）	333
十七、醫務人員之勇者義者赴難者（6人、3群體）	333
十八、記者編輯之勇者義者赴難者（14人、1群體）	335
十九、「六四」後遭抓捕 判刑受難死難者（1200人）	337

後記	368
----------	-----

代序

關注「六四暴徒」還他們一個光榮的定位

北京 武文建

二十年了，似乎海內外的民主精英們都有意或無意的忽略這個群體。是的，這些「暴徒」們文化不高，不會寫也不會說，更不會作秀玩什麼「和解」實為給劊子手繼續下跪；這些「暴徒」們不會說出「反對暴力」又拿「成本」說事的文明學說。但是，當年劊子手撕下偽裝殺人時，北京市民和「暴徒」們拿出了人性中最聖潔的真誠用生命用熱血奏響了反抗暴力的神聖樂章。試問，當年全人類所有成員還有誰比他們更可愛的呢？

「六四」屠殺後全國大抓捕，因「六四」遭判刑的人員很多。二十年了，這些人遭受難熬的刑期後又遭受貧困的生存壓力。「六四」除了死去的人，就屬遭判刑的人員付出的最多，並且苦難還在繼續。



「六四」的道義資源，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暴徒」們和遭判刑的人員用青春的代價所積累換取的。二十年了，誰在消費「六四」的道義資源？那些因「六四」所得綠卡的8萬人（劉賓雁說不下10萬）都哪裏去了？我要大聲的對這些人說：你們最應該關注因「六四」遭判刑的人員，他們是被共產黨和民運們所拋棄的群體，請拿出你們的良心！

2009年4月15日於北京

編錄者說明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的學潮有許多市民、工人參加。解放軍戒嚴部隊進京「平暴」，攔阻者主要是市民、工人，有青年，也有許多老人。六四鎮壓屠殺和事後清查，市民、工人和底層學子、底層知識人被作為暴徒射殺、整肅、抓捕、判刑、槍決者是六四受難者的絕大多數。他們基本上被遺忘了，遺忘在監獄中和社會上，也被遺忘在視六四為偉大革命行動的學生名人和知識精英的記憶、話語和文字中。有大陸武文建曰：「這些年來，估計寫了幾十萬篇文章吧——就沒一個字，為這些『暴徒』而寫，好像這些人根本沒存在過……」。語或過激，然非虛妄，基本是實。有海外吳仁華曰：「在八九民主運動中，最具有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的是允論。

1989年6月3日至4日晨的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頭，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面特殊的鏡子，底層民眾、底層學子、知識人，在這面鏡子中濃縮了鐫刻了自己的身影，留給了青史。編錄者擷取這十幾小時的主要場景，作「六四底層列傳」，列傳共分十九項（詳見目錄），以為歷史補闕，為底層立傳。

六四底層者逾1500人，10個群體約2000人，有姓名、年齡、身份、何處人氏、遇難地點、簡況介紹、近況諸要素，為筆者所聞所見所尋綜合歸納，不一一注明出處。大量未知未錄者，期識者補充。錯訛之處，祈請指謬補正。不勝感謝之至。

一、英雄譜(49人 集體1140人)

殺身成仁者 **韋武民**，女，武漢人，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83級學生，已畢業，待分配。韋參加天安門廣場學運和絕食，其退休老母也來陪伴女兒。有學弟王龍蒙者問她：「為什麼您也來，這廣場的生活如此艱苦。您怎麼可以承受得了？」老母答曰：「中國的自由和民主不只是你們自己的事，也是我們大家的事。我來廣場一直陪伴我女兒，陪伴你們，也是代表我自己參加這場運動。」6月4日後清查中韋遭整肅，某日，她迎著火車頭走去，撞車自殺，香消玉殞，身殉國殤。現流亡法國的王龍蒙廿年來一直打聽韋武民下落，無從得知。王現呼號：「我更想知道的是韋武民學姐您的母親還在人世麼，是否也隨著您的愛女共赴黃泉。如果您萬幸活著，我多麼想跪在您的面前，叫您一聲：『母親』。」

1968年捷克布拉格遭前蘇聯軍隊坦克入侵，有捷克查理大學19歲學生自焚抗議。捷克人民在布拉格最著名的廣場為他造墓立碑，燃長明火。余1990年旅居布拉格，每日經過其墓，每日見墓前鮮花陳放。吾國吾族非無此等英烈者，韋武民即是。其女兒身、巾幗氣偕秋瑾、林昭、李九蓮、鍾海源、張志新更動天地泣鬼神。奈吾人不復記憶矣。獨丁子霖「六四死難者名單」有幾十字的記錄。余以韋武民冠於「六四底層列傳」之首，祈韋姐妹英靈安息，警吾人良知道義醒來，求知情者還原其真其實其詳其細，願精英名人不忘同仁、不忘同學、不忘千千萬萬北京義民也。

1140名政大、北大、北師大學生敢死隊員。1989年6月3日，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自治會廣播站播送成立特別糾察隊前赴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的通知，呼籲同學參加。其時，北京城內已經傳來解放軍戒嚴部隊動武打傷大批學生市民的訊息。特別糾察隊無異於敢死隊。報名參加特別糾察隊的人很多，有男有女，領隊吳仁華、劉蘇里挑選了40名男生，每人發給紅布條，紮在頭上，作為標記。3日下午3時10分，40名隊員離開政大，搭乘一輛路過的大卡車前往天安門。聞訊而來的政大師生簇擁在校門口相送，激昂慷慨，熱淚揮灑，瀰漫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氛。3日晚8時，北大100學生敢死隊員來到了廣場；北師大學生王德邦率近千名北師大學生也於3日晚緊急增援守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1100名北大、北師大敢死隊員與政大40壯士會合。臨難事者有三：處難



不退，勇也；臨難逃逸，怯也；赴難就死，勇且義也。赴難最難。漢有田橫五百壯士，民國有四行倉庫抗日八百壯士，今有一千一百四十學子敢死隊員，其民族之勇毅之捨生取義精神一以貫之，堪媲美也！一千一百四十敢死隊員，名不見經傳，其赴難之時，未絲毫為名慮。吾人有責，為其鐫刻青史，垂式後昆。

吳仁華，浙江溫州人，1956年生，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參與1989年學潮，組織4月17日北京學生第一次遊行示威活動，擔任新華門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1989年6月3日，吳受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委託組織特別糾察隊赴天安門廣場維持秩序，經歷了「六四」血腥煉獄的一夜，堅持到最後。1990年3月，被追捕逃亡中的吳仁華跳海游泳到香港轉赴美國流亡。現居美國洛杉磯，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中國憲政協進會秘書長。吳窮多年之力，著《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傳世。

劉蘇里，1961年生，中國政法大學教師，與吳仁華一起組建挑選特別糾察隊赴天安門廣場，一起守護到最後。劉家有嬌妻幼兒。6月3日午夜，劉妻來探望，知道勸不回丈夫，交代單身漢吳仁華盡量幫她看顧好劉，千萬別出事。劉妻淚流滿面，言不成聲。

孫永平，浙江溫州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6月3日-4日，孫與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生死相依在一起被驅離。孫腳有疾，被驅離時鞋子沒了，光腳一拐一拐走回校園。

陳坡，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6月3-4日，陳與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一起守護至被驅離。4日凌晨4時30分，廣場熄燈後重新開燈，解放軍戒嚴部隊與學生怒目相向，雙方情緒都極度憤怒緊張至臨近爆炸點。陳坡站出來講話，呼籲學生保持鎮定和秩序的時，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與學生生死與共，絕不向獨裁專制者屈服。

張麗英，中國政法大學國際經濟法系教師，6月3-4日與學生一起守護在天安門廣場至被驅離，走到長安街上時，遭從後面追來的三輛坦克施放的毒氣彈毒暈倒地。

海明、蔡敖、肖東、賈毅、慈恩、簡雷、高戈，海明諸7人，清華大學青年教師，6月4日凌晨2時許，還與學生一起守護在天安門廣場，接受記者採訪。因為太疲憊了，不管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子彈曾射中身邊2、3米處的一座帳篷，7人還是不顧一切鑽進了一座帳篷睡覺。幸其中賈毅一直處於半醒迷糊狀態，至4時廣場燈光全熄，賈毅感覺異常，急忙將同伴叫醒，離開帳篷，回到紀念碑周圍。不久坦克、裝甲車就在他們睡的帳篷上隆隆碾壓而過。

王德邦，北師大學生，在6月3日晚得悉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鎮壓屠殺民眾的訊息後，主動出面組織並率領近千名北師大學生緊急增援守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他認為：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市民越多，屠殺清場的可能性就越小。王德邦在長安街上目睹和經歷了血腥場景，險死還生，受傷後活了下來。臨危受命，慷慨赴難，死不旋踵，捨生取義，吳仁華、劉蘇里、孫永平、陳坡、張麗英、海明、蔡敖、肖東、賈毅、慈恩、簡雷、高戈諸君子是也。學生為此難。知識人唯此最難。其時，「北京城的氣氛已經非常緊張，許多知識界知名人士紛紛離開京

城避風……失去行踪，聯繫不上。」時過境遷，名人們流亡集中在海外各民主國家，紛紛撰文回憶「六四」，多有英雄氣壯兒女情長的篇章，也有或撇清或自澄，或細述逃亡細節，或自詡我是黑手，或於高層內幕的撲朔迷離，或於居中調停的積極斡旋，或於好上壞下的高妙精當，或於絕食撤離諸問題的枝枝節節、遲遲早早、是是非非高談闊論、爭訟不休，而屠殺鎮壓的史實則少人深究、實究，底層民眾英烈被視而不見遺忘淨光。幸有二十年中丁子霖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二十年後吳仁華的《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兩書填補了一部分空白。余以電話向吳仁華索書，萬里鄉音傳遞，頗感親切。敝鄉賢中有吳仁華、孫永平、溫州媛子諸勇仁信義兼備者，余與有榮焉。

林青、宋文清以及北京農業大學百餘學子。6月4日凌晨4時，天安門廣場突然熄燈，死一般的黑暗和寂靜籠罩著廣場。解放軍戒嚴部隊有意製造的死亡恐怖感比死亡的現實威脅更加可怕。仍在廣場守護著的北農大一百餘同學互相鼓勵著，他們已不抱任何幻想，想到的只是需要留下什麼給父母。同學們紛紛尋找紙筆準備寫遺書。宋文清同學遞給林青同學一個本子，讓大家記下姓名、班級。

周鋒鎖，西安人，清華大學物理系85級學生，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6月3日主動前往天安門廣場與同學一起守護在廣場紀念碑周圍，至4日凌晨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托毆擊驅離廣場。「六四」後遭通緝逮捕關押1年。現居美國三藩市。

楊朝暉，北京「高自聯」糾察隊負責人，一直守護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期間多次暈倒。6月4日凌晨，楊在撤離時因極度疲憊衰弱，被擠倒地不起，人群踩踏而過，楊呼喊求救「拉拉我，救救我！」力竭聲嘶，混亂嘈雜中聽者未聞。楊朝暉掙扎良久，用盡最後力氣，伸手在空中揮動，伴以喊叫。原先與他同行的梁擎墩正走不遠，終於循聲看見了楊求救之手，回身一步步硬擠過來，拉起楊，相偕相攜脫出生天。

梁擎墩，四川蓬溪人，1969年生，北師大心理系學生，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周圍守護至4日凌晨撤離，撤離時，救了同學楊朝暉一命。「六四」後遭通緝，現居美國洛杉磯。

馬少方，江蘇江都人，1964年生，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北高聯」常委，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一起守護在紀念碑周圍至4日凌晨撤離。「六四」後遭通緝逮捕判刑3年。現居大陸。

張志清，中國政法大學87級學生，「北高聯」常委，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與同學一起守護在紀念碑周圍至4日凌晨撤離。

邵江，1966年出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北高聯」常委，6月3日與同學一起守護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周圍，午夜時分，前往西長安街燕京飯店一帶觀察並搶救傷患，T恤上沾有傷者腦漿，至今保存；返回廣場，講述解放軍戒嚴部隊殺人情景，建議撤離。「六四」後入獄17個月，獲釋後起訴警方、公安部、國務院侵犯公民權利，上書呼號民主，屢遭拘捕監居。1997年流亡海外。現居英國，就讀威斯敏斯特大學，是政治學在讀博士生。

熊焱，湖南雙峰人，1964年生，北京大學法律系代培研究生，6月3日與同學一起守護在天安門廣場，並前往西長安街搶救受傷者。「六四」後遭通緝逮捕關押2年。現居美國，在美軍中任隨軍牧師。

潘強，山東大學外文系學生。6月3日，潘強在廣場拿著小喇叭聲嘶力竭地勸導民眾放下石頭棍棒，不要拚命。一位工人紅著眼怒吼著：「他們殺人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害怕就滾開！」潘強一點挨了一位工人的揍。4日凌晨4時，天安門廣場熄燈之後，潘強因疲憊至極，明知就要清場殺戮，還是不聽同學勸阻，在歷史博物館東門前小樹林裏睡了一會。他自我安慰：先躺下休息一小會兒，以便在清場時頭腦清醒些，否則在黑暗中暈乎乎反應呆滯，很容易被殺。這一躺，他無意看到了解放軍戒嚴部隊官兵用水龍頭沖洗廣場地面的場景。他成了最後一隊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中最後一人。

謝京鎮，21歲，北京聯合大學輕工業學院學生。6月4日凌晨，謝在西單六部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棍棒打爛下身，繼遭射中左胸，送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死亡。

劉弘，24歲，清華大學88級環保專業研究生。6月4日凌晨，劉在前門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腹部，腸子流出，被同學塞進，扣上一隻小盆後送醫院搶救，死於同學懷中。

閻文，22歲，北京大學數學系87級學生。6月3日夜，閻扛著私人攝像機趕到長安街拍攝，4日凌晨1時許，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右腿主動脈，死於海軍總醫院。

張XX，19歲，河南人，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本科生。6月4日凌晨，張自天安門廣場撤離至六部口，額頭遭棒擊，繼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咽喉，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身亡。

夏之蕾，女，22歲，南方某大學學生。6月4日凌晨，夏隨廣場學生外撤，行至東單時，夏踉蹌倒地，說了句「快！快找個地方歇歇。我好像中彈了。」夏捂著胸脯，鮮血從她的指縫中湧出。幾位女同學脫下她的襯衣，發現左胸中了一槍，血仍在往外湧，幾分鐘後身亡。

李浩成，20歲，天津人，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漢文學專業87屆本科生，團支部書記。6月4日凌晨，李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拍攝照片，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兩彈，送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校方給予李親屬2000元作為補償，同時銷毀了李的檔案。

王楠，19歲，北京市月壇中學學生。6月4日凌晨，王在南長街南口拍照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倒地，倒地的王楠作出「V」字手勢後昏死；軍人禁止救護隊送醫院搶救，一老太太跪下呼天搶地懇求軍人開恩讓送醫院，軍人不從，兩三小時後王身亡；守護在王身旁的醫生學生民眾要求移屍醫院或家屬，軍人仍不從。屍體被軍人埋於天安門西側北京市28中學校門前綠地內。6月7日，屍體發出異味，經校方交涉，將屍體挖出。6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為其開具「外出死亡」證明。

王磊，西北大學哲學系87級學生，6月3-4日與同學一起守護在天安門廣

場，4日凌晨撤離朝前門方向走時，他身後有兩位同學被背後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來的子彈擊中倒地，王磊回身搶救，將傷者送往前門醫院。

高旭，山西大學電腦系學生。6月4日清晨，高旭隨學生隊伍撤離了天安門廣場。因有同學遺忘了照相機，高旭返回廣場去取，即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抓捕。高與一起被抓捕的8人被捆綁在人民大會堂的柱子上，軍人用槍托狠砸他們，用煙頭燙他們。有人的前胸後背被用煙頭燙成了「暴徒」二字。打夠了後，高旭8人被轉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關押，再遭毒打，昏死過去，用冷水潑醒再打。高旭僥倖活命，然雙目幾乎失明，嚴重腦震盪後遺症，每天須服止痛藥度日。

鄭魯濱，北京測繪出版社職員。6月3日下午3時15分，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南側用武裝帶猛力抽打學生市民。鄭魯濱上前搶救一位被打倒的老人，遭軍人毒打，頭部被用鋼盔砸破，血流如注。晚7時，鄭魯濱出席了學生召開軍人武警暴力傷人的新聞發佈會，現身說法。

李蘭菊，女，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學生，6月3日夜在天安門廣場竭盡全力勸民眾不要以暴易暴，不要手執棍棒作無謂的犧牲。她勇敢地走向荷槍實彈虎視眈眈的解放軍戒嚴部隊，拉住一位軍官的手，哽咽著說：「我是香港的學生。天安門廣場裏的人都是大學生，是國家的精英和棟樑，他們是和平請願，絕不是暴徒……你們不能開槍，求求你們，不要朝他們開槍！」李蘭菊痛苦失聲，跪倒在地。一位15、6歲孩子放聲大哭，要去和軍人拚命，李蘭菊拚命勸阻，百般撫慰，孩子伏在李蘭菊肩上，淒厲哭叫「哥哥，哥哥！」當李蘭菊再次見到這位孩子時，孩子已是渾身鮮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懷裏。李蘭菊悲憤痛心，當場暈倒在地，被人送到急救站再轉同仁醫院。

陳清華，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工作系學生，6月3日夜在天安門城樓附近拍照，後伴送同學李蘭菊來到同仁醫院。傳來軍人要來醫院搜捕暴徒的消息。醫院人員勸導輕傷者離院躲避。陳清華將自己身上的3000元人民幣分發給躲避的輕傷者作路費，每人100元。

小陶，16歲，學生，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在同仁醫院救治。陳清華分給小陶100元時，小陶流著淚拒絕了，說：「我是不行了，胸口中了兩槍，一條腿也斷了。你還是把錢分給別的同學吧。」小陶看見李蘭菊腰包上有一枚「天下為公」的徽章，對李說：「請你告訴同學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又哽咽告訴李：他是獨子，父母一定會為他的死訊傷痛。6月4日下午3時，陳清華、李蘭菊要離開醫院，特意去向小陶告別，發現小陶已經永遠閉上了眼睛，永遠不會說話了。

雨源，學生。6月4日晨，撤離的學生隊伍行至六部口，解放軍戒嚴部隊三輛坦克從後追了上來，一邊施放毒氣彈，一邊逕向躲避的學生碾壓擠壓過去，碾擠死傷十幾人。雨源目睹同學遭碾壓，悲憤莫名，設法收殮5位被碾死同學屍體運走。未料，碾人坦克去而復返，從背後逕向收屍的他壓去。民眾和同學衝他驚叫，雨源回頭一看，坦克已在身前，他條件反射地扔掉手中木板，跳往一邊。轉眼坦克已過，雨源扔掉的木板被壓得像麻片。雨源諸同學和一位個體戶小卡車司機終於把這5具屍體運往政法大學。車子開得慢，不顛簸重疊的屍體，又為繞開軍人，在胡同裏尋路；一路上，護送的自行車越來越多，還有行人跟著，有上千人。小卡車到達政法

大學時，數千名師生在校東門口迎接。一位老教授噙著淚水緊緊抱住從卡車上跳下來的雨源。一直憋著的雨源這才趴在老師身上嚎啕大哭起來。這5具被解放軍戒嚴部隊從後碾壓而過的屍體擺放在政法大學教學大樓，設置了靈堂。先後有數以萬計的師生前來祭悼。

林耀強、黎洪。林耀強，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赴京聲援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主席；黎洪，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林黎諸香港學生在6月4日凌晨3時許來到北京天安門廣場會晤學生領袖柴玲諸人，表示支持，雙方緊緊握手擁抱。柴玲諸北京學生領袖再三懇請林黎諸香港學生離開廣場，爭取安全返回香港；林黎堅持留下，他們說：我們雖然是香港學生，但也是中國人，在這個時刻決不能離開。林黎諸香港學生終於留了下來，與北京學生一起守護到最後一刻。

王維林（？）。1989年6月5日，北京戒嚴部隊天津警備區坦克一師的10餘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離開時，有一個人擋在坦克前阻止坦克離開。這個人據說叫王維林。美國公共廣播協會公佈的一段錄影中顯示：在東長安街上，王維林跑向一列正在前進的坦克，揮手示意坦克後退。坦克停止了前進，並試圖繞開他，但他仍然左右移動堅持擋在坦克之前。當頭坦克停下，後續坦克相繼停下。王維林爬上當頭坦克，坦克裏面的軍人爬出來，兩人交談了一會兒，那個軍人朝後面的坦克揮揮手。王維林爬下了坦克，坦克往後面退了幾步，又突然加速試圖衝過他，王維林再次擋在了坦克跟前，相持一段時間後，一個騎自行車的男子騎到了坦克跟前並與王維林交談了幾句，這時路北方跑來兩個身穿藍色工裝上衣高舉雙手的男子，一左一右夾送王維林快速跑步離開坦克，從畫面上消失了。錄影到此完畢。中央電視臺曾播放過相關錄影，顯示王維林安然從坦克前離開。中央電視臺在語言文字的報導中，稱王維林為「螳臂擋車的歹徒」。中央電視臺在後來大量播放六四節目時不再播放這一錄影。1989年「六四」後，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接受美國記者芭芭拉沃爾斯特訪問時，被問及王維林的下落，江澤民表示不知情，至於之後王是否被秘密逮捕並處死，江澤民表示沒有（never）。1992年臺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多次會晤江澤民詢問王維林下落，江澤民明確回答：死了的人名單裏沒有他，關著的人裏沒有他，看來是躲起來了。2003年，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糾察隊長張健在馬德里對包括筆者在內的3人說：王維林是安徽合肥工業大學學生，是他任隊長的糾察隊隊員，他很熟悉，尚在人世，居大陸某地。2007年，香港某大學黃先生在德國柏林說：王維林是考古專業人員，尚在人世，在臺灣故宮博物館任職。以上說法莫衷一是，都沒有確鑿依據。王維林身份至今未能確認，生死未卜。「王維林」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英國報刊上（Wang Wei lin），中文是據其音譯沿用流傳，英文報刊的準確名稱則未見，更未見有人順藤摸瓜，予以挖掘考證。「王維林」的真實姓名至今未有任何確定資料可資佐證。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錄影出現在全球各種媒體，被視為英雄，被作為一個標誌性的人物。相對於中國大陸百姓對他幾乎毫無所知的情況，全世界億萬電視觀眾則明白無誤確認：1989年6月5日王維林擋坦克是人類良知與勇氣在向無情的專制機器挑戰，這一瞬間，已成為永恆的歷史象徵。

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余志堅，湖南瀏陽人，26歲，瀏陽市中學

教師。喻東岳，瀏陽人，22歲，瀏陽報社美術編輯、記者。魯德成，瀏陽人，26歲，汽車公司司機。余、喻、魯三人志趣相投，相交相知，談文學談政治，談毛澤東談中國前途，對專制深惡痛絕。1989年春學潮起，余、喻、魯偕長沙學生組成「倒鄧擁方」湖南請願分團於5月18日抵京聲援北京學潮。在北京，他們積極參加了各種示威遊行、演講、攔截戒嚴部隊等活動。余、喻、魯痛恨鄧小平的戒嚴鎮壓，不滿趙紫陽的懦弱，對學生下跪式的乞求民主也大不以為然。5月21日，他們寫了意見書，希望「高自聯」能夠迅速「號召首都和全國工人罷工、市民罷市、學生罷課」。他們上廣場向學生領袖投書，未果。5月23日午後，余、喻、魯在天安門城樓貼出了「五千年專制到此可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大型橫幅。2時40分，余、喻、魯站在城樓下，將事先備好的顏料雞蛋，砸向了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懸掛著的毛澤東巨幅畫像。一時轟動全國，震驚全球。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學生領袖將余、喻、魯3人送交北京市公安局。「六四」屠戮後，余、喻、魯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分別判處無期、20年、16年徒刑。1989年冬，余、喻、魯被押回原籍湖南，關在衡陽監獄服刑。喻東岳在獄中遭獄卒毆辱酷刑致精神失常仍被關押。2006年，喻東岳坐牢16年9個月後獲釋。他不知道自己是誰，現在是什麼時間，世界有什麼變化。如此延續半年經多方治療後始稍有好轉，至今仍然精神失常。魯德成於1998年獲釋。余志堅於2000年獲釋。2004年，魯偷渡至泰國。2006年，魯獲加拿大政治庇護，移居加拿大。2008年，余志堅、喻東岳偷渡至泰國。2009年，余、喻二人到了美國。

方政，北京體育學院理論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學生，1966年出生於安徽合肥。1989年6月4日晨，方政從天安門廣場隨著撤退的學生隊伍走到離中南海約50米的六部口附近。三輛隨後追來的坦克施放的毒氣彈在他身後爆炸。跟隨方政的一位女同學嚇壞了，方政扶抱她往人行道移動。這時一輛坦克從方政身後急速馳來，坦克炮筒就在方政頭上。方將學妹推靠在自行車道與人行道的護欄上，自己躲閃不及倒地，坦克壓到雙腿，毫不遲疑地碾了過去，方正的褲子連腿被捲到坦克履帶的鏈條上，拖了一段路後，鏈條把雙腿撕拉掉了，方政從坦克的履帶上掉了下來。方政還有知覺，下意識地滾到了路邊，靠在護欄上，昏死了過去。好心人將方政送積水潭醫院救治。已經接近死亡的方政由於醫生護士的全力搶救得以存活，右腿截肢大腿上部，左腿截肢膝蓋位置。九死一生的方政6月9日被從病房抬到一間大辦公室，北京市公安局盤查審問了重傷中的他，讓他在筆錄上簽字。20日，方政從積水潭醫院轉到北京體院校醫院。為方政所救學妹安然無恙，到醫院看望方政，感謝方政救了她的生命。院黨委讓方政寫交代，要他不要寫是坦克壓的，寫是軍車或者是裝甲車壓的，且責問方政是否有暴力舉動，否則，坦克為什麼會壓你呢？方如實陳述。院黨委找到被方政所救學妹作證，學妹說：我記不起當時的情況了，當時我沒有看到坦克壓人，我昏過去了；甚至不承認與方政在一起。有另外的目擊者北京鋼鐵學院吳培老師和曹姓職工則主動找到體院校方為方政作證。1992年，方政被趕離學校，沒有分配，沒有工作，生活艱難。方政參加了1992年全國殘疾人運動會，獲輪椅鐵餅、標槍冠軍。1994年遠東及南太平洋傷殘人運動會在北京舉行，方政報名參加，通過選拔賽，參加北京集訓。領導知其



是1989年六四被坦克碾斷雙腿後，即取消其參賽資格。此後，方政一直被當局監控至今，被當局絕了與體育運動的緣分。2008年奧運前後，方政踪影全無，再也找不到他。2008北京奧運前，有心人呼籲：「方政，你在哪裏？天不絕方政！他頑強地活下來了。我們不要再一次碾殺方政！底層人，我們找到方政，與他聊天，買點糖果諸小禮物給他的孩子，送一束鮮花給他的妻子、父母，感謝他的妻子成為方政的女人，感謝他的父母養育了方政這麼個頂天立地的男兒；住在他附近的朋友，帶上一杆標槍、一個鐵餅，推著他的輪椅，陪他上最近的體育場，與他一起擲鐵餅、投標槍。」2009年3月，方政偕妻子來到美國。

武文建，河北人，北京燕山化工廠工人。武「六四」前去天安門幫助學生維持秩序，六四清晨去天安門看實況，見地上一灘灘血，見解放軍一大片，迎過去欲詢問情況或理論。緣其從小受「軍民魚水情」云云的教育，一時絕接受不了解放軍會殺老百姓的事實。握鐵棍兵數百人追打他，武背上挨了一棍，幸腿快熟悉地形，鑽胡同得以逃脫。另有一青年被追上打倒，不成人形。兵退後，武與群眾送尚有一口氣的青年去醫院。武回家後，找了件體恤衫，用毛筆寫上：「還我民主！還我自由！」後背寫孫中山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在燕化廠區遊走，逢人便說城裏情況，被群眾推上貨車演說，喊口號「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罷工！罷市！反對鎮壓！」旋轉身軀讓群眾看胸前後背的字。武後來躲到河北奶奶家。武父相信公安局長朋友「只要找出你兒子，一定寬大處理」的話，告訴他兒子在河北。警察去河北把他兒子抓了回來交給了黨和解放軍。武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7年。1995年出獄。武說：「這些年來，估計寫了幾十萬篇文章吧——我每年都要看一些，就沒一個字，為這些『暴徒』而寫，好像這些人根本沒存在過……」。武文建現居北京，39歲，畫畫維生，入獄時19歲。

張健，18歲，北京體育運動學校學生，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糾察隊總隊長。1989年6月3日夜時分，在天安門東觀禮台對面，張健和糾察隊員對著戒嚴部隊的軍人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這時，一輛大型公共汽車越過人群直接開到軍人前面，軍人隨即開槍掃射，把汽車打的像篩子一樣，渾身都是槍眼。隨後軍人端槍衝到車上，揪著那些渾身是血的人的頭髮，把他們一一拽下車來。張健此時與大家一起呼喊：「不准打人！你們放了他！放了他！」軍人又舉槍射擊，幾個人中彈倒下。張健撩起上衣直至胸前，對著戒嚴部隊領隊的一名中校軍官高喊：「我們都是學生，我們沒有武器，人民軍隊愛人民。如果你們想殺死我們的話，我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糾察隊員的頭。要殺你就先殺死我！」中校距張健十米遠，聽到他的叫喊，隨即舉起手槍瞄準他連開三槍。張健中彈倒地，糾察隊員衝過來搶救。伴隨著女同學的哭聲，軍人再次開槍，又有人中彈倒下。張健與另四位傷者被抬到一輛打壞了的121型號的汽車上，沿途近百人接替推車到同仁醫院。張健獲救，右膝蓋中彈，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子彈頭至今未取出。與張健同車另四位傷者，3人死於途中，一人死於手術臺上，皆佚名。願佚名的英烈亡靈安息。2003年，余有緣晤張健共餐，摸到他大腿上一顆活動子彈。張健現流亡巴黎，皈依基督，由糾察隊長改為牧師，傳教為業，不忘六四。2008年底張在法國醫院取出右大腿上一顆子彈，另二顆深嵌右膝蓋骨中的子彈仍無法取出。

齊志勇，33歲，北京城建六公司工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回家路上，在西單六部口附近胡同裏遭解放軍槍擊中雙腿四彈致傷，群眾送他到宣武醫院救治，左腿切除。事後，齊志勇拒絕承認官府對他致殘原因為「意外事故」的定性而長期遭受報復刁難，失去工作，沒有分文補償撫恤。齊志勇擺小攤、開小鋪維持生計，被官府以「整頓市容」為名取締。齊志勇申請辦一個廢品收購站，屢遭轄區派出所所長嘲笑刁難拒絕。齊志勇仍然堅持實事求是：我的腿是六四那天被解放軍開槍打傷致殘的。現齊志勇全家四口僅靠妻子打零工收入維生。齊志勇傷殘後遺症嚴重，無錢醫治。

莊儂紅，女，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北京，1989年人大哲學系倫理專業研究生畢業。莊參加89學運，6月3日夜守在天安門廣場，是最後一位播音員。六四後遭整肅，不分配工作，遭抓捕下獄。2007年因修練法輪功再次遭抓捕入獄。友人如是描述她：儂紅又被抓了？為甚麼？中秋節聽到這樣的消息，心疼得快要窒息了。這樣一位文文弱弱的女生，能再一次經得住牢獄之災嗎？真恨自己幫不了她。我和她認識有二十年了，那時候她還在人大做研究生。是六四時在廣場留守的最後的播音員，因此沒有畢業，沒有工作，她的丈夫在這個時候離她而去。我六四以後避走京城，去她的斗室看望她，見她一頭秀髮幾剩一半！我們聊了半宿，又一起打坐到天色微明。我驚異於一位弱女子何以始終以寧靜之心微笑之態娓娓道出她一年多的經歷！我們一別十八年，失去了聯繫，但是我會在很多場景想起這位美麗文靜堅強睿智的江南女子（她出生北京但祖籍浙江紹興，我更願意她是紹興人）。

二 無名氏英雄譜(6人 3群體)

白衣少女。1989年6月4日凌晨3時10分，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城樓東側南向廣場上的學生一陣掃射，幾個人被打倒了。學生憤怒異常，難以相信。這時，一個身著白色連衣裙的姑娘，在臥倒的人群中站了起來，向軍人大步跑去。夜色中，少女長髮飄飄，在白色連衣裙襯托下，像一位天使，像一尊觀音，身後，還跟著5、6位男青年。全場的人都驚呆了。軍人又開槍了，5、6位男青年先被擊倒，白衣少女跑到軍人10餘米處，子彈射中了她的大腿。她像天使一樣折翼倒下。這位白衣少女真實存在，有兩位目擊證人不約而同的敘述了這一場景。她是誰？她是活著的林昭，她是民族的精魂，她是我們的老師，她是我們的姐妹，她是女神，她是觀音，她是女媧！找到她不會很難，只要把二十年的時間騰出二十分之一，只要有心，只要協力，我們的白衣少女就會來到我們中間。

揮舞旗幟遭坦克碾壓者。6月4日凌晨，聚集在金水橋一帶的坦克裝甲車開始向廣場駛來，數千人的隊伍在學生糾察隊手拉手的維護下，向廣場東南角退去。有一位男生爬上帳篷頂，對著迎面而來的坦克揮舞著一面旗幟，一直揮舞



著，直到坦克碾過帳篷和他的身軀。

一位北京市民。1989年6月3夜至4日上午，他獨自用平板車冒著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的危險，拉了21趟受傷者。

帳篷中的殉道者。6月4日凌晨4時，天安門廣場突然熄燈後不久，列陣於金水橋前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坦克、裝甲車向廣場推進，矗立在廣場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像遭碾壓倒下，然後是一座座帳篷被碾壓而過，成為一灘灘雜零狗碎，連同帳篷內疲憊不堪尚在夢鄉的學生。坦克的轟鳴掩蓋了學生慘死的淒厲叫聲。其時，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南北兩側有300餘座帳篷，「民主女神」塑像周圍有20座帳篷。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帳篷裏有學生，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坦克一逕碾壓帳篷而沒有軍人事先搜查驅離帳篷中的人員。（參閱吳仁華著《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內幕》392 - 402頁）。

兩位女青工。6月4日凌晨1時許，一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來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特別糾察隊處泣不成聲報信：與他同行的工人弟兄都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打死了，他是唯一的生存者。這時，這支工人糾察隊僅存的坐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兩位女青年猛地甩掉披在身上的軍大衣，情緒極為激動地要與來報信的男青年一起去西長安街。特別糾察隊領隊、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和隊員流淚苦勸苦阻，堅決不放這兩位年青的女同胞去攔阻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裝甲、坦克，去送死。「求求你們倆，別去了！千萬別去了！我們良心上受不了！受不了呀！」兩位女青年撲通一下跪倒在地，哭著說：「同行的弟兄們都死了，我們不能貪生不去啊……」。這兩位女青年還是隨著渾身是血的男青工走了。沒見她們再回來。

喊「中國人，站起來！」的北京市民。6月4日凌晨4時25分許，一群北京市民從天安門廣場東南角向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走來，一邊走一邊齊聲呼喊著：「中國人，站起來！中國人，站起來！」其時，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北京城內各地和天安門廣場開槍殺戮已是盡人皆知的血腥事實，廣場剩有數千名學生堅守著。這群北京市民慷慨赴難，喊聲激昂悲壯深刻，在漆黑的夜空回蕩，似無聲處驚雷。

溫州媛子。6月4日凌晨4時半許，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底座來了一位溫州媛子（溫州方言，姑娘叫「媛子」），坐在了特別糾察隊領隊、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的旁邊。因是不認識的陌生人，在時刻有生命危險的殺場環境中，吳不免追問其來歷，媛子答是搞攝影的個體戶，溫州人，要將這百年難遇的歷史事件用鏡頭記錄下來。恰吳仁華也是溫州人，二人皆興奮地改用鄉音交談。溫州媛子為吳仁華在紀念碑前拍了一張照片，說會將照片寄給他，吳仁華給了她家鄉的地址。此後，吳仁華未再見到這位溫州媛子，也沒收到過她寄的照片。溫州媛子，您在哪裏？願您平安！

燃篝火視死而歸者。6月4日凌晨4時，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全部熄燈。風高放火，月黑殺人。此舉給尚守護在廣場的數千學子產生了巨大的死亡恐怖心理壓力。這時，在廣場紀念碑底座西側20餘米處，有學生用棉被帳篷布等物燃起了第一堆篝火，隨後，在紀念碑周圍陸續燃起了好幾堆篝火。燃篝火者不會不懂

這是最好的靶標。有學生特意跑向篝火，圍繞著篝火席地而坐。閃爍的篝火，映襯著紀念碑底座周圍一面面迎風飄揚的校旗和一張張視死而歸的殉道者面孔。

三 孩子老人遭射殺死難者(5人)

呂鵬，9歲，北京順城根小學學生。6月3日夜12時許，呂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胸部，當場死亡。

XXX，約10歲，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屍陳北醫三院。6月4日上午，學院路的大學生將孩子屍體推到在學院路上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帶隊的軍官（師長）前。面對群眾憤怒的譴責和謾罵，軍官一言不發，只是拿右手不停地摸他的鋼盔下沿，一邊喝令他的士兵「不要開槍」。這一隊軍人被攔住了，軍車再沒有朝城裏開進一步。一部分軍車輪胎被放了氣，延至下午被燒毀；另一部分軍車轉移到馬甸橋，被那裏的群眾攔住燒毀。10歲孩子英靈不滅？！

馬駿飛（1 - 8歲），偕其父馬鳳友（27歲），6月4日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陳屍郵電醫院。

N.Y.J，12歲，小學生，北京人。6.6下午3點鐘左右，放學回家在木樨地地鐵口，遭一輛坦克上的機槍掃射，擊中腹部及左胳膊，戒嚴部隊不准救護，在地上躺了半個多小時，流血滿地，送往復興醫院，摘去脾臟和一腎臟並傷及肋骨。

XXX，老人，6月4日凌晨，在總工會大門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死亡。

四 遭坦克軍車碾殺者(21人)

林仁富、**王寬寶**，30歲，福建莆田人，北京科技大學材料系博士生。6月4日凌晨，林與同學王寬寶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行至六部口遭由後至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坦克當場碾死。與林同行者北科大研究生王寬寶同時遭坦克碾壓，骨盆粉碎，得救治倖存殘廢。

田道民，22歲，湖北石首人，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學生。6月4日清晨，田在六部口遭由後至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坦克碾壓，碾去半邊臉連同左眼，送市急救中心不治身亡。

王培文，21歲，陝西咸陽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學生。6月4日凌晨，王走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頭排，在六部口遭由後至前的解放



軍戒嚴部隊坦克軋死，屍體軋碎。

董曉軍，20歲，江蘇鹽城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學生。6月4日晨，在六部口附近，董站在從天安門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尾部，遭由後至前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坦克壓死，屍體碾碎。

龔紀芳，女，19歲，包頭人，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本科生。6月4日凌晨，龔自天安門撤至六部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坦克子彈射中左臂，且中毒瓦斯昏迷，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搶救無效身亡。醫院出具死亡證明書上載：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爛。

許建平，19歲，北京某大學學生，6月4日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臉部，坦克又從他身上壓過，死亡。

王鋼，20歲，北京焦化廠技工。6月4日早7點，王下班後到廠大門口買早點，遭解放軍戒嚴部隊軍車飛速駛過，就站在路邊等待。一輛軍車衝向人群，當場軋死王鋼和另2人。

錢輝，21歲，福建人，北京廣播學院新聞採編專業學生。6月5日凌晨，錢在廣播學院校門外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彈擊破膀胱和大腿動脈，錢未斷氣，向同伴說：「當心！軍車還沒有過去！」同伴將錢抬至校門內，血流一百米，死去。

翟順，30歲，居北京，6月4日凌晨，在木樨地遭警車碾死。當時以車禍處理。其母因此瘋了。

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遭坦克碾壓成功地躲避開，卻遭坦克射出的子彈擊中右大腿。

方政，學生，在六部口遭坦克碾斷雙腿。詳見「英雄譜」。

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與方政同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由後至前坦克碾壓重傷殘廢。

北京某大學一女生，6月4日凌晨參加一支自發組成的救護隊，在西長安街上搶救受傷者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坦克碾壓大腿粉碎性骨折。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學生。6月4日晨，他在六部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坦克碾壓，因其個子小，坦克從他頭頂開過去時，他恰好處在兩條履帶之間，未受碾壓，只受小傷，左手骨折。大難不死，終生不忘。

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蘇趙錢單4人皆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生，6月4日晨，在六部口皆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由後至前坦克碾壓重傷。

XXX，女，31歲，北京某廠職工，6月5日夜下班過馬路時，在五棵松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高速行駛的裝甲車撞死。死後經交涉，承認為「誤傷」，給予小量撫恤金。

XXX，6月4日白天，先遭解放軍戒嚴部隊一輛軍車撞倒，繼遭解放軍戒嚴部隊一輛裝甲車碾成肉泥，僅剩一隻手的殘餘。屍體留到5日下午被人用鐵鍬鏟入

塑膠袋運走。

五 遭刺刀捅死者(2人)

吳國鋒，21歲，四川新津人，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86級學生。6月3日夜，吳攜相機騎自行車離校後，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肩、肋、臂，倒地後，又遭刺刀捅入腹部，刀口長2寸，吳屍身雙手手心留有明顯刀痕。一老人送吳到郵電醫院，吳向老人說完校名就死了。吳生前曾參加過天安門絕食行動，一連五個晝夜。

XXX，不滿16歲，頭部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刺刀捅穿，導致腦液外溢，群眾送鐵道指揮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六 救援傷員遭射殺者(9人)

熊志明，20歲，江西金溪人，北京師範大學88級經濟系本科生。6月3日晚，熊與一女同學躲進胡同口，女同學先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殺，熊上前救援也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殺。熊的遺體由其同學從熊所穿衣服辨認出，由學校領回。

曹振平，29歲，北京農業機械工程學院計算站職工。6月3日晚，曹在西單搶救一名女記者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射中背部、腹部炸爛，送郵電醫院後轉人民醫院，6日去世。

李振英，45歲，軍事醫學科學院儀器廠技工。6月3日晚，李去301醫院給孩子取藥，10時許，李站在301醫院北門門衛身旁。解放軍戒嚴部隊從西邊掃射過來，忽然門衛向前傾倒，李正欲去扶，自己前胸中彈，從右後胸穿出，經301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周欣明，16歲，北京雪花電器公司技術學校學生。6月4日凌晨，周在民族宮前救援傷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擊中肋、肝部，從右背下方穿出，肝部粉碎，送積水潭醫院，5時許，死於手術室。

趙德江，27歲，全國總工會司機。6月4日凌晨，趙在總工會大門口搶救一遭槍擊老人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送空軍醫院途中死亡。

XXX，約20歲，北京301醫院正北門武警門衛。6月3日夜11時許，人群在解放軍戒嚴部隊推進中後退，門衛打開301醫院大門，讓人群進大院躲避，遭戒嚴部



隊射殺，當即死亡。

陶茂仙，北京811廠職工，搶救傷患時後腰部中彈，死後單位作出王「非正常死亡」結論。

劉鳳根，40歲，地質部鑽探工具廠工人。6月3日夜10時許，劉在西單一帶搶救傷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3彈，由民眾送二龍路醫院，不治身亡。

楊燕聲，30歲，體育報社工作人員。6月4日凌晨，楊在正義路口搶救傷員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擊中腹部送北京醫院不治身亡。

七 躲藏逃跑仍遭追殺者(5人)

張向紅，20歲，中國人民大學國政系國際共運專業87級學生。6月3日夜11時許，張與兄嫂多人從珠市口親戚家出來歸家途中，在前門受阻失散。張與嫂躲在前門西側樹叢後，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胸主動脈，穿透後背，送市急救中心，4日凌晨去世。

張瑾，女，19歲，國貿中心外事服務專業學校學生。6月3日夜12時許，張與男友一起躲在民族宮附近的胡同裏，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4日凌晨死於郵電醫院。

劉錦華，女，34歲，總政政治部幹休三所職工。6月3日晚11時許，劉與其夫在木樨地燕京飯店處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掃射，兩人躲入木樨地21樓邊的小胡同，士兵追入胡同射擊，劉上額中彈，立即死亡。

孫鐵，26歲，中國銀行總行職員。6月3日晚，孫在軍事博物館前遇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與朋友一起逃到附近有色金屬設計院內躲避，遭戒嚴部隊追入射中孫胸部，在鐵路總醫院不治身亡。

張福元，66歲，解放軍302醫院退休工人。6月3日晚張下班後，去北京長話大樓東牆外一條胡同親戚家串門。因解放軍戒嚴部隊施放瓦斯彈，屋裏嗆人，大家跑到門口去看個究竟，剛到胡同口即遭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掃射，張右腰部中彈，與人群一起往胡同裏逃，解放軍戒嚴部隊追擊開槍。張逃進親戚家的院門倒地不起，送積水潭醫院後立即死亡。

八 遭炸子射殺者(15人)

魏安民，23歲，湖南人，北京航空航大太學噴氣發動機專業89屆學生。6月4

日凌晨，魏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頭部，半邊臉被炸飛，當即死亡。

賴筆，21歲，廣西邕寧壯族人，北京醫科大學87級學生。6月4日凌晨2時許，賴在西長安街南長街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前額穿出，彈徑約10釐米，送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搶救無效，晨6時死亡。

鍾慶，21歲，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86級本科生。6月3日夜，鍾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死亡，打掉半個臉。

路建國，40歲，北京市旅遊局司機。6月3日夜11時，路在二七劇場路三裏河商場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用炸子射中左胸，死於阜外醫院。

王俊京，30餘歲，北京市儀錶局下屬廠技術員。6月4日上午10時許點，王去白塔寺上班途中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腎部，送協和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杜燕英，29歲，北京市勞改局下屬某公司職工。6月4日凌晨2時，杜在前門大北照相館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用炸子射中肝部，5日凌晨死於友誼醫院。

羅維，30歲，北京半導體材料廠助理工程師。6月4日晚，羅在長安街西側騎車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腹部，送廣安門醫院搶救，6日晨8時死亡。

賁雲海，22歲，北京市廣安門內街道辦事處職工。6月3日夜，賁離家未歸，4日家屬在復興醫院找到賁屍，腹部中炸子。

董琳，24歲，北京東城區人民法院職工。6月3日夜11時許，董在木樨地河東岸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右肋，送復興醫院，4日晚死亡。與董同時中彈者4人，當場死亡1人。

吳向東，21歲，北京東風電視機廠職工。6月3日夜11時許，吳在木樨地橋頭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頸部，4日凌晨5時許死於復興醫院。

楊明湖，42歲，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專利部法律處職員。6月4日凌晨，楊在東長安街公安部前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掃射，腹部中炸子，被送往同仁醫院搶救，發現膀胱、骨盆粉碎，6月6日身亡。

楊汝霖，41歲，北京第一機床電器廠行政科科長。6月3日晚11時多，楊在復興門立交橋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兩彈，一入肺部穿背炸開，一斷胳膊，死於北京兒童醫院。

高原，24歲，北京市石景山醫院中醫科醫生。6月3日夜11時多，高在復興門地鐵站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前胸，穿透後背，傷口碗大，送兒童醫院死亡。

南化通，31歲，北京市住宅壁板廠司機。6月4日晨5時許，南離家去長安街，再沒有回家。6日家屬在協和醫院找到遺體，子彈從左後肩胛骨下射入，胸腔被炸爛。

楊燕聲。詳見「救援傷員遭射殺者」。



九 遭槍擊後不准救治致死者(3人)

宋曉明，32歲，航天部二院283廠技術工人。6月3日夜，宋在五棵松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人行道上遭解放軍戒嚴部隊軍車向喊口號的民眾射擊，子彈穿透宋的大腿根部動脈，送301醫院，持槍的戒嚴部隊軍人命令大夫不准搶救，不准輸血，4日凌晨死亡。

宋寶生，39歲，北京玻璃四廠職員、市人民代表、勞動模範。6月3日晚，宋在木樨地家中聽到槍聲起來關窗戶，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胃部，送醫院死亡。當時軍隊派人監視不准搶救，死亡證明不准開槍傷，只准注明失血過多。

王楠，參見「英雄譜」。

十、在天安門廣場遭射殺者(7人)

程仁興，25歲，湖北通山人，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87級學生。6月4日凌晨，程在天安門廣場北端升國旗的地方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殺。人民大學曾派專人調查程仁興遇難情況，有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封存至今未公佈。

戴金平，27歲，湖北仙桃人，北京農業大學碩士研究生。6月3日晚11時許，戴在天安門廣場毛主席紀念堂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殺害。親屬於6月10日在友誼醫院找到遺體，校方給了2000元安置費。

李浩成，19歲，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88級學生、團支部書記。6月3日晚11時許，李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拍攝照片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一彈中肝部，送同仁醫院死亡。

周德平，20餘歲，湖北天門人，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6月3日晚，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掃射，頭部中彈，死於同仁醫院。

黃新華，25歲，湖南邵東人，中科院研究生班學員。6月4日凌晨，黃在天安門廣場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死後在京火化，骨灰由其兄黃林強帶回湖南邵東老家安葬。政府給了1200元錢，說是誤傷。

兩學生。6月4日凌晨2時許，在人民大會堂制高點上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掃射，射中廣場西北角的兩學生，一中手，一中眼眉。兩學生及時獲送廣場紅十字急救站救治。

十一、遭射殺後獲撫恤金者6人

郭春為，23歲，北京市六一中學教師。6月3日晚8時，郭到木樨地找同學，一去不歸。家屬在復興醫院找到郭的屍體，腎部腿部中彈。據院方稱，郭送至該院時尚有呼吸，因傷患太多搶救不及而死亡。校方給家屬少量喪葬費。

李評，23歲，遼寧丹東人，北京師範學院政教系86級學生。6月3日晚，李在木樨地橋西軍事博物館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面頰，送復興醫院搶救，4日凌晨身亡。校方發給家屬2000元慰問金。

XXX，北京人民大會堂炊事員，6月4日從前門門框胡同家裏去人民大會堂上班途中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死後賠1萬元。

陳子旗，31歲，首都汽車公司339路公車司機。6月6日家屬在兒童醫院找到陳的屍體，頭部變形，胸部中彈血肉模糊。單位以「正常死亡」處理，發給800元撫恤金，留話：如今後政府另有說法，再按規定辦理。

XXX，女，31歲，北京某廠職工，6月5日夜下班過馬路時，在五棵松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高速行駛的裝甲車撞死。死後經交涉，承認為「誤傷」，給少量撫恤金。

李浩成，遭射殺後校方給2000元補償（詳見「在天安門廣場遭射殺者」。）

十二 在家中遭射殺者(7人)

XXX，女，65歲，四川萬縣人，在木樨地22樓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初梨家當保姆，6月3日夜，應李初梨囑咐陪同李在14層陽臺觀看解放軍戒嚴部隊是怎樣向天安門挺進的。80餘歲的李坐在陽臺，保姆侍立李側，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當即死亡。

周玉珍，女，36歲，國家計委體改司機要秘書，6月3日夜晚，周與丈夫孩子站在家中窗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當場死亡。

尹敬，36歲，冶金部職員，6月3日晚在住家木樨地22樓8層廚房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

張佳梅，女，61歲，原化工部行政管理局人事處處長，離休。6月3日晚，張在和平里家中探出窗外觀望，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透心臟，當即死亡。

馬承芬，女55歲，居北京，參加過抗美援朝，1953年復員，屬鐵道兵。6月3日晚，馬與樓內鄰居在院內（水利科學院對門）納涼，遭行駛中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車射中腹部，送304醫院搶救無效，4日凌晨身亡。

李XX，約30歲，北京市市容總隊司機。6月3日夜至4日凌晨，李在人民大會堂西側絨線胡同口市容總隊二層小樓值班，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倒在



一同事懷裏，立即死去。

王鐵軍，北京鐵路局木樨地客運處職員。6月3日晚，王值班時在樓頂持望遠鏡觀看，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身亡。

十三 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者(12人)

鄭春富，37歲，北京故宮古建工程隊工人。6月3日夜11時多，鄭離家後失蹤，至今杳無音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劉強，河北人，河北師範大學學生，1989年來京參加學運，6月4日後一直未歸，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李萌，女，32歲，國家語言文字改革委員會助研。6月4日李丈夫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重傷，倖免於死。李受強刺激，導致精神失常，1990年底走失，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崔林峰，29歲，北京市三里河服裝廠工人，西城分局聯防隊員。6月3日晚7時，崔離家上班，與工友3人一起騎自行車去長安街方向。此後，崔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XXX，江蘇無錫人，無錫市江南大學機電系學生，在89天安門運動期間，與幾位同學一起去北京向天安門絕食學生送募集的捐款，始終沒有回校，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胡星雲，四川人，北京某大學85級學生，1989年6月4日後失蹤，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蔡XX，商務印書館職工，6月4日後失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林濤，24歲，復員軍人，6月3日晚離家後失蹤，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李長生，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圖書館管理員，6月4日凌晨，離家去天安門廣場，至今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雷廣泰，33歲，北京懷柔縣廟城鄉西臺上村農民。6月3日晚11時許雷與同伴在南池子旁紅牆下吸煙，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從東長安街一路掃射過來，雷中彈倒下，由市民用三輪車拉走，其他二人被衝散。從此再也沒有找到雷的下落。

殷順清，30歲，北京房修一公司工人，6月3日晚7時多騎自行車離家，有人在六部口看見他頭部中彈，立即死亡，至今未找到屍體。

蘇生機。詳見「記者編輯之勇者義赴難者」。

十四 堅持不撤死活未明者(400 - 500人)

6月4日凌晨4時30分後，守護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開始撤離和被驅離。在紀念碑和毛主席紀念堂之間的空地上，有**四、五百名學生**站立者，打著幾面紅旗，其中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大太學的旗幟。他們一聲不吭，對撤離同學打出的「V」形手勢，不理不睬，毫無回應。這是反常的。原來這是一群對撤離非常不滿，誓死也不願撤離的學生。這一群學生，多帶背包水壺類物品，以外地來京聲援的學生居多。4日凌晨5時30分許，中國政法大學教師、特別糾察隊領隊吳仁華帶領的被驅離的學生隊伍正走在前門箭樓附近的路口往西，拐向前門西大街之際，大家都聽到了身後天安門廣場方向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間雜著一陣又一陣斷斷續續的《國際歌》聲和口號聲。不久，有學生哭著趕來向吳仁華報信：那群堅守在天安門廣場誓死不撤的同學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

這群四、五百名學生被槍殺雖然尚無直接證據，但他們從人間消失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全部佔領了天安門廣場，學生市民全部離開廣場後，燃起了數小時連續不熄的大火，頻密起降軍用直升飛機。廣場紀念碑底座臺階的40條花崗岩石遭燒裂，2700平米草坪、175平米檜柏綠化帶遭燒毀。燒裂花崗岩和草坪的報導載1989年6月17日《人民日報》。在學生撤離之前，這一帶佈滿學生和軍人，沒有也絕無可能出現大火，這把火不是學生所燃明矣。能燒裂花崗岩系高溫烈火或突然澆水冷卻所致，如許烈火絕非學生能燃明矣。（參閱吳仁華著《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444頁）

十五 北京城各地遭射殺死傷者 (113人死 76人傷殘)

郭某，22歲，北京農民，6月3日晚9時多在復興路永定路口中彈身亡。

齊文，16歲，北京鐵路3中學生。6月3日晚，齊在木樨地遭槍彈射中，死於復興醫院。

蔣捷連，17歲，中國人大附中學生。6月3日夜11時許，蔣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子彈穿胸而過，傷及心臟，送兒童醫院搶救無效身亡。中彈後蔣對同伴說：「你們快跑！我可能中彈了！」隨即倒下。醫院開具證明「來院前已死亡」。

蕭傑，19歲，成都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88級學生。6月5日蕭已購得回成都的火車票，下午2時許行至南池子南口，過馬路逾紅色警戒線，遭戒嚴部隊射中前胸，當即死亡。



孫輝，19歲，寧夏石嘴山人，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學生。6月4日晨，孫騎車尋找同學，身穿北大背心，在西單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橫屍街頭。

陸春林，27歲，江蘇吳江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86級研究生。6月3日夜，陸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臨終前陸將證件交行人送回學校，由校方認回屍體火化。

段昌隆，24歲，清華大學化工系應用化學專業84級學生，段祺瑞侄孫。6月3日夜，段從家中騎車外出，在民族宮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手槍近距離射中，6月4日凌晨死於郵電醫院。

葉偉航，19歲，北京市57中學生。6月3日凌晨2時許，葉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子彈擊中左臂右胸頭部，死於海軍總醫院。

錢縉，21歲，北京外貿大學86級本科生。6月3日夜10時許，錢與袁姓同學由北蜂窩路口騎車朝木樨地地方拐彎回家，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由西向東掃射，錢與袁同時腹部中彈，被群眾送鐵路總醫院搶救，6月5日錢死於鐵路總醫院。

何潔，23歲，黑龍江寶清人，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生。6月3日晚，何在南池子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6月4日3時40分死於北京醫院。

劉洪濤，18歲，武漢人，北京理工大學工程光學系88級本科生。6月4日凌晨，劉在民族文化宮附近遇難，屍體在北京郵電醫院。

李得志，25歲，武漢人，北京郵電學院應用物理系88級研究生。6月3日或4日在復興門遇難，屍體在復興醫院找到。

張衛華，約24歲，國家海洋局海洋預報台碩士生。6月4日凌晨，張在禮士路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腹部，5日在兒童醫院找到屍體。

江XX，26歲，遼寧人，中國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6月3日晚，在建國門外遭槍擊身亡。

李輝，19歲，北京司法學校應屆畢業生。6月3日晚11時，李在木樨地公安大學宿舍樓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顴骨，耳後穿出。家人於當夜11時50分在復興醫院找到遺體。其兄李明被射傷。

XXX，北京市190中學學生，6月3日XXX去某派出所找當所長的父親，4日，其父派該所民警將他送回家，途經南河沿一帶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死亡。

XXX，16歲，北京市建築工業學校88級學生，6月3日夜，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兩彈，送空軍總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趙龍，21歲，高中畢業生，6月4日凌晨1時多離家，在西單路口遭戒嚴部隊射殺死亡。

鍾俊軍，22歲，北京農學院學生。6月3日晚，鍾與4位同學騎車去天安門途中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右胸，送急救中心不治身亡。

石海文，20餘歲，瀋陽藥學院應屆畢業研究生（在北京營養源研究所代

培），6月4日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頸部，死於積水潭醫院。

胡XX，湖北人，北京某大學學生，6月4日遇難，半個月後父母接獲通知，未敢前往北京認領屍體，兩個月後托親戚去北京料理後事。

張建，17歲，宣武區第95中學學生。6月4日，張離家去前門看望三叔三嬸，途中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中心臟死亡。

郝致京，安徽馬鞍山人，30歲，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6月3日晚11時多，郝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胸，死於復興醫院。

王一飛，31歲，北京中關村大通公司職員。6月3日夜，王在三里河中科院院部門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胸。4日家人從復興醫院領回屍體。

王建平，27歲，北京市煤氣公司南郊車隊司機。6月3日夜，王在西單路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胸，4日凌晨死於北京市急救中心。

袁力，29歲，電子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工程師。6月3日夜11時許，在木樨地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咽部，死於海軍總醫院。

安基，31歲，建設部中國建築技術研究中心《村鎮建設》雜誌編輯。6月6日晚12時許，安與6名友人在南禮士路路口，遭埋伏在電纜溝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密集掃射，5人中彈，兩女跪地求饒倖免繼續槍殺。安基一彈傷及腿部，一彈從後背斜穿胸部，7日凌晨4時死於兒童醫院。

王爭勝，20餘歲，華北物資站職工，6月6日夜，與安基一起遭槍擊，送醫院死亡。其兄王爭強重傷。

楊子平，26歲，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人，6月6日夜，與安基一起遭槍擊，送復興醫院死亡。其兄楊子明重傷。

于地，32歲，北京太陽能研究所工程師。6月4日凌晨2時，于在南池子至歷史博物館一帶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送協和醫院搶救20餘天，30日死於協和醫院。

莊捷生，27歲，北京五道口百貨商場售貨員。6月3日白天，莊離家後再未返回。11日家人在同仁醫院找到莊的遺體，胸部及胳膊兩處中彈。

袁敏玉，35歲，北京地質儀器廠電焊工。6月3日夜，袁在三裏河木樨地之間，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心窩與喉部，4日下午在兒童醫院去世。

奚桂如，女，24歲，北京市展覽館勞動服務公司職工。6月4日凌晨，奚在二七劇場路北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肩，死於人民醫院。

戴偉，20歲，北京和平門烤鴨店廚師。6月3日晚，戴去前門烤鴨店上班，行至民族飯店前受阻，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後背，4日凌晨死於郵電醫院。

劉建國，35歲，北京長城風雨衣公司銷售科科員。6月3日夜12時許，劉在西單路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胸部送二龍路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孫彥昌，24歲，北京建築築爐公司司機。6月3日夜，孫離家找弟弟，在東



郊紅廟110車站總站廣場南面，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擊中頸椎，送朝陽醫院救治，半年後身亡。

樸長奎，47歲，朝鮮族，中央民族歌舞團演奏員。6月3日夜，樸在西單至復興門之間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腦，子彈從右頸下穿出，死於郵電醫院。

卞宗序，40歲，北京新街口機電產品供銷公司經理。6月4日凌晨，卞在西單家俱店門前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當即死亡。

劉燕生，37歲，北京家用電氣研究所工人。6月3日夜，劉在長安街民族宮路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腹部，送郵電醫院搶救，血盡而亡。

韓子泉，38歲，北京科技大學電工。6月4日晨5時多，韓在農展館附近遭射中頸部身亡。

周永齊，32歲，北京彈簧廠汽車隊隊長。6月3日晚11時多，周在工會大樓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胸經右肺穿出，送復興醫院，不治身亡。

穆桂蘭，48歲，北京國棉三廠整理車間工人。6月4日晨6時點半許，穆出門買早點，路過朝陽門立交橋，遭戒嚴部隊坦克車自通縣方向開來，一路射擊，穆腦部中彈，當即死亡。

劉春永，24歲，北京天橋南通服務樓浴室工作。6月3日夜，劉在天橋附近15路公共汽車總站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空降部隊掃射，頭部中彈，經友誼醫院搶救無效，4日凌晨身亡。

劉俊河，56歲，個體戶。劉在前門大街箭樓下擺西瓜攤，6月4日凌晨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面頰，死於友誼醫院。

梁寶興，25歲，北京華豐縫紉機廠司機。6月3日夜，梁在天橋15路公共汽車總站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臉頰，送友誼醫院搶救無效，5日身亡。

樂沂偉，35歲，包頭人，包頭鋼鐵設計研究院工程師。6月4日凌晨，樂在南池子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腰部，於同仁醫院搶救無效身亡。

蘇金堅，25歲，服裝個體戶。6月3日夜，蘇遭戒嚴部隊射中頭部，送友誼醫院身亡。

王志英，35歲，北京第三通用機械廠重型汽車鑄造廠傳動橋廠車工。6月3日晚11時，王與妻從岳母家宣武門回東珠市口家，約12時多至珠市口十字路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向北行進，一路掃射，王被射中頸動脈，送前門醫院，又轉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王鴻為，21歲，海澱區皮革研究所職工，6月3日值班回家遭射穿胸部，在海軍醫院身亡。

李淑珍，女，51歲，北京自來水公司工人。6月3日晚，李與丈夫騎車在軍事博物館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3彈，送郵電醫院搶救無效，4日死亡。

寇夏，女，31歲，北京西西北幼稚園教師。6月3日夜，寇在軍事博物館對面

人行道上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腹部，送鐵路醫院搶救，4日下午5時身亡。

韓秋，25歲，黑龍江佳木斯人，佳木斯市制釘廠銷售科業務員，來北京出差，6月4日凌晨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後腦，送天壇醫院身亡。公安局開具死亡證明書：槍擊致死。

郭XX，22歲，6月3日晚9時多，在復興路永定路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身亡。

楊振江，32歲，北京淮陽春飯店服務員。6月4日凌晨，楊和幾位同學途經木樨地，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腿根，送海軍醫院搶救無效身亡。

何國，27歲，北京月壇街道糧店工人，6月3日或4日，在木樨地遭槍擊，死於復興醫院。

劉占民，38歲，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職員。6月4日凌晨3 - 4時，劉前往東四六條岳母家看望剛分娩的妻子。3天后家屬在協和醫院找到右頷骨中彈的劉屍體，編號21。

王慶增，34歲，北京天壇糧管所司機。6月3日晚11時，王從家（珠市口附近）騎車去單位（永定門方向）檢查車輛是否安全，騎至橡膠八廠對面馬路時，遭從南邊開來的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左胃部，送天壇醫院，不久死亡。

王文明，35歲，北京前進鞋廠模具鉗工。6月3日晚12時許，王與一鄰居在珠市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自南向北行進掃射，王左肋中彈，從右肋穿出，4日晚9時許在友誼醫院死亡。

倪世聯，24歲，山東人，中國石化總公司北京設計院設備室助理工程師。6月3日晚11時許，倪與6同伴騎車至西單，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胸腹部，民眾送宣武醫院搶救，不治身亡。同伴曹長韜、王建偉遭槍擊受傷。

鄭敏，27歲，北京叉車總廠工程師，6月3日夜，在木樨地遭射中，送醫院後立即死亡。

何世泰，31歲，北京第一機床廠鑄工車間工人。6月4日凌晨，何行至南河沿南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太陽穴，被群眾送往協和醫院途中死亡。

軋愛國，22歲，6月3日22時，去公主墳途中，遭戒嚴部隊射中頭部，死於301醫院。

陳森林，36歲，北京707廠工人。6月3日晚，陳騎車去西單，遭射中心口，死於北二醫。

楊撼雷，19歲，北京流芳賓館廚師班。6月4日凌晨，楊在南池子遭射中脾，送協和死亡。

彭軍，30歲，新疆兵團駐京辦事處人員。6月5日晨6時40分，彭從朝陽區東大橋住所出門買早點，途中遭戒嚴部隊掃射，身中兩彈，左前胸爆出，送朝陽醫院搶救無效身亡。

蘇欣，女，29歲，有色金屬進出口總公司職員。6月3日夜，蘇因不放心母



親一人在家，前往阜外大街路經南禮士路南口被阻，4日凌晨遭戒嚴部隊用衝鋒槍掃射路邊人群，蘇胸部中彈，送兒童醫院轉人民醫院，不治身亡。

包修東，41歲，鼓樓東大街某印刷廠廠長。6月3日夜，包在北京飯店旁歐美同學會路口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送協和醫院搶救，不治身亡。

曹XX，21歲，北京測繪研究院繪圖員，6月3日晚在西單附近遭槍擊，送郵電醫院身亡。

王芳，50餘歲，北京煤礦機械廠職工，6月3日晚，在木樨地遭射中頭部，送院途中死亡。

李春，20歲，西單民族飯店廚師。6月3日夜，李下夜班推著自行車行走至工會大樓南面第2座樓前（木樨地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肋部，送廣安門外醫院死亡。

杜光學，24歲，人民衛生出版社印刷廠工人。6月3日午夜，杜在新華門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太陽穴，同車6人送往協和醫院途中，4人死亡，其他2人傷勢嚴重，生死不詳。5日，家屬在協和醫院找到杜的屍體，編號30。

趙天仇，47歲，北京機電研究院維修工，6月4日身中4槍，親屬在協和醫院找到屍體。

韓俊友，20餘歲，北京第一皮鞋廠，6月3日夜，在木樨地遭射中頭，送復興醫院死亡。

李鐵鋼，22歲，首鋼動力廠供水車間青工，6月3日晚，在復興門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肩部肝部，民眾送往復興醫院死亡。

XXX，近20歲，6月3日夜，在復外大街三里河路口遭射中胸口，送兒童醫院死亡。

王鷹，30餘歲，北京變壓器廠職工，「六四」期間遇難。

劉京生，40餘歲，鐵路系統職工，6月4日在北京羊坊店附近遇難死亡。

XXX，河北人，原開灤礦工報記者，1989年借調至新華社當記者，6月4日遇難死亡。

王耀和，40餘歲，北京朝外某飯莊廚師，6月4日遇難死亡。

石岩，27歲，大連人，空政文工團演奏員，6月4日凌晨頭部中彈，在北京人民醫院死亡。

劉建國，35歲，住北京西城區橫二條50號，6月4日遭戒嚴部隊槍擊後陳屍郵電醫院。

富爾克，19歲，中央民族學院88級預科生，6月4日遭戒嚴部隊槍擊後陳屍郵電醫院。

顧麗芬，女，北師大教育系86級學生，6月4日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後陳屍郵電醫院。

劉鐘，19歲，上海人，政法大學政治系學生，6月4日遭戒嚴部隊槍擊後及陳屍郵電醫院。

馬鳳友，1962年生，工人，6月4日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後陳屍郵電醫院。

許瑞和，復員軍人，6月4日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後陳屍郵電醫院。

XXX，北京農學院農經系學生，6月4日遭解放軍戒嚴部隊槍擊後陳屍郵電醫院。

黃佩璞，住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公社東冉村黃莊，6月4日遇難身亡。

鄒作武，6月4日受重傷，鋸腿，半年後死亡。

張羅紅，女，30歲，總政幹休所工作人員，6月3日晚，遇難於木樨地。

賀安彬，32歲，6月4日遇難死亡。

仲桂清，女，31歲，6月4日遇難死亡。

張琳，37歲，6月4日遇難死亡。

XXX，女，101路公車售票員，6月4日晨5時許，陳屍於東郊紅廟十字路口北。

張XX，53歲，東郊熱電廠基建處科長，6月4日晨5時許，陳屍於東郊紅廟十字路口北。

王超，30歲，北京中關村四通公司職員，6月3日夜遇難，陳屍海軍醫院。

朱XX，江西人，原北京師範學院物理系研究生，6月4日遇難身亡。

孫曉峰，北京體育大學學生，6月4日遇難死亡。

任文聯，19歲，內蒙古臨河人，北京科技大學採礦系學生，6月4日遇難身亡。

黃濤，江蘇張家港人，北京某大學學生，6月4日遇難身亡。

陶志敢，24歲，浙江天臺人，北京某大學學生，遇難情況不詳。

王東喜，上海人，遇難死亡。已找到王父母姓名與地址，但不願與外界聯繫。

李莉，女，約20歲，貴州人，四川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十四系自動控制系87級學生。6月4日上午，李與男友一起去成都市人民南路廣場，遇警察與群眾衝突，遭警察電棒猛擊重傷，由群眾送醫院，當夜不治身亡。

陳忠傑，1958年生，原三機部某下屬單位，89年已離職擬去南方。6月3日夜或6月4日凌晨，陳於府右街南口中彈，子彈從前額進，後腦部炸出，送北大醫院後什庫醫院時已死亡。

白京川，21歲，北京聯合大學家電維修專業學生，住北京市東城區。6月4日遭槍擊致死，死於同仁醫院兒科。

金穎，18歲，住北京市。6月5日晚，金與同事外出，再也沒有回家。一周後，親友於西城區二龍路醫院找到金的屍體。金身中三彈，臀部和x部各中一彈，最要害的是x部中的一彈。據院方停屍房看門人介紹，金看上去是一個小孩。6月6日被一男一女用三輪車送來醫院，在金的身上放了很多小白花。他們



說，是在木樨地花壇裏，地上流有很多血，很可憐，人已經死了。

梁建波，18歲，住北京市，北京化工學校學生。6月3日下午梁去警校找姐姐未見，他離開警校往回走，始終沒有回家。十幾天後家人在積水潭醫院找到他的遺體。據搶救記錄記載：胸部及腿部中彈，先在兒童醫院搶救，後轉積水潭醫院，因肺部貫通傷死亡。骨灰在頤和園附近埋葬。

王永貞，女，中國農業大學86級學員，家址遼寧省。1989年遇難後骨灰送入渾河。

張(?)，16歲，住北京市。6月3日，張在天安門（姐姐為天安門管理人員）觀看，凌晨4至5時許，張從金水橋上騎車準備回家，迎面碰上一群殺紅了眼的軍人，不由分說，舉起棍子就朝頭上打。天安門上有不少人大喊自己人，但軍人全然不顧，將張擊倒後拖入勞動人民文化宮，殘喘一個多小時死去。

XXX，15歲左右，初中學生，住北京市青河農場駐京辦事處。6月底（29日？），這個孩子於下午下課後，與幾個同學走在玉泉營環島附近，碰上一個買西瓜的瓜農。孩子用手拍拍西瓜，西瓜掉下車一個。瓜農大呼「幹嘛，搶西瓜啊？」此時，恰逢駕著機槍的戒嚴部隊巡邏車經過，立即開槍，同學們四散亂跑，XXX被子彈擊中，旋即死亡。

XXX，35、6歲，住安定門安德路地興居以帶，北京市少年犯管教所幹部。6月3日晚，X離家出去看看動靜，在交道口附近被子彈擊中死亡。

劉永良，26歲，住北京市，北京市內燃機廠工人。6月3日晚，X中彈，死於北京醫院。

姜嘉興，男。

近80名由北京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記錄的「六四」在城內各地遭戒嚴部隊射擊致傷殘者。20餘人不願公佈，33人以半匿名公佈，23人以真名公佈。

楊子明，20多歲，職員，北京人。腹部受槍傷，送往復興醫院搶救，住院一個月。

劉華，20多歲，職員，北京人。6月4日受傷，右臂截肢。

張亞來，6月4日被子彈擊中大腿，造成高位截肢。1992年去美國。

龐梅青，6月4日凌晨，腿部中彈造成雙腿截肢，生活艱辛。

黃甯，6月4日凌晨，臉部中彈造成雙目失明，現以盲人按摩維持生計。

馮友祥，32歲，職員，在北京工作。6月3日夜，在燕京飯店附近左大腿貫穿，終身殘疾。

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6月4日晨在六部口被坦克子彈擊中，現右腿萎縮狀。

曹長韜，石化總公司北京設計院職工，6月3日晚11時許，在西單路口腿部中彈。

王建偉，石化總公司北京設計院職工，6月3日晚11時許，在西單路口腰部中彈。

李明，家住木樨地公安大學宿舍樓，6月3日晚11時許，在木樨地左腿中彈。

張志強，32歲，北京人，北京服裝學院教師，6月4日凌晨，在西單附近右腿中彈，送宣武醫院救治，前後6次手術殘廢存活。

張斌，34歲，職員，北京人。6月4日凌晨，在六部口附近搶救傷患時，大腿中炸子，腿骨粉碎，現用鋼筋支撐，行走不便。

馬毅飛，32歲，職員，北京人。6月3日夜，在六部口附近隨人群往胡同里跑的時候，被子彈擊中右面頭頂，腦蓋骨粉碎。半身不遂，左手不能抬起，左腿行走不便。

唐得陽，39歲，記者、編輯，北京人。6月3日夜11時左右，於軍事博物館附近腹部中炸子，被民眾送往復興醫院，院方見其奄奄一息難以救治，置於屍堆。後被人發現救治。

王運啟，21歲，工人，北京人。6月4日凌晨，在天安門西觀禮台南面馬路上中彈，子彈從右肩胛骨前方進入，右上臂外側穿出，造成粉碎性合併開放性骨折。

方政、蘇文魁、王寬保、王爭強、齊志勇、錢奕新、單連軍、趙國慶。

33人半匿名：

S.K.，18歲，技術工人，北京人。6月4日腿部槍傷。

L.L.F.，女，30多歲，公司職員，北京人。6月3日夜，在木樨地兩腿中彈，大面積植皮。

Y.Z.H.，30歲，研究人員，北京人。6月3日夜在木樨地中彈，傷及胯骨，愈後癩。

X.Y.C.，46歲，北京人。6月3日夜在木樨地腿部中彈，骨髓炎，每天需在藥桶中泡數小時。

L.K.Q.，20多歲，大學生。6月3日夜身中兩彈。

K.L.X.，30多歲，大學教師，北京人。6月3日夜在木樨地被子彈打中小腿，傷口半尺長。

C.J.，19歲，北京人。6月4日在經委會附近，左小腿遭槍傷。

Y.Z.，女，18歲，中專生。6月3日晚，在五棵松三處中彈，送304醫院。

X.J.Z.，醫生，延邊人。6月4日前來北京實習，6月4日被關進中山公園毆打致殘。

X.J.，20多歲，大學生，浙江金華人。6月4日後被關押在秦城監獄，致瘋。

W.B.D.，20多歲，個體戶，北京人。6月4日大腿受槍傷，手術五年後復發，醫療費自理。



K.W.Z., 20多歲, 大學生, 武漢人。6月4日小腿受槍傷, 前後3次手術。

無名氏, 女, 大學生。6月4日右腿被煙幕彈炸傷, 傷口久治不愈。為宣武醫院第一位住院者。

L.C.H., 職員, 北京人。6月4日於木樨地橋北約500米處, 遭子彈擊中腳踝上方。

L.X.J., 27歲, 待業青年。6月4日日骨盆中彈, 送宣武醫院救治, 子彈至今未取出。

C.X.C., 副總編輯, 北京人。6月4日日受槍傷, 遭單位清查整肅。

W.H. R., 20多歲, 大學生, 北京人。6月4日在天安門附近腹部受槍傷。

C.G.Q., 天津人。一腿被打斷。

M.W.B., 15歲, 學生, 北京人。腿受槍傷。

W.Q.H., 30歲, 工人。6月4日凌晨, 在前門肯德基速食店附近中彈, 傷左大腿及左小腿。

Z.J.S., 45歲, 個體戶, 北京人。6月3日夜或6月4日凌晨, 於阜成門遭兩顆子彈擊中兩腿, 右腿膝蓋被打掉, 送宣武醫院救治。同車送醫院的有約20歲男青年, 左胸中彈, 死於Z側。

C.M.Q., 女, 約20歲, 大學生, 北京人。6月4日凌晨, 參加民眾組織的救護隊在天安門附近救護傷患時被裝甲車軋傷腿骨, 經搶救, 現基本痊癒。

L.G., 36歲, 公司經理, 北京人。6月3日夜, 在木樨地被槍彈擊中胸以上脊椎, 造成高位截癱, 四肢功能喪失。

W.T.L., 24歲, 職員, 北京人。6月4日白天, 在北京飯店附近左臂中彈, 打斷神經, 傷及脾, 斷一肋骨。協和醫院救治後轉積水潭醫院, 左臂已殘, 3年內手術7、8次。

Z.J.Q., 17歲, 中專生, 北京人。6月7日白天, 騎車去北京站附近上學, 突遇坦克駛來, 向路邊開槍, 子彈進入肝部擦傷脊柱, 由協和醫院救治; 目前行走一腿癱。

T.Z., 16歲, 初中生, 北京人。6月4日白天, 與同學騎車至王府井南池子一帶, 被戒嚴部隊打傷頭部, 送協和醫院救治, 因受驚嚇, 90年神經失常, 現住精神病醫院, 醫療費用家人負擔。

W.Y., 27歲, 職員, 北京人。6月3日夜, 在公主墳一帶腦部中彈, 經北大醫院救治, 左半身不遂, 殘廢。93年萬念俱灰服藥自殺, 及時發現搶救脫險。

C.N., 30多歲, 大學講師, 北京人。6月3日夜, 在木樨地被子彈打中雙膝, 送積水潭醫院兩次手術, 兩年後恢復行走能力; 遭單位清查整肅。

C.C.Z., 20歲, 大學生, 四川人。6月3日晚, 在西單被子彈打中大腿, 送往積水潭醫院, 學校拒付醫療費, 被困在醫院近11個月。學校宣佈開除他的學籍。

L.B.D., 20歲, 中學教師, 河北唐山人。6月3日晚, 在南池子被子彈打中大腿根

部, 送往積水潭醫院搶救; 校方拒付醫療費, 並開除其學籍, 在醫院被困了10個月。

N.Y.J., 12歲, 小學生, 北京人。6月6日下午3點鐘左右, 放學回家在木樨地地鐵口, 遭一輛坦克上的機槍掃射, 擊中腹部及左胳膊, 戒嚴部隊不准救護, 在地上躺了半個多小時, 流血滿地, 送往復興醫院, 摘去脾臟和一腎臟並傷及肋骨。

L.H., 約20歲, 大學生, 福州人。6月5日於北京廣播學校門外, 遭一輛坦克射出子彈中臀部, 現一腿癱。

M.W., 28歲, 司機, 北京人。6月4日凌晨2時, 在西單附近, 子彈從後背脊柱旁穿過, 傷及肝、肺, 在宣武醫院救治半月, 出院後受感染, 再度住院。醫療費單位不予報銷, 均自己負擔。

十六 不堪折磨自殺者(3人)

任建民, 30多歲, 河北定州陳莊子村農民。任去內蒙看望分娩的妻子, 於6月4日返鄉途經北京時, 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腹部, 腸子流出, 送協和醫院, 醫院判斷已無法救治, 移置太平間後發現任還活著, 遂通知家屬, 家屬無錢留任治療。任回家後流出的腸子腐爛, 不堪折磨痛苦於1989年9月16日(中秋節後次日)自殺身亡。

齊力, 22歲, 中央戲劇學院88級舞美設計專業學生, 曾參加天安門學生運動。6月4日後受審查整肅, 不堪壓力, 自殺身亡。

鄒冰, 女, 約19歲, 河北人, 北京廣播學院88級學生。鄒因參與八九學潮遭受審查不過關, 在1989年9月中旬從學校塔樓13層跳下自殺身亡。自殺前鄒給宿舍同學打了水, 寄給父母遺書, 說辜負了父母的養育之恩。

十七 醫務人員之勇者義者赴難者(6人 3群體)

王衛萍, 女, 25歲, 居北京, 北京醫科大學應屆畢業生, 北京市人民醫院實習醫生。6月3日夜, 王在木樨地子彈橫飛中救治傷患, 在包紮一位傷者時, 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頸部倒地不起, 群眾送北大醫院搶救無效身亡。

史鑒母子。6月3日晚, 史鑒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後, 搜集了一些急救藥品, 上街救護傷亡者。其母知道他決心已定, 只是默默地將紅十字標記分別縫在他的上衣胸前和左臂。史鑒乘坐一輛插著紅十字旗幟的車子救護傷患, 車子開到近金水橋時, 遭密集子彈掃射, 車子前後玻璃被打碎。車上有十幾位傷患。史鑒和另一位小夥子下車搖晃紅十字白旗, 高喊「請你們不要開槍, 我們是救護受傷者的!」車子重新開動, 子彈又橫掃過來。有傷者重新中彈流血。史鑒把手絹遞給傷



者高喊：「堵住傷口。誰會開車？趕快倒車後退，去協和醫院！」載著十幾位傷者掛著紅十字的救護車，在史鑿的指揮下，乘槍聲間歇之際，倒退著脫離了險境。

星光（化名），女，解放軍301醫院研究生院研究生，在6月3日夜，不顧禁令，擅自逃出單位，先到西長安街西單路口救治傷者。解放軍戒嚴部隊用鐵血突破民眾血肉的攔截後，星光趕往天安門廣場，加入到北京紅十字會臨時急救站，繼續搶救傷者；在解放軍戒嚴部隊最後清場的時候，她與一批醫務人員集結在歷史博物館西門前，目睹與見證了全過程。

近百名在最後關頭留下來的醫務人員。6月4日凌晨4時後，天安門廣場上北京紅十字會急救站負責人讓大家自願選擇是撤離還是留下繼續搶救傷者。近百名醫務人員留了下來，他們聚集在歷史博物館前，打起了紅十字旗，提出口號：人在受傷者在！4時30分後，有幾個掉落在撤離隊伍後面的學生在大批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夾擊下無路可退，突然轉身向歷史博物館紅十字站跑來。醫務人員為了保護先前救治收容的幾位傷者，已經手挽手組成一個人圈，正好讓這幾位逃命的學生躲進了保護圈。一些打紅了眼的軍人向紅十字會醫務人員撲來。醫務人員把手挽得更緊，用自己的身體組成的人牆把學生和軍人隔了開來。軍人要醫務人員交出學生，堅持說他們是暴徒、是學生領袖；醫務人員堅決拒絕：我們絕不會交出任何人！醫務人員中的301醫院研究生星光與一個年青的軍人四目怒視了半個多小時。相峙一小時後，一軍官來，提出條件：留下學生傷者，醫務人員可以離開。醫務人員正告軍官：要抓一起抓，要放一起放；我們受國際法保護，希望慎重考慮；你們清場行動既已結束，我們要派人到天安門廣場各處巡查，看有無需要救治的傷患。解放軍戒嚴部隊在這近百名醫務人員同聲相應義正辭嚴的凜然不屈面前，不得不同意讓醫務人員帶著學生和受傷者離開，但拒絕了巡查天安門廣場有無傷者的要求。這近百名醫務人員見好就收，帶著逃來的學生和傷者撤離。為了防止軍人違諾，在撤離過程中乘機來搶奪，醫務人員手挽手連成兩道人牆，讓抬傷者和學生走在中間，沿著歷史博物館的人行道撤離了廣場。聚集在前門街道兩旁的民眾看到他們走來，熱烈鼓掌歡迎，醫務人員中很多人再也控制不了情緒而失聲痛哭。

北京兒童醫院接收的受傷者2、3百人，死亡20餘人（死傷者資料被院銷毀。）「六四」期間，北京兒童醫院救治了大量被解放軍戒嚴部隊殺傷者。最初他們依照規定，對傷者一一登記個人資料，以便日後計算收取醫療費用。但當他們從廣播裏聽到官方「告全國人民書」指稱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意識到這些受傷者會被指控為「暴徒」，遭受迫害，立即決定將已經登記的受傷者個人資料銷毀。北京兒童醫院接收的受傷者有2、3百人，死亡20餘人。

吳醫生和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職員。吳醫生，北京醫學院1989年畢業生。6月3-4日，吳醫生和幾位同學以及西單大街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的幾位職員自願組織起一支臨時醫療隊，救死扶傷。4日凌晨，他們在南長街南口搶救傷者中學生王楠。解放軍戒嚴部隊無論如何不允許他們將傷者送醫院，他們只能就地憑手頭簡單的藥物救治，在軍人的恐嚇下，一直守護著傷者至不治而亡。軍人還不

允許移走屍體。吳醫生暗中將傷者的學生證和鑰匙取出帶回。1990年初，吳醫生將傷者遺物交還了傷者母親張先玲。

北京醫院一醫生。6月4日凌晨。北京醫院一醫生在正義路口，目擊體育報社楊燕聲在欲救助一傷者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的全過程，並與群眾一起送楊燕聲到北京醫院救治。「六四」後大清查中，清查人員要醫生作偽證，指稱楊燕聲是「暴徒」，故遭射殺。醫生不從，一遍又一遍地講述當時的真實情況，一遍又一遍地澄清強加於楊燕聲的誣陷不實之詞。這是清查者和醫生的對話記錄：「難道楊燕聲就沒有一點越軌行為？」「沒有！」「你再想想！」「沒有什麼可想的。」「沒有暴力行為，戒嚴部隊怎麼會打死他？」「我不知道。你應該去問戒嚴部隊。」再問，沉默；再再問，沉默。

十八 記者編輯之勇者義者赴難者(14人 1群體)

陳來順，23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華社代培攝影班89級應屆畢業生。6月3日晚，陳在人民大會堂西北側的平房頂上照相時，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身亡。

張汝寧，32歲，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俄語部副主任。6月3日夜10時多，張離家步行去電台途中穿越馬路，在木樨地橋頭附近遭解放軍戒嚴部隊炸子射中腹部，腹腔炸爛，送復興醫院搶救無效，4日凌晨身亡。

里慧泉，約35歲，中國冶金報記者。6月4日凌晨，里在六部口路南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殺，11日於郵電醫院發現遺體，屍體無頭。

蘇生機，43歲，北京亞運村《住宅建設》記者。6月3日傍晚，蘇在新街口松樹街一朋友家談工作；18時，見電視中戒嚴部隊緊急通告，隨即離開朋友家；23時，有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見到蘇；此後再無踪影，至今活不見人，死未見屍。

《人民不會忘記》編輯委員會及作者群體，為了讓歷史記載住這件大事，六十四名曾採訪北京民運的香港記者迅速集合起來，將北京民運始末，綜合報道，組成一幅縱橫交錯的京城變亂圖。為了梳理出較為全面的場景，香港記者群體不惜打破工作機構的界限、放下搶新聞的惡性競爭，全心全力撰寫一己的所見所聞，集眾人之力互補不足，在不足兩月之內，出版了這本新聞界前所未有的合作的新聞紀事書籍。《人民不會忘記》出版後，瞬即售罄，重印又重印，銷售總數超過五萬本。為了讓年輕一代認識此事、為了讓這項記載繼續留存，編輯委員會今年藉二十周年的機會，再版此書廣為流傳，全書保留原貌，只增編了一份二十年大事記。該書由香港記者協會出版，再版的銷售收入，一如既往，撥入「人民不會忘記基金」，以作支持新聞自由之用。

蔡淑芳，女，香港《星島日報》記者。6月4日凌晨蔡仍在天安門廣場採訪。4時，廣場熄燈後，蔡感覺大限將至，「可能會真的死在天安門廣場上，所以摸黑到一個帳篷面前，問一個同學可否借一張鋼床給我坐下，而帳篷內還有同學



在休息。我亮起電筒在筆記本上寫下遺言……」。蔡最後與學生隊伍一起撤離。

張結鳳，女，香港《百姓》半月刊記者。6月3日夜，張與兩位同伴前往天安門廣場採訪，午夜時分，在風水橋頭遭解放軍戒嚴部隊射中頭部背部，倒地流血不止。得廣場學生冒險跑來救她送醫院及時救治活命。

楊繼繩，新華社高級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楊繼繩撰寫《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004年一版，2006年修訂版），第六章《國殤》第7節：我目睹的『六四』悲劇，詳細引述《戒嚴一日》書中提及戒嚴部隊進城的詳情，以及他在北京街頭、醫院所親歷軍隊開槍和見證死傷的情況。其資料詳盡可信，填補史實空白，敢說敢寫，對歷史負責。

吳小勇，國際廣播電臺英語節目負責人。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2006年修訂版）一書第六章《國殤》第7節中記述，6月3日晚，冒著生命危險用英語向全世界廣播：「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吳小勇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他沒有像有些高幹子弟那樣，憑藉父親的權勢爬上高位，只是靠自己的業務水準當上了處幹部。事情發生後，他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

杜憲、薛飛，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女、男主播。6月4日晚7時新聞聯播節目中，杜憲、薛飛反常地著深黑色禮服，滿臉戚容，聲音沉重、緩慢、悲切地播送節目，以此對死難的學生民眾表示哀悼之意。一時，全國盡說杜、薛好。為此，杜憲、薛飛遭到懲罰，不讓再上電視主持節目了。

陸超祺，《人民日報》副總編。6月3日夜，陸主持《人民日報》工作，各記者紛紛報來解放軍戒嚴部隊在城內各地開槍殺人的訊息，值班編輯和回來的記者無不悲憤異常，幾位編輯記者寫好了千餘字的「北京這一夜」稿，陸超祺改為600來字，又改為200來字的簡訊。在中宣部電話壓力下，還是把這篇「北京這一夜」發印了。6月4日的《人民日報》頭版上一個加了花邊可容納600字的大框，印著稀疏的200字，越發使標題「北京這一夜」醒目。「六四」後，陸超祺遭重點審查，翌年離職。2006年，陸超祺所撰《六四內部日記》一書在香港出版，點名批評當時的軍委主席鄧小平、總理李鵬。

《中國青年報》一記者。6月4日凌晨4時，天安門廣場有意熄燈後，原尚留在紀念碑底座周圍的記者都撤離了。在學生開始撤離時，發現《中國青年報》一位年輕的記者還在沒走，同學勸他拉他一起走，他跪倒悲慟欲絕，不願撤離，同伴強行架走了他。

梅兆贊，英國《泰晤士報》東亞編輯。6月3日午夜，梅兆贊站在天安門城樓下風水橋上觀望，身邊一位年輕人中彈倒地。此前，梅目睹一輛裝甲車快速碾過了一個人。梅開始意識到必須離開時，武警發現了他。儘管他用漢語表明了外國記者的身份，還是挨打，被打掉了一顆牙齒和打斷了一條胳膊後，得到一位外國記者同行和義大利駐中使館副領事的仗義相助：喝阻打人武警，帶離殺場，得以活命。梅兆贊此後寫了許多文字見證報導「六四」真相，為此獲得1989年英國年度最佳記者獎。

十九「六四」後遭抓捕 判刑受難死難者人(1200人)

北京、上海、湖南、浙江、甘肅、四川、山西、山東、陝西、貴州、廣東、安徽、江蘇、吉林、遼寧15省市遭抓捕、判刑受難死難者。

死刑26人、死緩14人、無期26人、20年7人、18年2人、17年3人、16年1人、15年26人、14年13人、13年26人、12年23人、11年16人、10年26人、10年以下約1000人

1. 北京

死刑22人，死緩12人，無期20人，20年5人，18年1人，17年2人，16年1人，15年19人，14年13人，13年22人，12年14人，11年14人，10年5人，10年以下565人。

死刑22人

1989年「六四」後，22名北京市民被以「六四暴徒」名義遭不公正審訊後判處死刑。已知姓名者13人，餘9人至今不識姓名，請知情者提供。

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王連禧**，死刑。林昭榮等8人，於1989年6月17日，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諸罪宣判死刑。8名被告提起上訴，除王連禧被改判無期外，其餘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6月22日上午，林昭榮等7人遭槍決。

孟多、**周繼國**，死刑。孟多、周繼國，1989年12月8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孟、周是殺害戒嚴部隊士兵李國瑞的兇手，判處死刑；12月底，執行槍決。

李兵、**李斌**、**張建忠**，死刑。李兵、李斌、張建忠，被指控認定是殺害戒嚴部隊士兵劉國庚兇手，遭判死刑，執行槍決。

王連禧，北京西城環衛工人，1955年生，初中文化，無前科。王於1989年「六四」後被捕，在一樁「8人縱火焚燒軍車」案一審中與其餘7人皆判死刑。7人



被執行死刑，王在二審時改判無期，原因是發現王患有精神病。王沒有與人正常交流的能力，關押期間病情逐漸加劇，開始叫他一聲「大禱子」還能答應一聲，後來基本不會答應了。王與失去一條腿的「暴徒」某一起負責打掃操場的衛生，獨腿罵王欺負王，王沒有反應。王進監獄前原住房因建造北京金融街被拆除，管轄街道的片警和司法民政部門領導皆承諾負責他出獄後的生活。王在北京二監服刑18年後於2007年7月出獄，住在金融街司法所的沙發上3個月，後分給他一小間平房居住。2008年奧運前夕，王遭清除而關進了精神病院。奧運過後，王原住小房被領導安排了他人居住。王連禱現仍被關在北京精神病院。

小戴，北京朝陽區副食店肉櫃售貨員，29歲。1989年6月4日上午，北京解放軍戒嚴部隊屠殺鎮壓學生平民後，二環路上有拋錨及翻倒的軍車、民用車。在一處翻倒的汽車旁，有人喊：「點了它，誰有火？」小戴掏出打火機遞了過去。一位市民打火引燃，車被燒著了。兩天後，片警來找小戴，瞭解6月4日點火燒車的事。小戴如實陳述。又過了幾天，小戴被戒嚴部隊帶走了。小戴姐姐找片警詢問，片警透露，小戴是在燒車的現場被崇文公安分局的便衣跟踪至家，現在已交戒嚴部隊處理。兩個多月後，小戴家接到通知：戴××已被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死刑了。戴家三姐妹沒敢要回兄弟的骨灰，騙母親說兄弟判了無期，在新疆服刑，且懇求居委會和派出所片警幫同對老人撒謊。小戴母親盼兒心切，幾次要去新疆探監，被三姐妹勸阻，繼續聽信兒子減刑的謊訊。近耄耋的老人患高血壓冠心病，不輟鍛煉，頑強地活著，只為有生之年再見親兒一面。

死緩12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朱更生，死緩。朱在天安門廣場進第一輛坦克時，跳上去撬鐵蓋子，被錄影了。「六四」後中央電視臺播放的6月3日夜的「暴亂」錄影中，天安門廣場上一輛坦克在燃燒，一個年輕人站在坦克上揮舞著旗子高喊著「我們勝利了」，這個年輕人就是朱更生先生。「六四」後清查，按圖索驥，抓了起來，一、二審都判死刑，砸上腳鍊手銬等死。未料一年多後改判死緩，撿了一條命。然生不如死，在死筒囚了兩年多，人變形了。彼時看守所，隔三差五有人上路，開一次門，受一次刺激，如此心驚肉跳幾百天才改判。既非死囚，可卸腳鍊，他卻不習慣了——瘦成雞腳的腿發飄，一邁步就騰雲駕霧。2006年，朱更生的姐姐推著輪椅帶80多歲的老母親探監，母親告訴他，以後可能再也來不了了，盼著他早點回家。後來只有兩個姐姐輪流去看他。朱更生未婚。1998年改判20年，還有5年以上刑期。

王稼祥，死緩。王70多歲，年齡最大的「六四暴徒」，因義憤參與焚燒軍車，遭判死緩。1997年，80多歲的王稼祥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病死。

苗德順，1963年生，北京中院以「放火罪」判死緩。家址：西郊木材廠宿舍。6月4日，苗在五孔橋附近和民眾一起怒燒戒嚴部隊軍車。8月8日，遭北京中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處死緩。由於不認罪，苗被監獄定為反改造尖子。92年從死緩改為無期，一般情況下兩三年即可減為有期徒刑，但他卻等了5年，原因就

在於他不認罪。1997年從無期改為20年。苗德順性格倔強，為不給家裏添麻煩，97年他父母去監獄看他，他不見，後來家裏就不再去。由於抗拒改造，苗經常被獄警電擊，最多一次有4個獄卒用警棍電他，他從不求一聲饒。目前苗德順在延慶監獄服刑，餘刑在8年以上。

李玉君，反革命破壞罪，死緩。家址：北京市八裏莊一中李玉平轉。6月4日，李在朝陽區紅廟一帶燒軍車，以「放火罪」遭判死緩。李玉君有3個哥哥，大哥老三屆，在哈爾濱插隊落戶，基本沒來看過他；二哥在八里莊一個中學校開工廠工作，偶爾背著老婆去看一下他，給他點兒零花錢；三哥在花園村的一個汽車修理廠工作，基本上不管他。李玉君生活費來源主要是靠給刑事犯洗衣服、刷碗換得一些香皂、牙膏、毛巾，另外就是監獄每月發放的5元津貼。李玉君未婚。1998年改判20年，還有5年以上刑期。

董盛坤，1960年生，初中，幹部，無前科，北京中院以放火罪判死緩。龍潭西里16-3-8。

郝浩良，1971年生，中專，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放火傷害判死緩。東各莊北里33-1-309。

張茂盛，1968年生，初中，農民，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死緩。德外小關機械施工站9號。張21歲，北京機械公司三處工人，一貫支援學潮，6月4日清晨，在朝陽區馬店橋焚燒了一輛解放軍戒嚴部隊的軍車；6月21日被捕，遭軍人、警察毒打，遍體鱗傷；北京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縱火罪」判其死緩。關押17年後獲釋，全身傷病，無錢醫治，沒有工作，賴父母退休金度日。

孫宏，1971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死緩。朝陽區農光里2排2號。

朱文義，1951年生，高中，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死緩。清河鎮五建公司19排6號。

姜亞群，1936年生，反革命破壞罪，死緩。關押北京延慶監獄。6月4日，姜在東四附近參與怒燒軍車，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死緩。「六四」時姜亞群53歲，未婚，現73歲，家裏無親屬，無人探望。1991年改判無期，1993年改判20年。目前在延慶監獄服刑。

張琪傑，1966年生，初中，工人，4進宮，中院以搶盜藏槍判死緩。羊坊店鐵路宿舍573號。

楊璞，1964年生，初中，貧農，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死緩。永定門外四路通7號。6月4日，楊在陶然亭公園附近，和眾市民一起怒燒軍車，遭北京中院以「反革命放火罪」判死緩。在二監服刑時查出雙腿患骨結核，走路需要借用拐杖，後送濱河醫院；94年離開二監去茶淀監獄病號隊，再轉延慶監獄服刑。由於楊傷病重，無法參加體力勞動，因此死緩轉無期後一直沒能減刑。

無期20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常永傑，無期。

張群，1970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無期。海淀小關居民區113號。

武春啟，1952年生，北京中院以「放火罪」判無期。6月4日，武在永定門附近和民眾一起怒燒軍車，判無期。武春啟在看守所和監獄中備受折磨，導致多種疾病纏身。2008年出獄後，無法找到工作，申請低保未批，目前靠每月400元的困難補助度日。

李志新，1956年生，以「放火罪」判無期。家址：北京東城區黃寺附近。6月4日，李在學院路上和民眾怒燒軍車，遭判無期。2008年出獄。父1997年去世時沒讓見面；母已73歲，有心臟病，每天都要吃藥。李在獄中沒時沒點地幹活，把身體累壞了，關節炎，腰痛，眼睛看東西不清楚。出來歲數大了，找工作也沒人要，也沒有特長，現在住在家裏。後來問哥哥、姐姐借了點錢，買了一輛電動自行車，通過朋友介紹曾到一家速遞公司送快遞，不久就丟了工作。出來後一直在申請低保拒批，現終得解決，每月410元。

宋凱，反革命殺人罪，無期。家址：北京磚塔胡同89號。6月4日，宋在人民醫院門口，宋凱與張寶生（當年15歲，判刑10年）、常景強、等許多市民從一輛軍車上把士兵王玉文（後被授予「共和國衛士」）拽下來毆。宋凱將一個水桶扣在王玉文頭上，怕把王打壞了。宋凱被捕後在豐盛派出所內被幾十名戒嚴部隊暴打，後腰被打壞了，留下終身殘疾，走路時往前探著走。宋被以「反革命傷害罪」判無期。宋凱目前在延慶監獄服刑。

常景強，1969年生，反革命傷人罪，無期。家址：北京市中關村41樓109號。「六四」後，常在人民醫院門口用磚頭砸武警被以「反革命傷害罪」判無期。常是獨生子，其父是社科院鍋爐工，由於常年為兒子著急上火，2000年患腦血栓，行動不便。2005年，母、父先後去世，再無人看顧常。1991年改判20年。現關押北京市第二監獄第5分監區。

趙鎖然，1962年生，首鋼電工，反革命破壞罪，無期。北京門頭溝大台西窪12-6號。6月4日，趙在八角村附近和憤怒的民眾一起砸了一輛裝甲車，被北京中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判無期。2007年獲釋。趙在獄中18年，落下了腰腿殘疾，出獄後一直找不到工作，現每月領取低保費390元。

高亮，1971年生，中專，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無期。石景山區老山東里27-29號。

張寶群，1966年生，初中，農民，無前科，海淀院以放火罪判無期。東北旺鄉上地村68號。

孫傳恒，1970年生，中專，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持械聚亂罪判無期。孫傳恒，19歲，北京地質儀器廠工人，遭北京中級法院以「持械聚眾叛亂罪」判無期，關押17年後獲釋，全身傷病。孫在獄中自學，獲法律專業大專文憑和心理專業本科文憑，獲48種單科合格證書。然到處受歧視，找不到工作，生活無著。家

址：北京市東直門外六公墳高家園社區1區8號樓3-41號。

張燕生，1967年生，初中，貧農，無前科，中院以搶劫罪判無期。西外大街新興西里15號。

王連會，1967年生，小學，貧農，大興法院以搶劫罪判無期。大興縣紅星區舊宮鄉舊宮村。

孫彥財，1966年生，小學，農民，無前科，大興院以搶劫罪判無期。紅星區舊宮鄉舊宮村。孫彥財、孫彥茹，北京大興縣親哥倆，哥哥無期，弟弟13年，關押北京市第二監獄。

張福坤，1959年生，小學，農民，無前科，海淀院以放火罪判無期。海淀區馬甸西村35號。

張國棟，1970年生，小學，貧農，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無期。南苑鄉槐房村132號。

高鴻衛，1970年生，小學，貧農，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無期。朝陽區青年路紅門村30號。

石學之，1940年生，高中，地主，無前科，中院以放火罪判無期。昌平縣回龍觀鄉回龍觀村。1991年夏，石學之所在七中隊承接了北京乳膠廠出口美國乳膠手套的活兒。石學之用中、英文寫了許多紙條，放進手套裏，紙條上寫著：「自由民主萬歲！自由救中國！請好心人轉告海外民運人士救救我們！……」等等。後被發現，遭關禁閉，手銬腳鐐加身，手腳用一幅銬子聯上。當年50多歲的石學之被3、4個警察踩著，另外5個警察用電警棍電擊，每次都在半個小時以上，電擊的部位集中在陰部、腋下、脖子和臉部，陰毛都被電焦了，石學之從沒向警察求過一聲饒，痛苦到極點時，他只是本能地「啊、啊」叫幾聲。在三個多月的禁閉中，石學之經常被退回中隊，進行電擊，獄方以此來威懾其他暴徒。1993年從無期改為16年半。1998年從二監轉到延慶監獄。目前石學之在延慶監獄服刑，今年年底可望釋放。

王巖，1968年生，高中，工人，無前科，豐台法院以放火罪判無期。老山西裏35-48號。

余志堅，湖南瀏陽人，用顏料潑污天安門毛澤東像，高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宣傳罪判無期。

馮立生，65年生，高中，貧農，無前科，朝陽院以搶奪槍支罪判無期。北京釀酒總廠廠宿舍4-2-309號。關茶淀監獄。

20年5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劉建文，1969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宣武院以搶奪彈藥流氓判20年。小椿樹胡同1號。

李紅旗，1966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海淀以流氓搶奪槍支判20年。白堆子區委1-403。



高振河，1970年生，初中，貧農，拘留2次，豐台院以流氓搶劫盜竊判20年。豐台岳各莊335。

孫繼友，1960年生，小學，貧農，2進宮，崇文院以強姦流氓判20年。安里19-1-103。

喻東岳，湖南瀏陽人，用顏料潑污天安門毛澤東像，高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宣傳罪判20年。

18年1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趙慶，1970年生，初中，工人，拘留1次，西城院以放火搶劫判18年。半壁店街8-1-3-103。

17年2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杜建文，1969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海淀以流氓搶劫判17年。民族學院民印樓2-214。

劉振庭，1964年生，高中，工人，無前科，海淀以放火搶劫罪判17年。古城南里6-92號。

16年1人

魯德成，湖南瀏陽人，用顏料潑污天安門毛澤東像，反革命破壞罪、宣傳罪，判16年。

15年19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李延華，與路洪澤同案，遭判15年，關押北京市第二監獄。北京西城區法院1989年12月27日對路洪澤、李延華秘密審判。李、路的判決書這麼寫：「1989年6月4日零時許，被告人李延華、路洪澤竄至本市西城區六部口十字路口處，適遇已被點燃車頂頂部的戒嚴部隊某部339號裝甲車（價值人民幣33萬元）由東向西行駛。被告人二人分別向該裝甲車上投擲燃燒瓶，致使該車火勢增大被迫熄火停車，後被焚毀。……上述事實，有證人證言，戒嚴部隊某部證明材料為證，足以認定。被告人二人均亦供認。……被告人李延華犯放火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路洪澤犯放火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

劉旭，1970年生，職高，工人，無前科，豐台院以放火罪判15年。後安門外東莊7-2-12。

劉長青，1964年生，高中，貧農，無前科，朝陽院以放火罪判15年。朝陽區沙廠莊21號。

蘇鋼，1970年生，中專，教師，無前科，海淀以放火罪判15年。海淀區科技大學33-505室。

白鳳瑩，1964年生，初中，工人，1進宮，中院以搶劫罪判15年。車公莊大

街1-中-54號。

龔傳昌，1969年生，小學，農民，無前科，大興院以搶劫罪判15年。紅星區舊宮鄉舊宮村。

楊玉甫，1965年生，初小，貧農，2進宮，西城院以放火罪判15年。西城西潞胡同117號。

彭興國，1957年生，文盲，農民，中院以放火罪判15年。密雲縣番字牌鄉北柵子大隊牛留村。

李福全，1963年生，小學，農民，4進宮，西城院以放火判15年。鼓樓大街果入市遷善居8號。

蔣生，1967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崇文院以搶劫傷害罪判15年。法華寺大街甲8號。

陳揚，1966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西城院以流氓搶劫判15年。新街口羅二胡同27號。

李德喜，1934年生，文盲，貧農，無前科，大興院以搶劫罪判15年。紅星區舊宮鄉集賢村。

馬連喜，1954年生，初中，佃農，無前科，朝陽院以搶奪槍支彈藥判15年。甜水園六巷20號。

鄧萬玉，1964年生，初中，農民，無前科，門頭溝以詐騙放火判15年。三家店東街55-14號。

劉權，1953年生，初中，下中農，2進宮，朝陽院以放火破壞判15年。關東店北石營西巷10。

王長洪，臺灣特務，煽動學潮，15年。家址：北京安華里5區1樓2-262號。

張寶生，15歲，年齡最小的「六四暴徒」，沒爹沒媽，15歲判15年，罪狀是揍解放軍。

趙玉水、盧金生。

14年14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善輝，70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崇文院以搶劫罪判14年。東花市東2條29號。

梁寶華，1962年生，高中，貧農，無前科，豐台院以流氓罪判14年。右安門外關廟西巷13號。

趙玉水，1961年生，初中，貧農，2進宮，中院以搶劫罪判14年。八里莊東平房3-10號。

孫振鋼，1961年生，小學，工人，3進宮，西城院以放火罪判14年。西城西潞胡同111號。

柴軍，1971年生，初中，貧農，無前科，豐台院以放火罪判14年。豐台南苑鄉



槐房村170號。

李洪敏，1958年生，高中，工人，2進宮，崇文院以流氓罪判14年。崇文區東河沿19號。

楊建華，1959年生，小學，工人，3進宮，西城以擾亂交通搶劫罪判14年。德外弘慈巷4號。

梁雲卿，1971年生，小學，工人，無前科，東城以搶劫流氓罪判14年。建國門先曉胡同2號。梁父是解放軍高級軍官。梁將扣下給養軍車上的食品分給學生、市民充饑，大公無私地分了半天，車空了，自己卻還沒吃。梁東尋西找，終於在車叢裏發現有只燒雞。這只燒雞上了「起訴書」。梁遭判14年，關押北京市第二監獄，在獄中叫屈：「這燒雞貴啊！」

張勝波，1970年生，初中，幹部，2進宮，海淀院以盜竊搶劫罪判14年。農業工程大學宿舍1-中-307號。

路洪澤，北京海淀區四季青鄉人，在北京城打工。6月3日晚，路下班前往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在六部口看見許多正在燃燒的裝甲車，就與同伴李延華隨手用汽水瓶砸了過去，恰被十字路口紅綠燈上的攝像機錄了下來。「六四」後，據此被捕，遭北京西城區法院以向裝甲車投擲燃燒瓶為罪判14年。路沒有上訴，他說：「誰敢上訴呀？！當時的形勢多恐怖呀！法院說了，不槍斃我們就算便宜我們了。在看守所裏每天都得挨打，一開始是戒嚴部隊打，最後是刑事犯打。大家都盼著早點判完早點下圈兒，看守所那地方真不是人呆的地方。」「裝甲車是戒嚴部隊自己澆上汽油後點燃的。」錄影也能證實路砸向裝甲車的是汽水瓶1998年4月21日，路洪澤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病死。

楊光輝、孫彥如、劉育生、祁振國。

13年22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李增良，1971年生，小學，農民，無前科，豐台以流氓罪判13年。蘆溝橋鄉小井村732號。

米玉平，1958年生，高中，工人，無前科，西城院以放火罪判13年。崇文花市東4條21號。

李長占，1963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崇文院以放火罪判13年。崇文幸福村東街33號。

王月明，1966年生，小學，貧農，無前科，海淀院以放火判13年。密雲縣番字牌鄉南化嶺村。

劉昆侖，1954年生，初中，幹部，無前科，海淀以放火判13年。西釣魚臺30號東院西樓320。

陸小軍，1962年生，高中，工人，無前科，宣武以搶劫流氓罪判13年。太平街5-1-14號。陸小軍，38歲，原中央芭蕾舞團職工。6月4日，陸在家門口與解放軍

戒嚴部隊軍車相遇並圍觀，6月30日遭控流氓、搶劫罪判13年，2001年5月4日死亡。

梁朝輝，1971年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西城院以放火罪判13年。海淀六郎慶大街3號。

王建，1968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中院以搶劫罪判13年。車公莊大街1-2-151號。

廉振國，1968年生，初中，貧農，無前科，大興以搶劫罪判13年。紅星區舊宮鄉舊宮村。

賈馬傑，1970年生，中專，幹部，無前科，海淀院以放火判13年。北京科技大宿舍3-509。

梁志祥，1973年生，初小，工人，2進宮，西城院以放火罪判13年。西什庫大街76號。

趙品拒，1963年生，初中，貧農，3進宮，中院以搶奪槍支罪判13年。真武廟六裏48號。

孟凡軍，1969年生，中技，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搶奪槍支罪判13年。馬道口文巷83號。孟凡軍、孟凡民，親哥倆，哥哥21歲判13年，弟弟19歲判9年，關押北京市第二監獄。

張寶軍，1971年生，初中，農民，曾拘留2次，朝陽以放火搶劫罪判13年。垡頭村69號。

孫彥茹，1970年生，小學，貧農，無前科，大興院以搶劫罪判13年。紅星區舊宮鄉舊宮村。

劉懷東，1967年生，中，幹部，西城院以流氓罪判13年。北京第二監獄宿舍3-4-1-1。

吳瑞江，1970年生，高中，幹部，無前科，中院以流氓盜竊判13年。海慧寺銀行1-6-502。

孫伯光，盜竊罪、窩藏槍支罪，13年。

郭振波，1968年生，初中，工人，3進宮，海淀以流氓搶劫判13年。復興路32-4-4-463號。

華思宇，1970年生，初中，幹部，無前科，東城以搶劫流氓罪判13年。東後拐棒胡同甲2號後樓113號。

王東風、康秀林。

12年14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張佩利，1964年生，高中，工人，無前科，崇文以放火搶彈藥判12年。廣渠門外關廟南巷32。



許寧，1972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西城以放火罪判12年。鼓樓大街大石橋胡同25號。

劉春龍，1971年生，初小，貧農，無前科，豐台院以放火罪判12年。南苑鄉槐房村176號。

牛書亮，1972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海淀院以放火判12年。海淀市政宿舍1-5-7號。

黃雪坤，1970年生，初小，貧農，無前科，大興以流氓搶劫判12年。紅星區4分場西1樓12。

牛占平，1955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東城以放火判12年。東直門新中街一巷21號。

于文，1968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中院以流氓罪判12年。永定門內大街82號。

梁振雲，1966年生，小學，工人，3進宮，西城院以搶槍支判12年。真武廟二條3-7-5號。

梁迎春，1960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西城院以放火判12年。海淀區西外大街23號。

楊光輝，1973年生，初中，農民，石景山院以放火罪判12年。石景山老山西裏2-18號。

吳東明，1960年生，高中，工人，無前科，西城院以放火罪判12年。東城區國旺東巷3號。

喬鴻歧，1960年生，高中，工人，2進宮，石景山以搶槍支判12年。楊莊社區34-3-31。

張寶庫，1969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西城以放火罪判12年。西城西教場小6條1號。

霍連生，1968年生，小學，貧農，曾拘留2次，朝陽院以搶奪槍支罪判12年。密雲縣西田各莊鄉巷頭村。

11年14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宋世輝，1970年生，初中，工人，拘留3次，東城以搶劫流氓罪判11年。炒麵胡同25號。

張琨，1970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朝陽院以放火罪判11年。北京市第一機床廠宿舍。

李濤，1972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東城院以搶劫流氓罪判11年。前拐棒胡同13號。

吳春墨，1963年生，初小，農民，3進宮，朝陽以搶劫慣竊判11年。豐台區雲崗西平房6-1。

汪永錄，1968年生，初中，工人，無前科，朝陽以搶槍判11年。南磨房物資局宿舍1-3。

閻朝富，1956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西城以搶槍詐騙判11年。木樨地北西29排10號。

閻建新，1968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石景山以流氓搶劫盜竊判11年。八角北路36-63。

馬國春，1959年生，高中，農民，無前科，海淀院以流氓搶劫判11年。石景山楊宅38棟72。

馬士民，1972年生，初中，農民，無前科，豐台以放火罪判11年。玉淵潭鄉沙溝村90號。

段志均，1955年生，初中，工人，拘留1次，西城以放火罪判11年。西城區糖房大院45號。

鄭延生，1953年生，小學，工人，強勞2次，朝陽以放火判11年。安華西里3-14-422號。

一哥們。在北京開飯館，很有錢，學潮時送吃送喝，清查時遭判十幾年，關押北京市第二監獄。出來後開一夜總會，接濟了許多難友，相當於「暴徒」們的民政局，但一口也不願提過去。

吳瑞江、霍建剛。

10年5人（關押北京第二監獄）

撿鋼錐者，「六四」攔截軍車期間，撿了一枚鋼錐，獲判10年。

戶力平，洩密、反宣罪，10年。家址：北京市香山四王府40號。

胡忠喜，持械聚眾叛亂罪，10年。家址：北京市先農壇東街12-17號。

唐勇，反革命傷害罪，10年。家址：北京市棉花胡同上6條10號。

曹英遠，反宣罪，10年。家址：北京市建國門老錢局胡同12號。

10年以下565人

李俊存，1964年生，初中，工人，4進宮，西城以聚眾擾亂罪判9年半。東手帕胡同68號。

孟凡民，9年。

杜德成，1963年生，小學，貧農，2進宮，朝陽院以搶奪槍支罪判8年。農光里8巷11號。

劉寶，反革命宣傳煽動罪，8年。家址：北京市安貞西里4區2-1204室。

李玉生，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流氓罪，8年。



劉子厚，持械聚眾反叛罪，8年。家址：北京市宣武區3街14-甲1-1-2號。

李國強，7年。

申衛明，7年

孫立勇，7年（關押秦城監獄）。1981年畢業於北京公安學校，1989年「六四」後，孫與**李愛民**、**尚子文**、**金澄**創辦民間刊物《民主中國》，為「六四」死難者鳴不平，遭逮捕，1991年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7年。2004年，孫避難澳大利亞。現居悉尼，積極從事民主運動，任中國政治宗教受難者後援會召集人，救助國內受難者。

武文建，7年（詳見「英雄譜」）。

顧連仲，反革命宣傳煽動罪，7年。家址：北京市永內東街東1樓6-402號。

關寶強，1965年生，初中，工人，2進宮，西城以流氓罪判7年。展覽路扣幣南4巷9號。

王鼎民，1959年生，高中，工人，3進宮，崇文以搶劫罪判7年。崇文區營房西二條6號。

任曉町，北京人，7年，關押秦城監獄。

尚子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6年。家址：北京市禮士胡同48號。

賈立民，1962年生，初中，工人，4進宮，崇文院以流氓罪判6年。崇文半壁街37號。

劉瑞，1957年生，初中，工人，5進宮，崇文院以搶劫罪判6年。崇文營房寬街3號。

吳兆強，6年。

李金棟，6年。

王建生，6年。

李寶琴，6年。

官寶祥，6年。

劉剛，北京大學學生，6年，關押秦城監獄。

陸志剛，反革命宣傳煽動罪，5年。

郭海峰，北京大學碩士生，4年，關押秦城監獄。

王有才，北京大學碩士生，3年，關押秦城監獄。

張銘，清華大學學生，3年，關押秦城監獄。

翟偉民，北京經濟學院學生，3年半，關押秦城監獄。

孔險峰，北京經貿大學學生，3年，關押秦城監獄。

李克洲，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生，3年，關押秦城監獄。

鄭旭光，北京航空學院學生，2年，關押秦城監獄。

張前進，北京語言學院學生，2年，關押秦城監獄。

姚軍嶺，北京體育學院學生，2年關押秦城監獄。

戴熾義，北京經濟學院畢業生，2年，關押秦城監獄。

王建生，北京皮革廠工人，刑期不明，關押秦城監獄。

李金德，1959年生，高中，工人，3進宮，流氓罪，5年。安外大街青年湖北區7-3-403。

郝富春，1937年生，文盲，農民，2進宮，豐台法院以搶劫罪判5年。豐台成壽寺8號。郝富春，判5年，《判決書》上寫著：「用皮帶猛抽坦克，打完之後，揚長離去……」

楊寶玉，1961年生，初中，工人，3進宮，崇文以聚眾擾亂交通罪判3年半。

江棋生，人民大學博士生，1年半關押秦城監獄。

陳東象、陳秋龍、胡忠喜、梁振長、錢永冕、沈立成、譚鈞強、王寶玉、王東峰、王潤江、張佩文，刑期不明。

王忠賢，河北某縣個體印刷廠老闆。「八九」民運初期，王賣掉廠子來到北京，將所有的錢捐給了「工自聯」，後被任命為「工自聯」後勤部的副部長，「六四」後被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關押在秦城監獄兩年多不審不判。王對同監同罪難友孫立勇出示紙條，請幫助修改。紙條寫的是：「李鵬呀李鵬：我已被你關了兩年多，你究竟要把我的案子拖到猴年馬月才了結呀？你身為總理不僅不為人民服務反而屠殺自己的人民，你到底算哪門子總理？我真為你感到恥辱！我要求你盡快給我一個結果，槍斃判刑隨你便，反正快點兒就行了。王忠賢91、8、16」王現況不明。

溫杰，26歲，北京大學88年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北京服裝學院教師。「六四」後溫被羈押，獄中患腸癌，保釋出獄後病故。

陳佩斯，電影演員，6月4日遭關押一夜。

20名女「暴徒」（刑期暫以10年以下計）

1989年「六四」後，北京第一監獄關押著20餘名女「六四暴徒」，姓名、刑期不詳。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於1994年5月19日公佈了一份「522名因「六四」而被關押的北京市民和學生名單」。其中除個別名人外未見諸上述名單者有489名（刑期暫皆以10年以下計）。

21名關押在北京第二監獄

陳東象、陳秋龍、陳晏斌、關建、韓昱、李愛民、李寶琴、李國強、李金棟、王潤江、梁振長、錢永冕、申衛明、沈立成、譚鈞強、王、某、王



賈玉 王東峰 張佩文 吳兆強 王建生

70名關押在北京清河農場三分場（勞改場）

陳寶華 陳國強 陳景奎 董建軍 杜新海 豐續銀 高福興 高揚 顧文壽 郭學明 國戰強 郝風海 何永宏 霍岩楓 季立忠 金志剛 來文革 李寶華 李俊生 李立京 李瑞軍 李勝利 李 佟 李興江 李燕明 李 義 李 忠 梁愛忠 梁 正 劉東全 劉 艦 劉天利 劉文生 劉小偉 劉志強 呂京山 馬建立 馬宇鵬 孟凡民 牛金海 秦志玉 任英俊 榮永男 孫紅生 譚衛軍 田德剛 田金寶 佟 波 萬寶林 王春生 王 軍 王乃革 王世繼 王獻輝 魏國慶 肖富革 徐動新 楊 兵 楊宏偉 楊 屹 于海鈴 翟永猛 張進元 張 軍 張守信 張振喜 趙朋利 趙萬良 趙玉順 朱童筮

56名關押在北京清河農場六分場（勞改場）

于長城 方仲滿 王成起 王春友 王建搞 王 征 安連喜 杜 軍 鄧樹森 劉長青 劉 傑 劉金國 劉金華 劉曉東 李 兵 李 倉 李東輝 李廣田 李建軍 李繼民 李林懷 李 武 陳 偉 陳文忠 程紅利 程紅林 高玉文 侯永利 賈士旺 柳 剛 廬春民 孟連旺 榮俊平 尚偉光 石忠 宋有林 孫連啟 唐 傑 夏保和 夏秉清 蕭春明 蕭連喜 楊利君 袁勳 張福生 張麗偉 張文增 張 毅 趙建欣 趙 軍 趙文生 趙義智 閻玉慶 謝朝陽 魏 鵬 魏振社

46名關押在清河農場八分場（勞改場）

曹景洲 陳 超 陳春生 陳曉東 崔 成 鄧元平 刁 斌 丁 柯 丁 珏 董雙鎖 段成傑 高家榮 管龍鳴 呼 傑 胡萬春 黃玉順 寇永傑 郎 林 雷德琪 李近存 李憲忠 李永生 石國輝 宋立軍 孫革旗 孫 偉 湯永平 田 銘 王玉軍 吳玉平 楊海泉 楊 建 楊立國 姚繼佩 張才林 張傳友 張連福 張小蕾 張銀軍 趙立偉 趙永江 趙永林 趙志勇 趙中友 鍾 放 朱文福

296名1994年5月14日前羈獄者（以姓氏筆劃為序）

刁振浦 馬寶國 馬建軍 馬祥建 于淑珍 于志國 于世民 于波 于 宇 于 文 孔令軍 牛全利 方仲國 尹承軍 車豔華 馬小軍

馬宏宇 尤起江 尤自強 王永裕 王煥春 王永明 王進元 王文華 王伯達 王燕革 王有立 王新建 王金躍 王汝和 王雙全 王亞雄 王繼軍 王清延 王寶明 王冬利 王貴全 王浩英 王建國 王建新 王平來 王文江 王亞森 王志剛 王 軍 王 政 王 志 王 剛 王 宏 王樹 王 毅 石 勇 申美滿 田 禹 鄧長榮 白金泉 葉 皓 葉 劍 傅 強 傅硯波 馮志平 馮 燁 邊玉海 邊 雲 田德慶 田雙傑 田小甯 任建立 任文革 孫利亞 孫 鵬 劉光利 劉彥斌 劉越忠 劉玉根 劉玉平 劉險峰 劉世軍 劉君興 劉寶柱 劉博文 劉朝輝 劉東明 劉文興 劉振賢 劉洪峰 劉獻軍 劉澤國 劉東湘 劉桂華 劉漢民 劉金團 劉繼深 劉勤煉 劉其榮 劉新如 劉 琦 劉 馳 孫 慶 孫聚海 朱孝忠 朱守政 師宏亮 馮洪傑 齊永革 任衛軍 關宏志 許平立 呂 濤 杜建華 佟文利 吳國慶 邢德林 宋玉川 蘇燕軍 何 傑 穀 躍 嚴 偉 湯文志 湯名陸 吳立軍 吳學燦 吳玉成 吳振如 李松明 李長茂 李宗清 李正平 李愛民 李愛國 李惠成 李金祥 李曼戎 李兵交 李金德 李金泉 李勝勇 李文東 李學軍 李治國 李志堅 李建軍 李建新 李玉龍 李 強 李 升 李 濤 李 凱 李 斌 李 赤 李 楓 李 立 李 電 李 罡 楊長江 楊 智 龐 威 季家潤 楊 波 金 橙 果 振 邱文傑 易京瑤 孟賢強 范建國 范立文 林立明 林敏辰 金啟祥 金亞民 金德林 羅繼峰 羅連璽 孟浩然 孟 堅 孟慶祥 周國林 周繼輝 周文東 周 剛 陳仕軍 陳書金 陳雲健 陳戰泉 陳 越 陳愛民 陳亞輝 姜保家 侯培芳 俞軍波 段寶恩 鍾衛民 施偉才 鄭江輝 洪 波 胡 偉 胡志全 胡秋勇 高愛東 高連成 高萬成 高 軍 高士傑 高 峰 趙德全 趙永剛 趙品軍 趙 峰 趙桂林 趙建欣 趙金光 趙利強 趙瑞祥 趙永靜 趙盛強 趙 勇 趙東輝 趙晉川 張立新 張永順 張晨輝 張連軍 張秋生 張玉承 張仲福 張連祥 張國華 張金秋 張 巍 張宇 張 凱 張 力 張 立 張 松 張 岩 賈 雲 黨 鵬 徐寶生 唐 偉 唐壽先 徐 蘇 徐 偉 姜成斌 姜 華 姜 京 栗汝生 龔樹松 龔建民 龔勇華 章 斌 龔 明 康長軍 曹寶珠 常振華 常文龍 蕭金亭 蕭 亮 郭海維 郭維樹 郭向華 郭 峰 郭景華 郭雲飛 曹大增 曹忠鋼 閻德山 閻 劍 閻永利 黃清修 黃 振 竇志輝 竇林懷 梁 建 梁衛東 蔣 輝 曾衛兵 崔景春 焦建成 董 毅 董寶利



董亞軍 董會全 韓亞軍 韓忠良 韓寶增 韓衛東 韓勝利 熊偉 翟同貴 滿連德 潘根柱 蔡鴻岩 霍立軍 薛建明 戴國強 魏振莊

2. 上海市

死刑3人，無期2人，15年1人，10年以下15人，被逼下崗1人

徐國明、**卞漢武**、**嚴雪榮**，死刑。同案犯6人，其中2人無期，4人15至5年。1989年6月22日，徐、卞、嚴3人被上海法院以「破壞交通工具罪」和「破壞交通設備罪」判死處決。

男青年，住楊浦區愛國新村，因為殺了一條狗，舉著血手說北京殺人了，遭楊浦區法院立判7年，關押上海提籃橋監獄。

外號「輪胎」，女，上海某廠化驗員，「六四」早晨回家拿工具給學生戳輪胎，遭以破壞交通罪判5年，關押上海提籃橋監獄。

戴正平，女，充任上海人民廣場上學生聯絡員，判5年，關押上海提籃橋監獄。

男青年，上海銅管廠團委書記，組織工人聲援學生，在上海虹口郵電俱樂部公判4年。

王霞，女，4年，判決書上莫名其妙地寫著：「上衣第二顆鈕扣開著……情緒激動，言辭激烈」云，關押上海提籃橋監獄。

孫寶強，女，上海煉油廠職工，「六四」當日走上街頭大聲疾呼，憤怒譴責當局，第二天，帶領群眾在天潼路設置路障，抗議屠殺，被以「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判刑三年。孫的判決書如是曰：「被告人孫寶強於1989年6月5日下午，在四川北路海甯路小花園處，向群眾傳播謠言，進行煽動。次日上午十時許，被告人孫寶強又竄至奔市天潼路長治路口繼續傳播謠言，並在其煽動下，與他人一同將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餘塊竹籬笆搬至天潼路長治路南側道路中間，設置路障，堵塞交通。……判決有期徒刑3年。……1989年8月22日。」孫現居上海，以寫作記錄見證歷史，有《紅樓女囚》諸著作流傳網路。

技校教師，幫助學生設路障，判3年，關押大西北。

女青年，聲援學生，2年，關押上海提籃橋監獄。

李國濤，上海人，3年。

殷鴻衛，浙江溫州人，北大旁聽生，參與八九六四學運，六四後入獄一年，出獄後在上海工作，不堪當局騷擾，只得返鄉以教英文維生。

張其喜，上海退休女工，與鄰居一起將垃圾桶放倒在地，公安在第一時間偵破此案，退休女工和鄰居作為「暴徒」遭擒入獄。

XXX，女，西安某高校老師，六四後關押上海監獄，一周後在深夜押回西安。

上海煉油廠檢驗科分析員，六四時在北京度蜜月，遭戒嚴部隊流彈射中臀部。回上海後，煉油廠黨委書記史建民懷疑他參與暴亂，不讓他報銷醫藥費，還逼他寫檢查、讓他下崗，最後開除出廠。

3. 湖南省

死緩1人，無期2人，15年2人，13年2人，12年2人，10年3人，10年以下74人。

李衛紅，死緩。湖南省消防器材總廠工人，「六四暴徒」，6月22日遭長沙法院以尋釁滋事、煽動焚燒摩托車、毆打民警、打砸行為等罪名判死緩；同案26人被分別判1至15年，其中工人6，個體戶4，其他為停薪留職人員、農民、無業者。

劉智華，湘潭市電機廠工人，24歲，「六四暴徒」，遭以流氓罪、故意傷害罪判無期，關押湖南省龍溪監獄。1993年獲減刑15年。2009年5月獲釋出獄。

劉建、陳剛、彭實，3人與劉智華同案，組織工人罷工，以各種刑事罪名判入獄，刑期未明。

胡敏，25歲，岳陽市軸承廠工人，「六四暴徒」。1989年6月7日晚，胡與新婚妻子在岳陽火車站廣場聽到從北京南下演講的大學生對北京軍隊開槍殺人的敘說，激憤難已，撇開妻子，與岳陽市數千名大學生、工人、市民一起，在京廣鐵路上臥軌靜坐，造成京廣鐵路線中斷。胡敏參與成立「岳陽市工學聯盟會」，任會長。6月9日，胡敏被抓。8月8日，遭岳陽市法院以「流氓罪」判無期。2001年初胡獲假釋。

郭雲橋，20歲，岳陽市3517廠工人，與胡敏同案，15年，關押赤山監獄，1999年出獄。

張京生，1952年生，參與八九民運，13年。2001年出獄。現擺煙攤度日。

李旺陽，邵陽人，參與八九民運，13年，2000年獲釋；2001年接受境外電臺採訪和「中國人權」8000元人民幣生活資助，遭判10年，現在湖南省赤山監獄服刑。

李旺敏，李旺陽胞妹，因受其兄牽連，3年勞教。

毛岳君，1965年生，省建三公司五處工人，與胡敏同案，12年，1996年出獄。

王昭波，1965年生，岳陽機務段工人，與胡敏同案，12年，1991年因重病保外就醫。

黎立新，1967年生人，岳陽市郊區農民，與胡敏同案，10年。

劉建安，益陽人，湖南師大歷史系畢業。給臺灣寫信表示對六四開槍的憤怒，10年。

陸景國，25歲，新田人，中學教師。1989年5月，陸在北京進修，受學潮影響，攜帶學生反腐敗求民主的資料回鄉，印發成傳單在新田縣散發張貼。六四後，陸遭永州市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10年，曾關押永州監獄，1994年出獄。



宋灶發，30餘歲，新田人，中學教導主任，與陸景國同案，8年。

柏小毛，26歲，資興人，資興煤礦工人，發傳單抗議北京軍隊鎮壓屠殺，8年。

蔣復興、李金鴻、陳學金，湖南人，與柏小毛同案，皆遭判刑。

張善光，37歲，溆浦人，7年。

繁凡，23歲，岳陽市鋼球廠工人，與胡敏同案，7年，曾關押衡陽雁南監獄，1994年出獄。

唐敖，27歲，邵陽人，工人，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判6年，1993年出獄。

周敏，參與八九民運，6年。

顏家志，40餘歲，新田人，中學校長，與陸景國同案，5年。

周志榮，37歲，安鄉人，湘潭二中教師，反革命宣傳煽動罪，5年。

顏德雲，25歲，個體戶，擾亂秩序罪，5年；92年出獄，遇劫犯搏鬥殺死劫犯，判無期。

劉克文，株洲人，寫匿名信寄政府各部門抗議鎮壓屠殺，4年。

張捷，參與八九民運，4年。

姜連生，株州331廠車間主任，散佈謠言罪，4年。

何朝暉，23歲，郴州人，火車乘務員，參加湖南「工自聯」活動，4年。

李梲，1989年長沙「工自聯」副總指揮，4年。

閔和順，30餘歲，岳陽師專教師，反革命宣傳煽動罪，3年。

劉永祥，19歲，湘潭人，高中生，擾亂公共秩序罪，3年。

張帆，長沙水利電力學院學生，寫傳單，3年。

劉豐就，湖南人，演講，3年。

鄭世和，永州人，3年。

鄧立明，邵陽人，3年。

張國漢，長沙人，3年。

王長懷，湖南人，3年。

譚明奇，湖南人，3年。

劉偉，長沙人，3年。

莫莉花，邵陽人，邵陽師專教師，參與八九民運，3年。

王六蘭，29歲，祁陽縣中南製藥廠保衛科幹事，反革命宣傳煽動罪，3年。

段XX，24歲，祁陽縣中學教師，與王六蘭同案，3年。

蔣少雄，22歲，祁陽縣中學教師，與王六蘭同案，2年。

陳天成，湘潭大學歷史系本科生，2年。

唐柏橋，1967年生，永州人，湖南師大政治系學生，湖南高自聯召集人，2年。

譚力量，1963年生，婁底人，婁底師專教師，策劃動亂罪，2年。1992年流亡海外。

陳天成，湖南湘潭大學歷史系學生，2年。

潘明棟，1948年生，長沙人，2年。此後多次遭拘捕。1998年病故。

謝長發，長沙人，2年。

卿昭，永州人，2年。

胡定峰，26歲，汨羅人，律師，反革命宣傳煽動罪，2年。

夏陽，20餘歲，岳陽市團委書記，反革命宣傳煽動罪，2年。

劉X，湖南師大中文系學生，反革命宣傳煽動罪，2年。

雷諾衡，20歲，衡陽市工人，擾亂公共秩序罪2年。

李煜，20歲，衡陽市大學生，反革命宣傳煽動罪，1年。

譚壽林，26歲，祁陽第一中學教師，1年。

陳帥，湖南人，1年半。

4. 浙江省

13年1人，10年以下44人。

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獲刑者：

馬德良，38歲，杭州花園工人，組織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宣傳煽動罪，13年。

張偉平，25歲，浙江美術學院學生，9年，1990年改判為5年。

毛國良，30歲，安吉四中教師，7年。

陳剛，22歲，寧波大學學生，5年。

趙萬敏，23歲，椒江染織廠技術人員，5年。

楊忠信，19歲，仙居縣液壓廠工人，5年。

陳一標，34歲，麗水農民，4年。

鄭小滿，28歲，蘭溪市麵粉廠工人，4年。

董懷明，44歲，嘉興衛生學校講師，曾擔任北京「工自聯」特約評論員，4年。

施強，24歲，杭州某廠工人，4年。

葉文相，26歲，蘭溪市農業銀行會計，3年半。

王有才，26歲，北京大學碩士生，3年。



陳龍德，32歲，浙江鋁製品廠工人，3年。浙江鋁製品廠工人，1989年「六四」前印製散發傳單，「六四」後遭捕以反革命宣傳罪判刑3年。出獄後仍積極參與民主活動，屢遭逮捕拘禁，不堪凌辱毒打，被逼跳樓獲救，雙腿致殘。現居杭州。

傅權，23歲，杭州蕭山商業大廈職工，3年。

金秀元，18歲，嵊縣職業高中生，3年。

張金林，27歲，浦江縣農民，3年。

葉良才，59歲，玉環縣建築單位退休工人、聯防隊員，3年。

李小虎，32歲，杭州洗衣機廠工人，3年。

鮑瑞清，28歲，義烏市鄉村中學教師，3年。

高錦堂，33歲，3年。

張成，21歲，浙江醫科大學學生，3年。

胡溶溶，28歲，浙江大學碩士研究生，2年。

方月松，23歲，杭州大學學生，2年。

胡文奎，23歲，麗水師專學生，2年。

王東海，43歲，杭州文瀾商場經理，2年。杭州工人，「六四」北京殺人後，他在杭州還上街遊行，扛著「向我開槍」的大牌子。王被通緝，逃到海南海口市，被抓獲押回杭州判刑2年。現居杭州，熱心民主運動。

吳高興，42歲，台州供銷學校講師、政治教研室主任，2年。

謝志堅，26歲，秦山核電站技術人員，2年。

王星山，28歲，寧波某醫院職工，2年。

黃志道，24歲，浙江師範大學應屆畢業生，捕前已考取山東大學歐美文學碩士生，2年。

王文彬，2年。浙江長興人。1979年出差上海，在人民廣場得到當時的民間刊物《民主之聲》帶回長興傳播，被判刑兩年。「六四」期間，聲援絕食學生，捐款數千元而被捕，判處勞教3年。

蓋宇峰，26歲，秦山核電站技術人員，1年半。

方醒華，真名方杏華，杭州鋼鐵廠小型軋鋼分廠廠長，清查遭逮捕下獄。杭州鋼鐵廠小型軋鋼分廠廠長。1979年參加民主運動，為當年杭州民間刊物《浙江潮》雜誌社重要成員。「六四」期間，他號召本廠工人罷工，支援北京學生運動，並參與組織杭州市工人自治聯合會。「六四」清查遭逮捕下獄，獲釋後，顛沛流離，莫知所往。

傅國湧，22歲，赴京參加八九民運，3年勞教。

施明軍，30歲，余杭縣農民，阻塞交通罪，5年。

楊澤敏，23歲，浙江電子工學院學生，擾亂公共秩序罪，5年。

王九紅，30歲，擾亂社會秩序罪，3年半。

錢偉，28歲，個體戶，擾亂社會秩序罪，3年半。

湯德法，28歲，擾亂社會秩序罪，3年。

黃強，23歲，杭州9路公車售票員，阻塞交通罪，2年半。

崔建昌：26歲，浙江美術學院學生，擾亂公共秩序罪，2年半。

孫光清，27歲，擾亂社會秩序罪，2年半。

姚華，27歲，浙江工學院教師，阻塞交通罪，2年。

葉堅定，23歲，杭州大學學生，擾亂公共秩序罪，2年。

李寶庫，25歲，浙江大學學生，擾亂公共秩序罪，2年。

徐南南，20歲，浙江農業大學學生，阻塞交通罪，2年。

5. 甘肅省

10年以下1人

丁矛，1968年生，蘭州大學學生。1989年8月被蘭州公安以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拘押。

6. 四川省

無期2人，12年1人，10年1人，10年以下29人。

姜建、冉明，成都人，二人參加八九民運，以打砸搶罪判無期，曾關押省一監，後轉蓬安監獄。

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獲刑者：

雷鳳雲，廣安人，12年，曾關押蓬安監獄，1992年轉省三監。

蒲勇，南江人，10年，曾關押蓬安監獄，1992年轉省三監。1999年出獄後病故。

侯多蜀，達縣人，達縣師專教師，8年，曾關押蓬安監獄，1992年轉省三監。

許萬平，重慶人，遭判8年。

覃禮尚，遵義人，1964年生，西南師範大學物理系學生，5年，關押省三監。

趙明洪，樂山人，5年，曾關押省三監。

劉賢斌，遂寧人，196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87級學生，2年半。



余萬寶，廣元人，1958年生，農行廣元支行副行長，4年。

廖亦武，涪陵人，1958年生，詩人，4年。

李必豐，綿陽人，1964年生，成都青年自治會主席，4年，關押於省三監。

李子金，廣元人，4年，曾關押省三監。

蔣世華，重慶人，4年，關押省三監。

倪凱波，自貢人，3年，曾關押省一監，1992年轉省三監。

唐先全，綿陽人，1962年生，3年，曾關押省一監。

葉林，廣安人，3年，曾關押省一監。

劉平，自貢人，3年，曾關押四川省一監，1992年轉省三監。

張擘，徐州人，四川氣象學院學生，3年，曾關押省一監，1992年轉省三監。

戴林，重慶人，2年，關押省三監。

楊偉，都江堰人，2年，關押省三監。2000年流亡國外，現居加拿大。

廖品華，自貢人，2年，曾關押於省一監。

鍾林，富順人，2年。

楊偉，綿陽人，參加八九民運，3年勞教。

汪世能，綿陽人，參加八九民運，2年勞教。

余小林，三台人，參加八九民運，2年勞教。

汪建輝，安徽人，小說家，1966年生。參加八九民運，1年勞教。

蕭雪慧，西南民族大學副教授，收審近2年

汪成忠，四川社科院，收審近2年，

王林建，四川大學學生，收審1年

韓燕明，四川大學學生，收審1年

吳衛東，四川大學學生，收審1年，

歐陽懿，遂寧人，教師，收審3個月。

7. 山西省

10年2人，10年以下12人。

丁俊澤，山西大學教師，參與八九學運，10年。

胡踐，太原工業大學教師，參與八九學運，10年。

葛湖，山西煤炭幹部學院教師，參與八九學運，7年。

李福發，太原鋼鐵公司的工人，發動工人聲援學生，7年。

王新龍，山西大學政治學系教師，參與八九學運，5年。

秦懷慶，農民，寫打倒共產黨的標語，3年。

李樹平，太原鋼鐵公司經濟員警，張貼北京大屠殺真相傳單，3年。

劉貴平，大寧縣一中老師，對六四大屠殺不滿，寫了一張大字報，2年緩刑。

山西大寧縣黨史辦副主任，反對鎮壓，2年緩刑。

太原運輸四公司一工人喊了一句「打倒共產黨」，關押6個月。

冶金部第13建設公司一幹部在報紙的李鵬頭像上寫了一句：打倒共產黨！收審半年。

太原工業大學一老師，六四後遭通緝，竟還跑到北京全國人大提交抗議，北京市公安局抓人後通知山西省公安廳，押回山西，關押在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1995這位老師的母親收到山西監獄通知，說這位老師因患精神病絕食而死。

任建民，保德縣人，太原工業大學學生，他偶然碰到因受通緝，正在逃亡的老師，就把老師帶到自己哥哥家，告訴老師哪裏也不要，這個院子不會有人來，非常保險。可老師不聽勸阻，跑到北京全國人大抗議。老師被抓後，任的哥哥和父親被縣公安局抓獲，在抄家時發現任給他老師的信，任當即被逮捕。在交了六千塊錢罰款後，父親被放了，但任的哥哥被關六個月。任被關押一年後，以包庇罪，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釋放。

孫麗艷，18歲，太原市煤氣化公司幼稚園臨時老師。太原電視臺播出消息，說孫領人在山西省委門前呼喊反動口號被當場抓獲。她是山西八九民運中第一個被抓獲的「壞人」。從電視上能聽到的反動口號只有一句話：「鄧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孫麗艷說什麼也沒用，被以擾亂社會治安罪名勞教兩年。實際情況是：孫麗艷在山西省委門前觀看學生遊行，馬路對面有人領著喊口號，有人提議這面也找一個人領著喊。幾個小痞子就推舉孫麗艷領著喊，孫麗艷不喊，小痞子們借機在她身上亂摸亂抓佔便宜，她沒辦法只好告饒：你們別碰我，我喊。剛喊了一句，便被攝入鏡頭。

8. 山東省

死刑1人，死緩1人，20年1人，18年1人，17年1人，15年2人，12年6人，11年1人，10年10人，10年以下69人。

孫寶河，濟南人，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縱火罪」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邵良臣，濟南人，1966年生。以縱火罪判死緩。2004年因白血病保外，3個月後去世。

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獲刑者：



張傑，青島人，20年。青島人，住青島市市北區大連路6號。1989年春張赴京參加北京電影學院考試，取得復試資格，就留在北京參加了學生運動，反官倒反腐敗，跟著「北影」同學，穿著印有「北影」字樣的文化衫靜坐，搖旗吶喊。「六四」屠城後，張傑回到了山東青島，被作為「六四暴徒」、詐騙犯抓了起來，判20年。詐騙罪證是其回到青島後，還繼續穿著印有「北影」字樣的文化衫招搖過市、宣傳煽動。對張傑的開庭審判在1989年11月，宣佈張傑的判決則早在1989年10月18日山東省黨委機關報《大眾日報》上：張傑，男，xx歲，無業遊民，家住xx路x號。數罪並罰有期徒刑20年，合併執行18年云。張傑於2000年獲釋與父母團聚。

陳瀾濤，青島人，18年。青島大學海洋系碩士研究生，國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監測中心助理工程師。陳於1989年6月6日在青島街頭設置路障和公開發表5分鐘的演說，譴責當局鎮壓，並宣佈退黨。6月12日陳被青島市公安局拘留，7月21日轉逮捕被正式逮捕，8月23日青島中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陳18年。陳先後被關在北墅勞改隊和山東省第三監獄。獄中，陳學了七、八門外語。2000年獲假釋出獄。2006年移民加拿大。

陳延忠，濟南人，17年。1962年生，青島鋼鋸廠保衛科幹部。1989年積極參與學潮民主運動，是「市民聲援團」的主要組織者。6月5日、6日他還與陳瀾濤、張傑等人到四方機車車輛廠大門口宣傳鼓動工人罷工。幾日後即被捕，以「妨害交通秩序罪」和「流氓罪」判17年，關押在山東萊西北墅監獄。1995年因多種疾病保外就醫。2005年病故。陳延忠臨死前最關注的就是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六四」平反問題。

張宵旭，青島郵電局助理工程師，15年。

王中華，濟南人，以刑事罪判15年。2001年減刑獲釋。

孫維邦，青島人，12年。筆名孫豐，1943年生於青島。1989年春夏之交，孫豐用自己在青島開的小飯店向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提供免費午餐，與學生交談討論時事政局，還向學生捐助了5000元人民幣。「六四」後清查整肅，孫維邦先遭收容繼逮捕，終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獲判12年。1999年假釋出獄。2000年流亡法國，現與妻女居巴黎，撰寫政論文章。

吳旭升，青島人，12年。

牛升昌，東平人，12年。

張本先，青島人，12年，1997年獲假釋。

李海雲，河南駐馬店人，12年。

張士斌，12年，1999年減刑獲釋。

郝勁光，11年，1996年減刑獲釋。

李楠，10年。

孟慶秦，10年。

牛勝昌，10年。

邵日異，濟南人，10年，1997年減刑獲釋。

孟慶秦，煙臺人，10年，1998年刑滿獲釋。

李楠，煙臺人，10年，因折磨精神失常保外就醫。

竇建剛，青島人，10年，1995年保外就醫。

王衍輝，青島人，10年。

王建，青島人，10年。

王立新，濟南人，1970年生，以破壞交通秩序罪判10年。

王在京，青島人，8年，新世紀初病故。

劉濟濰，濰坊人，8年，1997年減刑獲釋。

姜福禎，青島人，8年，1995年減刑獲釋。山東青島人，1956年生。參加過1979年民主牆運動、1989年民主運動，「六四」後獲判下獄8年。1994年出獄，繼續從事民主運動，撰寫政論文章。

牛天民，青島人，7年，1996年減刑獲釋。

秦志剛，濟南人，7年，1995年減刑獲釋。

姜春源，青島人，5年，1993年減刑獲釋。

任仲倜，魚台人，4年，1992年減刑獲釋。

張新潮，濟南人，3年。

劉玉寶，濟南人，3年。

張銘山，臨朐縣人，2年。

車宏年，濟南人，2年。

申貴軍，濟南人，1年。

楊跟東，青島人，以瀆職罪判1年。

楊建國，青島人，青島教育學院教師，遭拘禁近半年。

以其他罪獲刑者：

毛永亮，青島人，7年，1992年獲釋。

王福榮，女，青島人，7年，在濰北勞改農場服刑，不堪折磨，精神失常。26歲，青島鋁製品總廠工人，「市民聲援團」主要組織者，遭判5年，在濰北勞改隊服刑。出獄後，精神錯亂，即或較正常時，有人問起往事，她會像祥林嫂一樣地反復嘮叨一句話：「真的，我不是造謠，死了很多人。」

謝金玉，濟南人，1966年出生。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6年。



史曉東，青島人，5年。

邵凌才，濟南人，1962年生，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4年。

郭剛，青島人，3年。

丁洪江，青島人，2年。

范強勝，青島人，1年。

被勞動教養者47人：

邱豐磊，21歲，青島市公交公司工人，參與市民聲援團和衝擊市政府，勞教3年。邱參加過幾次「市民聲援團」的活動，在所謂「衝擊市政府」事件中，推搡擁擠之際，市府門前的大花盆被推翻砸傷一個人。邱被扣留，是青島市最早被抓捕的市民，判勞教2年。

劉錫文，34歲，青島市南飲食服務公司工人，收聽和傳播美國之音，勞教3年。

傅春雷，20多歲，參與抗暴活動，勞教3年。

韓湧泉，42歲，參與抗暴活動，勞教3年。

馬大生，30多歲，市北區醫院醫生，參與抗暴活動，勞教3年。

王然，20多歲，參與抗暴活動，勞教3年。

王勇，勞教3年。

吳波，20多歲，參與抗暴活動，勞教2年。

劉青松，20餘歲，青島皮鞋廠工人，煽動司機罷工和堵塞交通，勞教2年。

盧振道，42歲，青島外貿食品冷藏廠工人，煽動司機罷工和堵塞交通，勞教2年。

魏孝明，30歲左右，青島市人民醫院醫生，煽動和帶領同事遊行，勞教2年。

李釗，20多歲，勞教2年。

單振衡，20餘歲，北京人，勞教2年。

史曉強，17歲，設置路障，參與推翻1輛汽車，勞教2年。

馬洪賓，不足20歲，設置路障，參與推翻1輛汽車，勞教2年。

溫紅軍，勞教2年。

魏明秀，20多歲，勞教1年。

30人左右，皆濟南籍，在濟南王村勞教。

9. 陝西省

11年1人，10年1人，10年以下29人。

「六四」屠殺鎮壓後，西北大學一些參加八九學運的學生秘密組織了「民主

救國委員會」。1990年春被當局破獲，定為反革命集團案，主要成員被西安市中級法院判刑，他們是：

許建雄，化學系學生，民主救國委員會主席，10年，獄中加刑1年。

張明，成都人，1969年生，中文系學生，10年。

孫正剛，生物系學生，6年。

張紅旗，5年，現打工維生。

王磊，1年零9個月。

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獲刑者：

李貴仁，8年。

馬洪良，西安冶金建築學院學生，4年。

連黨敏，西北大學學生，3年。

薛焰，西北大學哲學系學生，2年。

田豐，西安政法學院學生，2年。

鄭旭光，西安人，北京航空學院學生，2年。

周勃，1965年生，西北大學作家班學員，2年，因認罪態度惡劣，抗拒改造，加刑8個月。

艾東，西安飛機製造公司工程師，3年勞教。

傅升，西安導航研究所幹部，2年勞教。

傅瑜，西安政法學院教師，2年勞教。

安保軍，第四軍醫大學車隊職工，2年勞教。

李庭祿，西北國棉四廠工人，2年勞教。

秦小峰，陝西省糧食學校學生，2年勞教。

白應學，7171廠工程師，2年勞教。

苑建平，西安飛機製造公司工人，1年半勞教。

王進平，西安飛機製造公司技術員，組織遊行，聲援學生，1年勞教，加教1年。

賀國安：西安導航研究所工人，1年半勞教。

白復勳：西安導航研究所工人，1年勞教。

郝若燕：西安制藥廠子弟學校教師，勞教。

趙常青，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生，收審5個多月。

梅林，西安交大機械系碩士生，收審11個月。



湯致平，陝西機械學院機械系學生，收審半年。

林強，西安交大建築系碩士生，收審6個月。

高軍生，《人口報》記者，收審數月。

鄭保和，西安市第91中學教師，收審數月。

韓銳，陝西省政府經貿委幹部，收審數月。

李貴仁，陝西華嶽文藝出版社副總編，1989年因組織懸掛大幅標語、遊行示威和罷工抗議，以及要求罷免李鵬、楊尚昆等人，遭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8年。1994年因病保外就醫，出獄後以校對文稿為生，不改初衷，繼續從事民主運動。

10. 貴州省

15年2人，10年以下33人。

陳勇，以「打砸搶罪」判15年。

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獲判者：

歐宗佑，46歲，貴陽文化個體戶、中山西路個體勞動者協會主任，15年。越獄成功。

馮剛，貴州電視臺著名播音員，5年，1991年獲釋。

伍偉松，畢節地區工作，5年。

曾寧，1967年生於湖南新寧，4年。

夏春龍，織金縣2中高中生，4年。

覃禮尚，1969年生，北京某高校學生，4年，

蔣天擎，黔西縣，4年。

陳西，1954年生，貴陽市金築大學政工幹部，3年。

杜和平，1954年生，個體戶，3年。

王順林，1961年生，貴州省委黨校理論研究所教師、律師，3年。

郭忠明，1961年生，貴州省某校老師，3年。

蔣錄剛，1956年生，個體戶，貴陽「工自聯」負責人，3年。

何萬春，貴州工學院向陽機械廠，2年。

張新佩，1950年生，貴州省高原科學諮詢公司經理，2年。

盧兆祥，1954年生，個體戶，貴陽「工自聯」負責人，管制1年半，獄中執行。

廖雙元，1953年4生，貴陽市軸承廠公安處工作，勞教3年。

薛占平，1959年生，公司負責人，勞教3年。

王軍，1964年生，詩人，勞教3年。

曾實，1954年生，重慶《實業家》報記者，參加貴陽沙龍聯誼會組活動，勞教3年。

彭文剛，1972年生，學生，勞教3年。

孫亞丁，1960年生，地質隊工人，勞教3年。

王天元，1970年生，貴州工學院土建系學生，勞教3年。

周碧菊，女，1969年生，貴陽市花溪區石板鄉農民，勞教3年。

張為，1971年生，學生，勞教1年。

李斌，1970年生，臨時工，勞教3年。

趙利軍，1965年生，貴陽雲馬飛機製造廠攝影師，勞教3年。

譚新民，1968年生，學生，勞教2年半。

宿非，1964年生，貴陽永躍廠工人，勞教2年。

李政，1969年生，貴陽南明皮鞋廠學工，勞教2年。

季風，1962年生，貴州大學中文系學生，貴州省「高自聯」副主席，勞教2年。

覃波，1970年生，貴州工學院地質系學生，勞教2年。

陳天，貴州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生，校「高自聯」負責人，勞教2年。

徐克倫，1968年生，遵義某校學生，以「傷害罪」判2年。

曹志榮，1965年生，待業青年，以「破壞公物罪」勞教1年半。

11. 廣東省

10年1人，10年以下8人。

陳志祥，廣州海員學校教師，六四後，在廣州書寫巨型抗爭標語，10年。

陸子斌，河南外貿廳駐廣州辦事處負責人，為遊行學生起草檄，5年。

劉東華，四川人，中山大學物理系職工，為廣州學潮發起人組織者之一，3年。

易丹軒，湖南人，廣州商學院企管系87級，廣州市高自聯副主席，2年。

陳衛，女，中山大學大氣科學系85級本科生，收審1年半。

于世文，中山大學哲學系86級本科生，收審1年半。

王連平，華南師範大學碩士生，收審半年。

張宇，中山醫科大學85級本科生，收審。

余厚強，華南理工大學本科生，收審。



12. 安徽省

10年以下5人。

張林，蚌埠人，六四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2年。

馬糧綱，合肥人，六四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2年。

馬少方，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生，3年。

李克洲，中國人民大學碩士研究生，3年。

孫向東，黃山人，6個月。

13. 江蘇省

10年以下2人。

陳學東，南京某高校學生，2年。

齊治平，南京某高校學生，2年。

14. 吉林省

20年1人，10年1人，10年以下8人。

唐元雋，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20年、唐1957年生於長春，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6月10日，唐與另外5人在長春被捕，以「組織反革命集團」、「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20年。唐元雋不服判決，堅持上訴申訴。1997年吉林省高院破天荒推翻了長春市中院判決，判定「組織反革命集團罪」不成立，改判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8年。2002年10月，唐跳海泅渡到金門大擔島，向臺灣當局尋求政治庇護。唐現居美國紐約，積極從事民主運動。

遲壽柱，吉林市工人，10年。

冷萬寶，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8年、

李維，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5年

梁立維，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工人，5年，

何振青，參加八九民運，5年。

安福興，吉林省人，成立「民主社會主義同盟」，5年。

司偉，吉林通化人，反對六四屠殺，4年。

王貴生，山東人，被判刑3年。

李靜娥，吉林省人，成立「民主社會主義同盟」，3年。

15. 遼寧省

13年1人，10年2人，10年以下109人。

魏壽忠，瀋陽人，因阻攔軍車前往北京，13年。

肖斌，大連人，10年。大連塑膠機械廠供銷員，「六四」前到北京出差，「六四」後在北京街頭接受美國CNN有限電視網記者採訪，用誇張的語言，講述天安門流血事件，在全世界影響很大。中央電視臺轉播了有關他的錄影。6月10日肖斌返回大連，遭人舉報，6月14日被捕，數天后遭大連中級人民法院判刑10年，關押在遼寧省凌源監獄。1994年肖獲准保外就醫。肖至今仍在在大連公安國保24小時嚴密監控之下，不許他出國或接觸海外媒體。肖以做小生意維生。據知肖保持用短波機收聽外台的習慣，確信「六四」總有一天會平反，他亦將恢復名譽。

趙軍路，遼寧丹東市人。10年。

徐佰泉，鐵嶺市農民，8年。

田曉明，丹東市工人，7年。

劉允伸，遼陽市中學英語教師，4年。

閻興安，撫順市工人，4年。

李樹深，錦西市工人，4年。

李德軍，本溪市中學教師，3年。

6月30日，103名「打砸搶動亂分子」遭處勞動教養。

2007、6、4 - 2009、4、15初稿，多次補稿，5、22仍為未定稿

黃河清 於馬德里



後記

《六四底層列傳》自5月初在美國《縱覽中國》網路雜誌首發後，海內外許多網站和個人博客予以轉載。筆者收到許多贊同、鼓勵的電話、郵件和新的資料線索。最多的提示是有關「六四」後底層民眾遭抓捕判刑入獄者的情況。電腦網路上也不斷出現底層受難者新的訊息。

底層民眾之付出、之勇毅、之義薄雲天少有甚至沒有人知人議，之冤屈、之苦難則延續至今。他們的遭冤受難，其罪魁禍首，自是黨與政府；他們的湮沒無聞，精英學子、名人學者、黑手君子以及我們整體難辭其責其誤也。此情此況，自古皆然，近六十年來尤甚。不改變，沒希望；欲改變，賴自身。筆者乃永遠底層人，既悟此理，端付實施。因作此六四底層列傳。願吾底層同仁深悟徹悟，自贖自救，自立自強，自主自由。

茲補寫《六四底層列傳》中「『六四』後遭抓捕、判刑受難死難者」一節，從原來的233人增補至1196人。當然仍舊會有錯漏，祈批評指正，補充完善。

借此機會，對撰寫中的一些問題作一簡要說明，也是回答許多讀者的詢問和質疑。

一、英雄譜所列，非獨純是個人看法，且亦掛一漏萬。無論列或未列、當或不當，皆祈諒解。

二、收錄入傳的第一原則是力求真實。必須有時間、地點、人物、單位、籍貫、何處人、家址、年齡、姓名、在何處

死傷、如何死傷、醫院名稱、什麼法院判的、以何罪判的、刑期、現況……諸全部要素或部分要素；可據此查證，或者說是有可資查證的前提條件因素，最大限度地摒除可能的偏差、訛傳甚或造假。也有個別只有姓名的，一般都是出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搜集的名單。這是將天安門母親搜集的名單視為權威了，視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於「六四」死亡傷殘名單上不獨是認真負責的，也是正確的；一時缺乏必要的資料一定是一時絕無法搜集到。即使如此，也很謹慎，有所選擇。

三、在當前的條件下，無法將官方或個人的、網路的資料視為權威。我們只有自己根據具體情況來判斷、來確認、來確定，來創造權威。一般不注明出處也是因此。注原始出處用處不大，都是網路的、個人的，難以證實這就是真的。你真要落實是否真的，唯有據所提供的時間、地點、人物諸要素去查證。筆者注意到丁子霖的名單上一般都會注明在何地火化、骨灰存放地，恐怕也是因此之故。天安門廣場上400-500名不明下落者群體就筆者所見，只有吳仁華的書提及，故注明了出處。

香港新出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一書，作者據稱是前新華社新聞部主任張萬舒，提及「六四」死亡人數，援引當時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的話說：727人，其中學生和群眾713人，軍隊14人。張萬舒的說法可作參考，但不能完全採信。他說的軍人死亡數14人錯了。筆者在《六四軍人列傳》中列出軍人死亡18人，其中「共和國衛士」死亡者就有15名。這個數字是大陸完全公開很容易查到的，張都錯了。大陸異議人士江棋生新發表的《1989年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中說：1989年6月4日，北京紅十字會披露的死者數字，為2600人左右。所援引者同一，相差竟如此之大！至於袁木、張工、遲浩田、陳希同、李鵬、江澤民、鄧小平，國務院、戒嚴部隊所說的更難以為憑了。可見可證無論官方、



半官方或是民間的說法，都不能或難能視為完全的權威。在檔案未披露，真相未大白之前，我們自己來創造權威，產生權威。只能如此！

《六四底層列傳》確實是拋磚引玉。現在網上有越來越多底層受難者的訊息。列傳兼具歷史資料和報導性兩種功能、性質。在此之前，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資料，有澳大利亞孫立勇的資料，有中國人權的資料，有吳仁華的資料，以及其他許多資料；在此之後和同時，有武文建的資料、有湖南劉先生的資料，有上海孫女士的資料，有胡亦廣的資料，有艾鵠的資料，有姜福禎的資料，有陳立群的資料，有博訊記者莫默的資料，有香港支聯會的資料，有江棋生的資料……筆者相信，還會繼續有的。我們需要盡力補充完善它，但恐怕是一定做不到的。筆者從開始到現在，已補充修改了不下10次。接下去還需要繼續補充修改。要使它成為完備的準確的史實資料，必須是六四真相大白之後的事。列傳之磚引出了越來越多的玉，或正是兌現了部分使命，聊可自慰了。筆者將會盡力繼續補寫。

謹向大陸天安門母親群體、武文建先生、劉先生、孫女士、姜福禎先生、江棋生先生和孫立勇先生、莫默先生、艾鵠先生、胡亦廣先生、陳立群女士、香港支聯會、中國人權致謝。尤其要感謝香港蔡淑芳女士，她二十年如一日，為「六四」受難者號呼的執著和奉獻精神深深地感動和鼓舞了我。

黃河清

2009年5月24日午夜 於 馬德里

六四軍人列傳

黃河清 編錄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發生的「六四」鎮壓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決策者是鄧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執行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

1989年5月17日晚，在鄧小平北京寓所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5名常委對北京是否戒嚴投票表決，李鵬、姚依林贊成，趙紫陽反對，喬石、胡啟立棄權。5月18日，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主持中央軍委會會議，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遭排除；會議討論決定了戒嚴部隊的組成。戒嚴部隊指揮部由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總參謀長遲浩田、北京軍區司令周衣兵組成，劉華清任總指揮。

戒嚴部隊由解放軍以下部隊組成：陸軍第38集團軍、24集團軍、27集團軍、28集團軍、63集團軍、65集團軍（隸屬北京軍區），空軍第15空降軍（隸屬廣州軍區），第23集團軍、39集團軍、40集團軍、64集團軍（隸屬瀋陽軍區），第20集團軍、26集團軍、54集團軍、67集團軍（隸屬濟南軍區），第12集團軍（隸屬南京軍區），北京軍區炮兵第14師，北京衛戍區警備部隊，武警北京市總隊，天津警備區坦克師。總計20至25萬人。除第54集團軍外，其餘部隊都在6月3日21時開始陸續接到開槍鎮壓的命令。

戒嚴部隊從總指揮、軍長到士兵，在這一場曠古未聞的軍人「征伐」平民的戰爭中，表現不一，遭際有異。有心懷悲憫，不願屠民而抗命者；有以服從為天職，堅決執行命令者；有以坦克碾人為樂殘民以



遲全無心肝者；有被憤怒的市民痛毆致死者……。

茲擇其著者略記，所據是中共公開報導、講話和出版的書籍以及海外公開出版物和網路。不一一注明出處。已昭示天下者觸目驚心，然只是極有限的一部分。歷史將記住這些人和事，善人、惡人、好事、壞事。歷史絕不會背著「六四」走過去。「六四」解放軍鎮壓屠殺平民百姓和學生的真相完全徹底大白於天下，有賴檔案解密，有待當事者、知情者吐實。

限於條件和水平，多有錯失遺漏，不過以聊勝於無自勉，期有心人知情者指正補充完善。

「六四軍人列傳」總目

上將劉華清、上將遲浩田、少將張工（「平暴」指揮者）

上校羅剛（指揮坦克碾死11人者）

大校佟大剛、大校謝雙喜、軍士趙斌（在長安街疑軋死、傷多人後受學生保護免死者）

上尉李勃（開332號裝甲車第一個殺進天安門廣場者）

中校軍官（近距離用手槍對準學生連射3槍者）

少將張美遠（率38集團軍率先殺進天安門廣場者）

少將左印生（率15空降軍從南面率先殺進天安門廣場者）

少校趙勇明（率偵察隊搗毀廣場高自聯指揮部者）

18名軍人的死亡

中將徐勤先（抗命不從者）

大校許峰（躲藏變相抗命者）

少將何燕然、少將張明春（變相抗命者）

第28集團軍官兵抗命

少將傅秉耀（請士兵將槍口抬高者）

少將吳家民（請士兵將槍口抬高者）

上士齊金貴（「六四」後投寄抗議信遭判2年者）

士兵汪全勝（遭民眾毆打致瘋者）

穿便衣的戒嚴部隊小兵（受廣場特別糾察隊負責人保護者）

第39集團軍116師高炮團1營2連「抓暴徒」

第39集團軍116師高炮團6連某排排長「崔博士」

佚名戰士（用高射機槍打跑傳達軍委首長命令的直升飛機者）

第12集團軍一名戰士的信（配備130發子彈）

中尉李曉明（講述親身參與「平暴」經歷者）

宣傳幹事張世軍（「六四」後遭勞教，發表致胡錦濤公開信遭抓捕者）

張愛萍、蕭克、楊得志、李聚奎、葉飛、陳再道、宋時輪7上將與羅點點（聯名上書者）

劉華清，湖北大悟人，1916年生；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戒嚴部隊總指揮。1989年6月4日中午12時半左右，一架軍用直升機飛到木樨地28軍受阻部隊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復播講：「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堅決還擊」一般被解讀為「開槍」。這架直升機是戒嚴部隊總指揮劉華清派來的。「六四」後，劉華清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遲浩田，山東招遠人，1929年生，中央軍委委員，1989年北京戒嚴部隊指揮部三巨頭之一。「六四」後升任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1996年遲浩田以國防部長身份訪問美國，在美國國防大學講演結束時，該校學生就1989年「六四」屠殺學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質詢，遲浩田回答說：「我當時作為解放軍總參謀長，我在這裏可以負責的、認真的回答朋友們。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出問題就出在東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點問題，就是有點推推撞撞。」遲浩田在《戰爭離我們不遠，它是中華世紀的產婆》的內部講話公然宣稱對美國「清場」時，要將在美國的幾百萬華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這些人受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太深，如果留下他們，今後還要搞運動改造……。遲嘲諷反對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人「太迂腐，太不講實際了。中國人不殺中國人，我們怎麼能解放全中國。」

張工，山西原平人，1935年生；時任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戒嚴部隊發言



人。張工在戒嚴部隊鎮壓屠殺平民學生的全過程中不斷對外發言：解放軍戰士如何遭到暴徒毆辱毒打殺戮、如何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如何忍無可忍奮起還擊，如何沒有殺死一個平民學生云云。張工是解放軍內的「袁木」。「六四」鎮壓屠殺翌年7月，張工軍銜由少將晉升為中將，擢任北京軍區政委，1998年晉升為上將。

「六四」開槍命令究竟誰下，至今無人承認。公開的說法撲朔迷離。中共文職以至軍人上下，從決策者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姚依林以及陳希同和坐鎮指揮的劉華清、遲浩田、周衣兵、張工諸人，沒有一個對此承認或說明。

羅剛（指揮3輛坦克在六部口追逐碾壓11人死亡者），陸軍第38集團軍坦克第6師上校團長。1989年6月4日清晨，羅指揮三輛坦克在北京六部口追逐碾壓學生至11人當場死亡或成肉醬，傷者眾，未能統計；現查明姓名單位者死5傷9。部分死難者是被這三輛坦克擠死的。他們在坦克到達前已經緊急躲避，有的已經越過綠色尖頭鐵柵欄，有的雖然來不及或無力越過綠色尖頭鐵柵欄，也已經緊貼在綠色尖頭鐵柵欄旁，騰出了路面；可是，其中一輛坦克並不照直前行，而是故意掉頭擠倒路邊的綠色尖頭鐵柵欄，衝上人行道，把這些學生活活擠死在綠色尖頭鐵柵欄處，然後又猛地掉轉頭，甩倒幾名學生。羅剛事後著文「紅牆外的較量」，宣揚自己在六部口指揮坦克鎮壓「暴徒」的功勞。該文收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的《戒嚴一日》書中。

佟大剛、謝雙喜、趙斌和003號裝甲車（在長安街疑軋死、傷多人後受學生保護免死）

佟大剛，38集團軍112師大校副師長，46歲；

謝雙喜，北京軍區裝甲兵部大校副部長，48歲；

趙斌，003號裝甲車專業軍士駕駛員。6月4日凌晨1時許，003號裝甲車在長安街上橫衝直撞耀武揚威疑軋死傷多人後，開到了天安門城樓東側觀禮台附近卡住了，只能在原地轉動，無法行進。憤怒的民眾一擁而上，先是用棍棒撬鐵蓋，繼而用棉被蒙鐵蓋燒。大火燒了十餘分鐘，佟大剛、謝雙喜在裝甲車裏忍受不了高溫，先爬出來逃命，接著駕駛員趙斌也爬了出來。憤怒的民眾圍住佟、謝、趙毆打出氣。有人勸阻無效。十餘名學生迅速擠了上去，挽手成一個包圍圈，將3位軍人圍在中間，還有學生緊緊抱住已被打得頭破血流的軍人保護，苦苦勸說在場的民眾冷靜：不要傷害軍人，他們只是奉命行事。好幾位學生被憤怒的民眾誤傷而血流滿面。佟、謝、趙3軍人在學生的保護下被送到了廣場北京紅十字會臨時急救站，得以保全性命、治療毆傷。

6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登「『共和國衛士』精神永放光彩」文章，其中有對佟大剛、謝雙喜和003號裝甲車的描述：「某師副師長佟大剛大校和某部裝甲兵副部長謝雙喜大校，乘坐首長車隊向天安門廣場開進，因後面車輛受阻，他們單車英勇前進，先期抵達廣場，對暴亂分子起了震撼作用。在掉轉車頭準備接應後續部隊時，裝甲車突然熄火，暴徒蜂擁而上，有的砸車，有的點火，這兩位領導幹部先後下車，宣傳群眾，揭露暴徒，慘遭毒打，身負重傷。」

佟大剛自己撰文 浴血金水橋（文載《戒嚴一日》書，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1989年11月），其中引用003號裝甲車駕駛員趙斌的回憶文字曰：「突然正前方二百米處從路旁竄出兩個人，拖起一個隔離墩直朝我車跑來，我先是一怔，怎麼辦？躲，對方也會左右移動，隨車而變化。倒不如……我加大油門，方向絲毫不變，逕向前衝。每隔十餘米路上就有一處路障。我開動腦筋，正確分析，果斷處置，能撞則撞，能軋則軋。說心裏話還是躲得多。因為每撞一個障礙物，像崗亭、油桶什麼的心裏就一陣難受，為國家的財產而可惜。」「六四」後，佟大剛升任北京軍區副總參謀長，授少將銜。

李勃（開332號裝甲車第一個殺進天安門廣場者），38集團軍112師技術部修理科上尉助理工程師，北京人，1961年生，1976年入伍。6月4日凌晨率322號裝甲車第一個挺進天安門廣場。1989年7月27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中校軍官（用手槍對準學生連射3槍者），6月4日凌晨2時許，戒嚴部隊一中校軍官在天安門城樓東側觀禮台前率隊開槍打死了許多人。天安門學生糾察隊長張健（北京體育學校學生）目睹同學中彈倒下，情緒異常激動，撩起體恤衫，露出胸膛，對著距離約10米的這個中校軍官高喊：「我們都是學生，我們沒有武器……我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糾察隊員的頭，要殺就先殺死我！」中校軍官聞聲舉起手槍，連開3槍，兩槍擊中張健。張健未死未倒，強撐著盯著中校軍官近半分鐘，再喊：「你再開一槍，你再來！你沒有將我打倒，你再來！」

張美遠（率38集團軍率先殺進天安門廣場者），38集團軍少將副軍長。在軍長徐勤先抗命後，張美遠受命率軍進京「平暴」。38集團軍軍史記載：「面對暴徒的打、砸、搶、燒、殺，指戰員們英勇無畏，以步代車，人護車行，突破了12個路口，排除了暴徒設置的由燃燒的汽車、電車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長的密集路障，歷經4個小時的艱難奮進，於6月4日1時30分到達金水橋一線，作為成建制的集團軍，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集團軍1萬零8百名官兵、45輛裝甲車在清場前開進到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沉重地打擊了暴亂分子的囂張氣焰，摧垮了他們的西部防線，震懾了盤踞在廣場的頑固之徒，為取得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張美遠在「六四」後升任軍長，授中將銜。第38軍大批官兵立功：8人「共和國衛士」、4人「衛國勇士」、27人一等功、131人二等功、1311人三等功。

左印生（率15空降軍從南面率先殺進天安門廣場者），15空降軍副軍長。幾乎與38軍同時，15空降軍經由永定門、宣武門、珠市口、前門從南面殺進了天安門廣場。15空降軍屬於解放軍中最精銳的部隊，武器裝備最先進。在向天安門挺進的過程中，一直以班為單位，形成一個方陣，人手持槍，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號，殺氣騰騰，開槍挺進，沿途打死打傷



許多民眾。從珠市口到前門這一民居密集、地形複雜、民眾攔阻最頑強的地段，15空降軍毫不留情、兇悍異常地以密集的槍彈開路，僅僅15分鐘就殺到了前門，先頭部隊於6月4日凌晨1時25分挺進天安門廣場東南部。15空降軍殺進天安門廣場後，繼續開槍殺人。已查實者，北農大園藝系研究生戴金平就是被15空降軍槍殺在廣場東南部毛主席紀念堂附近。

15空降軍副軍長左印生、副政委田瑞昌、43旅旅長李家洪、43旅旅政委趙金奎、44旅旅長武運平、44旅旅政治部主任樊友義，在「六四」後皆得升遷。

15空降軍和38集團軍是「六四」鎮壓屠殺學生市民最兇狠的虎狼之師。

趙勇明（率偵察隊搗毀廣場高自聯指揮部者），27集團軍司令部偵察處少校參謀，江蘇南通人，1957年生，1976年入伍。奉命率領偵察分隊搗毀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高自聯指揮部。1989年7月27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18名在「六四平暴」中死亡的軍人，有15人被國務院、中共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中共在北京開表彰大會，請來了他們的父母妻子家屬，鄧小平、楊尚昆、李鵬、劉華清、遲浩田諸政要接見慰勉有加。中共下令中央各部門、國務院政府各部門、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大張旗鼓地勞軍慰問。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3位「共和國衛士」的畫像和雷鋒、賴甯等英雄人物一起，張貼在全國各中小學教室裏。未幾，各學校受令撤下畫像，不再張貼。他們的「平暴」英雄事迹也不見再行提起，宣傳部門、媒體奉令不再宣傳、舉辦紀念活動。15名「共和國衛士」的死亡全部在6月4日凌晨後，也就是說是在6月3日21時戒嚴部隊開槍鎮壓屠殺了大批學生市民後。18名軍人死亡者的原因無論是憤怒群眾的報復性毒打，還是自傷或意外，他們都是「六四」鎮壓屠殺祭壇上的犧牲。願他們的亡靈安息。

18名軍人的死亡

39集團軍116師某部戰士某，該名戰士在由山海關向北京進軍「平暴」途中，給連長買汽水，被自己的軍車撞死。「六四」後，該戰士被授予「烈士」稱號。

39集團軍116師高炮團1營2連戰士某，該名戰士於6月7日隨部隊從天安門廣場撤離後，駐在朝陽區一所小學校內，一名士兵在駐房內擦槍走火，將他打死。團裏報告上級說是被「暴徒」打黑槍打死的。該戰士被授予「烈士」稱號。

陳XX（第一位「共和國衛士」），某軍宣傳幹事，5月22日乘坐軍車撤退，攔阻的群眾歡呼時陳幹事揮手致意。因軍車突然發動，陳幹事被摔下車致死。當時各報都做了如實的簡短報導。兩天後中央軍委突然授予陳XX以「共和國衛士」稱號。陳XX成了1989年「六四平暴」第一位「共和國衛士」。軍報改口報導他是被群眾擁擠的人流擠到車輪下致死。當時引起學生方面強烈抗議。

劉國庚，63集團軍通信團4連1排少尉排長，山東萊陽人，1964年生，1983年入伍，1987年畢業於重慶通信學院。6月4日凌晨5時許，劉在長安街電報大樓對面，被群眾打死，腸子被劃出，屍體遭焚燒。民間說法：劉國庚用手槍打死4人後被市民圍住打死，屍體被焚燒。1989年6月30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崔國政，39集團軍116師347團炮兵營榴炮2連6班下士戰士，1968年生，1987年入伍。官方報導，崔於6月4日凌晨4時40分犧牲於北京崇文門天橋。崔始被群眾圍住毒打，其中「暴徒」趙耀堂「掏出一把長約15公分的水果刀上前亂刺」，「趙身邊一個穿皮夾克、身高1.80米左右、操北京口音、約20歲男青年，……趙與那名暴徒一起往崔國政身上倒汽油。……趙用火柴點著了崔國政的褲子。約10分鐘後，因繩子燒斷，崔國政掉在橋下，昏死過去。」民間說法：崔國政與同夥在崇文門天橋上利用有利地形打死打傷多名群眾，後被憤怒的市民抓住處死，屍體被焚燒並懸掛於天橋上，其同夥逃脫。1989年6月30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李國瑞，武警北京總隊2支隊1中隊通信班上等兵，內蒙古赤峰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4日凌晨在阜成門一帶掉隊，5時許，被群眾打死在阜成門立交橋上。1989年7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王其富，38軍炮兵旅5營營部無線班下士班長，安徽嘉山人，1968年出生，1986年入伍；

李強，38集團軍炮兵旅5營2連1班上等兵，西安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

杜懷慶，38集團軍炮兵旅5營2連3班下士戰士，河北清河人，1967年出生，1985年入伍；

李棟國，38集團軍炮兵旅5營2連4班下士副班長，安徽嘉山人，1968年生，1986年入伍；

王小兵，38集團軍炮兵旅5營2連4班上等兵，西安人，1968年生，1987年入伍；

徐如軍，38集團軍炮兵旅5營3連有線班下士班長，安徽嘉山人，1967年生，1986年入伍。

王其富等6人，都隨部隊參加北京「平暴」。6月4日凌晨1時許，他們乘坐的軍車在西長安街翠微路口轉彎時因車速過快翻車導致油箱爆炸，「我們10名戰士全被車上的防爆器材砸在車裏。車廂前頭的5名戰友都被死死地砸在車底擠在一起。一點也不能動。」6人身亡。後來軍人收屍時用鐵鏟鏟他們的屍體，引發圍觀群眾強烈指責收屍不人道。1989年6月30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予王其富等6人「共和國衛士」稱號。稱他們：6月3日晚9時，上級命令炮兵旅迅速派出人員去運送防暴器材，王其富等10名戰士乘坐一輛軍車前往天安門執行任務，車行至翠微路口時被「暴徒」攔截，遭投擲石頭、燃燒瓶、火把，油箱爆炸，其中6名戰士壯烈犧牲。

馬國選，54集團軍162師炮兵團6連代理排長，河南人，1967年生，1985年入伍。6月4日凌晨1時許，馬重傷於菜市口附近，送往武警醫院搶救無效死亡。1989年6月30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王錦偉，54集團軍某團後勤處戰勤中尉參謀，河南太康人，1963年出生。6月4日凌晨王被冷槍打死在南新華街一帶。1989年6月30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劉艷坡，武警北京總隊1支隊1中隊列兵，河北襄城人，1971年生，1989年入伍。6月4日凌晨2時許被群眾打死在北京人民醫院門口。1989年7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于榮祿，39集團軍政治部少校宣傳幹事，1967年生，1989年6月4日凌晨犧牲於赴廣場採訪途中。1989年7月27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民間說法：于榮祿違反部隊規定，自行脫下軍裝，換上便衣前往天安門廣場拍攝戰友「平暴」照片，遭戒嚴部隊誤以為學生平民拍照而射殺。

臧立傑，39集團軍115師某團7連2班戰士，黑龍江嫩江人，1969年生，1987年入伍。6月7日10時許與同伴乘軍車路過建國門時被外交公寓裏精確的遠距射擊擊中面部身亡，大批軍隊隨即包圍並掃射外交公寓。翌日，各國大批外交人員和家屬離京返國。1989年7月27日，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王景生，39集團軍某團1營1連3排排長，河南南陽人，1966年出生，1984年入伍，1988年畢業於石家莊陸軍學院，1989年7月4日因勞累過度病故。1990年2月11日，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簽署命令，授其「共和國衛士」稱號。

徐勤先，中共第一王牌軍38集團軍中將軍長。1989年駐軍保定，學潮期間，受命率軍進京「平暴」。徐勤先因病住院抗命，「這個兵我不能帶」，拒絕在調兵令上簽字。六四後，徐勤先被判處5年徒刑。在軍事法庭上，徐說：「人民軍隊從來沒有鎮壓人民的歷史，我絕對不能玷污這個歷史。」「不是人民的罪人，就是人民的功臣！」徐勤先獲釋後與友人李銳相往還。徐70歲時邀李銳來居所相聚。李銳贈徐手書壽聯：「傲骨虛心真力量，熱腸冷眼大慈悲。」此壽聯以「勤先同志」上款收錄2007年浙江出版的李銳來居所聯選集中。徐勤先現居石家莊。有說刑期非5年，獲釋後患病，現已亡故。

許峰，第39集團軍116師師長。1989年北京學潮期間，奉命進軍北京城區「平暴」。許峰消極抗命，拖延行進。許峰曾化裝進城到天安門廣場察看情況，回來後對部下說：「現在收不到上級指示，你們也不用找我了。」116師除1個團外，其餘各團6月5日才到達天安門廣場，還是在其他部隊的押解下。

何燕然、張明春，第28集團軍軍長、政委。1989年北京學潮期間何、張奉命率軍進城「平暴」。何、張消極抗命，拖延行進。6月4日清晨部隊尚在西長安街木樨地，遭民眾攔阻，不強行挺進而順勢停滯不前。28軍在六四屠戮中普遍抗命，比較溫和，同何燕然軍長、張明春政委的態度有關。

第28軍官兵抗命

1989年6月4日上午，奉命進北京城鎮壓學潮的28軍在西長安街木樨地一帶受到民眾阻攔。該部隊官兵不相信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凌晨發生屠殺，強調「人民軍隊絕不會向群眾開槍」。一些年輕人跑到附近的復興醫院，高喊著：「要血衣，要血衣，28軍官兵不相信軍隊會向群眾開槍。」這些人很快從復興醫院拿到很多血衣給28軍的官兵送去。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28軍官兵，軍心渙散，許多戰士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槍枝扔到了護城河裏。靠近木樨地立交橋約有七、八十輛車的軍人全都下了車，棄車而不顧。

傅秉耀，第39集團軍軍長。1989年北京學潮期間傅奉命率軍進城「平暴」。傅接到可以採取一切措施的命令，並得知其他部隊已經開槍後，在戰前動員大會上說：我這個老兵也是第一次遇到今天這種情況，我請求大家把槍口抬高一點。

吳家民，陸軍第40集團軍軍長，據該軍118師一名戰士說，吳家民在向部隊下達挺進北京城的命令時，親自訓話：「我活了50多歲，第一次指揮這樣的軍事行動。軍令如山，不過，弟兄們，我求求你們，進城的時候，無論遇到什麼情況，請把你們的槍口抬高一寸。」

就已經知道的軍人挺進北京殺人情況，至今未有第40集團軍開槍殺人的具體案例。

齊金貴，解放軍駐雲南部隊某坦克團上士播音員，「六四」後以「中國人民解放軍普通一兵」的名義，書寫了十多封抗議信，寄給各級政府機關。遭軍事法庭判處兩年監禁，關押在雲南省第二監獄。流亡法國的詩人艾鴿最近著文披露這一史實，艾鴿說：齊金貴對他說過「我也是軍人，如果派我去執行戒嚴，我死也不會對著自己的兄弟姐妹開槍。」

汪全勝，第38集團軍某部戰士，祖籍湖北，1969年生於長沙，獨子，有4位姐姐。1989年汪參加北京「平暴」戰鬥，遭憤怒群眾毆打致腦震盪，獲中央軍委嘉獎，參加「平暴英雄事迹報告團」；汪父母受到省軍區首長接見，4個姐姐由臨時工轉正。汪自己因腦震盪後遺症時發，經常神志不清，胡言亂語；談過幾次戀愛，都沒成。現在是徹底瘋了。2008年有海外原鄰居友人返國欲探望汪，遭有關部門阻止。

穿便衣的戒嚴部隊小兵。戒嚴部隊和公安、國安系統在鎮壓屠殺前，派出了大量的化裝便衣特務混入學生和市民中。6月3日晚6時許，一名穿便衣的軍人被送到了廣場紀念碑特別糾察隊處。這名軍人由於沿途受到憤怒的學生和市民的嚴厲譴責，驚恐萬狀，雙目失神，臉色慘白，語無倫次，失去常態，但是全身上下全好無損，沒有任何傷痕。特別糾察隊負責人、人民大學教師吳仁華將這名軍人安置保護在最高層西南角的一個帳篷裏，與憤怒的學生和市民隔離，並請來了



醫生幫他穩定情緒。從便衣的口袋裏找到了士兵證件，便衣便無從再否認了。在對他講述了一番真相和道理後，吳仁華委託醫生伺機用救護車將這名便衣特務安全地送出了廣場。

第39集團軍116師高炮團1營2連「抓暴徒」。「六四」之後，2連駐守在北京市朝陽區一所小學，就在朝陽區「抓暴徒」和「圍堵通緝犯」。一位街頭擺攤賣冷飲的老太太，罵他們是「法西斯部隊」，即被當作「暴徒」抓了起來。2連因此多增一份功勞。

第39集團軍116師高炮團6連某排排長「崔博士」，軍校出身的下級軍官，對六四「平暴」不滿，在部隊中講了一些批評政府的話，並在6月中旬開小差回了遼寧海城。六四後遭處理回家。

佚名戰士。1989年6月4日中午12點半左右，一架軍用直升機飛到木樨地28軍受阻部隊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復播講：「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時，這位佚名戰士開著裝甲車，用車上的高射機槍向播講命令的軍用直升機掃射，將其打跑了。

第12軍戰士的一封信

「六四」時一位高中學生在近十年後，披露當時戒嚴部隊第12軍一位戰士的信。摘錄如下：

SM：

我們前往北京時乘的飛機是中國民航和中國聯航，到京後就住在南苑機場。因為我們是第二梯隊、後備軍，主要任務是控制整個戒嚴部隊的，哪裏需要人時就上哪裏。當時參加戒嚴的部隊也不是很穩定。他們好多在我們沒到時，只有幹部有子彈，正、副班長有5發子彈，其他人根本就沒有發子彈。我們到後他們每人發10發子彈，而我們每人卻發了130發子彈，並有命令是在執行任務中可以開槍掃除一切有礙於我們完成任務的人。當然大家的心情也很複雜，只是緊張而不是害怕。對我們來說並不怕，不像其他部隊沒有命令不准開槍射擊，我們接到的命令是可以開槍射擊任何你所看不順眼的人。當時若我們12軍上了，肯定會血洗北京城。這是沒說的，因我們是中央軍委的鐵拳，不到萬不得已的情況根本不會讓我們上去。

南苑機場是整個戒嚴部隊的大本營。最早到京的是38軍，最晚到的是我們軍，6月4日到。本來5月20日我們軍就到了，但因保密不嚴，整個駐X部隊的營房都被X市的高等院校（連中專也在內）的學生所圍，所有通往鐵路和機場的交通要道都被學生所阻。

我們是7月18號乘火車離開北京的。有好幾個將官來給我們送行，並和我們車廂的官兵一一握手。當時也不知是什麼心情。其中有一個是中央軍委的，也不知是什麼來頭，因除到我們客車車廂來外，悶罐車廂都沒去。鐵路沿途整個都被

武裝力量所封鎖，安全措施是國家元首級。

好了，我只能給你談這些。本來不該談的，希望你你看後把它燒掉。我畢竟還是名軍人，應該遵守國家機密，為了你我卻違反了這鐵的紀律，希望你好自為之！

XR（1989）7、31

這位當年的中學生還附了如下一段話：

他的這封信我一直保留著。除此而外，我還有一隻他送給我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手錶——戒嚴手錶。錶盤上沒有商標，在12點刻度下是一個頭戴鋼盔的士兵頭像，6點刻度上方有一行字：獻給敬愛的首都衛士。下面寫著：北京市手錶廠。這只機械手表裝在紅色的長方形塑膠盒內，盒蓋上印有「贈首都戒嚴部隊 中共北京市委員會 北京市人民政府」字樣。

他在信中雖然說過「血洗北京城」的話，但是他後來對我說，他們剛到京就被告知「首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有的士兵被活活打死」，因此情緒有些激憤。我理解他，因為當時連我也相信政府的宣傳，何況他還在更封閉的軍營中。只是在多年後我們才瞭解了事實的真相。

李曉明，22歲，解放軍第39集團軍116師高炮團1營2連雷達站中尉站長，1989年隨軍參加北京戒嚴部隊「平暴」。2001年李居澳大利亞，在墨爾本某大學就讀。李曉明接受澳大利亞呂易採訪時說：

我們116師高炮團當時駐軍在遼寧省海城縣。5月20日上午10時，高炮團召開了動員大會，傳達了上級文件，大意是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生們正在罷課、示威、遊行，派我們去瀋陽執行維護治安的任務。每人發了衝鋒槍，軍官還配有手槍。我們乘軍車向瀋陽進發。當隊伍行進到瀋陽附近時，上級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關附近，上面又說改去北京。……

6月3日下午，……我們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進發的命令。並說上級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執行戒嚴命令，並準時於6月4日到達天安門廣場。這時，上級沒有再說我們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開槍」之類的話。部隊官兵也都感到氣氛緊張，情態嚴重。部隊進軍途中，遇到群眾堵路，整個軍隊行進緩慢。最後，我們軍隊後退，群眾還報以熱烈的掌聲。我們又按照預案行走另一路線。師長（許峰）同一些參謀穿便裝先頭察看形勢。這時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隊傳開，說是有的部隊已開槍殺人。我們師長也許聽到、看到更多。他回來後便一頭鑽進師通信車內，告訴大家說收不到上級指示。我們營長頭腦簡單，說：師裏怎麼會收不到上級指示，我們營通信員的電臺都收到了軍委直呼：「116師，你們在哪裏，請回答！」……6月5日清晨6時許，第38集團軍作戰處處長前來我團，他站在一輛軍車上，兩名士兵將機關槍架在駕駛室上。由他在前面開路，我們車隊仿佛被押進城。一路上，我們看見許多燒毀的軍車、民用車、公車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幾乎不見，但不時從街旁樓內傳出喊聲：「法西斯、劊子手！」我們的戰士有的便向樓內開槍掃射。到廣場後，我們部隊被安排到軍事博物館前廳駐下。我同6



連1名排長一起去廣場想看個究竟。只見紀念碑四周全是垃圾，狼藉一片。紀念碑北側的大理石臺階和柱子已被坦克車撞壞，履帶印在廣場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見。我們在垃圾堆裏隨意翻了一下，發現一條褲子和一件棉襖上面，都有彈洞和斑斑血跡。也不知這些衣服的主人是傷是死。我們的戰士去打掃廣場，回來後也告訴我說他們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灘血。……有開槍就難免有人被打死打傷。但我們部隊射殺，打傷了多少人我們沒有統計，也不好統計。整個戒嚴部隊打死、打傷多少人恐怕也難統計。前面提到，6月5日清晨，我們部隊在38軍作戰處長押進城途中，就有戰士向街道兩旁樓內喊話的人開槍射擊。6月5日10時左右，我團1連由天安門廣場去新華社接應被圍困在那裏的6連時，也是一路開槍將他們接回來的。一個士兵就親口告訴我，他就向路上的群眾打了一梭子（約有20多發子彈）。所以說死傷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再就是6月7日，廣場上的部隊開始向各自的防地出發。我們師由廣場向朝陽區方向開進。前面由裝甲車開路，每輛軍車上都架著機關槍，每個官兵的槍內裝滿了子彈。當車隊行進到建國門立交橋附近，從對面的一個國際飯店（我不知道這家飯店的名字，它的後面是外交公寓）樓上傳來幾聲槍聲。我們的整個車隊便停下來，衝鋒槍、機關槍一起向樓上開火，如同暴雨一般。有無死傷，我不清楚。只聽說第二天便有大批駐在公寓和駐京的外交人員就匆匆離京回國了。……我沒有看到或看到開槍殺人的明確檔或口頭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執行戒嚴命令，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這些文字，和政府讓官兵荷槍實彈，炮兵、裝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為，顯然是讓部隊開槍鎮壓學生運動的。這是不言而喻、每一個官兵都心知肚明的。……

7月4日，「六四」之後整整一個月，上面正式傳達了開槍的明確命令：在協助警察抓「暴徒」和圍堵「通緝犯」的過程中，如群眾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開槍；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開槍；如再接近我們，就可以直接向身體開槍。

……我們軍長傅秉耀因執行戒嚴令不得力而被貶新疆軍區，名為平調，實為暗降。據說，38軍軍長因拒不執行戒嚴令而被軍事法庭判刑。……對中央為維護其專制統治而不惜血腥殺人的野蠻、慘暴行徑，我也十分憤怒。雖然我未開一槍，但看到天安門廣場的灘灘血跡，想到那些為全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與幸福而英勇犧牲的青年學生和無辜平民，內疚、慚愧、負罪之感常常縈繞我的心頭。記得當年的6月8日，我和營部車輛管理員一同坐公共汽車到郵局想往家發封平安電報。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懼的眼光看著我們。到了郵局，當我們向工作人員說明想發電報時，他們又同樣以冷冷的眼光藐了我們一眼，說機器壞了，不能拍，拒絕了我們。

張世軍、劉村亭、關祥勇

張世軍，第54軍162師宣傳幹事。生於1970年，現住山東省滕州市善國南路東2巷35號，身份證號碼：370421197008260050。1989年4月20日，張隨所在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當時的口號是：視人民如父母，視學生如弟妹。張目睹6月3日傍晚開始的「六四」鎮壓屠殺學生平民的慘劇後，提出提前退役的書面申請，

遭部隊以「資產階級自由化」、「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等理由將其除名。1992年3月14日夜，張在山東滕州市禮堂電影院遭便衣秘密逮捕，滕州市公安局搜繳了張寓所所有文字資料包括戒嚴筆記。1992年7月22日，滕州市公安局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將張非法勞教3年。至今，張未收到《勞教通知書》、《勞教決定書》等任何勞教的文字手續。18年來，張依法多次向各級行政部門、司法部門乃至國務院、全國人大提出復議、起訴、上訴、申訴，皆被置之不理。2008年10月1日起，張先後9次以掛號信的方式向國家主席胡錦濤申訴，沒有任何回應。

張世軍於2009年3月6日發表致胡錦濤公開信。張於3月中旬對採訪他的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喬龍說：「我看到過很恐怖的畫面，到目前為止，我沒有見到任何人揭露過這個（屠城）真相……」。2009年3月19日深夜2時許，張世軍在家中被山東滕州市警察抓走。

劉村亭，與張世軍同部隊，1992年同案入獄，2004年在新疆打工時遭莫名其妙的槍殺死亡。

關祥勇，與張世軍同案，遭非法勞教。

張愛萍等七上將與羅點點

張愛萍、蕭克、楊得志、李聚奎、葉飛、陳再道、宋時輪七位上將於1989年5月21日聯名上書，呼籲軍隊不能鎮壓民眾。其書曰：

首都戒嚴部隊指揮部並轉中央軍委：

鑒於當前事態極其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向你們提出如下要求：

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進城。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張愛萍、蕭克、楊得志、李聚奎、葉飛、陳再道、宋時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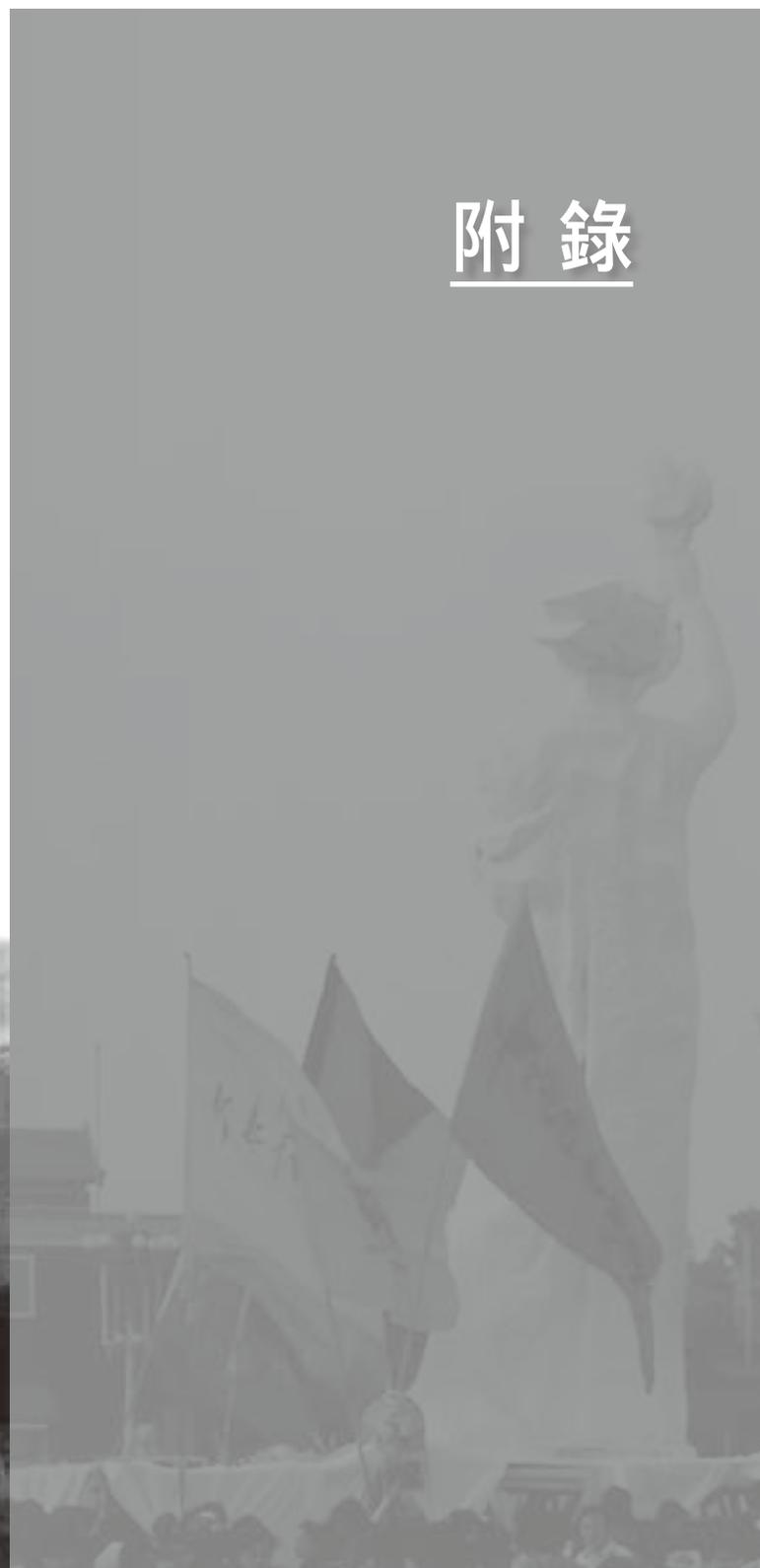
這封聯名信送到新華社，被扣不發。次日，北京百萬民眾遊行，七上將聯名信被印成傳單散發，內容變為上書中央軍委、反對戒嚴、反對李鵬、罷免鄧小平軍委主席職務。七上將無人出來否認，皆保持了沉默。

七上將上書是羅點點穿針引線促成的。羅點點是大將羅瑞卿女兒，時在海軍總醫院任門診部主任，反對動用軍隊鎮壓平民，故運用自己的脈關係，聯絡當時在世的十幾位上將，得到這七位上將的積極反響。為此，羅點點事後被捕，囚禁一年。其母四處奔走求告，始獲釋。

2007年6月4日 - 2009年5月初稿於馬德里



附錄





從見證到抗議

——記與淑芳的重逢並向香港記者朋友致敬

馬少方

讀完淑芳給我發來的文稿，許多往事，奔來眼底，但支離破碎，一團亂麻。許多香港記者的名字：蔡淑芳、范卓雲、羅綺萍、潘潔、羅少蘭、廖美香，還有臺灣《聯合報》的王震邦老師，其他的一些記者朋友，只有模糊的印象，甚至有些連印象都沒有了，更談不上當初接觸時的場景和交流了（二十年了，請原諒我在這裏公開我僅有的記憶，我害怕終有一天，連這些一起勇敢面對殘暴和血腥的朋友的名字都忘記了）……

按說，才四十五歲的人，記憶力不會衰退得如此厲害。但若有著強迫遺忘的經歷，「往事回憶亂如麻」也就可以理解了。我這裏所說的強迫遺忘，是指八九年被捕入獄接受沒完沒了的審訊時，所採用的一種策略。那時，你必須遺忘，並且，在面對嚴厲的審訊時，你還要把強迫遺忘後的若干段落連接起來，以使之能應付審訊。結果，強迫遺忘後編造的事情因反復記憶反而取代了事情的真相。九二年出獄後，再想把真相還原

馬少方，1964年生，江蘇江都人，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北高聯」常委，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一起守護在紀念碑周圍至4日凌晨離離。「六四」後遭通緝逮捕判刑3年。現居大陸。

出來，就不僅是回憶所能完成的，還必須對自編的假象進行剔除，但三年的時間不算短，加之自己被「特別管理」的身份，從未想過記日記和寫回憶，一拖拖了二十年，當初應對審訊的強迫遺忘終於成了努力回憶的巨大障礙。箇中悲苦，一言難盡。

我的這個強迫遺忘的經歷，是屬於「主動遺忘」型，這與另一種我稱之為「被動遺忘」型的社會形態大大不同。所謂「被動遺忘」，就是八九年血腥屠殺後，執政當局操縱媒體，偽飾歷史乃至掩埋歷史，而受眾們無論是當年的參與者、見證者，還是事後出生來到這個世上的人，都有意無意地配合著執政當局繞開這段歷史，或閉口不談這段歷史，好像這個歷史事件真如執政當局所說的，是正確的，是不得已，甚至還有人以為這件事壓根兒就沒有發生過。主動遺忘，是個人行為，而被動遺忘，是社會形態。主動遺忘，是對抗政府權力的一種策略，而被動遺忘則是政府權力操作下的全社會的一種共謀。

二十年了，現在，主動遺忘遭遇被動遺忘！主動遺忘者在努力回憶，力圖復原事實，還原真相；而被動遺忘群體則拒絕承認遺忘，他們或是偏聽偏信，從而得出事情就是這樣只能如此的結論，而不認為自己是遺忘者，是掩埋歷史真相的「共謀者」，也當然不會承認自己是庸眾的一員。這是中國之悲？還是中國人之悲？亦或這是中國歷史之悲！

淑芳不是遺忘者，她不僅是記錄者、見證者、參與者，她還是反思者，而今更是以一種抗議者的形象，抗議偽飾歷史、掩埋歷史，也抗議平庸的遺忘。

一、迎向刀槍，參與並見證

閱讀淑芳的文稿，一種巨大的憂傷伴隨著強烈的責任感，



迎面撲來。她的執著、堅毅、真情，把我沉睡的責任重新點燃。

我馬上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前幾天《明報》的記者約我寫一篇香港學生到北京聲援學運的文章，我雖然寫了與林耀強和李蘭菊相識交談的經過，可最重要的事情卻沒有記起來。在讀了淑芳的文章後，我記起六三晚至「六四」早晨的一些事情。是的，那天，淑芳就在我的身後，她還以她記者的職業習慣，不，應該是職業責任，就在我 and 梁二、楊朝暉的身後，在第二排，悄悄地舉起相機，拍照。相機「咔嚓、咔嚓」的聲音，讓我緊張，也讓我害怕，我連忙告訴她：「不要打閃光燈，千萬別打閃光燈。」淑芳沉穩地回答：「沒事的。」這個細節是讀了淑芳的文稿才記起來的，同時我也記起了那天晚上，林耀強等香港學生也在廣場。他們作為香港市民和大學生聲援大陸民運的代表，在那北京的天空已經飄滿血腥味的夜晚，沒有回避，更沒有逃避，而是毅然走向廣場，走進和平抗議的學生隊伍。他們選擇了與無私無畏為伍，與正義尊嚴並肩。是的，我最後離開紀念碑到廣場北側第一排之前，在絕食四君子的帳篷前見過林耀強，我讓他回北京飯店去，我說他不該呆在這裏，他應該回到北京飯店去。但林耀強的回答是：「應該在這裏，必須在這裏，因為我們也是學生，也是黃皮膚、黑眼睛，也是龍的傳人！」那是一九八九年，他和淑芳的身份是：香港市民。可是他的回答卻是那樣沉穩、鎮定、堅決。我不該遺忘這個珍貴的細節，但我的確是遺忘了，是主動遺忘還是被動遺忘，說不清楚。

去年我有幸去了趟香港（零七年前一直申請不到護照和身份，理由是：莫須有），當我的雙腳終於邁進香港那一邊，就暗下決心，這次一定要找到淑芳。九二年出獄後，在北京以及深圳，還是見過幾位當年廣場上認識的香港記者，我每次都向她們打聽淑芳的消息，她們只是告訴我，淑芳已經不做記者的了，甚至已經不在香港了，找不到。十多年，一直沒有淑芳的

消息，但冥冥中，我總覺得我們還會見面，一定會見面。這是一種共同經歷了生死之後的莫名其妙的感覺，說不清，道不明。甚至，十多年過去了，她的樣子已不十分清晰，但那晚，她在我的身後緊張地按下快門的情景，我怎麼也忘不掉。那晚，我們用胸膛直面刺刀；那晚，我們一起被迫接受槍彈射擊紀念碑的事實；那晚，我們一起高唱《國際歌》；那晚，我們一起害怕，一起流淚，一起憤怒，一起覺醒。那晚，我們共同經歷了與巨大的恐懼一起生長的更加感人的大無畏。那晚，我們一起承受了「刀槍武裝的恐怖驅散了以激情與正義為盾的大無畏」的悲愴……我們會就此失散而不復相見嗎？我不相信，所以，我的雙腳一踏上香港的土壤，我就相信，我們一定會見面。

終於找到了，馬上電話聯繫，我終於聽到了那個已經二十年沒有聽到的聲音。在赴約的汽車上、地鐵裏，我一直在努力回憶，我們是哪一天認識的？在什麼地方？但我只記那一晚的場景，別的都模糊。那一幕因罪惡太放肆、激情太無辜、正義太無助因而印象太深刻。別的事情，大概由於強迫遺忘和被迫遺忘的共同作用，一點都清晰不起來。一路上我都在想，二十年後的見面，能讓二十年前的許多事情復活嗎？二十年前的那些日子裏的激情、緊張、憤怒、恐懼，還能真實地重現嗎？甚至，我們能在這熙熙攘攘的人群裏，毫不猶豫地相認嗎？

的確有一段尋找的過程，但很快我們還是彼此認出了對方。

二十年了，淑芳黑髮裏的白髮已經不少，就像她說我的那句：也有白髮了。豈止是也有白髮了，應該說是到處白髮，離滿是白髮不遠了。二十年，當年那個二十五歲激情洋溢的馬少方，已經四十四歲，額頭滿是歲月的滄桑了。



那天，我們倆在香港的中文大學校園裏靜坐、散步，咖啡亭裏，林蔭道上，淑芳不僅關切地詢問我監獄裏情形：有沒有受皮肉之苦？三年的一千多個日夜都是怎樣熬過來的？還問我出獄後這十多年都怎麼過的，有沒有受到不公正待遇。我向她講述如何對付審訊，如何因江蘇九一年發大水而坐水牢的情形（我於九一年四月被押回江蘇鎮江第二監獄服刑至九二年六月），也向她講述九二年出獄後坐家牢（九三年被監控在家鄉，證件被沒收，嚴禁外出）、多次軟禁、多次失去工作、一次被抄家、無數次莫名其妙地被約談、長期被監聽、跟蹤，甚至還有恐嚇等等。淑芳為我的遭遇而憂傷、憤怒，我心懷感激，卻又害怕她問起當年的一些事情，畢竟我是主動遺忘和被動遺忘的雙料「病人」，我不願意被淑芳看出我的遺忘病。淑芳好像明白我的心思似的，她只慢慢地講些她知道的事情，然後這二十年後的會面，就重新又把我帶回二十年前的場景：彩旗飄揚，口號驚天，歌聲昂奮，鬥志感人。那是一條久久不能忘懷的長長的隊伍，那是已然覺醒但還未充分意識的中國公民的隊伍……那個隊伍的旁邊，一直有那些個子不高，身背記者包，手舉相機的香港記者……蔡淑芳、范卓雲、羅綺萍、羅少蘭、潘潔、廖美香，還有臺灣記者王震邦……她們，正是她們，用她們職業的責任以及甘為中國人的承擔精神，為中國大陸年輕學子的勇敢無畏和激情豪放留下了敢於行動敢於言說的聲音、文字和身影。她們，那一群從客觀採訪終而積極匯入其中的香港記者，不僅及時記錄下整個運動的歷程，更在記錄之餘，用她們的勇敢和無畏行動，書寫了她們的民主意識和自由精神！九三年，我在王丹家還翻過一本由這群可敬可佩的香港記者聯合寫作出版的《人民不會忘記》的書，王丹答應送我一本，可惜隨著他於九四年的第二次被捕，家被抄，原本應該屬於我的一本《人民不會忘記》，終於只是腦海裏的一個記憶。去年赴港時與淑芳、卓雲姐等見面，她們說「六四」二十

周年，將重印此書。這當是這個勇敢的記者群體對執政當局掩埋歷史真相的抗議。這抗議於淑芳來說，是持續地延續了二十年，在我被淑芳帶動著拒絕遺忘努力回憶的時候，我突然明白，在我們二十年前面對屠殺而能戰勝恐懼的勇氣裏，有著她們輸入的大無畏精神！我要向她們致敬！

二、直面奴性的憂鬱

和淑芳在香港校園自由的空氣裏呼吸，淑芳的真情漸漸掩不住她的憂傷，我感覺到了淑芳的憂鬱，一種經歷過巨大的希望又終而失望才能有的憂鬱。

我沒有隱瞞我的感受，而是直接問淑芳，為什麼，歲月催生了你憂鬱？從淑芳的回答裏，我聽出了這樣的回答：豈止是催生，完全是助長。

淑芳說她難忘那些日子裏的隊伍、旗幟、口號，五四集會、五一三絕食、「六四」屠殺……淑芳在講述她的記憶，我則強烈的感受到橫亘在她心中的揮之不去的那情那景。而我呢？當年被她採訪的人，她是旁觀者，我在風暴中，而今她的見證卻把我的遺忘映襯成懦弱，一種拒絕承擔、乞求恩賜、只要手中有財哪管正義公理的可憐蟲的樣子。

我便努力地拒絕，暗示她，你只是記者，一個見證者，一個以客觀、真實為特點的職業。淑芳時而用言說時而用動作做回答。她在告訴我：作為記者，她本該以客觀的態度、旁觀者的姿態來面對那長長的隊伍，但恰恰是那飽滿的激情，無私的姿態，無畏的生命，感染她，衝撞她。她在撕裂自己，採訪時，她是見證者，記錄者；而一當她停下筆，她就抑制不住地走進那隊伍，拉住那隻手。她說，那種坦誠的理想主義，像電流一樣，剎那間就湧滿全身。她說：那是一個感人的巨大的氛



圖，那也是一個面對政府的無恥行徑由不得不憤怒的奇特的場。正義被謊言玩弄，正直被蔑視扭曲，公理被迫需要論證，而無論怎樣論證也不被強權認可。勇氣是從未見過的可憐，驚天的氣勢完全可以被視而不見。你下跪吧，即使跪斷所有人的腿，那代表權力的身影只是遠遠的一個背影，只要沒看見，便肯定沒發生。你絕食吧，哪怕救護車的悲鳴，每隔幾秒鐘就哀嚎，並匯成怒吼，只要不去聽，便什麼事也沒發生。即使不得已面對了這個只要是就會被感染被驚醒的場面，當權者的假惺惺也終於遮不住隨之而來的惡狠狠。淑芳說，這些都被記錄在案了，但記錄者若是只管記錄，只為歷史留下證據，而完全無視這奇特場域裏罪惡對正義的強姦，這披著記錄工作外衣的人，難道可以逃脫強姦的罪責嗎？面對殺人，你不是只管拍下證據，然後若無其事地任罪惡得逞，而是首先要敢於挺身而出，扼制罪惡。

我在聽她說陪她行的時候，一直在想，在她瘦小的身體裏，哪來的如此澎湃、洶湧的正義感和責任感。

我不得不和她講述一個我九二年出獄後親身經歷的事。那次我拜訪一個朋友，他和我講起「六四」屠殺後全社會大清查的事，他說：對於是否上街遊行，大家一概回答，沒有；對於問及都是誰上街遊行了，大家一概回答，不知道。我問他，你上街遊行了嗎？他說，當然了，那種情形，能不加入嗎？我說：就像大清查的緊張氣氛下，能不如此回答嗎？他默然。

淑芳也默然了。我又說：八九年的學生運動，有人說與文革一樣，是學生鬧事。別的不說，就拿我這個朋友事後清查時的行為，八九學運和十年浩劫，這兩件事除了都是年輕人的身影一致外，恐怕再也找不出其他相同之處了。十年浩劫，清查一來，不少人忙著出賣，而八九年哪怕已經坦克上街，機槍平射，人們還是沒有被嚇倒，拒絕合作。但僅僅不被嚇倒、拒絕

合作就夠嗎？承擔精神呢？胡耀邦、趙紫陽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人性覺醒了，但被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化運動掉的承擔精神和責任意識，依舊蹤迹罕見。難怪有人會說：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人沒殺到二十萬，而二十年的穩定差不多快實現了。這種現狀怎麼理解？

我沒有注意淑芳情緒的變化，只按著自己的思緒，繼續談八九年以來我所親歷和聽說的一些事實。我以為，中共三十年來的改革政策，只是個跛足改革。八九年運動中，大部分人認為，只有經濟體制改革而沒有相應的政治體制改革，必然導致腐敗、甚至是經濟改革的全面失敗。九二年我重入社會後，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官僚腐敗迅速轉化為全社會腐敗。再後來，不少知識人在經改大潮中獲利頗豐，而與之相應的思潮是：只要不斷的私有化，民主將水到渠成，更有甚者，政治體制是否民主其實不重要，關鍵是社會要自由，特別是經濟要自由。三十年過去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可謂不快，大、中、小型城市面積整體上擴充出不止一倍，光土地的一次轉讓金，粗算一下都是一個天文數字，但每個人都在這轉型中獲得公正對待了嗎？恐怕只是少部分人在這轉型中獲得暴利，而大部分人在這改革中，鐵飯碗沒了，基本保障也沒了。整個中國社會一邊是猛建高樓大廈，狂建公路鐵路，現代民用通信網路恐怕也是世界先進國家行列，但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專案卻才剛剛起步，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絕大部分人口抗通脹的能力極差……

淑芳問：整個問題在哪裏？六四事件在這個巨大變化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中國的未來將向哪個方向發展？淑芳問話的急切，已完全不是一個記者的身份。的確，她現在已不是記者了，她是一個香港普通市民，但她仍急切地想知道大陸的未來，並且她還不是從香港的未來而關心大陸，她更主要是心繫大陸自身的未來走向。聽了我上面的描述，她的腳步放緩，臉



色更顯憂鬱，我的心情也不自覺地跟著沉重起來。我原本是想通過我的言說緩解一下淑芳憂鬱的心情，卻不曾想反而是加重了她的不快。但我的確無法立即找出一些說法來寬她的心，也無法向她描述一個燦爛的未來。我只能說出我真實的感受。

我告訴淑芳，我無法回答她的一系列問題，我只有非常個人化的認識。在我看來，在存在著巨大國有資產的情況下，只經革不政改，所謂的市場經濟方向，則是加速被強化了權力與金錢的勾結，這是由巨大國有資產這個錢袋子決定的。在集權專制制度的權力體系制約下，利用所謂的市場配置資源，只能加速權力與金錢的勾結。因為金錢與權力勾結，效率最高，而權力與金錢勾結，亦同樣是權力的當下兌現最合算。特別吊詭的是：越是反腐敗的運動聲勢大，腐敗的涉及面也越廣，大概掌權者在反腐敗的聲勢中，越來越感覺到權力不迅速借市場兌現為金錢，權力隨時會過期作廢。而另一方面的助力，恐怕與四九年以來的整個中共統治歷程有關。

只有一點是讓人感到欣慰，畢竟三十年經濟改革，社會體系重新在整個國土上出現。有了社會，人們的生活空間相較於毛澤東時代是大大擴展了，或許時間還沒到，如今大陸的社會肌體整體上是病態的，但也出現了一些希望的萌芽，特別是互聯網的全新通信技術，新聞封鎖、警察治理的成本都越來越大，諸多社會邪惡現象時不時在互聯網上曝光，相關犯罪官僚被迫受到制裁。不過，越來越顯聲勢的民間維權運動，或許是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而僅僅是就事論事的利益訴求，故而聲勢雖越來越大，但實際的社會力量卻還沒有形成的跡象。這裏既有集權當局的統治術的作用，也有國民性的問題。不能不談國民性，大陸的每一個，無論是城市人還是鄉村人，其成長過程中都受到四個方面的影響，一是家庭，二是學校，三是大眾媒體，四是親身經歷的自我教育。前三方面的教育往往決定了第四方面。這方面非常複雜，簡單地說，傳統在家庭教育中

起到極重要的作用，學校教育事實上是集權統治的意識形態作用，而大眾媒體則是極典型的歌頌裝置。這三大教育體系型塑和生產著一代代中國人，且強大的束縛了人的自我教育。這導致整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真正的公民社會難產，沒有公民教育，就沒有公民，當然談不上公民社會。要害是：公民社會的力量在憲政共和體系內通常是強大的政府權力的有效制衡力量，而在集權專制社會，公民力量則可以成為一種顛覆性的力量。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和經濟增長，中國大陸甚至連生長一點公民社會的空間都沒有。這或許也是不少知識人擔心中國當下就搞民主政治改革必然帶來天下大亂的原因吧，這種擔心正好可以被集權體制的「穩定壓倒一切」的統治目標利用。其實，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民主，真正的憲政民主，對於中國來說，是一條道路，而不是理想中國社會的前提。中國一天不走上憲政改革之路，就只能在集權專制體系下，繼續著權富勾結的轉型，直到某一日，大廈轟然倒塌。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個人有限體驗的感性認識，不是預言。

淑芳停下腳步，而天空又突然陰沉，甚至還飄下了雨滴，陣陣微寒也迎面而來。她提議到她家去坐坐。在去她家的汽車上，我才發現，二十年重逢本該有的喜悅已經一掃而空了，她內心的憂鬱好像在集聚，而臉上終於有了一絲無奈。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能和她說些我此次赴港的一些良好感受，並且說，香港、臺灣的存在還是讓我看到了希望。

三、震撼於塵封的見證

淑芳住在香港一個偏僻的村落，那是她租住的一間小屋，從情形看好像還是與人合租。小屋擁擠不說，屋內也沒什麼家用電器，甚至連一張讀書人的書桌都沒有。看到淑芳就生活在



這樣的環境裏，卻二十年不變地心繫八九民運，不平於當年無辜的冤魂，憂傷於中國的現實和未來，與她對照，我內疚，心虛……而隨後淑芳從小屋的角落處吃力地拖出一個黑色大箱，急切地在我面前打開這塵封了多年的史實倉庫，我內心的慚愧在迅速地翻閱上千張照片無數的傳單和大量淑芳當日的文稿時，也達到了頂峰，繼而是被這些資料感染，遺忘終於被制服，而記憶的閘門一下子打開。

我翻閱著已經有些發黃的照片，許多已經遺忘的面孔重又鮮活起來。而當我翻閱淑芳那件簽滿了人名的T恤時，我突然看到了「吳向東」三個字，我立即記起這是個「六四」死難者，淑芳聽說後臉色更加沉重。她絕沒有想到她收藏的這件T恤卻可能留下了「吳向東」最後的字迹，這件被收藏了二十年的衣服，太沉重因而也太珍貴了。我捧著這件T恤，腦海裏重又出現「六四」下午德勝門邊面對的那個九歲孩子的屍體。我的鼻子有些酸，但淚水卻沒有了，八九年已經把淚水流乾了。五月十七日，中央戲劇學院幾名同學在人民大會堂北側宣佈絕食絕水，他們僵直地躺在烈日下，一動不動，他們在橫陳絕望的時候，也橫陳著一個民族的希望，可最後是「六四」屠殺瀰漫出的更大的絕望。吳向東作為死難者，在他生前於淑芳的這件T恤上簽上自己的名字時，他絕不會想到他將被屠殺而告別這個人世，甚至二十年了，冤魂還無處安息，更別說以無辜犧牲者的姿態去控訴。

在上千張八九年紀實照片裏，我也看到了「六四」凌晨淑芳在我們的身後拍下的照片。那是槍彈擊中紀念碑而發出的火光的照片。被槍擊中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沉默著、矗立著，只將他巨大的憤怒迎向罪惡的子彈，只在暗夜中迸發出尊嚴的光芒。儘管這尊嚴的光芒在暗夜中遇風而滅，可淑芳的相機捕捉了這個光芒，記錄了這個光芒，於是，這光芒開始不朽。

我還在淑芳保留的資料裏，讀到我尊敬的包遵信老師的一封信，那是九十年代中期包遵信老師托人轉交給淑芳的一封信。那封信記錄了淑芳對遭受牢獄之災的包遵信老師的真誠的關懷，以及包遵信老師對淑芳的真誠致謝。包遵信老師已於零七年不幸辭世，淑芳問我一些包老師生前的事情，言語中對包老師的辭世很是痛心。是的，正如年逾八旬的于浩成老師在包老師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含著眼淚說的，包先生是很多朋友的精神導師，甚至是很多中國人的精神導師。包老師用他的智慧、思想、熱情以及辛勤的工作，啟蒙了幾乎整整一代中國人，但他的最後的告別，大陸沒有哪怕一張大眾媒體向國人公告。雖然送他的那天，還是有很多他的朋友和敬仰他的人，不懼權力機關的阻攔，來到送別現場，但仍有很多人被強行阻攔而不能親自送包先生一程。這就是集權體制對待一個國家的良心的做法，扼殺的做法。他們不僅槍殺無辜的生命，他們還頑固地扼殺良心。

說到包老師，也就說到趙公紫陽。我不僅和劉曉波、張祖樞、張顯揚老師一起參與了包老師的葬禮，我也曾在包老師的及時通知下，以一個當年學運積極參加者的身份，親臨趙公家門，在趙公遺像前三鞠躬，並寫下「蓋棺不定論，何時有晴天」的輓聯。可惜我很快被權力機關秘密軟禁一周，而最終沒能參加趙公紫陽的遺體告別儀式，沒能在趙公紫陽的遺體前三鞠躬。我遺憾，終生遺憾！我以為，趙公紫陽，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更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公民。

淑芳耐心的聽著我的講述，她的塵封的記憶好像也一下子打開了。她問我當年逃出北京的情況，又說當年她最想救出的人中，有我，但很快她就知悉我在廣州投案。她好像一直不想說投案這個詞。我卻坦誠地告訴她，雖說當年我是以抗議被通緝的名義走進廣州白雲山派出所的，但老實說，見到通緝令上



有我的名字，我的確非常緊張、害怕、恐慌。我不是個堅強的人，我的性格中懦弱的成分偏大，因此，名義上是抗議，實際上還是主動走進，用「投案」一說，未嘗不可。但說自首，則是當局的刻意宣傳了，這也是集權體制慣用的伎倆，不值一駁。我負責地對淑芳說，在那些嚴厲審訊的日子裏，我承認了所有我做的事情，但沒有出賣一個朋友。我雖懦弱，但絕不無恥。淑芳笑了，笑得真誠，笑意裏滿是安慰。淑芳的笑意裏彷彿在說：敢用胸膛直面刺刀的人，不能算懦弱。

但我瞭解我自己，懦弱就是懦弱，而勇於承擔又是另一回事。我告訴淑芳，在最後的法庭審判中，我為自己做了無罪辯護，並且高聲地告訴法庭，「我無案可投，更無首可自」。法庭大概是想我在庭上能利用「主動投案」的情節，乞求其寬大處理的，但我讓他們失望了。所以最後的判決書上雖有「投案」一詞，但具體判決卻沒有慣例的「從輕處理」一說，我笑著對淑芳說：我是爭取到了「罪有應得」的。

那天與淑芳見面，淑芳還給我閱讀了她寫的一部關於八九年的話劇劇本。時間關係，我當時未能認真閱讀，但粗讀之下，已經被那高昂的責任深深打動。我雖一時間提不出什麼修改意見，可從淑芳的寫作中，我真切地目睹了一個香港記者從見證者到參與者再到抗議者的英姿。這英姿的代價，她想過嗎？我不敢問，甚至一想到要問，心底的內疚又湧遍全身。淑芳好像明白了我的困窘，她提議我們到不遠處的湖邊去走走，大自然裏，或許那記憶的痛楚會得到釋放。

當淑芳把我帶到那個村落旁的湖邊時，天空正是黃昏時分，湖水倒映著晚霞的別樣風景，湖水平靜，晚霞凝重，那是一種告別的場景，甚至更可以說是一種退場，一次謝幕。誰在退場？誰在謝幕？而當夜幕終於降臨的時候，誰又能說這不是鋪陳的埋葬。但誰被埋葬？又或許誰在埋葬誰？

晚霞中的淑芳，個子不高，但努力地挺直身軀。她背負了二十年的沉重的歷史，何時有機會放下？這本不該由一個香港女記者去承擔的重壓，淑芳不僅承擔了，而且承擔了這麼久，並且還肩負著這個重壓，以堅定的抗議暴政抗議遺忘的方式，把香港市民關心中國人的命運的情懷，鑄造成一個真正中國公民追求憲政共和制度的莫大勇氣。

在我告別淑芳的時候，淑芳說：「不，絕不是我一個人，我也絕不再憂鬱，我要把這些資料公佈於眾，絕不讓其再塵封。還原真相，相信真相的力量，相信真相下覺醒的公民的力量。」

二零零九年五月





紀念「六四」二十周年

我們呼籲

1989年北京百萬學生和市民舉行「反官倒，懲腐敗」的和平示威，要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要求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民主改革。

然而，6月4日，中共當權者動用20餘萬軍隊、坦克機槍，進行屠殺，將這場史無前例的民主運動鎮壓下去。

二十年來，中共當權者用謊言欺世，先是堅稱他們當時屠殺的是暴民，後又極力設法使這場屠殺從人們記憶中消失。

「六四」受害者蒙受千古奇冤，死者冤魂不安，活者悲痛難熬。

二十年來，中共當權者拒絕政治改革，靠不公平競爭發展官僚資本主義，以此積累了財富，加上暴力，更加變本加厲地侵犯人權，壓制言論自由。

二十年來，「六四」一案得不到公正審判，以致社會正義不得伸張，黑惡勢力橫行，社會道德淪喪，貧富兩極高度分化，弱勢群體處境日益艱難。

值此「六四」二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我們呼籲：

對「六四」一案進行公正審判，首先要查清真相，公佈死亡、傷殘及失蹤者準確數字和名單，並設法追尋失蹤者。

立即停止目前仍在發生的對人權和自由的踐踏，停止對維權律師及其他維護正義者以及包括法輪功在內的一切宗教信仰者的囚禁和迫害。

嚴懲腐敗官員，打擊黑惡勢力，建立民主制度，支持維護人權，

停止對資訊和出版自由的鉗制和扼殺。解除黨禁和報禁，撤銷一切網路警察。

「六四」精神萬古垂青！

「六四」英烈永垂不朽！

紀念「六四」二十周年聯署呼籲書

聯署名單

- | | |
|-----------------------------|------------------------------------|
| 1. 艾鴿（法國巴黎 詩人兼畫家） | 28. 黃河清（西班牙 自由撰稿人） |
| 2. 卞和（美國三藩市 巴蜀同盟會） | 29. 韓柳茵（廣州 公民） |
| 3. 陳方（浙江 退休工人） | 30. 金成學（美國紐約） |
| 4. 陳立群（美國紐約） | 31. 金美花（美國紐約） |
| 5. 陳愉林（香港 作家） | 32. 吉英子（美國紐約） |
| 6. 陳邁平（瑞典 翻譯） | 33. 金賢淑（美國紐約） |
| 7. 陳文斌（四川） | 34. 金英愛（美國紐約） |
| 8. 陳學成（美國紐約） | 35. 姜明姬（美國紐約） |
| 9. 陳西（貴州 民主運動者） | 36. 林希翎（法國 大右派 於巴黎醫院加護病房病榻） |
| 10. 崔光林（美國紐約） | 37. 劉燕子（日本 大學教師、作家） |
| 11. 戴傳熹（浙江杭州） | 38. 李桂琴（加拿大） |
| 12. 戴捷（法國 翻譯） | 39. 李力（西班牙 中國民陣陣自民黨政務委員） |
| 13. 方政（北京體院學生 六四晨雙腿被坦克碾斷） | 40. 李玲芳（美國紐約） |
| 14. 費良勇（德國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 41. 劉雲霞（加拿大） |
| 15. 伏虎（美國三藩市 巴蜀同盟會） | 42. 劉劭夫（加拿大） |
| 16. 馮保羅（加拿大） | 43. 劉真（河南） |
| 17. 封從德（美國三藩市 六四時北京大學學生） | 44. 駱賓父（美國三藩市 巴蜀同盟會） |
| 18. 傅正明（瑞典 學者） | 45. 梁聯發、熊若磐（美國三藩市 兩個年邁美籍華人 呼籲書發起人） |
| 19. 方能達（美國紐約） | 46. 李玉順（美國紐約） |
| 20. 方能禦（美國華盛頓DC） | 47. 林德莊（美國紐約） |
| 21. 高寒（美國紐約 《中國之路》主編） | 48. 羅雲庚（澳大利亞墨爾本 工人） |
| 22. 郭平（美國三藩市 營救王炳章工作委員會負責人） | 49. 茉莉（瑞典 教師） |
| 23. 郭新（美國紐約） | 50. 莫默（加拿大） |
| 24. 高旻（山東 藝術家） | 51. 南雲河（美國紐約） |
| 25. 高強（山東 藝術家） | 52. 朴順花（美國紐約） |
| 26. 郭國汀（加拿大 中國人權律師） | |
| 27. 韓文光（加拿大） | |



53. 朴好順 (美國紐約)
54. 錢通神 (美國三藩市 巴蜀同盟會)
55. 盛雪 (加拿大)
56. 蘇明 (加拿大)
57. 王丹 (加拿大 女)
58. 王犀利 (北京 退休工人)
59. 吳倩 (美國 詩人)
60. 王策 (西班牙 中國民陣自民黨主席)
61. 吳仁華 (美國洛杉磯 六四時中國人民大學教師)
62. 王超華 (美國 學者)
63. 王容芬 (德國 學者)
64. 武文建 (北京 畫家 六四後遭判刑人員)
65. T.S.Wu (美國三藩市)
66. 王孔東 (美國紐約)
67. 武振榮 (韓國)
68. 徐文立 (美國 布朗大學資深研究員)
69. 薛亞高 (山西 退休教師)
70. 夏桂英 (加拿大)
71. Jenny 謝 (加拿大多倫多)
72. 許順今 (美國紐約)
73. 楊莉藜 (美國華盛頓DC 《觀察》主編)
74. 羊子 (美國紐約 民主運動者 王若望先生夫人 王若望畢生為民主奮鬥, 客死異邦, 至今骨灰被禁止運返故國)
75. 俞又生 (上海 退休工程師)
76. 逸君 (加拿大)
77. 嚴明 (加拿大)
78. 應紅善 (加拿大)
79. 郁申樹 (愛爾蘭 自由撰稿人)
80. 尹貴玉 (美國紐約)
81. 周鋒鎖 (美國三藩市 六四時清華大學學生)
82. 鄭炎 (山西 退休教師)
83. 鍾岩 (加拿大)
84. 翟步剛 (加拿大)
85. 張寶善 (美國紐約)
86. 張振中 (美國紐約)
87. 趙京 (美國 《人道中國》三藩市負責人)
88. 趙有男 (美國紐約)
89. 趙東明 (澳大利亞墨爾本)

後續的簽名(2009年4月11日至6月4日)

90. 郭曉陽 (美國紐約)
91. 戴捷 (法國 翻譯)
92. 徐沛 (德國 詩人、作家)
93. 張前進 (美國舊金山 基督教牧師)
94. 邵江 (英國 六四時北京大學學生)
95. 紀岳 (廣州 互聯網從業者)
96. 張鑒康 (西安 人權律師)
97. 張澤培 (加拿大多倫多 愛國僑胞)
98. Chen Jian Hua
99. 沈純理 (上海滌塵居 專項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100. 蔡淑芳 (香港 自由撰稿)
101. 吳海波 (北京 畫家)
102. 陳震康 (挪威 政治流亡者)
103. 李天明 (加拿大 公司職員)
104. 鄧煥武 (重慶 民主運動者)
105. 沈子俊 (甘肅蘭州 農民、民主人士)
106. 韓約 (上海 工程師)
107. 劉雄偉 (西安 公民)
108. 江亞南 (江西 公民)
109. 張占明 (法國 工程師、中國第一批留法學生)
110. 鄧韞璧 (韓國 民主運動者)
111. 王國興 (荷蘭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112. 段雯 (澳洲 留學生)
113. 楊運海 (廣東)
114. 吳志成 (廣州 學生)
115. 王品言 (吉林長春 學生)
116. 何少顏 (法國 留學生)
117. 雷躍輝 (江西 自由作家)
118. 魯揚 (山東 詩人)
119. 劉煜明 (廣州 職員)
120. 秦煜 (美國馬里蘭大學 學生)
121. 王澤元 (香港 商人)
122. 蘇雨桐 (北京 NGO工作人員)
123. 郭文浩 (北京 大學生)
124. 唐國恒 (上海 公民)
125. 郭少坤 (江蘇 獨立自由撰稿人)
126. 謝慶慶 (北京)

127. 王仲夏 (北京 市民)
128. 廖新榮
129. 劉泰 (香港 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召集人)
130. 柳玉成 (香港 商人)
131. 戚惠民 (杭州)
132. 邵文明 (雲南 公民)
133. 呂易 (澳大利亞中國社會民主黨副秘書長兼澳洲黨部副主席、澳大利亞華人基督教會牧師)
134. 胡平 (美國紐約 《北京之春》主編)
135. 王撼 (湖北 工人)
136. 能白流
137. 姚曉平 (江蘇 教師)
138. 熊振耀 (湖南 自由職業)
139. 楊明燕 (四川 教師)
140. 彭新忠 (湖南郴州 89民主學潮親歷者)
141. 涂純 (美國 學者)
142. 張俊生 (四川敘永 08憲章簽署者)
143. 鄭存柱 (美國洛杉磯 原六四參與者)
144. 陳凱 (江蘇 工程師)
145. 荀建 (瀋陽 六四退黨者)
146. 周露 (廣州)
147. 葉光庭 (杭州 浙大退休教授)
148. 勾占宇 (河南 公民)
149. Mingjian Hua
150. 齊志勇 (北京 六四傷殘者)
151. 蔡延慶 (中國大陸基督教徒 書刊出版人)
152. 胡圖南 (武漢 大學生)
153. 多傑丹增 (藏族 腦控武器受害者)
154. 于浩 (中國大陸)
155. 馬少方 (深圳 自由職業者)
156. 李趙 (美國馬里蘭 會計師)
157. 毛孟靜 (香港 傳媒人)
158. Freeman@RebuildHK (香港 多媒體創作人)
159. 蔡子強 (香港 大學講師)
160. 劉文欽 (香港 醫生)
161. 陳欣慧 (台灣)
162. 黃碧雲 (香港 大學講師)
163. 許舜莉 (香港)
164. 郭家麒 (香港 醫生)
165. 蔡淑梅 (香港 醫生)

166. Kusche Cheng (香港)
167. 方子華 (香港)
168. 陳瑞蓮 (香港)
169. 游順釗 (法國 學者)
170. 余瑋琪 (香港 編輯)
171. 張國亭 (丹麥 天網)
172. 鄭宇碩 (香港 城市大學講座教授)
173. 林斌 (澳洲 新聞工作者)
174. 盧正 (瑞典 學生)
175. 朱耀明 (香港 牧師)
176. 韓連山 (香港 教師)
177. 邱祖淇 (香港 大學講師)
178. 陳竟明 (香港 大學講師)
179. 查錫我 (香港 執業大律師)
180. 蔡詠梅 (香港 編輯)
181. 李凌瀚 (香港)
182. 張英 (荷蘭 中國民主黨中央主席、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歐亞主席)
183. 吳呂南 (英國)
184. 李煒佳 (香港 教師)
185. 陳軾英 (香港 教師)
186. 胡金榮 (香港 醫生)
187. 吳詠琳 (香港 教師)
188. 黃啟泰 (香港 牧師)
189. 張涵珠 (美國紐約)
190. 林瑞琪 (香港 天主教研究員)
191. 鄧如玉 (香港 中學教師)
192. 馮德華 (香港 中學教師)
193. Leung Chun Hung (Canada)
194. 陳國權 (香港 退休校長)
195. 鄒崇樂 (加拿大)
196. Chong Yiu Kwong (香港)
197. Marcel Ng (香港 1989年十歲小孩子)
198. Wang Xiaohua (Singapore)
199. 鄧婉霞 (香港 自由撰稿人)
200. 譚美玲 (香港)

(名單截至2009年6月4日)



鳴謝

淑芳囑我替她寫一段鳴謝文字，本來似乎並不完全恰切，不過，可能她認為我直接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版，想我交代幾句，我還是恭敬從命。

下列的朋友名字排序不分先後，資助出版費用：韓連山、丁炯燦、李煒佳、徐漢光、潘瑩明、潘天賜、李麗明、黃克廉、趙善炬、洪英豪、陳中禧、馮偉華、張文光、鄭振初、趙志成、鄧玉貞、陳漢森、尹麗瓊。我深信一眾朋友集資替她出版這本書，都是本着出一分力圓一個夢的小小心願，微不足道，言謝便顯得矯情了。

此外，淑芳也囑付我記寫下列名字：梁聯發、熊若磐、蔡子強、劉文欽、黃碧雲、許舜莉、郭家麒、方子華、陳瑞蓮、游順釗、鄭宇碩。我也深信，淑芳這些朋友都十分關顧她、痛惜她，更樂意扶她一把，讓她從跌宕中昂起頭來，對他們的支持和贊助特別致謝，也太着迹了。

如果必須表示謝忱感恩，我覺得真的要感謝上天的眷顧和召喚，引領淑芳克服了深藏心底的恐懼，以及抹掉了過份自責

的疚愧。我們所認識的淑芳八九六四時在北京親歷血雨腥風，回到香港後仍然背負著抑鬱重擔，一直纏繞著她下半生的悲情歲月，令人心痛惋惜。如今，我們喜見她終於踏出陰霾籠罩，鬆解六四情結，祝願她創傷已痊癒，為着未來的路，勇毅而舒懷的迎向陽光邁步。

這本書的部分內容，即《廣場 活碑》一六四底層列傳（摘要），已經以單行本印刷，趕及在維園「六四」二十周年燭光集會時免費派發。如今《廣場 活碑》全書已完成，深感欣慰，淑芳和我已決定稍後製作《廣場 活碑》電子書、網上紀念館及簡體本，作為後續，擴大讀者群和匯集「六四」資料檔案。

最後，我必須多謝翻閱過這本書的讀者，更期望你們把「六四」的真相傳遞給被誤導迷惑的青少年，特別是被瞞騙欺壓的內地同胞。

陳國權

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



跋

微紅淚泉

這些年來，都是以淚洗面的日子。寫這篇文章，悲從中來，停了好幾次，伏下痛哭。「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周年祭之後，曾蔭權失言以為自己代表整體香港人，抹殺「六四」記憶，無恥言論，刺傷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良心。

我忘不了、也放不下「六四」，正為書名、序言和文稿章節編排校對煩惱不已。一直想放棄出版，結果我由低調到高調，由無言啞忍到吶喊控訴，由「微紅淚泉」到「劫後餘生」，由一個香港女記者的「採訪實錄」到「六四見證」。最後我自己決定用《廣場活碑——一個香港女記者眼中的六四血光》，於是我必須坦然站在人前現身，公開承認劫後活得不像一個人，而是一塊碑。我幽怨神傷地告訴蘇曉康，我承擔不起這個使命？！我不願享有這個資格？！跌跌撞撞，躲躲閃閃，我痛死過了，已受夠了！我不是耶穌，不是林昭，不是革命者，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柔弱女子，帶著心靈疾患，忍負精神創傷，是無藥可醫，偏執瘋癲的理想主義者。

二零零七年五月，馬力說「六四」不是屠城，沒有發生坦克車壓過人群的時候，我正參加一行禪師的靜修活動，學習心如止水。這番「碌豬肉餅」言論，對我猶如那傷口被灑了鹽，心痛極，氣難消。我匆忙做了一個叫做「中國榮光」(Glory of

China) 的網站紀念「六四」，之後繼續轉貼中國民間疾苦的新聞，回應良知呼喚，撫慰心底傷痕。那是香港回歸十年之際。

二零零八年三月，西藏發生鎮暴流血事件的前夕，網站被黑客轟炸而寂滅。我對網路侵襲已經有了抗體，沒有被它擊倒，但卻一直預感將有天災人禍。五月，緬甸的超級風災和四川的特大地震發生之後，我連電視新聞也不敢看，怕見大地裂變，屍橫遍野。那段日子，我正在整理「六四」資料，重聽廣場恐怖之夜的現場聲帶，又拿廣場請學生簽了名的T恤出來，抄錄那上面遺下的名字和留言。失喪魂靈，死亡陰影，肝腸欲斷，錐骨刺痛。

全國哀悼三天的那一刻，我才稍稍回過氣來，微微有告慰感覺，同體大悲，撫慰生者，送別亡靈。我以為一場毀滅性災難之後，國難興邦，或應學會文明進步，小心處理民眾遇難後的「心理創傷後遺」(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我又以為奪去近十萬人性命，或可喚來全民醒覺，認真追究責任，避免災難重演。

結果，中共黑幕旋即回復原狀，災區豆腐渣貧民工程的證據判詞被界定為國家高度機密，就連學生死難名字也不可尋訪調查，海內外賑災所獲得的破紀錄善款數目，也沒有受惠的指定單位和明確的用途去向。

中共建國六十年，歷次災劫，堆埋無數亂葬墳場和無名墓穴，往往在轉瞬的一年半載之後，便成千古懸案、永恒謎團；單單文革時期的自殺跳河失蹤，和偷渡蹈海來港，就有千千萬萬的浮屍，對這個世道完全不起阻嚇作用，歷史悲劇反覆重演，殺人死傷的天文數字，串成謎樣的機密號碼，化成一個一個政治敏感的紀念日；近在眼前的這幾宗歷史命案，政府漠視天下父母黎民百姓的血淚心史，任之沒入歷史乾涸的河床……



「六四」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罪行之一，我自逃離天安門廣場後即用「屠城」來形容這宗慘絕人寰的血案，中華民族的命脈徹底地爆裂流血。一夜之間奪回廣場，專制獨裁政府指揮軍警國安加強全國人民的圍剿監控，年年月月封存勞役禁鬱。一去廿年，換來經濟騰飛，供養血肉盛世，終成遺傳後代的暴力基因。

這黑暗二十年，真的折磨得人好苦呀！我沒誇大慘況，一人的苦，算甚麼呢？承受得來便得承受，能提起多少就提多少，然而，萬萬不可血流遍地之後，還要強迫洗腦，集體失憶，遺忘舊恨。我驚恐畏懼，因為這不是獨我一人遭受無形迫害，而是黃土地上千千萬萬受壓迫的群體，活得豬狗不如，更苦更慘，更不自由，更為難堪。歲月摧折而衍生出來的無力感和挫敗感，令我曾經討厭自己，為何沒死在廣場？甚至我曾經憎恨自己，為何奮力逃跑？當我以為我該死，或我該入地獄，目擊屠殺現場，又或應親訪停屍間驗明死傷，才足可見證血光，救渡苦劫亡靈的時候，我受不了冤魂的牽引附體，真的有想過自殘了斷，以尋求圓寂解脫。當我經常恍惚走進死蔭境界，對黑暗中的光，生起無明畏怯，究其實相，到底這是開槍殺人的火光，殘留記憶的血光，飛撲燭淚的焰光，抑或是長明引路的靈光？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才認識朱耀明牧師。「六四」凌晨四時，廣場的燈全熄，黑暗忽至，牧師流著淚禱告：「上主啊！祢恩賜人有眼睛，要人在黑暗中看見光明，在光明中看見黑暗，為何……？」之後，他成為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救命恩人。近兩年，他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為他們討回公道，每到傷心絕處，我都會問他：「牧師，上帝何時才肯挪走這隻苦杯？黑暗何時才能過去？」他說：「要奉行神的旨意，黑暗過後就是黎明。」

難道這真是神的美意？究竟主在哪兒？

他說：「有百萬人上街請願抗議，上帝就在這兒！」

但我仍要問：為甚麼一個殘暴政權，為了鞏固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勢，不惜殺死孩子，甚至滅絕種族？為甚麼一個殘暴元凶，聲言殺二十萬人在所不惜，誓要壓垮國家整代精英的脊梁，破滅階級後代平民農工的夢想？一個國家沒有氣節，一個民族沒有靈魂，一個社會沒有良心，殺人者殺瘋了，受害者嚇呆了。我祈求神明給人間一片淨土，留活口一條生路，取消所有被通緝追捕限制入境的黑名單，解除一切牢獄軟禁監視居住的法令，還我中華天賦人權自由，體現公民天倫大愛美善。

六四之後，知我走不出黑暗痛苦而伸手助我還願者，有朱耀明、盧瑋鑾（小思）、司徒華、張文光、蘇曉康、游順釗、劉育港、史明、Freeman、陳國權、黃河清、余瑋琪、鄒幸彤等等，還有很多助緣背後出錢出力，衷心致謝，感銘於心，成書之日，讓我得以暫離廣場記憶，卸下歷史重擔，托付後生記取、永續薪火承傳。

驀然回首，偌大廣場，聖人出，黃河清，沒有份量相當的《六四底層列傳》承托鋪墊，活碑空靈孤絕，無以為繼。燈火闌珊處的那人，不是孤單纖弱蒼白無力的女子，而是黑壓壓低沉沉渴求光明的中國魂靈，依偎聚攏廣場活碑底層，見證國哀、國恥、國殤。人心不死，立誓生成民主自由氣息，崇高穩重，矗立不倒。

最後，我想以司徒華提及的一個故事為本書作結，來自羅曼·羅蘭的《克利斯朵夫》的末段。漫漫長夜，聖者逆流而上，背負沉重使命，為了未來，為了黎明，為了孩子，艱苦奮進，並肩前行，一起走罷。

蔡淑芳

二零零九年五月



聖者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現在他結實的身體像一塊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扛著一個嬌弱而沉重的孩子。聖者克利斯朵夫倚在一株拔起的松樹上；松樹屈曲了，他的脊骨也屈曲了。那些看著他出發的人都說他渡不過的。他們長時間的嘲弄他，笑他。隨後，黑夜來了。他們厭倦了。此刻克利斯朵夫已經走得那麼遠，再也聽不見留在岸上的人的叫喊。在激流澎湃中，他只聽見孩子的平靜的聲音——他用小手抓著巨人額上的一縷頭髮，嘴裏老喊著：「走罷！」——他便走著，偻著背，眼睛向著前面，老望著黑洞洞的對岸，峭壁慢慢的顯出白色來了。

早禱的鐘聲突然響了，無數的鐘聲一下子都驚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後面，看不見的太陽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來了的克利斯朵夫終於到了彼岸。於是他對孩子說：

「咱們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誰呢？」

孩子回答說：

「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羅曼·羅蘭《克利斯朵夫》



